

思想 @ 网络·中国
Idea @ Internet.Cn

剧变的社会中
用新媒体追求正义和归属感
之历史经验的系统表述

杨国斌 著
邓燕华 译

连线力

中国网民在行动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连线的力量
依赖网络但根源于民众
凝聚了人民对自由与正义的渴望和追求

在本书中，杨国斌开创了将舆论形式与舆论实践链接到中国

学》

杨国斌的分析，视野宽阔，数据丰富，对网络行动主义的

re)

杨国斌所阐述的分析视角，重视具体的问题和情景，既有实证和现实性，又有思想和理论性。

——《国际传播杂志》(*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无论是对政治社会学还是对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的学者来说，本书无疑都是一本重要著作。

——《当代社会学》(*Contemporary Sociology*)

在对 [中国互联网] 的社会和政治影响的学术研究领域，本书标志着重要的突破。

——《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

杨国斌博采文化理论与社会运动理论，捕捉“多种互相融合又互相冲突的力量”……阐明互联网带来的真正变革超越国家—社会关系的范式，包含了文化和社会的革命。

——《中国研究书评》(*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杨国斌的《连线力》注定成为经典和必读书。

——《中国信息》(*China Information*)

本书的论点尖锐而明晰……所覆盖的内容几乎无可挑剔。

——《华文传播杂志》(*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杨国斌发展了一个清晰的分析模型，即公民行动的多元互动，从而轻松自如而又令人信服地破解了一系列的二元对立，如通与变、传统与创新、控制与抵抗、风格与内容、商业与政治、政府与群众，等等。

——《亚洲政策》(*Asia Policy*)

上架建议：当代中国、社会趋势

ISBN 978-7-5495-4337-3

理想
国

imaginist
想象另一种可能



9 787549 543373 >

定价：39.00元

思想 @ ideas @ Internet.cn 网络.中国

连线力

中国网民在行动

杨国斌 著

邓燕华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 Citizen Activism Online

by Guobin Yang

Copyright © 2009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Thi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edition is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U.S. edition, specially authorized by the original publisher,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10-3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 / 杨国斌著；邓燕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9

ISBN 978-7-5495-4337-3

I. ①连… II. ①杨… ②邓… III. ①互联网络-信息化进程-研究 ②互联网络-社会影响-研究 IV. ①C913②TP3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1014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联兴华印刷厂

开本：710mm×1000mm 1/16

印张：20 字数：360千字

2013年9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0 001~7 000 定价：39.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信息时代中国公民
如何在客观社会条件的限制下
拓展文化、社区和政治参与

目 录

序 言 中国互联网、公民运动及社会转型新探 / 001

导 论 中国网民在行动 / 003

- 网络行动：身份与抗争 / 005
- 多元互动论的分析路径 / 008
- 技术决定论与被决定的技术论 / 011
- 权力与反抗的辩证 / 013
- 网络行动与抗争文化 / 014
- 网络抗争的经济学 / 015
- 网络行动与公民社会的互构 / 017
- 跨国化与网络行动 / 018
- 情感结构 / 019
- 有关方法论的思考 / 021
- 本书的结构 / 023

第一章 抗争时代的网络行动 / 029

- 1990 年代以来的民众抗争 / 030
- 中国网络行动的兴起 / 032
- 网络行动的特征 / 034
- 作为反向运动的网络行动 / 036

作为认同感运动的网络行动	/ 039
“明”的故事：抗议对糖尿病病人的歧视	/ 043
结论	/ 045

第二章 网络抗争政治 / 051

媒体、权力与抗争：历史回顾	/ 052
1990年代以来的国家权力	/ 053
中国网络控制体制的演变	/ 054
对抗争的审查与控制	/ 057
矛盾与逆流	/ 059
议题机会与议题共鸣	/ 061
依法抗争和艺术性抗争	/ 063
电子隐藏文本	/ 066
结论	/ 067

第三章 抗争仪式与抗争体裁 / 073

文化形式与人的状况	/ 074
现代中国的抗争文化	/ 075
传统仪式的延续	/ 077
网络行动的新仪式	/ 080

电子抗争的体裁 / 084

结论 / 090

第四章 变迁中的抗争风格 / 095

宏大叙事的风格 / 096

网络抗争的戏谑风格 / 097

网络抗争的平淡风格 / 100

环保主义：新公民行动风格 / 103

媒体、内容和抗争风格 / 106

结论 / 109

第五章 电子抗争经济 / 113

社会生产与网络发展 / 114

积极分子对市场策略的运用 / 120

网络公司促进抗争 / 122

虎，虎，明亮如火 / 125

抗争市场化的条件 / 127

网络推手：人为制造争议的可能 / 128

结论 / 131

第六章 网络公民社团 / 137

信息与社团的双重革命 / 138

社团对网络的使用 / 141

社团的网络能力 / 144

联网状况与常用的网络服务 / 146

网络在组织活动中的作用 / 149

网络能力和网络使用的变化 / 152

网络使用的障碍	/ 155
四个环保组织的诞生	/ 156
发展、变迁与挑战	/ 158
结论	/ 160

第七章 网络社区中的乌托邦现实主义 / 167

空间、社区与中国的现代性	/ 169
中国网络社区的发展	/ 171
网络社区中自由的形象	/ 179
网络社区中家园的形象	/ 182
网络社区中的武侠形象	/ 184
一个求助帖引发整个社区的同情	/ 186
一位网侠的诞生	/ 187
隐私与信任	/ 189
自私社会中的利他行动	/ 191
结论	/ 193

第八章 跨国网络行动 / 199

晚近中国历史上的跨国行动	/ 200
在中国的国际 NGO	/ 201
中国之外的国际 NGO	/ 203
网络上的华人离散社群	/ 204
网上“文革”博物馆	/ 207
国内的跨国积极分子	/ 209
跨国行动产生的原因	/ 211
结论	/ 213

总 结	中国的长期革命	/ 219
	文化的革命	/ 223
	社会的革命	/ 227
	草根民主实践	/ 229
后 记	中国网络行动的新发展	/ 237
	网络行动的持续	/ 237
	网络与工人罢工	/ 239
	微博	/ 240
	全面的网络控制模型	/ 242
	形迹可疑的商业行为	/ 245
	复杂的互动和未来抗争的趋势	/ 248
附 录	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	/ 253
	社会运动的文化分析	/ 253
	社会运动的情感动因	/ 256
	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两种情感动员	/ 259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 259
	山西黑砖窑事件	/ 262
	主帖的内容、情感与表达方式	/ 263
	回帖的内容、情感与表达方式	/ 264
	网络事件与当代中国的情感结构	/ 267
附 录	译名对照	/ 271
附 录	参考文献	/ 277

中国互联网、公民运动及社会转型新探

《连线力》英文版 2008 年完稿，2009 年 6 月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至今已有好几年。这些年，互联网产业与文化有很大变化。如今风靡的微博、微信，那时还没有出世。尽管如此，本书在翻译的过程中，并未对原作（*The Power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 Citizen Activism Online*）内容进行更新，以求保留原貌。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舍去近万字内容。另外，则以附录的形式，收入一篇单独发表过的论文。

《连线力》对互联网、公民运动及社会转型的研究，做了新探索。互联网影响的研究，通常把网络作为外在的技术力量，分析它对社会、政治、文化、经济诸方面的影响。研究的重点是揭示具体的因果关系。这种传统的社会科学因果分析法，应用到互联网研究，容易陷入技术决定论的思维模式。本书没有把互联网当作独立的技术力量来看待，而是把它看作新的文化形态。文化形态是历史、文化、制度和实践的产物。因此研究中国互联网，就要分析该文化形态如何在当代中国复杂的制度环境中得以呈现，如何既保留了历史和文化的印

记，又在实践中有所创新。

西方学界研究互联网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大多套用经典的社会运动理论和概念。比如有学者曾分析互联网的运用对政治机会或资源动员的影响。这样的思路，也难以摆脱上述技术决定论的束缚，容易流于简单的因果分析。本书充分考虑到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公民运动的特点，兼采社会运动理论和文化理论及文学理论，从风格、仪式、体裁、情感、象征、历史和政治文化诸方面对中国的网络社会运动进行诠释。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大体分两类。一类侧重动因，另一类侧重结果。本书把互联网和基于互联网的公民运动，看作中国大转型的有机组成部分，既是推动力，也是社会变革的反映。这样，便可以通过对网络运动的分析，揭示社会变迁的动态特征。同时，对社会变迁大格局的把握，也成为诠释网络运动的重要途径。这种探索的意图，在于说明，对社会转型的研究，不论从任何一个现象或角度介入，只要把该现象与大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就有可能获得超越现象自身的发现。

以上探索，能否启发新思考，推出新问题，仰赖读者诸君的批评指正。

在《连线力》的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得到家人和海内外诸多师友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不能一一致谢，只因感激之意一言难尽。不过要特别感谢胡泳教授和丛书主编力促本书的出版，更要感谢西南财经大学邓燕华博士的精心翻译。

杨国斌

2013年5月于美国费城

中国网民在行动

在中国网络文化的所有特征中，我们对最重要的抗争性却知之最少。各种媒体报道和调查报告不断使人对中国网络形成两个错误的印象：控制与娱乐。这两个印象使人错以为，在政府的网络控制下，中国网民在网上除了娱乐，别无他为。因此，中国人民真正的抗争被忽略了，中国网络文化的激进性遭到了抹杀。然而，不仅网络娱乐不是无关政治，就连政治控制本身也是斗争的舞台。中国人生活中的所有其他方面的抗争，充斥于网络空间，并溢到现实生活。不了解与网络相关的民众抗争，我们是否还有可能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

本书研究与网络相关的抗争，我称之为网络行动（online activism）。我的主要观点是，网络行动的形式和动力，来源于多种互相融合又互相冲突的力量，除了政治力量，还有技术、文化、社会与经济力量。因此，网络行动必须被视为多种力量互动的结果，这一动态过程是多维的。出于这个原因，分析网络行动不仅可以揭示网络时代民众抗争新的形式、动态和结果，也将阐明当代中国变迁的一般模式和动态过程。我将展示中国人民如何在网络空间中以及通过网

络创造出狂欢、社区和抗争，并展示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如何改变个人、社会与政治。本书要写的，是网络时代公民的力量。

1994年，中国开通了全功能的网络连接。至2008年6月，中国网民已达2.53亿。在10多年时间里，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拥有上网的机会。在工作和娱乐上，人们越来越依赖网络，由此催生了充满活力的中国网络文化。这一富有创造性的文化，充满了幽默、游戏与不恭，具有参与性和抗争性。中国的BBS、网络社区和博客是全球网络空间最活跃的部分。整整四分之一的中国网民经常光顾BBS论坛。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中可以找到最反传统、最富想象力和最具颠覆性的思想。形形色色的权威遭到质疑和嘲讽。普通人通过网络广泛地参与政治行动，从而获得有关自我、社区和赋权（empowerment）的新认识。所有这些都与至今还用单调的阐述和浮夸的形象宣传权力与权威、以供世人膜拜的官方报纸和电视节目，形成鲜明的对比。整个网络文化在政治控制日益增强的条件下，反而蓬勃发展起来。

学界对中国网络文化的诸多方面都有很多探讨，在网络控制、电子政府、网络民族主义和网络参与方面已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网络控制日益收紧，有些则研究了网络文学社区的形成，还有的探讨了基于网络的政治行动。然而在已有的研究中，这些不同方面的分析之间互不相连。对中国网络文化的力量、动因和内在矛盾，我们仍知之甚少。为什么管制日益加强的条件下，民众抗争仍会产生？网民和公民社会群体如何应对和挑战网络控制？网络行动采取了哪些文化形式？人们如何建立网络社区？网络经济对这些方面有什么影响？网络行动作为一个社会变迁的力量体现在哪里？

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脱离大的社会与历史进程做出孤立的回答。网络空间中的创造性、社区感、抗争与控制之间彼此联系。网络社区既是抗争的社会基础，又是抗争的结果。抗争挑战控制，同时也适应控制。民众抗争和寻求社区归属感是体现人的能动性与创造性的过程。当然，中国网络文化不仅同网络相关，它还反映了更大的潮流。网络空间中的创造性、社区感、抗争和控制，见之于当今生活的其他领域。网络之外的文化、社区与公民行动的发展，与互联网的革命形影相随。本书将展示信息时代中国公民如何在客观社会条件的限

制下，拓展文化、社区和政治参与。中国公民的这些努力，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新公民行动。书中要论述的，正是这一新公民行动与网络相融合的故事。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是通过网络行动的视角透视社会变迁。

□ 网络行动：身份与抗争

网络行动是指通过网络和其他新型通讯技术开展的抗争性活动。网络行动或多或少地基于网络之上。一方面，网络日益同传统的发生于特定地点的抗争相结合。例如，网络可以用来动员线下的抗争行动。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抗争主要发生在网络空间，它可能波及线下，但行动的中心在网上。抗争有强弱之分。那些每天发生在网上的有关社会与政治的讨论和辩论，是较弱的抗争性活动。抗争性较强的活动包括网络运动、签名请愿、直接的口头抗议和诸如虚拟静坐与黑客攻击的直接行动。

行动 (activism) 往往被用来指代具有抗争性的政治活动，但抗争并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行动可以采取文化与社会的形式，同时又不失激进。¹ 在中国现代史上，很多文化与社会活动同政治运动一样具有政治性。在 1970 年代晚期和 1980 年代早期兴起的“朦胧诗”运动，虽属文化运动，但却具有政治颠覆性；崔健的摇滚音乐亦然。² 另外，并不是所有的行动都具有明确的政治目的。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参与的是文化性的抗争，其目的是表达或反对某种价值、道德、生活方式或身份认同。

中国网络行动最吸引人的特征恰是它的模糊性。它有时采取抗争的形式，有时貌似异见，却又不那么明确。用欧博文 (Kevin O'Brien) 和李连江 (Lianjiang Li) 的话说，网络行动具有“跨界” (boundary spanning)³ 性质，它跨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上。还有的时候，网络讨论本来没有政治性，但却被官方解释为政治性讨论。因此，根据最近社会运动研究对行动的最广泛的定义，我把网络行动定义为以网络为基础的倡导、争辩或抵抗变迁的各种集体行动。

中国网络行动的议题，应有尽有。从维护消费者权益到性取向问题，从抗议对脆弱个体和弱势群体造成的伤害到提倡新的生活方式与身份认同。这些议

题大体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争取承认和反对歧视的议题。该类议题涉及认同政治——这一点我将在第一章作详细讨论。另一类议题包括反对根源于严重物质怨恨的压迫与剥削。这两种类型的斗争，与李静君（Ching Kwan Lee）所区分的工人“反歧视抗争”（protest against discrimination）和“源于绝望的抗争”（protest of desperation）有相通之处。⁴只不过在李静君的研究中，反歧视的抗争主要根源于工资未发而造成的物质性怨恨，而网络行动中争取承认的抗争却主要集中在非物质利益的问题。当然，这也仅仅是一个理论上的分类。在现实中，大部分行动涉及相互重叠的物质与非物质利益的诉求。物质利益与非物质利益之间并没有纯粹的界限。

在争取承认的网络行动中，张先著和其他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故事颇具代表性。⁵张先著是乙肝病毒携带者 BBS 论坛“肝胆相照”的网友。2003 年 10 月 10 日他因在公务员录用上遭歧视而状告安徽省芜湖市人事局。在 30 个人竞争 1 个公务员职位的应试者中，25 岁的张先著名列第一。但经过 3 个月的焦急等待后，他于 2003 年 9 月 20 日接到人事局的通知。通知称他因体检结果显示为乙肝病毒携带者，不能受聘。张崩溃了。他向乙肝论坛的网友讲了这件事，立即获得情感和道德的支持。张先著听取论坛网友的意见，向法院提起诉讼。该 BBS 论坛也就此事展开了宣传运动，支持张的案子。新开的维权版的版主找到了四川大学著名法学教授担任张的辩护律师。其他的成员则联系报纸和电视台，寻求媒体对张的诉讼加以关注和报道。论坛还开设银行账户，为张先著募捐。2004 年 4 月 2 日，地方法院作出判决，认为人事局没有理由取消张先著进入考核程序的资格。2004 年 4 月 19 日，中级法院驳回人事局的上诉。该判决标志着在就业方面反乙肝歧视法律行动的第一次胜利，具有深远影响。2004 年 8 月，人事部和卫生部取消了国家《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中有关乙肝的规定，确认乙肝病毒携带者有资格从事公务员工作。该案例的成功说明，人们不仅可以利用网络提供和获得社会支持，而且可以动员和组织集体行动。从那以后，反乙肝歧视宣传发展成全国性的成熟运动。如今虽然该运动仍然依靠网络，但从网络论坛发展而来的社会网络，则变成了重要的社会基础。

对山西省黑砖窑奴役童工的曝光与抗议，是反压迫抗争的案例。⁶2007 年

5月19日，河南省电视台播发一则新闻，对山西省黑砖窑绑架男童做苦役以及父母寻找失踪孩子的痛苦历程做了报道。该节目在河南省内引起关注，电视台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进行了跟踪报道。山西省的报纸也报道了这则新闻。然而直到6月份，该事件才引起全国媒体的关注，并最终导致中央政府介入。该事件从地方新闻转变成全国性议题，与一封发在网上的匿名信有关。该信于6月6日发布在河南省官方网站大河网上，到6月18日，已有30万点击量。信贴出不久，被转载到极具影响力的天涯社区，因而受到更多关注，在同一个时间段点击量达到58万。网上有很多回帖。网民对这21世纪的奴役行为感到震惊，要求惩罚当地砖窑主和那些帮着隐瞒真相的警察和官员。很多人提出了具体行动方式，比如建QQ群保持信息畅通；⁷建应急公民组织，募捐帮助父母及被绑架的孩子；联系国际媒体及宗教组织对事件曝光；呼吁政府干预等等。在这些抗议和动员过程中，全国性报纸、电视台和网站开始大量报道，中央政府派员到山西调查。至7月初，民众抗争浪潮因主要嫌疑人被起诉而消退。

以上仅仅是本书要讲述的很多故事中的两个。这些故事发生在真实的人身上，是他们真实的经历。这些经历以各种形式依赖于网络和其他新信息技术，但又不囿于网络，而是常常延伸到网络之外。故事的主人公具有相当的多元性：他们或是积极分子、异见人士、潜水者、游戏者、黑客和博主；或是环保人士、民族主义者、揭发内情者、女权主义者和理想主义的乌托邦人士；还可能是中学生、研究生、白领职业者、业主、宠物主、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积极分子，或者仅仅是普通网民。尽管来自农村人口的积极参与者要少得多，但农村人口的网络参与亦不可忽视。截至2007年12月，网民中有5200多万是农村居民（占总数的7.2%）。近年农村网民数量的增长速度已经超过城市网民，⁸说明网络在农村获得了快速扩散。此外，农村的网络参与有时还会以其他的方式得到呈现，比如通过网上城市居民的介入，很多网民会参与有关农村社会问题的网络行动。读者或许还记得2005年在网上广泛流传的有关太石村80岁村妇冯珍的感人照片。在那张照片中，冯珍一手拿着扩音器，一手高举着拳头，向正在上访控告村委会主任的村民作演讲。⁹这些间接的呈现同令人震撼的电视形象一样，一旦在网络上得到传播，就会直接起到动员网络公众的作用。

□ 多元互动论的分析路径

网络行动的数量为什么会上升？它的主要形式是什么？呈现出怎样的动态进程？

现有研究已有不少好的观点。许多研究揭示了中国互联网的政治控制的制度特征、操作方法和结构形态。¹⁰也有研究探讨了电子政务的实践，即利用网络和其他新信息技术以提升政务公开、加强政府管理。¹¹还有很多研究从不同方面考察了网络、短信和移动电话在政治、社会与文化上的用途，揭示了知识话语和公众话语的扩张、¹²网络文学社区的形成、¹³社会矛盾的表达、民工等社会弱势群体力量的增强、¹⁴网络民族主义的出现¹⁵以及政治自由主义的影响。¹⁶尽管这些研究有不少已经论及与网络行动相关的问题，比如网络控制与公众表达，但目前还缺乏对网络行动进行系统而深入的专门研究，网络行动还没有在理论上得到阐释。

网络行动是社会科学领域内备受关注的议题，然而大部分社会科学研究，侧重将已有的理论应用到对网络行动的分析中。最典型的研究问题是有关网络在社会运动的不同方面（如动员和框释形成）的作用。例如，有学者通过文献回顾发现，信息和通讯技术通过降低成本、提升集体认同和创造新机会可以促进运动动员。同时，信息与通讯技术也加快并扩展了抗争的传播，丰富了抗争剧码（*repertoire of contention*），促进了分权的、非等级的组织形式的运用。¹⁷这一类研究的优点在于能把网络行动同已有的研究联系起来。然而，有关信息与通信技术是否改变了社会运动某一方面的论点，难以帮助我们获得更深入的认识，因为这些论点受到技术决定论的限制。认为网络改变了民众抗争的某些方面，就是想当然地认为技术自身会产生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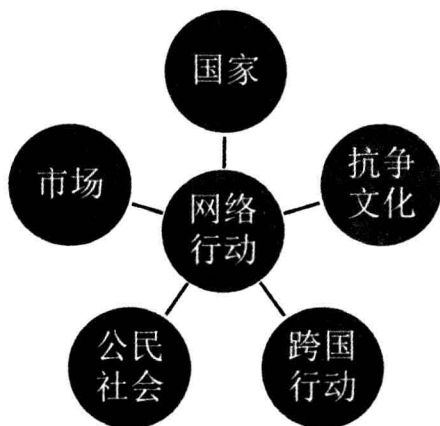
总之，现有研究已经论及中国网络的很多方面，不过虽然这些研究有不少卓见，但它们通常彼此孤立、互不联系。因而对网络行动（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中国互联网）的研究来说，需要一个能把握网络行动的多维动态的分析路径。本书所采用的正是这样的路径，我把它称作网络行动的多元互动模型（*multi-interactionism model*）。

这里所说的多元互动，是指促进和限制网络行动的多维互动。多维互动是信息化与全球化时代日益重要的社会互动环境。它涉及多元主体，产生多种影响。例如，国家政治权力不仅塑造了网络行动，而且通过自我调整以适应网络行动。

具体而言，该分析框架强调网络行动同以下诸方面的互动：(1) 国家权力；(2) 文化；(3) 市场；(4) 公民社会；(5) 跨国行动（transnationalism）。网络行动回应的是中国社会结构性转型导致的怨恨、不公和焦虑。国家权力限制了抗争的形式和议题，但这不但没有阻止抗争的发生，反而迫使行动者变得更富创造性和艺术性。文化作为象征形式与实践，¹⁸ 通过仪式和抗争类型的传统和创新，启发并建构了网络抗争。经济利益体有可能容纳网络抗争行为，尽管也会带有操控的危险。作为公民社会主力的公民组织和网络社区，则策略性地利用网络寻求社会变革。跨国行动扩大了网络行动的规模，激化了行动的形式。以上种种，共同构成了网络行动这一当代中国社会冲突与社会变迁中心的复杂图景。这种复杂的关系可以用图 0.1 加以呈现。

多元互动视角借鉴了社会运动理论的最新发展。近年来，社会运动理论家开始更多地关注关系性的动态（relational dynamics）过程。对于互动关系的关注，是当代复杂社会条件下学术思潮的大潮流。就连著名的结构主义者也已摒弃

图 0.1 网络行动的多元互动模型



狭隘的结构主义路径，而采纳具有关系性与互动性的动态解释路径。¹⁹道·麦克亚当 (Doug McAdam)、西德尼·塔罗 (Sidney Tarrow) 和查尔斯·梯利 (Charles Tilly) 写道：

我们一直以来秉承结构主义的传统。但是，我们在研究欧洲和北美非常多样化的抗争政治的过程中，发现有必要将策略性互动、意识和历史累积的文化纳入我们的分析……我们意识到，人际关系、人际交往及各种持续的妥协形式——包括不同身份间的妥协——在抗争的动态过程中具有核心作用。²⁰

这一表达中所提到的关系的论点，强调的是社会运动内部和人际间的关系。也有学者强调不同制度间的互动。伊莉莎白·阿姆斯特朗 (Elizabeth Armstrong) 和玛丽·伯恩斯坦 (Mary Bernstein) 提出了“多元制度性政治路径” (multi-institutional politics approach)。²¹ 她们认为，在社会运动理论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政治过程模式，把社会运动解释为政治机会、资源动员和策略性框释的结果，²² 夸大了国家的作用，低估了其他制度性因素特别是文化的影响。她们指出，“多元制度性政治”的分析路径也许特别有利于解释跨国运动，因为民族国家在这些运动中是多元主体中的一个。

对多元制度性因素的重视，不仅仅是在批判地回应社会运动理论中的政治过程模型。或许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和抓住了导致当今社会复杂性的新环境。在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Keohane) 和约瑟夫·奈 (Joseph Nye) 用他们“复合相互依赖”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理论描述了这些新环境。“复合相互依赖”的概念，指的是在国际交易中多元主体 (如资金流、商品、人、来自不同国家的信息等) 之间的相互影响，它强调的是多元主体间的互动和互依，突出公民社会主体日益增强的作用，而不是强调民族国家的支配地位。²³ 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后来进一步深化了他们的理论，将信息革命的新环境也纳入他们的理论框架中。他们认为，在信息时代，国家的影响日益依赖于它们保持可信度的能力；非国家行动者 (non-state actors) 现在可

以更容易地挑战国家的这种能力，因为新通信技术赋予公民更好的传播重要信息的方式。²⁴

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一样，也在变得日益复杂化。实际上，多元互动性的概念之所以对分析中国网络行动十分有益，正因为它抓住了当今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中国网络行动的复杂性是其他当代社会现象所无法比拟的，因为它由不同层面（结构的、制度的、个体的、跨国的、跨地方的、地方的）众多政治、社会、经济、技术和人口力量所构成，同时网络行动也促成了这些力量的形成。网络行动是各种力量的汇聚点以及冲突和争论的焦点，因此是这些动态力量互动的典型形式。

接下来，我将详细阐述图 0.1 所示的网络行动的 5 个动态过程，并同主流理论文献对话。首先我对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做简要论述，阐明对网络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 技术决定论与被决定的技术论

有关中国网络的媒体报道和学术研究，容易受到技术决定论观点的影响。不妨举两个常见的观点。有一段时间，流行将网络视为民主化的力量。后来潮流变了，认为网络不会导致民主化的观点得宠。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具有误导性，因为它们都存在同样的误区：过分简单地在技术与社会之间划上因果关系的等号，而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在技术和社会之间，还有非常丰富的人类经验与制度。第二个也就是现在更常见的认为网络不会导致民主化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更成问题，因为它不但没有看到发生在民间的真正变迁，而且轻而易举地否定了成千上万人上网和参与的日常经历。

也有学者在摒弃技术决定论后，走向反面，转而接受了简单的情境论。这本是有益的尝试，但这种尝试最终仍缺乏批判性。因为只看重情境，技术本身变成了表面现象。²⁵ 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称这种误区为“被决定的技术”（determined technology）论。在情境论的观点中，技术变成了结果，这同将技术看作原因的技术决定论一样，把问题简单化了。威廉姆斯区分

了两种技术决定论。在纯粹的技术决定论中，技术被视为“能够创造新生活方式的自我驱动力”，而在“症候式”技术决定论（“symptomatic” technological determinism）中，技术是“为新生活方式提供物质基础的自我驱动力”。²⁶ 第一种观点夸大了技术的作用，而第二种观点却把技术当作偶然的、边缘的力量。这两种观点都忽略了人的意志、目的和实践。

威廉姆斯巧妙地既承认技术的重要作用，又通过强调人与制度的作用，肯定了塑造现实的文化形式。在电视还没有被看作“严肃文化”的时候，威廉姆斯以其开创性的研究，明确地指出了大众文化形式的民主内涵。如果不是在日常生活中，至少在学术研究中，今天的网络文化与1970年代早期的电视文化一样，尚处于边缘地位。尽管威廉姆斯对电视文化的作用有一定的保留态度，但他对大众电视形式的研究，肯定了普通人的创造性。这一点对今天研究网络文化，有直接的意义。

在新兴的网络研究领域之外，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刷媒体发展的研究得到了蓬勃发展。有学者强调人的意志，而不是技术的功能。如琼·贾吉（Joan Judge）关于晚清政治媒体的研究，强调记者和其他文化企业家（cultural entrepreneurs）的作用，同时也突出话语在促进社会变迁过程中的重要性。²⁷ 芮哲非（Christopher Reed）的研究显示，企业家个体决定性地塑造了晚清和民国上海时期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崛起。²⁸ 周启荣（Kai-Wing Chow）认为，“技术如何被使用不是由印刷技术本身决定的，而是取决于其他的因素，即某一特定技术能被发明、吸纳、推销、使用和抵制的生态、经济、社会与政治的条件，以及使用该技术之群体的特定态度。”²⁹

以上的研究强调人的作用，而另一种视角则更关注文本、习俗和文化形式。这一脉的研究直接受到迈克尔·舒德森（Michael Schudson）有关美国新闻史研究的影响。舒德森在他的研究中指出，媒体的力量主要在于它能够提供表达的形式和惯例。³⁰ 芭芭拉·米特勒（Barbara Mittler）在研究《申报》时，关注的是文本而不是情境，她把报纸看作“一个文化现象，一个19世纪引入中国的新形式和新型的文集”。³¹ 她认为，“作为一个文本，报纸通过适应中文写作风格、以‘圣贤语录’的方式言说、摆着谏臣的姿态、利用中国宫廷公报的

权威，获得了一定的象征权力（symbolic power）。”³² 对她而言，《申报》是“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文本，是在风格、语言和语气上具有多重样式的现象，是几个处于不同语言层面和受不同风格控制的具有异质格调的整体累积。”³³

如果 100 年前的一份报纸就可以制造出复调文本和巴赫金式的众声喧哗，这对理解当今网络上无尽的多媒体话语意味着什么？威廉姆斯关于大众文化形式的民主愿景对网络研究有何启示？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揭示普通人通过制造、接受和回应网络上批判性的、抗争性的话语而体现出的民主渴望。比如我在第三章，将提出和阐述这样的观点，即网络抗争是在创造性地利用抗争仪式、惯例和话语风格的过程中形成的。网络行动依靠当代中国民众抗争的传统，同时又创造出自己的文化特征。

□ 权力与反抗的辩证

最近几年，因新一波抗争浪潮的兴起，学界对民众抗争做了大量的研究。研究展示了中国民众抗争的新的多元图景。³⁴ 有学者探讨了农村抗争、工人抗争、宗教骚动、妇女行动、大众民族主义、环境运动、业主维权和 NGO 行动等等，说明 1990 年代以来抗争的普遍性和抗争形式的多元化。然而一般来说，这些研究只关注某一个具体领域的抗争，比如工人或农民抗争，而没有探讨为什么抗争会出现多种不同的形式，以及抗争形式的多元化如何影响社会变迁。

网络行动是新的行动方式。它促使我们思考抗争的方式、图像、符号、话语和仪式，及其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关系。形形色色的网络行动到底有多新？这些形式意味着中国民众抗争的环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它们如何反映国家权力性质的变化？

长期以来，社会理论家都在争论权力与抗争的关系。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机会结构。一些著名的学者认为，政治环境越开放，越有可能促进动员。³⁵ 但也有学者反驳说，政治机会也是个认知问题，客观存在的机会未必受到注意。³⁶ 而且机会之门的突然关闭，事实上会刺激抗争者而导致动员。另外，镇压也会导致革命。³⁷ 还有学者对政治机会加以分解，将政治机会与不同形式的抗争

联系起来，而不是仅仅泛泛地讨论机会与抗争的关系。戴维德·梅耶（David Meyer）和黛博拉·敏科夫（Debra Minkoff）认为，“政府可能允许某一类行动，但同时关闭其他行动的机会”。³⁸ 还有学者提出，制度的开放程度，会影响抗争是否采取暴力的形式。当政治结构相对开放时，人们可能通过制度化途径，采取温和的、非暴力的抗争形式。当政治结构呈现封闭状态或者制度化途径不起作用时，激进的、非制度化的抗争形式就可能出现。³⁹

权力塑造抗争。至于权力如何塑造抗争、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抗争，则并不很清楚。在分析国家权力与网络行动的关系时，首先，我认为国家把网络行动引向了特定的议题。换句话说，网络行动会受到特定议题的政治机会的影响。那些在政治上更容易被容忍、更能在公众中引起共鸣的议题，进入公共视野并成为抗争事件的可能性更大。其次，当国家权力企图控制网络时，网民和积极分子会创造性地予以应对。在中国复杂的媒体环境下，⁴⁰ 人们并不是“被俘虏的观众”，而是“熟练的行动者”。⁴¹ 他们熟练地使用网络，擦着“官方认可的行动方式的边界”，⁴² 合法地、正义地与网络控制讨价还价，巧妙地表达抗争。第三，虽然权力约束抗争，但它同时也在回应和适应抗争，互动的结果是权力和抗争都发生了变化。网络控制和网络行动之间的这种互动关系，尚未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我在本书中说明，国家权力和网络行动的形式和实践，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复杂。它们互动着，彼此适应着。网络行动与网络控制在过去 10 年中的共同演进，为我们认识它们互动的结果，提供了准试验性的个案。

□ 网络行动与抗争文化

在 1990 年代，有学者通过分析 20 世纪初期和 1980 年代的抗争活动，率先对现代中国的民众抗争文化进行了研究，⁴³ 他们分析的重点是仪式、表演和话语。后来一波的研究转向了市场改革加快过程中产生的工人和农民的抗争，⁴⁴ 尽管部分学者对这些抗争中的文化策略给予了关注，⁴⁵ 但他们大多还是采纳了社会运动理论的政治过程模型，而没有将文化作为分析的核心。

研究网络行动必须重新关注抗争文化。与其他任何形式的抗争相比，网络行动更多地贯穿着文化的形式。它通过制造和传播符号、图像、话语和声音来动员集体行动，这一过程以文化习俗的创新和使用为特征。为了理解文化如何建构网络行动，我们必须分析：（1）现代中国民众抗争的文化传统如何被继承和再造；（2）抗争文化出现了何种创新以及这些新形式如何影响网络行动。本书将通过考察网络行动的仪式、类型和风格来回答这些问题。我认为，网络行动的这些文化形式是通过动员情感来动员集体行动的。网络抗争的符号、话语、图像和仪式，能够特别有效地引起人们在道德情感上的共鸣。

抗争文化既包括抗争表演，也包括诸如叙事、语言、图像和音乐等符号资源。⁴⁶ 分析网络行动的仪式和体裁，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独特的理解文化如何促进行动的视角。⁴⁷ 风格是文艺表达和政治表达的重要元素。我将在第四章中说明，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表现出多种风格，有的具有英雄史诗的特征，有的则具有散文的风格。风格具有时代或集体的特征。在文学艺术领域，风格是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艺术流派的标志。如果中国社会正经历历史性的变迁，那么这些变化完全有可能反映在民众抗争的风格上。因此，分析抗争的风格，不仅能够解释文化与网络行动关系的新特征，而且也有可能揭示历史发展的通与变的宏大轮廓。

□ 网络抗争的经济学

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研究中国的宣传体系时认为，尽管宣传机器仍发挥一定作用，但宣传部门控制信息的能力日益削弱。他把这一结果归因于几个因素，如媒体的商业化、全球化、技术的尖端化以及公众意识的增长。⁴⁸ 本书认为，市场、技术和公民社会这些因素，削弱了官方控制信息的能力，促进了网络行动的兴起。市场、公民社会、全球化是网络行动多元互动模型中的三个核心因素。每个因素的互动，都发生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与本书分析框架中的其他因素相联系。

网络行动与市场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共振关系。说其特殊，是因为这种

共振在其他抗争形式（如街头示威）中并不常见。这种共振是网络抗争与网络经济互动的结果。网络经济可以从推动网络抗争中获益，而抗争多发生于商业网站而非官方网站上。这是因为网站的生存依赖流量，而诸如网上辩论这种抗争性活动和其他形式的互动，则可以提高流量。这背后的逻辑就是尤亥·本科勒（Yochai Benkler）所阐述的非专有性社会生产的逻辑（nonproprietary social production）。⁴⁹在社会生产中，正是网民和消费者通过同辈群体的共享、草根式的共同生产（peer production），及规模巨大的讨论和互动，创造了大量的网络信息。抗争事件引发社会互动（反之亦然），增加网络信息流量。近几年中国主要的网络行动个案，均表现出这样的互动特征。经济利益体对抗争的影响，其意义虽有可商榷处，但仍然十分重要。经济利益体是否间接地对民主参与有所促进？商业利益的控制有什么样的危险？

对中国的市场发展与民主化的关系，在政治学和传播学界争论已久。在关注市场变迁与媒体开放的研究中，赵月枝的著作具有代表性。她有力地指出，媒体的商业化改变了党与媒体的关系，但结果不是促进民主化，而是加强了党的控制和市场逻辑的交织（interlocking）。赵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批判，比对政党控制的批评尤甚：“时下党的控制与市场力量的纠结虽然很成问题，但单单依靠完全的商业化，以及用市场控制替代政党控制，也不会产生民主的媒体传播系统。”⁵⁰对赵而言，媒体商业化的最大危险是媒体不再关注社会公平与正义问题。她指出报纸对农民和工人的关注已经削弱。当然，赵在这一研究中基本上只关注报纸。她最新的研究，讨论了新媒体具有成为揭示社会问题的途径的潜能。她指出了一个意外的讽刺：作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的新信息技术的快速增长，“一方面对中国令人惊叹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导致极端不平等的社会发展”。⁵¹市场与民主之间的矛盾和暧昧关系引发了持续的讨论，目前尚无定论。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关系在任何情况下只能是一个历史的关系。在某些时候，在一定条件下，市场的某些元素可以促进公民事务上的民主参与，但这些条件变化不定。我将根据对网络行动的分析，说明网络经济和网络抗争的这一协作有助于抗争的产生和传播，但也不能排除操纵的可能。

□ 网络行动与公民社会的互构

多元互动模型的另一要素是公民社会。所谓公民社会，是指公民社团，⁵²既包括正式的有组织的群体，如非政府组织（NGO）、非盈利组织（NPO）及五花八门的民间或非官方组织，也包括诸如网络社区等非正式的、草根公民群体。

我这里论述的公民社会，不具有规范性（normative）特征。有关公民社会的研究，大多认为公民社会代表公民反抗压迫性的国家。这种观点是1989年东欧国家倒台后出现的历史建构。很多学者认为在当时的东欧国家，公民社会（如教会和自愿组织）是推翻国家政权的关键力量，⁵³因此推论公民社会与民主具有内在的联系。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公民社会与民主的关系是有待验证的经验性关系，而没有天然的逻辑关系。⁵⁴另外，葛兰西的公民社会概念具有双重特征。⁵⁵一方面，它包括教会、工会和其他公民组织的中层社团，这些社团是国家霸权的组成部分，它们延伸了国家的控制范围。另一方面，这类组织又根植于社会和人民之中。因为公民社会具有这种双重特征，它没有天然的好坏，而是“政治斗争尤为激烈的特殊领域”。⁵⁶因此，公民社会的拓展，只表明政治斗争舞台的拓展。

我的观点是，在当今中国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公民社会与网络行动呈相互建构的特征。公民社会引发网络抗争，同时抗争激活公民社会，并推动它的发展。网络行动与公民社会的相互建构，呈现共同演进的轨迹，⁵⁷网络行动与公民社会齐头并进。在有关美国⁵⁸和前东欧国家⁵⁹的NGO与网络互动关系的研究中，也有类似观点。在中国史学界，林郁沁（Eugenia Lean）对1930年代公众同情（public sympathy）的研究，强调公众形成的过程特征。公众在形式上的制度化程度很低，因此它的形成基本上依赖媒体事件的过程。林郁沁所强调的是公众的过程特征，而不是其空间或制度特征。公众并不是简单地存在，而是在日益发展的城市消费主义和现代媒体文化的条件下被“呼唤”出来的。

本书从两方面考察公民社团组织与网络行动的关系。一是有关现有公民社团组织如何使用网络，以及网络的使用怎样影响组织发展和认同。另一方面是

关于网络社区的形式和动态过程，主要分析网络社区的特点，网络社区是否孕育社会运动，以及孕育了什么样的运动。

□ 跨国化与网络行动

跨国化是多元互动视角的最后一个元素。跨国化是指国界之间的流动，这是当今世界的新条件。跨国化最常表现在人、钱、物、文化产品、符号和思想的跨国性流动。有学者认为，如果一个行动满足以下任一条件，它就具有了跨国特征：(1) 行动关注跨国议题，如环境与健康问题；(2) 积极分子拥有不受地域范围所限的组织结构，或者关注本国之外的议题；(3) 行动采取了跨国策略，如基于网络的动员；(4) 行动的目标在积极分子所在国家之外；(5) 积极分子认为自己是“全球公民”。⁶⁰ 最后一个条件值得商榷，因为全球公民的概念本身具有模糊性。除此之外，跨国化的概念足以涵盖我观察到的中国跨国网络行动的类型。

传统的社会运动理论以国家为中心，更晚近的研究则开始关注跨国行动。玛格丽特·科克 (Margaret Keck) 和凯瑟琳·西金克 (Kathryn Sikkink) 的研究展示了国内的积极分子如何通过国际回飞镖的作用 (international boomerang dynamic)，挑战国内的国家行动者。⁶¹ 西德尼·塔罗分析了跨国行动内化与外化的双重过程。⁶² 萨斯基亚·萨森 (Saskia Sassen) 着重分析了新信息技术如何使新的全球性聚合体 (global assemblages) 成为可能，以及如何帮助地方行动者参与全球政治。⁶³ 一般认为，跨国联系通常以牺牲地方整合为代价，但斯达克 (Stark)、韦德里斯 (Vedres) 和布鲁斯特 (Bruszt) 在研究匈牙利的公民社会组织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发现，公民组织可以在扎根本土的同时保持全球化的联系。⁶⁴

在我分析网络行动的多元互动模型中，跨国化是不可或缺的部分，这既是因为跨国化是中国网络行动的显著特征，也因为它与模型中的其他因素相互影响。当中国的公民群体与他国的同类组织群体建立联系时，中国公民社会就具有了跨国特征。随着抗争方式、话语及符号的文化转换 (cultural translation)

和跨国传播，抗争文化同样呈现出跨国特征，博客和 Flash 动画影片的跨国传播就是例子。更重要的是，跨国化直接影响了国家的地位和力量。跨国化并不意味着国家的衰弱，但它对积极分子如何在信息时代利用新的政治机会、资源、联盟、文化框释和传播技术以挑战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谈判方面，提出了新的问题。⁶⁵

中国网络行动有哪些跨国的维度？跨国化又如何影响网络行动的动态过程？本书第八章指出，跨国化拓展并加强了网络行动，导致了行动规模和强度的升级。⁶⁶ 具体地说，我将区分两种类型的跨国网络行动，即源自中国国内和源自国外的网络行动。地域政治大体可以解释这两种行动类型的不同。但在每种行动类型中，却又有或偏激或不甚偏激的形态。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是因为其他一些条件的作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积极分子个人的经历和身份认同。

□ 情感结构

我们可以把网络行动视为正在形成中的社会型构 (social formation)。威廉姆斯将社会型构看作“有意识的运动和趋势，它们一旦形成，通常很容易被辨识。”⁶⁷ 然而，当新的社会型构变得轮廓清晰之时，它已经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不是处于正在形成的过程。”威廉姆斯还认为，“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就这些已经形成的制度、型构和经验进行分析，因为这些过程一旦完成，便以固定明确的形式出现，而鲜活的存在 (living presence) 在本质上却在消失之中。”⁶⁸ 这一鲜活的存在就是威廉姆斯所说的情感结构 (structures of feeling)。对“鲜活的存在”的捕捉，应该是社会科学努力的方向。他还指出，情感结构也可以定义为经验的结构：

只不过经验结构的概念含有一层过去的意思，这层过去的涵义是认识我们所要界定的那层社会经验的障碍。我指的是冲动、克制与语气这些独特的元素，特别是意识与关系这些情感性的方面；我们不是将情感与思维对立起来，我们探讨的是被感受到的思维 (thought

as felt) 和思维的情感 (feeling as thought)。这是一种当下的经验意识，它存在于鲜活的、有内在联系的动态之中。⁶⁹

社会上出现新的情感结构，表明这个社会经历了重大的变迁。如果网络行动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社会型构，那么它应该能揭示中国社会中一些新情感结构的元素。我将在结论部分尝试描述这些元素。但在导论中把这个任务提出来，很有必要。这样做，是对时下中国研究领域和一般社会科学的新媒体研究中某种倾向的有益批判。这种倾向体现在给网络贴上数字化乌托邦 (digital utopia) 和数字化崇高 (digital sublime) 之类的标签，从而抹杀网络的重要意义。⁷⁰

这类标签化有若干表现形式。有人认为，网络是虚拟的世界，虚拟的就是不真实的。还有人认为，人们在网上做的事情，只不过是他们一直都在做的事情的延伸，因此价值不大，不值一提。还有一种观点最具误导性，即认为网络之所以看起来重要，只不过因为它是新事物，人们对它还抱有好奇心；而一旦网络融入日常生活，它将一切如故，迟早会过时。这些论断通常是在比较电话在现代美国历史上的命运后作出的。作为对过往事件的历史性回顾分析，这类研究的价值，在于揭示了历史的重复性特征。但是，虽说历史经常有所重复，但这并不意味着重复历史的人们就白白浪费了生命。我们现在对网络的痴迷，可能类似早期人们对电话的痴迷。同电话一样，网络即便不会直接促进我们的社会公正和平等，但人们却在对网络的痴迷中生活过，经历过，甚至抗争过。这种历史的经历有其内在价值。这是我们研究互联网所具有的独特优势。我们虽然没有后见之明，但却能幸运地有机会直接观察人们的网络经历，与他们交谈，耐心地倾听，并与他们一同感受和思考。网络行动正是这种鲜活体验的重要成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网络行动，绝不局限于网络行动本身。网络行动实则是观察正在形成中的社会情感结构的一扇窗口。

正如威廉姆斯所指出，分析情感的产生与结构同时也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种方法论的意义是：

不把具体的质变，想当然地视为制度、形构与信仰变化的表象，

也不把这类变化看成是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经济社会关系变化的反映。同时，从一开始就把这些变化当作社会的经验，而不是“个人的”经验，或社会中的肤浅的、偶然的“小变化”。⁷¹

本书将展示网络行动的种种画面，讲述访谈对象的故事，引用大量通过网络民族志（online ethnography）方式搜集的 BBS 回帖，列举网络自传的个案，并在其中一章，综合分析抽样调查数据与定性数据。这样做，不仅是讲述个人的故事，也要解释网络行动的兴起及更广泛的社会变迁图景。全书的旨意，是对中国人民在剧变的社会中，使用新媒体技术去争取正义和寻找归属感的广泛历史经验做出表述。

□ 有关方法论的思考

为撰写本书我做了大约 10 年的研究。1999 年年末我开始搜集网络上有关社会议题方面的资料，那时我正在研究知青的怀旧现象。互联网出现后，很多知青建了个人主页，主页一般取名为“知青之家”、“中国知青”等。从 2000 年到 2002 年，我积极参与一个由知青群体组建的 BBS 论坛，并最终加入这个网站的志愿管理团队。该团队的成员有的来自中国不同地区，还有的来自海外。团队通过 BBS 论坛和邮件组，完全在网络上运转。团队成员知道我是一个参与观察者，正在做相关研究。

这一经历让我坚信通过直接参与，了解网络文化的重要性。研究网络文化就像学习一门新的语言。浸染（immersion）是最重要的方法，但浸染于网络空间这一方法也有其误导性的一面。新事物总会产生，网络不断发展，不管是在技术、社会、文化还是政治方面。所以研究网络的确看起来像是打一个移动的靶子。但是，随着研究和写作的深入，“移动靶子”的理论不再让人信服，“鲜活记录”（living record）的理论变得更为合适。诚然，网络每天都在变化。但那并不意味着昨天发生之事到今天就失去了意义。事实上，过去的每个小发展都成为当下的一部分。网络的发展就像人或社会的成长一样，过去总是部分地

构成了当下的本身。如果从这一角度看,那么就没有一个网络研究会真正过时。在特定时间地点搜集到的材料,是网络在那个时候的鲜活历史记录。

因此,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为这项研究搜集了繁多的材料。除了上面提到的参与观察的经验,其他主要的研究方法类型和数据搜集方案如下。

(1) 从2000年5月23日到6月4日,我每天平均花6个小时的时间,跟踪一个围绕北京大学学生被杀的网络抗争的发展。我选择了6个BBS论坛进行集中的观察。

(2) 2001年,我搜集了74则个人如何邂逅网吧的故事。这些故事在1998年到2000年间最先发表于新浪网。我把这些个人故事称为“网络自传”。这些网络自传对理解网络经验十分重要。⁷²再后来又搜集了更多的网络自传。

(3) 2001年,我对4个BBS论坛(两个在中国,另两个在北美)作了内容分析,以理解它们在互动层面和议题呈现上的不同。

(4) 2002年夏,我对中国环保非政府组织(ENGO)的网络使用状况做了调查,采访了14个ENGO的工作人员,包括4个网上的组织。

(5) 从2002年到现在,我加入了6个NGO邮件组,包括一个网络慈善组织。我通过邮件组发来的通讯观察它们的发展。

(6) 2003年,在戴建中教授的直接支持下,我对中国民间组织的网络使用情况做了一次调查。调查样本是城市地区的550个公民组织,实际收回129份有效问卷。该调查数据是第六章分析的基础。

(7) 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2月,我对中国环保NGO网站使用情况做了调查。在74个环保NGO样本中,40个拥有网站。我研究了40个网站的内容。

(8) 2005年,我从新浪网成立1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搜集到33个网络自传。

(9) 2007年夏,我访谈了20个不同类型的网民,包括商业网站的编辑、官方网编辑、博主和其他普通网民。另外,我请人撰写了18个网络自传。

(10) 从2007年4月到2008年4月,我用匿名的方式开了个人博客,增进我对中国博客文化的了解。

(11) 在过去10年左右的时间里,我研究了众多网站,密切关注主要大型网络社区,包括天涯、搜狐、网易、新浪和强国论坛。单在—项有关中国“文

化大革命”在网络上的呈现的研究项目中，我就分析了 100 多个网站。在 2005 年因全国性打压使大学 BBS 文化受到影响前，我也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追踪几个大学的 BBS 论坛。

(12) 最后，我也使用了有关中国网络发展的大众媒体报道，包括主要的报刊杂志和主流的英文媒体报道。我研究的中文杂志中，主要包括两个有关网络的杂志：《互联网周刊》和《网络传播》。

从以上的研究纪事可以看出，本书的研究结合了定性和定量的方法，但主要是定性方法，特别是参与观察、访谈和内容分析。网络参与观察已经被发展成一套成熟的方法，称作虚拟民族志 (virtual ethnography)。⁷³ 在我的研究中，我整合了多址民族志 (multisited ethnography)⁷⁴ 和全球民族志 (global ethnography)。⁷⁵ 因为网络具有全球的、网状联系的特征，所以网络研究必须要有理解这些全球化联系策略。中国网络行动的多元互动过程，同样要求关注抗争在多个网站中的扩散。不管是跟踪正在发生的抗争事件，还是寻找过去抗争事件的资料，我都感觉自己像个游击民族志研究者，从不同链接中按图索骥地追踪各种网站，或在网下寻找所需的信息。希望这些丰富的原始材料在本书中以连贯统一的故事，呈现给读者。

□ 本书的结构

本书根据上述分析框架，按不同主题分章节。第一章追溯网络行动的结构根源。其他章节分别考察网络行动的 5 个动态过程，其中有关文化和公民社会的讨论各占两章。每一章的开头都会对该章的主要问题作简短的历史讨论，从而建立历史渊源和背景。例如，在第二章有关权力与抗争的研究中，我讨论了网络控制方式的演变。又比如，网络社区一章对网络社区发展作了历史性的总揽。这些历史性总揽提供了大的历史背景和网络行动的环境。这类历史概述，是勾勒中国网络社会史的初步努力。

第一章将网络行动同 1989 年政治风波和中国当今更广泛的抗争图景联系起来。该章说明，新公民运动自 1990 年代以来得以兴起，网络行动是其有机

组成部分。本章提出，网络行动通过两种方式回应中国的市场转型。它既是反压迫的运动，也是寻找归属感与自尊的认同运动（identity movement）。

第二章考察网络行动产生的政治条件，以及网民创造性地同政治管制谈判的方式。在过去的10年里，网络控制的范围变得更广，控制力更强，形成了一整套网络管制的制度和操作方法。在这种环境下，网络积极分子用三种方式应对政治控制：依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艺术性抗争（artful contention），以及信息化时代的电子隐藏文本（digital hidden transcripts）。网络行动中的主要议题，反映了抗争者所面临的政治上的限制和社会环境的影响。

第三、四两章通过对仪式、类型和风格的分析，研究网络行动的文化。第三章通过研究网络抗争的仪式和类型，发现网络行动的文化虽与中国现代史上的抗争文化保持一定的连续性，但也有重要的创新形式，表明抗争领域的拓展。第四章比较传统学运和网络行动的抗争方式，发现抗争文化已经从宏大的、史诗般的抗争方式转向了更平凡、更戏谑的方式。这一转变反映在媒体技术和行动内容上。第五章考察一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关系：经济与抗争的关系。该章说明，积极分子正在采取市场的策略，以实现他们的目标。同时，网络公司把推动网络事件当作一种运营方式。这一个互动过程尽管存在着被操控的危险，但是抗争经济的确有利于网络行动。

第六章根据问卷调查，研究公民社团网络能力的类型和网络使用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公民社团的网络设备虽然很一般，但网络使用的水平却十分突出，特别是那些致力于社会变迁的组织。对网络环保群体所作的个案研究，补充了定量调查分析，进一步说明公民社团与网络发展共同演进的特征。

第七章从正式的公民社团转向网络社区，探讨网络社区成为抗争温床的原因。我认为，尽管网络社区发挥了很多实际的和功利性的作用，但最吸引那些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网友的方面，是网络社区作为希望与想象空间的特征——即网络社区的乌托邦现实主义（utopian realism）特点。网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赋予网络社区以自由、团结和公正的价值。这些价值又转而促使他们以实际行动，捍卫这些价值。

第八章考察中国网络行动跨国化的原因和结果，发现跨国化扩展了中国网

络行动的规模，使之从地方走向国际，同时也促进了更加激进、更具颠覆性的网络行动的产生。

结论部分总结本书的观点，考察更宏大的社会变迁问题。我认为网络行动是在当今中国正在展开的长期革命（long revolution）的标志。这一革命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转型交织在一起。这些转型主要表现在文化的创造、公民参与和组织化，以及公民的非正式民主（unofficial democracy）。作为中国新公民行动的一部分，网络抗争的沸腾表明革命的动力有所复苏。网络的力量在于昭示这种动力，表达人们愈来愈强烈的追求更公正和更民主的社会的渴望。

注释

- 1 正如新社会运动理论所倡导的，过去几十年的社会运动已经采用了新的形式。它们可能以“潜在网络” (submerged networks) 和“隐形实验室” (invisible laboratories) 的形式存在着。这些运动中的很多活动没有明确的政治挑战，但包括选择非传统生活方式、使用新的符号、采纳与主流社会情趣和价值观相冲突的文化实践等。参见：Melucci, *Nomads of the Present*, 205。对社会运动感兴趣的社會学家，开始在明确的政治行动之外，更关注日常生活与文化政治。比如，惠蒂尔 (Whittier) 认为激进女权运动的持续，应该“不仅通过运动建立的组织，而且通过它的非正式网络与社区，以及那些将运动传播到其他环境下的分散的女权主义者。”参见：Whittier, *Feminist Generations*, 23。另见：Almanzar, Sullivan-Catlin, and Deane, “Is the Political Personal?”
- 2 See Baranovitch, *China's New Voices*.
- 3 O'Brien and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 4 Lee, *Against the Law*.
- 5 下述案例的信息来源为媒体报道、从乙肝病毒携带者开办的主要网站上搜集来的信息，以及一个运动组织者在 2007 年 10 月回顾反乙肝病毒歧视运动的历史与发展的公开演讲。
- 6 以下故事根据主流媒体报道及从天涯社区论坛中收集到的信息整理而成。特别参见：段宏庆、王和岩，“黑砖窑事件：舆论的有力与无力”；朱红军，“陕西的黑砖窑风暴被她点燃——辛艳华”。我还受益于如下篇文章：Shi Zengzhi and Yang Boxu, “Civicness as Reflected in Recent 'Internet Incidents' and Its Significance.”
- 7 QQ 是腾讯公司提供的网络聊天工具。这一简单的软件使腾讯公司建立起巨大的消费者基础，使其成为中国最大的网络公司之一。
- 8 中国互联网络中心，《农村互联网发展状况调查报告》。
- 9 东南西北这一很受欢迎的博客网站，有一则关于这些抗争以及冯珍形象报道，参见：http://zonaeuropa.com/20050919_1.htm，获取日期：2007 年 2 月 29 日。
- 10 Qiu, “Virtual Censorship in China”；Chase and Mulvenon, You've Got Dissent!；Kluser, “The Architecture of Control”；Corrales and Westhof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Political Regimes”；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
- 11 Holliday and Yep, “E-government in China”；Hartford, “Dear Mayor.”
- 12 Barne and Davies, “Have We Been Noticed Yet?”；Yu, “Talking, Linking, Clicking”；Zhou,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 13 Hockx, “Links with the Past.”
- 14 Chu and Yang, “Mobile Phones and New Migrant Workers in a South China Village”；Damm, “The Internet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Chinese Society”；Latham, “SMS,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China's Information Society”；Law and Peng,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ern China”；Zhao, *Communication in China*.
- 15 Wu,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 16 郑永年的研究很好地搜集了网络行动的主要事件。他特别关注这些事件的政治影响。他指出：“问题的关键已经不再是这些网络集体事件是否可能，因为这些集体行动在中国正变得日益流行……问题的关键是，网络集体行动能否成功地挑战国家。”Zhe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136.
- 17 Garrett, “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 18 在一本有关现代中国抗争文化的开拓性著作中，裴宜理 (Elizabeth Perry) 在导论中借鉴了革命研究的新文化主义路径，强调抗争与镇压中的语言、符号和仪式。参见：Perry, “Introducti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Revisited,” 6.
- 19 参见：Diani and McAdam,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 20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22.
- 21 Armstrong and Bernstein, "Culture, Power, and Institutions."
- 22 有关政治过程模型的经典论述。参见：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 23 Keohane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 24 Keohane and Nye,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 25 周永明的研究很细致，但也受到情境主义的影响。参见 Zhou,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 26 Williams, *Television*, 6.
- 27 Judge, *Print and Politics*.
- 28 Reed, *Gutenberg in Shanghai*.
- 29 Chow,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253.
- 30 Schudson, *The Power of News*, 54.
- 31 Mittler, *A Newspaper for China?*, 4.
- 32 同上，5。
- 33 同上，7。
- 34 很多研究在后面的章节中会引用到。我在这里仅提一些 2005 年以后发表的作品：Cai, *State and Laid-off Workers in Reform China*; Ho and Edmonds, eds.,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 Lee, *Against the Law*; O'Brien and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Perry and Goldman, eds.,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and O'Brien,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 35 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 36 O'Brien and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 37 Goodwin, *No Other Way Out*.
- 38 Meyer and Minkoff, "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1463.
- 39 Almeida, "Opportunity Organizations and Threat-induced Contention"; Kriesi et al.,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 40 Donald and Keane, "Media in China," 15.
- 41 Pan, "Media Change Through Bounded Innovations."
- 42 O'Brien and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2.
- 43 Esherrick and Wasserstrom, "Acting out Democracy";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Wasserstrom and Perry, eds.,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Perry and Li, *Proletarian Power*.
- 44 O'Brien and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Lee, *Against the Law*; Chen, "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Chinese Factories"; Cai, *State and Laid-off Workers in Reform China*.
- 45 比如，李静君研究了历史和记忆作为抗争资源而被使用的现象。参见：Lee, *Against the Law*。欧博文和李连江也关注依法抗争的话语方面。
- 46 Tilly, *Stories,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Change*; Polletta, *It Was Like a Fever*; Alexander, Giesen, and Mast, eds., *Social Performance*; Jasper,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Jasper and Young, "The Rhetoric of Sociological Facts."
- 47 仪式和类型经过长期而逐渐的过程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具有相对固定的性质。它们是既促进又限制行动的文化结构。同时，仪式和体裁唯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具体体现。比如，仪式或体裁只有经过人们的实践之后，才能具体呈现出来。同一仪式按不同的方式践行，该仪式会渐渐地分化。结构与行动的双重问题是当代社会学理论的中心议题。参见：Sewell, "A Theory of Structure."
- 48 Shambaugh, "China's Propaganda System."

- 49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 50 Zhao, *Media, Market, and Democracy in China*, 186.
- 51 同上, 111。
- 52 一个经常被引用的概念将公民社会界定为“自愿的、自我生成的、(大多)自我支持的、独立于国家的、受法律或共享价值限制的有组织的社会生活领域。”参见: Diamond,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5. 公民社会是否拥有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 在学界有争议。有学者将它视为规范性的标准, 也有学者把它当作有待研究的经验性问题。关于公民社会相对国家的自主性程度问题, 我不作先验性的假设, 而将它看作有待研究的经验问题。
- 53 哈贝马斯 (Habermas) 指出, “公民社会这一概念的兴起, 主要是因为对彻底废除政治公共空间的做法的批判, 特别是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异见人士的批判。”参见: Habermas,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Public Sphere,” 454.
- 54 White, Howell, and Shang,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Alagappa, “Introduction.”
- 55 Cheek, “From Market to Democracy in China.”
- 56 Castells, *The Power of Identity*, 9.
- 57 Yang, “The Co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 58 Warkentin, *Reshaping World Politics*.
- 59 Bach and Stark, “Innovative Ambiguities.”
- 60 Piper and Uhlin, “New Perspectives on Transnational Activism,” 5.
- 61 Keck and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 62 Tarrow,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 63 Sassen,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 64 Stark, Vedres, and Bruszt, “Rooted Transnational Publics.”
- 65 Smith, “Explo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Glob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258; Grugel, “State Power and Transnational Activism.” 有关网络时代国家的角色, 参见: Everard, *Virtual States*; Goldsmith and Wu,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 66 有关规模的扩大, 参见: Tarrow and McAdam, “Scale Shift in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 Tarrow,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 67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119.
- 68 同上, 128。
- 69 同上, 133。
- 70 See, for example, Mosco, *The Digital Sublime*.
- 71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131.
- 72 有学者称这些故事为“技术自传”。参见: Kennedy, “Technobiography.”
- 73 Hine, *Virtual Ethnography*; Constable, *Romance on a Global Stage*.
- 74 Marcus,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 75 Burawoy et al, eds., *Global Ethnography*.

抗争时代的网络行动

大约自 1992 年起，新公民运动的浪潮开始席卷中国。根据公安部的数据，中国在 1993 年发生了 8700 起“群体性事件”。这一数据后来不断攀升，1999 年是 32,000 起，2003 年是 58,000 起，2005 年达到 87,000 起。¹与此同时，建设“和谐社会”的官方话语开始出现，实质上表明中国社会已经进入抗争的时代。

民众抗争不仅在数量上激增，在形式上也变得多样。在 1980 年代，抗争主要集中在争取自由民主这些启蒙理想的努力上。1978 年和 1979 年的民主墙运动、1980 年大学生的参选以及后来的学运，均属此类。²90 年代以来，则出现了很多新的抗争形式，如工人和农民的抗争、环保行动、消费者行动、妇女行动、艾滋病行动、宗教行动、民间反日以及维权行动。³网络行动是其中的一种新类型。

1990 年代以来出现的新的抗争形式，与之前的相比，有所不同。1980 年代末，始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近一个世纪的启蒙运动的热情，在达到顶峰的同时转向枯竭。正如博士卓（Joseph Fewsmith）所言：

直到[五四运动]70年之后，知识分子自身才认识到五四的传统已经过时，或者与他们无关。这个转变发生在1990年代。而对五四运动的启蒙目标的背离，标志着许多知识分子看待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方式，发生了重要的、甚至是根本的变化。⁴

网络行动和其他抗争形式与抗争议题的兴起，标志着处于后启蒙时代现代中国⁵民众抗争的新阶段。本书用大量篇幅，阐释这些新的行动方式。本章以网络行动作为策略性切入点，分析中国新公民行动出现的宏观结构条件。我认为，如果民众抗争的方式发生结构性转型，那是因为中国社会本身经历了结构转型。网络行动和广泛的民众抗争，是对中国现代性后果的回应。

□ 1990年代以来的民众抗争

到1990年代，改革时期开启的民众抗争浪潮并没有消退，争取政治自由和政治改革的努力也从未停止。众所周知，工人罢工和农民抗争近几年来频频爆发。1980年代也有过一些工人和农民的抗争，却鲜有人知。⁶这些工人和农民的抗争一直持续至今。

与之前相比，1990年代以来的民众抗争既有连续性，也呈现出新的特征。这些特征非常显著，使这些抗争可以当之无愧地被称作“中国新公民行动”。新公民行动的第一个特征是抗争发生的频率高，这一点我在本章的开头已经谈过。第二个特征是抗争的议题多。一方面，工人抗争的核心关注点依然是工资和生活条件等物质怨恨，而农民反对的则是税负、腐败和挪用公款的现象。⁷另一方面，很多新议题凸显出来，如失地问题、养老金问题、财产权益、消费者权益、大众民族主义、动物权益、污染、农民工问题、艾滋病以及对乙肝病毒携带者的歧视。显然，中国新公民行动包含了一些欧洲“新社会运动”的核心议题。

中国新公民行动的第三个特征体现在抗争社会基础的变化上。在中国现代

历史的不同时期，工人、农民和学生是民众抗争的主力军，这在整个 1980 年代也是如此。然而，自 1990 年代中期以来，抗争的社会基础有所扩大。工人、农民和学生仍然活跃，但其他社会群体也登上了舞台。业主、领取养老金者、农民工、乙肝病毒携带者、蚁农 (ant farmers)、消费者，甚至包括电脑游戏玩家和宠物主，都加入到抗争的行列。随着城市中产阶层的崛起以及出生于改革初期的一代人步入成年，他们成为新公民行动重要的社会基础。城市中产阶级是个异质群体。那些与政治精英关系紧密的一部分，例如玛格丽特·皮尔森 (Margaret Pearson) 和布鲁斯·迪克森 (Bruce Dickson) 研究的私人企业家和“红色资本家”，他们可能不会支持政治变革。⁸ 然而其他人则未必。例如城市业主，他们是当今中国最具抗争意识的群体，尽管采取的是温和的行动方式。⁹ 而在改革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则是与网络关系最紧密的群体。¹⁰

第四个特征是新型公民社团的兴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的抗争相比，1990 年代以来在特定议题上的不同行动形式有相应的组织基础，尽管这些组织可能非常脆弱，形态各异。有关中国公民社会的早期研究主要集中在“社会组织”，但“社会组织”这个名称逐渐成为官办非政府组织的专称。新型公民社会组织则用 NGO、民间组织和草根社团等名称把自己同官办“社会组织”相区分。¹¹

第五，同 1980 年代的抗争相比，1990 年代以来的民众抗争经常追求更温和的目标。1980 年代的抗争者，胸怀宏大但模糊的政治理想。他们以预言家的目光憧憬未来，相信革命式的变迁。为民主而战，为现代化而战，是强有力的动员口号。这些理想至今还激励着很多积极分子。但自 1990 年代以来，民众抗争已经提出其他的、更温和的目标。维护个人权益、表达和主张新的身份认同，是新公民行动的核心关注点。

第六，尽管扰乱式的和对抗性的抗争仍然存在，1990 年代以来新的抗争形式主要是非扰乱式的。“公民集体行动” (collective civic action) 可以最好地概括这一阶段集体行动的策略方式。¹² 例如，裴敏欣观察到，“1980 年代的异见运动偏爱用直接的、冲突性的反抗方式，这一运动在 1990 年代逐渐变得依赖间接的、合法的方式”。¹³ 欧博文和李连江研究的“依法抗争”，就是一种非

正面冲突性抗争。NGO 在城市地区开展了很多行动，如妇女行动和环保行动，采取了媒体宣传、公众论坛、展览和田野调查等间接的公民行动方式。

中国新公民行动的崛起，反映了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中的转型。在文化上，随着 1980 年代政治理想主义的破灭而滋生的玩世不恭，很快转变成追逐金钱的热情。甚至有大学教授辞职“下海”走上经商之路。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文化很快成为风尚。消费革命的结果之一是导致了交往空间的扩大。都市新的社交形式为交往、表达和寻找身份认同提供了新渠道。热闹的小吃街、舞厅、电话热线甚至麦当劳等，都成为新的公共空间。¹⁴ 电话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后逐渐成为普通家庭用品，接着网络和手机也进入寻常百姓家。经济转型的成果，有目共睹。我将在本章的后面讨论到，大部分新公民行动是对这些经济转型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后果的回应。经济转型对新公民行动形式的另一重要影响，是导致了国家权力性质的变化，这也是下一章要谈的内容。在这里我只想谈，自 1990 年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权力一方面变得更分散、更碎化，另一方面也变得更有规训力、更无孔不入。公民行动的新形式是对新权力形式的回应。

□ 中国网络行动的兴起

网络行动是中国新公民行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 1980 年代末期的海外。那时，海外留学生与学者已经开始使用电子邮件和新闻组 (newsgroup)，¹⁵ 在里面讨论国内的事件，同时在海外留学生之间建立起社交网络。

当时，新闻网 (Newsnet) 上有上千个新闻组，“中国社会文化” (Social Cultural China, SCC) 最为活跃。SCC 创建于 1987 年 11 月，初期活动并不多。1989 年 3 月，SCC 上有 624 条信息，4 月达到 833 条，5 月升至 2198 条，6 月达到了 3183 条。¹⁶ 到 1990 年 4 月，SCC 是新闻网 1473 个新闻组中最活跃的前 20 个之一，大约有 2 万个读者。¹⁷ SCC 因此成为美国新闻组历史上的一个成功案例。¹⁸

然而在中国国内，这时网络还少有人知。在 1989 年，只有少数科学家同

外界有电子邮件往来。¹⁹直到1994年，中国才获得全功能的网络连接，但上网者仍然是极少数人。直到1996年之后，普通城市消费者才有机会触网。在中国网络发展的最初几年，也只有零星的关于网络抗争的报道，网络技术的传播仍十分有限。BBS论坛后来成为网络行动的主要空间，而第一个BBS于1995年才在清华大学创建。它的成立是个里程碑事件。清华的BBS“水木清华”，后来成为中国最有影响的BBS之一。首家BBS建立之后，其他高校也纷纷跟进，其中有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因而最早的一批BBS论坛是出现在高校和主要的研究机构中。传统上，它们是抗争的温床。因而，有记录的最早的网络行动发生在这些BBS论坛上也就不足为奇。第一次的网络抗争是有关钓鱼岛主权问题的民族主义抗议。²⁰在接下来的几年中，还有其他一些事件，尤其是一次在世界范围内掀起的反对印尼对华裔施暴的抗议。²¹

在早期的网络行动中，具有特殊意义的是1999年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被北约轰炸后的抗议。大使馆被炸后，人民网开通了“强烈抗议北约暴行”BBS论坛，供网民宣泄不满情绪。²²数日之内，该论坛出现了上万条评论。在因特网刚开始流行于中国之时，该抗议论坛的开通意外地推广了网络抗争行动。

自那以后，网络行动的数量不断增长，形式也变得多样。BBS论坛始终是孕育抗争的温床，但随着博客、网络视频和短信的推广，它们也成为抗争的载体。个体和自愿组织建立了很多维权网站，“网络维权”。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出现了公民记者（citizen reporters），他们将博客作为主要交流渠道，承担起报道被主流媒体忽略的重大社会问题的责任。

网络行动在形式上变得多样化之时，数量得到了提高，影响也随之扩大。全国性“网络事件”年年都有。²³这些事件既包括具有文化取向的抗争，也包括明确的政治抗议。例如，仅在2003年就有五六起网络抗争的发生。其中一起因孙志刚之死引发，结果导致《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同年的另一起事件迫使法院撤回判决。²⁴2005年的反对日本申请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网络请愿运动收集到300万个签名。²⁵2007年，在“PX事件”中，厦门市民成功地利用网络和短信，组织了一起反对化工厂建设的游行示

威,因为他们担心PX(对二甲苯的缩写)会损害健康。很少有其他的民众抗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直接的政治结果。2008年初发生的一起大型的网络抗争,围绕1月份湖北省天门市一名无辜公民死在无情城管的手下这一事件(下文还会更多地提到这起事件);接着是从4月份到5月初以网络为依托的反CNN的民族主义抗议活动,以及四川地震之后的全国性公民动员。本书建立在对过去10年中发生的70个网络抗争个案的分析之上。

□ 网络行动的特征

上文讨论的民众抗争的特征同样适用于网络抗争,这些特征包括普遍性、议题多样性、有组织基础、目标温和以及采取非扰乱式手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抗争每天都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中发生。“抗争性对话”(contentious conversation)是描述社会运动的常用概念,用来形容网络行动则尤为贴切。²⁶ 在中国的网络空间,这样的对话非常普遍,以致它的缺位比其在场更令人费解。根据对西方国家网络行动的观察,一些学者指出,网络使积极分子可以通过维持抗议网站和保持多中心的交流网络,开展“永久的运动”(permanent campaigns)。²⁷ 虽然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网络行动都那么持久,但同很多早期的抗争运动相比,现在的一些事件持续时间更长。例如,由乙肝病毒携带者发起的反歧视运动,以一个BBS论坛为中心,至少从2003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即使是一些短暂的电子抗争事件,比如抗议农民工被打死的网络抗争,也并不是那么稍纵即逝。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事件都是更大的抗争周期的组成部分。如果说这些事件来去匆匆,那只是因为新的抗争事件随时可能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说,一系列短暂的抗争事件构成了“永久的运动”。

第二个特征是议题的多样性。网络抗争议题同线下抗争议题一样多。线下抗争在网上都有相应的呈现,但有些网络抗争议题却不一定常发生于线下。在我的样本中有这么一个案例,即网友发起网上抗议运动,反对Google采用的中文名字。2006年Google宣布它的中文名字为“谷歌”,中国网民通过建立www.noguge.com的网站开展网络反对。积极分子声称,他们因为太喜欢

Google 这个名字，所以不能忍受其蹩脚的中文名。可见，网络行动既反映线下行动，又有新的议题。

第三，网络行动的某些个案具有组织性。这些个案是以合法独立的组织为基础的持续性运动。其组织形式不一，既有正式的，也有以互联网为基础的非正式的网状组织。例如，一些协作很好的以网络为基础的组织在 2005 年发起反日签名请愿运动，²⁸ 环保社团也经常发起网络倡导活动。²⁹

第四，虽然网络行动的一些个案具有明确的组织基础，其他个案则是对线下社会不公的自发回应，或者纯粹由个人发起。这些形式的抗争主要依赖因特网的网络结构，个人可以创办抗议网站，区区一个帖子也可能在网上走红。有些有影响的维权网站由个人创办和维护，而最有影响、最为人熟知的网络抗争，往往是自发的，大量网民同时参与，但彼此之间缺乏协作。

第五，根据中国网络信息中心一年两度的调查结果，当前网民人口特征方面的数据显示，网络行动的参与者主要是城市居民，而且很多是年轻人。除此之外，参与者在年龄和职业背景上具有相当的多样性。民族主义抗议中的电脑黑客主要是年轻的大学生，³⁰2007 年底要求文化部禁播《色·戒》电影的网络请愿活动是由一群大学生发起的，³¹“多背一公斤”（1kg.org）这个以网络为基础的公益组织也主要由大学生组成。那些更具颠覆性的活动的参与者（如人权积极分子），大部分已过了读大学的年龄。例如，“大赦国际”在 2004 年列出的因参与网络政治活动而被捕的 54 个人中，37 人有年龄信息。这些人在 2004 年的平均年龄是 36 岁，只有 6 人的年龄低于 20 岁。³²

在其他可获得个人信息的积极分子中，胡佳生于 1973 年，在成为全职 NGO 积极分子之前是记者。刘荻，网名不锈钢老鼠，在她还是大学生时就在网上发表批判性文章，³³她在 2002 年被警察拘留时，是 21 岁。报道 2007 年重庆“钉子户事件”的博客写手周曙光（Zola Zhou），曾是蔬菜摊贩，与刘荻同龄。当然，还有其他人，也多次发动网络请愿活动。网络行动参与者的多样性，既显示出中国社会危机的规模之大，也说明这一危机已经引发了普遍的社会回应。

第六，同过去大规模的抗争相比，网络行动的目标更加具体而入微。之前

抗争者大都追求宏大的政治理想，并鼓动通过革命性的变革达到这一理想。网络行动很少提出革命性的变革目标，它们寻求的是社会正义、公民权利、文化价值以及个人身份认同。

第七，与其温和具体的目标相符的是，网络行动主要采取温和的和符号化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中，传统的激进抗争方式经常延伸到网络。抗争者不去公共场所静坐，而是在网上进行虚拟静坐；他们不去破坏公共财产或者占领公共空间，而是袭击网站，进行电子邮件轰炸和开展其他各种形式的电子扰乱行为。³⁴ 在中国，这些激进的电子抗争，会出现在与民族议题相关的网络动员中，但在其他的抗争议题中并不多见。³⁵ 中国网络行动的主要形式是建立倡导网站、开展网络请愿、群发有关活动预告的邮件、在 BBS 论坛上发表或转载信息、下载帖子以便线下传播、在个人博客和网络论坛上播报线下活动等等。

符号与话语表达是网络行动重要的组成部分。网络抗争是通过语词、画面和声音而进行的激进的交往行动。语言、故事和符号经常是民众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³⁶ 但在信息时代它们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正如马克·博斯特 (Mark Poster) 所说，物质资源对工业时代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是最重要的，而在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是话语资源。³⁷ 也正是出于这些原因，阿博托·梅鲁西 (Alberto Melucci) 才认为当代社会运动是符号性的挑战。³⁸

□ 作为反向运动的网络行动

如果说中国的网络行动是反对中国现代性后果的反向运动 (counter-movement)，那么它比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所研究的反向运动更复杂。在《大转型》³⁹ 一书中，波兰尼对反向运动的表述是这样的：不受规制的市场的破坏力引发了社会的反抗，于是社会自发地采取反向运动以保护自身。波兰尼意义上的反向运动有三个显著特征：深度的物质怨恨导致了最强烈的反抗；运动反对的是市场的掠夺行为；运动是自发的。中国的反向运动多了一个重要元素，即运动不仅反抗市场，还反抗地方政府部门。这是因为中国的国家具有

掠夺性⁴⁰和碎片化⁴¹的特征。国家掠夺行为是严重怨恨的一个源头，而它的碎片性以及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矛盾，则给集体行动提供了政治机会。为保持统治，中央领导集团不会容忍直接挑战其权威的活动，但它可能会接受甚至鼓励反对地方政府及其掠夺行为的草根抗争。

根据波兰尼的分析，在反向运动中，国家与社会共同抵御市场。改革时期的中国，国家从没有明确地站在社会一边，而更经常是市场的支持者。只是在反向运动出现之后，国家才开始警惕市场的破坏力。即使这样，也并不是整个国家，只是中央政府担心反向运动危及自身的合法性，才试图遏制市场的破坏力。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视作地方国家法团主义（local state corporatism）的一种形式。⁴²这种以经济为中心的地方政府维护经济利益，不足为奇。所以，地方政府是抗争的对象而不是支持者。

很多学者借用波兰尼反向运动的观点，或直接或间接地提出，中国的民众抗争构成了反向运动。比如有学者认为，工人抗争主要源于劳动商品化和工业重组导致的怨恨，⁴³农民抗争是针对侵犯权利的行为（如强占土地、摊派非法农业税、工业污染了水源等）所作出的防御性的、反应性（reactive）的反抗。⁴⁴同样，最近出现的城市环保行动和业主的反抗运动，也是公民保护刚获得的财产权和健康生活环境的努力。⁴⁵一项有关退休工人争取养老金的研究，提出要将怨恨重新纳入集体行动的分析框架，认为“突然导致的大的怨恨和资源丧失而产生的‘对日常的扰乱’（disruption of the quotidian），在激发集体行动上起了主要作用”。⁴⁶这些研究有力地表明，当代民众抗争反映了社会对中国“大转型”负面的反抗。在这样一幅反向运动的图景中，网络行动处于什么位置？

如果把网络抗争视为对中国市场转型引起的消极后果的回应，那么它就是中国社会总体的反向运动的组成部分。在我的样本中，至少有20个网络抗争的案例（接近三分之一）是回应严重社会不公的自发性抗争。这些事件通常涉及弱势人员的死亡和腐败的或失职的政府官员。孙志刚之死引发的公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孙在广州一警察局被拘留期间，于2003年3月20日因遭殴打致死。他是在死前3天，因没有暂住证而被拘留的。他的死讯传出后，在网上激起公愤，网民们通过辩论和抗议，表达了对受害者的同情，同时要求

将嫌疑人绳之以法。和往常一样，抗议的内容超出了孙志刚之死。网上的讨论从遏制警察的暴行，延伸到保护弱势群体的权利。这些讨论反映了公民对社会不公的普遍怨恨。

网络抗争的自发性程度有高有低。如果将抗争看作由网络论坛上缺乏协作的个体参与而起，那么它是自发的。这也是媒介社会学家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所谓“一致但缺乏协作的回应行动”。在这样的行动中，“人们通过对媒介传播的行为、言语或事件作出相似的反应，但他们的处境并不一样，彼此之间也没有交流与协作。”⁴⁷ 汤普森研究的重点是电视，相隔遥远的电视观众之间自然缺乏交流。但是，网络的互动性改变了这种情况。互动性促进了协作与协商，因而改变了抗争扩散的基本动态，但基本没有改变抗争自发性的特征。在1989年的抗争中，尽管存在着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组织形式，学生仍坚持认为他们的抗议是自发的运动。克雷格·卡洪认为，学生坚持运动的自发性，是为了否定被操纵，坚持自身的独立与真诚：“学生坚持说运动是自发的，因为这样就肯定了运动自身所表现出来的独特性和个人自由……‘自发性’这样的语言，含有真诚和自然的意思，这些是运动所称颂的品质。”⁴⁸

真诚和自发意味着具有深刻的道德意识。它们使自发的抗争具有独特的道德感召力。波兰尼分析的反向运动，其自发的特征来源于抗争的道德根基。他认为，反向运动最终并不是由经济利益推动的，它的真正推动力是社会利益。社会利益关乎文化与道德价值，事关人的尊严与自我尊重。波兰尼写道：“纯粹的经济问题，虽然影响人民的需求和物质满足，但与阶级行为关系不大，社会承认才是阶级行为的核心问题。”⁴⁹

在中国，自发的网络抗争富有道德感。当公民自发加入反对不义行为的抗争时，他们的行动是因为受到了道德的感召。不行动，就意味着道德的沦丧。反之，自然地表达愤怒，则是有道德操守的表现。事件越是骇人听闻，抗争就越呈现出自发性。抗争的自发性，因此成为度量社会状况的指标。自发性抗争越频繁、规模越大，这个社会也一定处于更深的困境中。2008年1月7日，在湖北省天门市，魏文华被城管殴打致死，仅仅因为他试图拍摄城管殴打反抗城市垃圾倾倒政策的村民。魏文华之死在网上引发广泛抗争。天涯论坛上的网友

在数日之内贴出成千上万条愤怒的评论。一名叫“Volunteer200”的网友说：“我们必须顶这个帖子 [关于魏死亡的帖子]，否则下一个被害的就是我们自己。”⁵⁰ 另一个ID为“bbwap”的网友通过手机评论：“这是什么世道？我们如果不顶此帖，那我们还是人吗！天理何在？”第三个评论这样写道：“我已经没有愤怒了。这种野蛮行径简直惨不忍睹。”⁵¹ 这些话都表达了强烈的社会正义感。⁵²

□ 作为认同感运动的网络行动

波兰尼对尊严和自我尊重的关注，蕴含了对身份和承认问题的关心，但他最终还是更倾向于分析物质怨恨。他的分析帮助我们抓住了当代中国民众抗争的重要部分，但不是全部内容。中国网络行动的很多案例，是波兰尼式的反向运动的体现，但也有很多不仅是有关物质怨恨的抗争，还有些也不是自发的，而是有组织的。这类抗争是为了什么而发生？

我认为，这些网络抗争是认同运动的体现。这种认同运动，既是对失控的生活的抵抗，也是争取承认的斗争，它属于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运动。在卡洪看来，认同“是有关自我承认和他人对自我的承认之间相互交织的问题”。认同政治是一种抗争，因为它要求“其他人、其他社会群体和组织（包括国家）必须作出回应”，也“因为认同政治涉及拒绝、贬低和替代别人所承认的身份。”⁵³ 认同运动是一种积极的抗争形式，主张替代性的或被压抑的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乙肝病毒携带者、同性恋社区和艾滋病病人所发起的反歧视运动均属此类抗争。那些参加有组织的网络公益活动（如“多背一公斤”）的网民，追求一种自我实现。网络空间中有很多基于共有记忆的社区，⁵⁴ 它们也是认同社区。即使那些在个人博客中发表私人日记和照片的年轻人，他们也在努力建构认同，因为这些都是寻求交流与理解的方式。因此，网络行动在两方面表现为认同感运动，一是它注重表达，其次是它的抗争性。这两方面都是内在危机的体现。

认同感运动源于中国的市场转型及其引发的认同危机。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将认同危机定义为“一种严重的无方向感，在这种状态中，

人们经常表现出不知自己是谁的样子，这一状态也可以被视为人们对自己所处位置的极端不确定。”⁵⁵ 中国当今的认同危机有别于改革初期的“信仰危机”。改革初期的那场危机，是对党的领导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信仰的危机，在失落的“文革”一代中表现得最为深刻。民主墙运动以及1980年因潘晓的信⁵⁶引发的有关人生意義的全国性大讨论，都表现了这一危机。然而，尽管民主墙运动强烈地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它依然秉承着中国启蒙传统的理想。信仰危机衬托了对未来的更强烈的希望，以及对变革的更热切的渴求。渴望变革是整个1980年代的主导情绪。陆星儿是“文革”一代的小说家，她是这样描述这种情绪的：

在那时[指1986年]，我对我们这一代仍满怀着自豪，我对我们的描述还是很乐观很昂扬的……因为他们[小说中的人物]不知不觉地承袭了旧的传统，是在背着许多历史包袱的同时，又那么清醒地想接受、想创造新生活。新旧的复合与冲突，在承上启下的这一代人身上，表现为最复杂最无奈的心灵的内涵。但在1986年和1987年的时候，这种复杂无奈的困难，好像还有种种克服的途径……⁵⁷

变革是当代中国认同危机的原因，而不是希望的寄托。“文革”一代最早经历并表达了这种失落感。1990年代“文革”一代人中表现出的怀旧热，正是表达了当代生活条件的变化所导致的对人生意义和认同的迷惘。

陆星儿在描述了1980年代的乐观情绪之后，接着表达了她在1990年代所经历的无方向感：

到了近一两年，社会的急剧变化，经济的、意识的、观念的、人与人的关系，使许多困难更进了一步变成困惑。知难，是可以迎难而上的。可是，难一旦难得困惑，迷惘了不知所措了——这无疑是最深沉的困境。现在我们就处于这种困境中。⁵⁸

这一认同危机的症状无所不在。症状之一体现在有关寻找快乐和生命意义的自助手册的大量涌现上。2007年夏，我在北京一家大型书店随手记下了正热销的一部分书名：

- 《人为什么活着》
- 《幸福是什么》
- 《我的人生笔记》
- 《无目的的美好生活》
- 《凭什么活着》
- 《有一种幸福叫流浪》
- 《人生从此不寂寞》
- 《倾听与诉说》
- 《心灵处方》
- 《心灵指南》
- 《心灵体操》

其中，有些是刘心武、陈忠实和王小妮等著名作家的作品，⁵⁹另一类作者，属于专门提供人生意见的新型流行作家。

于丹就是这类新派畅销作家的最佳范例。于丹有关中国古代哲学家孔子和庄子的著作，销售了上百万册，令终生研究孔子庄子的专家们颇为艳羡。她在中央电视台上讲孔庄，成为全国性的现象，是因为她能将经典转化为缓解当代危机的自助手册，告诉人们如何在日益失控的世界中安身立命。比如于丹会这样说：

我们工作的时候要面对老板、面对同事、面对手中的职业。回家以后要面对亲人，不能让他们为我们担忧。我们每一天在这个世界上，太多的表情是为了他人，而内心的愿望究竟是什么？其实我想这个故事是作为一个现代人生命中的一个寓言。它其实是表现了我们内心的

一种深深的困惑。我们还知道内心的声音终究是什么吗？……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只有比过去更迷惑。⁶⁰

如果一些读者觉得这段话很熟悉，那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于丹的话与珍妮特·瑞恩沃特（Janette Rainwater）曾经说过的异曲同工。瑞恩沃特在1989发表的题为《自我疗法：如何成为自己的理疗师》一书中，为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有关自我认同危机的观点提供了原始材料。下面这段话，是吉登斯从《自我疗法》中引用的：

你可能焦躁不安，或者被来自妻子、丈夫、孩子或工作上的要求压得喘不过气来。你可能觉得那些离你最近的人并不理解你。你或许感到愤怒，因为生活与你擦肩而过，而你却尚未完成那些你想做的大事。你感觉生活中缺了什么。你希望能掌握自己的命运。那该怎么办呢？⁶¹

这两段话的相似性，反映出中国现代性与西方现代性在结构上的相似，这促使我们将中国追求认同的网络行动与西方新社会运动作一比较。新社会运动理论用西方社会在结构上的变迁以及相应的观念变迁，来解释它的产生。这一理论认为，新社会运动已经起而代替“旧”社会运动，成为后物质主义和后工业社会中的主导社会运动。“旧”运动关注的是物质进步和分配矛盾，而新社会运动关心的是个人的自主性和自我实现。工人运动是“旧”运动的典型，而和平与环保运动代表的是新社会运动。“旧”运动是有关解放的政治，即“将个体和群体从不利于他们的生活际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⁶²而“新”运动是有关生活的政治（life politics），关注“后传统社会中的自我实现过程引起”⁶³的政治议题。

在中西现代性之间，既有历史的关联性，又有结构的相似性。中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化倡导者，极力引入西方启蒙价值，试图将之作为现代中国的文化引擎。以资本主义工业和市场为中心的混合型制度条件，直接引起

了改革时期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⁶⁴然而，21世纪初期的中国现代性不管在原因上还是结果上，都有其历史的特殊性。如果说西方现代性已进入以生活政治为主的反身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ity），中国的现代性则出现了分叉，社会学家孙立平称之为断裂。⁶⁵中国经济在迅速地发展着，社会也以同样的速度在两极分化。当越来越多的人变得富裕时，中国人口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没有从经济贫困的处境中走出。中国在形成中产阶层的过程中，同时也形成了贫困阶层。

当代中国现代性呈现出的断裂特征，影响了中国新公民行动的特殊性。中国新公民行动不仅关注生活政治，而且将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相结合。因而，在一个碎片化的社会中产生的抗争分成两个支流：根源于物质怨恨的反向运动和根源于对承认与归属感的渴望的认同运动。对新社会运动理论范式的批判，矛头部分地指向该理论对历史断裂性的夸大，它让人感觉“新”运动好像是在某一神秘的历史节点上突然产生并取代“旧”运动似的。⁶⁶我在前文已指出，我对中国新公民行动的分析，既强调它的新特征，也重视它同过去的连续性。

那么作为认同运动的网络行动有哪些表现形式呢？

□ “明”的故事：抗议对糖尿病病人的歧视

2007年11月21日，明（系假名）进入山东中医药大学学习还不到3个月，就接到学校的通知。他被告知学校已取消录取他，他必须退学。该通知称，明因患有I型糖尿病，不符合大学入学体检要求。明崩溃了。上大学是难得的机会，对贫穷农村地区的孩子来说尤其如此。明是通过竞争非常激烈的高考而被大学录取的少数农村孩子之一，而现在他面临着因健康问题而被开除的可能。

在接到正式通知的前两天，明在一网络布告栏上发帖寻求帮助，帖子的标题是《急！大学让我退学怎么办》。在接到通知后，明又发了另一个帖子：“正式通知已经下来了……现在没有办法了。”⁶⁷

明的消息被贴到由糖尿病病人开办的论坛上，吸引了很多论坛成员的回应，其中有人立即开始为明动员公众的支持。他们发起了一个网络请愿活动，并利用人际关系联系媒体。11月24日，省电视台报道了明的故事。这个4分钟的

视频被贴到网上后，在两天时间内就获得了 30 万个点击。中国网民激烈地讨论这件事，绝大多数人表达了对明的支持。面对这一公众压力，明所在的大学发表公开声明，称该决定是根据教育部高校招生体检标准作出的。截至 2007 年 12 月 25 日，明还在学校上学，网上还在讨论明采取法律行动的可能。

明的故事将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带人公共视野。中国高校招生总是要求考生进行体检，体检不合格就不可能被大学录取。但是，那些体检要求是否合乎宪法？很少有人质疑这一点，包括考生自己。导致这一无人质疑状况的原因之一是一种出于无知的歧视（discrimination out of ignorance）。明在采访中告诉媒体，他得这个病很久了，但在老家时，他不对学校和同学公开病情，因为在他们家乡，人们认为糖尿病会传染。另一个原因是不同病人及家人之间缺乏沟通，不知道其他人也因同一原因被大学拒收。第三，之前一定也有过个别投诉，但因为没有办法就他们的投诉与公众进行交流，因而没有成为公众讨论的议题。明的故事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他在网上寻求帮助，很多人因与他有共同的痛苦，表达了同情与支持。有人在网上发表评论说，明的情况使他担心自己女儿的将来，他的女儿还不到考大学的年龄，但也身患糖尿病。另一个网友写道：

这是对糖尿病人的严重歧视！糖尿病人只要控制好血糖，与正常人没有差别。难道，现在社会上的所有糖尿病人都要辞职、退学吗？社会能保障这一群体的生活吗？……我们要建立的是和谐社会。人生存的保障都没有，还谈什么和谐？病人也是人，他们应该有生存的权利，并且受到社会的保护！⁶⁸

正因为有这样的关注，网上才有可能发起请愿活动，要求教育部和卫生部保护糖尿病病人受教育的权利。

明的故事代表了网络行动中的认同感抗争。这一案例不但与物质怨恨有关，也与社会承认相关。这是一个人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因歧视性文化环境中的社会压力，将故事的真相埋藏许久。大学勒令退学这一迫切的威胁使他有勇气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在网络社区开始了他的抗争，社区成员给予了同

情和支持。于是，他的故事变成了一个社会议题，也使很多人有机会表达他们个人的焦虑，并提出抗争性的诉求。反对政府政策是政治性的挑战，但这些诉求所提出的更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歧视性的社会中坚持个人价值的问题。明的故事只是众多案例中的一个。很多其他遭到边缘化或歧视的社会群体，如民工、同性恋、乙肝病毒携带者、宗教信仰者等，也在网上展开了抗争。这些抗争共同组成了一个不断扩大的网络认同感运动。

□ 结论

中国正处于抗争时代。自 1990 年代以来，民众抗争的数量迅速增加，抗争的形式和议题变得多样。本章勾勒了网络抗争的主要形式，并将其置于更大的背景之中。我认为，中国新公民行动虽然与过去的社会运动之间存在连续性，但也有显著的不同。它至少在 6 个方面与过去由学生主导的抗争存在着不同：它发生得更频繁，涉及更广泛的议题；有着更宽广的社会基础；既可以是自发的，也可以是有组织的；追求更加温和世俗的目标；既采取旧式的、抗争性的策略，也采取创新的、非对抗性的方式。

网络行动与新公民行动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产生，并组成了新公民行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海外留学生在 1989 年已经利用网络支持国内的学生，而在国内，网络的发展，特别是中国网络行动的崛起，与中国新公民行动的发展是平行的，这两个过程都始于 1990 年代初期。因此网络行动与它所属的更大的公民行动之间有着共同的特征。

这一公民行动是对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回应。中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后果，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碎片化。网络上大部分的自发抗争是对严重的社会不公的回应。这些抗争组成了波兰尼式的反向社会运动。同时，网络行动也表现为争取承认的抗争。这一方面的抗争，根源于结构性社会断裂所导致的认同危机。

在社会运动研究中，关于怨恨、政治机会、运动资源在运动动员中的重要性，有着长期的争论。⁶⁹ 我对中国新公民运动产生的结构性根源的分析，表明怨恨这一概念在解释社会运动上仍然有效。需要强调的是，广泛而深刻的怨恨在某

种程度上反映了总体性的社会危机，它容易导致人们开展更多自发形式的抗争，以保护自身以及社区免受破坏。因此，持该观点的学者不强调组织在动员中的重要性，但这并不否定组织在民众抗争中具有中心作用。抗争的普遍反映了怨恨的结构性条件，然而抗争的形式是对不同条件的回应，包括运动的资源和政治机会。因此，分析网络行动的结构性条件只是探索的开端，它不能解释抗争采取的具体形式。本书接下来的部分，将详细分析网络行动的不同方面，以揭示其间的动态、形式与结果。我首先要讨论的是国家权力与网络行动的关系。

注释

- 1 McGregor, "China's Official Data Confirm Rise in Social Unrest."
- 2 我们说 1980 年代的民众抗争集中在争取民主上, 不是否定多元利益的存在, 例如运动也提出了争取更好物质生活的诉求。然而, 这些物质利益的表达, 往往借助自由与民主的话语。有关民主墙运动和 1980 年代大学生的选举参与, 参见: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Goodman, *Beijing Street Voices*。关于学生运动, 参见: Calhoun,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 3 在这一领域的很多研究中, 几本编著可以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议题的广泛性。参见: Perry and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Perry and Goldman, eds.,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Ho and Edmonds, eds.,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 O'Brien, ed.,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 4 Fewsmith, "Historical Echoes and Chinese Politics," 322。
- 5 然而, 这不是后现代的条件。在中国一些地区取得引人注目的经济发展之时, 还有一些地区仍处于不发达甚至倒退发展的状态。
- 6 Perry, "Rural Violence in Socialist China."
- 7 O'Brien,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Bernstein and Lü,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O'Brien and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 8 但蔡欣怡 (Kellee Tsai) 在《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一书中指出, 私营企业家利用基于日常生活之上的非正式组织推动了政治变迁。Pearson,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s*;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 9 Cai, "China's Moderate Middle Class"; Read, "Democratizing the Neighbourhood?"
- 10 2007 年 12 月, 在中国 2.1 亿网民中, 32% 的年龄在 18 到 24 岁之间。参见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于 2008 年 1 月公布的中国网络调查报告, 链接: <http://www.cnnic.net>, 获取日期: 2008 年 2 月 14 日。
- 11 有关新型公民社会组织的研究有很多, 其中参见: Howell, "New Directions in Civil Society"; M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 《中国公民社会组织发展蓝皮书》。
- 12 Sampson et al., "Civil Society Reconsidered."
- 13 Pei, "Rights and Resistance," 23。
- 14 Davis et al.,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avis, ed.,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 15 这一事实和下面两则信息来自: Yang, "Contention in Cyberspace," in O'Brien, ed.,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 16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soc.culture.china/about>, 获取日期: 2007 年 4 月 19 日。
- 17 Li,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S.," 127。
- 18 参见: Stahle and Uimonen, eds., *Electronic Mail on China*, 1:xxxv。有关 SCC 在新闻组中的受欢迎程度, 参见: Grier and Campbell, "A Social History of Bitnet and Listserv, 1985-1991."
- 19 根据官方一段时期的观点, 中国第一封电子邮件是钱天白通过中国科学院网络发往德国的。根据我在 2007 年 7 月 23 日对一个中国研究者的采访, 该观点尚有争议。
- 20 Qiu, "Virtual Censorship in China"; Chen Chiu, "University Students Transmit Messages on Defending the Diaoyu Islands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the Authorities Are Shocked at This and Order the Strengthening of Control."
- 21 Yang, "The Internet and the Rise of a Transna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phere."
- 22 这一论坛后来更名为“强国论坛”, 至今依然很受欢迎。
- 23 中国媒体有时称它们为“网络事件”, 就像群体性事件被用来指代民众抗争一样。
- 24 Liebman, "Watchdog or Demagogue."
- 25 刘县书, “虚拟世界的抗日”。

- 26 Tilly, "Contentious Conversation."
- 27 兰斯·本纳特 (Lance Bennett) 这么解释道：“渐渐地，运动不仅是在为政治目标的达成提供政治信息交流，同时也成为碎片化的晚期现代社会（即全球性社会）长期的政治组织基础，因为这个社会缺乏制度性的凝聚力 (institutional coherence) (例如，强大的政党，草根的或自下而上的利益组织)，以形成稳定的政治身份认同。”参见：Bennett, "Communicating Global Activism," 151.
- 28 刘县书，“虚拟世界的抗日”。
- 29 Yang and Calhoun, "Media, Civil Society, and the Rise of a Green Public Sphere in China."
- 30 王云斌，《红客出击：互联网上没有硝烟的战争》。
- 31 通过与其中一个组织者之间的电邮通信获得的信息。
- 32 Amnesty International,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trols Tighten as Internet Activism Grows," http://www.amnesty.org/en/alfresco_asset/c176cd3d-a48b-11dcbac9-0158df32ab50/asa170012004en.pdf, 获取日期：2008年2月4日。
- 33 参见她的自传文章：刘获，“不锈钢老鼠上网记”，<http://www.dok-forum.net/MyBBS/yd/mes/27234.htm>, 获取日期：2008年2月18日。
- 34 Rolfe, "Building an Electronic Repertoire of Contention"; Denning, "Activism, Hacktivism, and Cyberterrorism."
- 35 关于中国黑客的讨论，参见：Denning, "Activism, Hacktivism, and Cyberterrorism."
- 36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Polletta, *It Was Like a Fever*.
- 37 Poster,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 38 Melucci, *Challenging Codes*.
- 39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 40 Pei,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 41 Perry,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O'Brien and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 42 地方国家法团主义是指“地方政府的运作是为了协调辖区内的企业，其自身就像有着多种经营的企业一样”，而政府官员可能“像董事会”那样办事。Oi,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100-101.
- 43 Chen, "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Chinese Factories"; Lee, *Against the Law*.
- 44 Bernstein and Lü,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O'Brien and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 45 农村地区的环保抗争比城市地区的环保行动更具有防御性的特征。城市的环保行动因为有 NGO 的领导，经常可以事先努力阻止那些被认为对环境有害的工业项目。有关农村的环保抗争，参见：Jing, "Villages Dammed, Villages Repossessed." 关于城市的环保行动，参见：Yang and Calhoun, "Media, Civil Society, and the Rise of a Green Public Sphere in China."
- 46 Hurst and O'Brien, "China's Contentious Pensioners."
- 47 Thomps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112-113. See also Zhou, "Unorganized Interes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st China."
- 48 Calhoun,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158-159.
- 49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160.
- 50 在 BBS 论坛，“顶”是对好帖表示支持的通常做法。通过顶帖会使自己的帖子置于一长串帖子的前面，从而有助于使一个主题在论坛中处于显著位置。
- 51 三个引用都来自：<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1095173.shtml>, 获取日期：2008年1月17日。
- 52 值得注意的是，也有的网络互动缺乏道德感，比如民族主义网络辩论中的一些话语。感谢裴宜理在电子邮件中向我提出这一点。
- 53 Calhou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20, 21.
- 54 Yang, "A Portrait of Martyr Jiang Qing."

- 55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27.
- 56 潘晓是两个人的笔名。他们发表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的信的题目是《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这封信表现了信仰危机。关于这封信的英文翻译，参见：Siu and Stern, eds., *Mao's Harvest*, 4-9.
- 57 陆星儿，《生是真实的》，201。
- 58 同上。
- 59 比如，刘心武是《心灵体操》的作者。
- 60 于丹有个载有她个人作品的网站不足为奇。以上一段引自她的《论语》讲座，可以从如下网址获得：<http://www.yudan.net.cn/5uwl/200732971943.html>，获取日期：2007年9月8日。
- 61 Giddens,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70.
- 62 同上，第210页。
- 63 同上，第214页。
- 64 有学者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中国成功的经济改革是一种路径依赖，而改革开放之前已播下了成功的种子。
- 65 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
- 66 Calhoun, “‘New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 67 张伟，“糖尿病学生退学引发‘糖友’呐喊：我们做错了什么”。
- 68 来自：<http://health.sohu.com/20071129/n253685702.shtml>，获取日期：2007年12月25日。
- 69 有关支持以怨恨为基础的解说的观点，参见：Piven and Cloward, “Collective Protest.” 有关政治机会和资源动员的观点，参见：Tilly,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McAdam,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网络抗争政治

罗伦斯·莱斯格 (Lawrence Lessig) 认为, 软件代码是对网络空间进行控制的基础, 网络控制的构架可以建在代码之上。代码有开放的与封闭的两种。相对于封闭代码, 开放代码更难被规制。因此, 网络是否能够以及能否被规制, 取决于代码的结构。因为结构是由人建立的, 所以建什么样的结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规制网络, 最终的权力在政府。¹ 莱斯格预测网络将越来越受到规制, 这在世界各地已基本成为现实, 在中国更是如此。²

然而, 在权力加紧对网络进行控制之时, 抗争也应激而起。中国网络空间有哪些抗争的形式和条件? 面对日益加强的网络控制体制, 网络行动采取了哪些形式? 我认为, 网络行动的形式应控制的形式而生。通过代码结构, 以及通过设计和运行这套体制与技术结构的人, 控制才得以实行。因此, 抗争发生在各个层面。网络控制的技术结构越精密, 抗争形式就越精巧; 控制制度越完善, 反抗力量也同样会不断自我完善。

在中国, 网络行动应特定议题的政治机会而起。首先, 那些在政治上更容

易被容忍且更会引起公众共鸣的议题，更有可能进入公众领域，成为抗争性事件。其次，虽然国家权力塑造了网络行动，但积极分子创造性地应对国家控制。他们不但合法而正当地在“许可渠道的边界”³开展行动，而且规避国家权力，灵活使用网络，巧妙地表达抗争。政治控制塑造了抗争形式，但不能阻止抗争的发生。第三，政治权力在控制抗争的同时，也回应并适应抗争。社会与国家之间在相当程度上互相制约，⁴这导致政治权力与抗争都在互动中不断变化。网络控制与网络行动之间的这层关系，没有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国家控制与网络行动的形式和实践不断与时俱进，它们在互动过程中不断相互适应。在积极行动变得信息化和电子化之时，政治力量也是如此，从而越来越具有葛兰西所说的霸权意味。网络控制的实践掩盖了一些更微妙的方面，即权力机器也利用这些实践去调整、适应和延伸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网络行动和网络控制在过去10年中的共同演进，为我们检验这对互动过程的影响，提供了一个近乎准实验的个案。

□ 媒体、权力与抗争：历史回顾

经典社会理论将国家界定为垄断合法使用暴力以维持统治秩序的强制性政治组织，⁵当代理论家则强调国家作为信息控制的机构。吉登斯在分析现代民族国家崛起时认为，民族国家是垄断分配性资源（allocative resources）和权威性资源（authoritative resources）的政治结构。分配性资源指的是物质设施和商品，权威性资源指的是用以控制人类活动、特别是控制信息的资源。因此，吉登斯认为，国家权力的生产包括了“规范化地收集、储存和运用信息以服务于行政目标”⁶的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国家都是信息社会。吉登斯的权威性资源被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称为信息资本。⁷布尔迪厄扩展了将国家视为暴力机构的传统观点，认为国家还是文化与符号暴力的机构。国家控制了思想、影像和一般化信息等符号形式的生产、使用与传播。⁸他列举的国家控制信息的例子，包括施加审查、开展全国性统计、进行会计审核、建立档案、统一交流等形式。

媒体是重要的信息资源。在中国历史上，国家对媒体予以严格控制，但人们总能设法突破。他们篡用官方媒体，或自己创建替代性媒体，作为挑战权力的工具。在“文革”期间泛滥的红卫兵报刊，并不都是服从控制的，很多“小报”、传单和大字报包含了批判性的内容，有些甚至表达了潜在的异端思想情绪。⁹ 那时有个北京大学生对一外国访客说：“通过大字报，我们现在可以写一些被禁了20年的东西。你真的想知道什么是‘文化大革命’吗？它是批评的盛宴。”¹⁰

红卫兵运动后，在青年学生被送往农村当“知青”的一段时期里，手抄本和“黄歌”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下文化。¹¹ 这些活动导致了一些牢狱之灾和其他形式的迫害。有人因写了一首伤感的歌曲，被判了10年监禁。¹² 即便如此，这样的活动也难被抑制。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一次以诗歌为载体的运动。人们将自己手写的诗歌，贴在送给周恩来的花圈上，以此作为抗争的形式。¹³ 民主墙运动是通过非正式的杂志和大字报开展的。在1989年政治风波中，媒体也曾一度对事态进行了全面报道。

以上历史表明，虽然国家极力控制媒体，但人们可以篡用官方媒体或创造自己的小媒体去颠覆控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一基本的动态方式会在网络时代改变。改变的只是共同演进的权力与抗争的形式。接下来我将首先回顾网络时代国家权力的演变，然后探讨抗争的形式。

□ 1990年代以来的国家权力

1990年代，中国经济经历了短暂的停滞，但很快就进入了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深化改革的两个中心目标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和推行依法治国。这一时期实施了一些缓慢但有意义的政治改革，使中国政治“更制度化、更具预测性、更重视绩效”。¹⁴ 例如，这些改革包括党政逐渐分离，以及第三代向第四代领导集体的平稳过渡。政体仍然是威权统治系统，执政党和这一政治体系的合法性是不可谈判的。正如经济学家钱颖一和吴敬琏所指出的，“政党至上原则”高于一切，即执政党“极力发展经济，但不能有损其统治地位”。¹⁵ 同样，缓慢的政治变迁，只有在不危及党与国合法性和统治条件下才被允许。

中国政治制度在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黎安友（Andrew Nathan）称这一政治体系是以制度化为主要特征的韧性威权主义（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他认为在若干重要领域，都有制度化的迹象，比如政权交接、政治精英的选择、国家官僚机构的功能分化，以及旨在加强执政党合法性的政治参与制度的建设。裴宜理同意黎安友有关当今政体具有威权特征的观点，但她认为这一威权主义保持了中国的革命传统的很多元素，因而仍具“革命”性。比如，与毛时代的政体一样，当代形态的“革命威权主义”（revolutionary authoritarianism）也具有发动和吸收民众怨恨的机制。¹⁶

当今中国的威权政体无论是韧性的还是革命的，并不是完全没有公民参与的制度。至于这些制度运行得如何，则另当别论。有学者指出，这一政体存在严重的矛盾。欧博文和李连江注意到这一政体的分割与分层的特征，也注意到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之间利益的分化和冲突。李静君强调国家寻求经济积累和政治合法性这两个策略之间的张力。公众参与正式制度的存在以及中国国家权力的分化，共同为民众抗争提供了政治机会。这些政治环境，部分地解释了1990年代以来民众抗争日益增长的原因¹⁷。

作为中国民众抗争这一更大图景的一部分，网络行动也面临着相同的政治机会和限制。网络行动反映了这一结构性机会。但是，政治机会必须进行分解，这样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议题比其他一些议题更容易出现在网络行动中。

□ 中国网络控制体制的演变

网络控制的制度和实践的总和，构成网络控制体制。网络是流动的、多面的。网络控制的体制反映了这一特征，也在不断演变。网络行动对国家提出挑战，国家则调整并改善控制的制度与方法。¹⁸

中国网络控制体制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94年开始到1999年，集中在制定网络安全法则、网络服务提供和机构调整。与网络相关的第一个主要的政策框架，体现在《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¹⁹上。该条例于1994年2月18日生效，那时全功能的网络连接在中国建立才满2个

月。该条例列出了网络管理的原则与制度，规定公安部为主要负责机构。第二个重要的政策文件，是公安部在1997年12月发布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这一办法详细规定了中国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的责任，列出9种禁止在网上传播的信息。这9个禁区包括传播违反宪法和其他法律的信息这一标准化规定，但也包括有关散布谣言、“损害国家机关信誉”²⁰等含意模糊的内容。在机构调整方面，主要有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合并为新的信息产业部。在这一新的制度框架下，信息产业部是信息工业的主要监管机构。²¹

第二阶段是从2000年开始到2002年，主要特征是网络控制的扩张与完善。该阶段主要的发展，体现在对网络内容提供商（ICP）和个体消费者加强了内容控制。比如，2000年10月，信息产业部颁布了专门针对BBS的规定，要求BBS必须有经营许可证。2000年11月7日，国务院发布有关互联网新闻服务的规定，允许官方新闻组织在其网站上发布新闻，但经官方许可的商业网站，只被允许发布来自官方新闻渠道的信息。²²下面我还要谈到，内容控制包括运用技术手段过滤和屏蔽关键词。这类控制通过代码而实行。政府部门也可以运用技术跟踪到发帖人，这表明了权力形式和实践的扩张。理查德·克劳斯（Richard Kraus）在讨论文学艺术审查时，提示审查的对象是表达的形式而不是内容，“总是明确规定公开讨论问题的形式……它不会告诉你什么不可说，但设定了相关标准告诉你应该怎样表达你想表达的。”²³网络过滤标志着审查开始走向同时限制内容与形式的阶段。现在，定时给网站下发禁词清单，要求它们进行审查。这之所以成为可能，很大部分是因为技术的能力。技术既让网友获得表达的机会，也让国家能够审查言论。然而必须再次强调的是，审查既是技术使然，也有人为因素。权力通过代码发力，但代码是由人设计和执行的。汇编并下发关键词的做法，本身就是控制网络公司的一种机制。

第三阶段是从2003年开始到今天，该阶段的特征是网络控制的扩张，以及控制从规制（government）发展到规管（governance）和治理（governmentality）。前后两个时期的分界线是2002年底到2003年初第三代领导集体向第四代领导集体的过渡。如果说规制包括正式制度、规则和国家管理实践，那么规管则包

括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以及包括国家和非国家行动者的实践；治理则表示“规管模式产生的文化与社会情境以及这些模式得以持续的条件。”²⁴在这一阶段，对网络加强控制的指导原则是在2004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四次会议通过的重要决定中确定的。该决定提出了网络控制的新原则：

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加快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加强互联网宣传队伍建设，形成网上正面舆论的强势。²⁵

这一框架包括以下因素：(1) 制度建设；(2) 法律手段；(3) 道德自律；(4) 技术手段；(5) 积极的话语生产。这是一个全新而全面的管理框架，其运用不仅体现在网络控制上，而且包括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控制。

在网络控制方面，该框架的实施体现在若干新措施上。首先，中国政府继续加强对数量不断增长的网络内容提供商（到2003年已超过600,000家）²⁶的规制。例如，2003年5月，为加强对通过网络生产或传播的网络产品（如音像制品和游戏软件）的管理，文化部下发了27条临时规定。2005年9月25日，政府出台了新的新闻服务规定，取代了2000年11月7日下发的“临时规定”。新规定增加了两种非法信息，禁止传播的信息种类从9种上升到11种。新增的两类是“煽动非法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的”信息以及“以非法民间组织名义活动的”信息。²⁷显然，增加这两类是为了控制网络被用于公民结社和动员，而这两方面是网络行动的重要内容。

其次，官方开展了旨在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职业行为规范和网络使用道德自律的活动。2004年4月，在官方主办的《网络传播》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有关提升网络媒体社会责任的报道。2004年6月10日，作为官办非政府组织的中国互联网协会，创办了相关网站（net.china.cn），鼓励公民举报“违法与不良信息”，这是官方动员大众监督网络信息的一个尝试。²⁸

第三，若干新政策方针表明，政府非常重视在网上形成正面舆论。一方面，政府努力扩大地方新闻组织的影响。这些新闻机构可以报道自己的新闻，转载

其他机构报道的新闻，以及利用 BBS 和短信提供信息服务。这是国家将网络纳入大众媒体规制框架的新步骤。国家将网络视为新媒体，或者将网络媒体化，这样就可以将控制大众媒体的制度延伸到网络。在这一背景下，与其他国家相比，新媒体这一概念在中国含有不同的意义。从国家角度看，它更强调网络的“媒体”特征，而不是强调它有多“新”，因为网络如果作为媒体，就意味着政府可以按中国严格的媒体政策对之加以管理。

另一方面，政府在 2004 年引入“网络评论员”的新机制，以引导和影响网络公众舆论的形成。网络评论员是志愿者或带薪员工。他们通过回帖和参与辩论直接介入网络讨论。然而，他们的使命不是促进批判性的辩论，而是根据宣传部门下达的原则，隐秘地引导辩论的方向。²⁹之所以隐秘，是因为他们不是以网络评论员的身份登录网络论坛的，而是像其他网友那样匿名登录。网络评论员的角色带有欺骗性，他们因此落个坏名声。据称，网络评论员在论坛上每发一条信息，即获得五毛钱作为报酬。“五毛党”的蔑称便由此而来。

□ 对抗争的审查与控制

建立网络规管体制，是为了治理网络。治理包括建立和完善制度，推行制度的实施。制度的执行归结为控制上文提到的 11 种禁传信息。政府在不同层面和不同部门都建立了控制机制。比如，肩负保护网络安全的公安部，拥有纵贯到镇的网络控制组织。文化部也有类似的机构，但主要负责管理与网络相关的文化产业，特别是网吧。

由于 11 种禁传信息最有可能出现在网络的互动功能区，所以这些互动区成为主要的控制点。对这些区域的控制会直接影响用户的行为，包括抗争行为。BBS 论坛无疑是中国网络空间中最受欢迎的互动功能区，因而可以作为说明控制机制运作的例子。

2000 年 10 月 8 日，信息产业部颁布《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该规定将电子公告服务界定为在互联网上，以电子布告牌、电子白板、电子论坛、网络聊天室、留言板等交互形式为网友提供信息发布条件的行为。对电子公告

服务提供者和网友也有一些具体规定。电子公告服务提供者必须有相应的专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对电子公告服务实施管理。拥有电子公告服务的网站必须出具执照号码，发表在公告栏上的内容和用户注册信息须保留 60 天。

网络公司使用技术手段和人力监控网络论坛的内容。³⁰ 主要的技术手段是采用关键词过滤软件，这意味着开发这些软件技术的公司，也间接地服务于政府对网络的控制。³¹ 政府部门列出需过滤的关键词名单，定期下发给网络公司。³² 拥有网上论坛的大型网络公司，还雇用全职编辑管理论坛内容。虽然网络编辑的主要工作是活跃论坛，但他们也同时监控非法信息。此外，网络论坛还依靠志愿管理者（如版主）进行管理。版主通常是从论坛网友的活跃分子中选出，有时甚至由网友推选。如果他们未尽到责任而引发论坛成员的不满，他们可能受到“弹劾”。因为论坛版主的主要责任和兴趣是活跃而不是控制论坛，所以他们越能提高上帖数和论坛的点击率，就越受欢迎。这种情况有时与他们监督和审查内容的职责冲突。

公安部门侦查到违规行为后会介入处理。前期的介入包括对问题帖子的内容和来源进行调查。根据行为的严重程度，公安部门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方式之一是警告网站经营者，要求他们提高论坛监控力度。例如，2004 年 12 月，公安部门的官员到北京某社团，调查该组织网络论坛上出现的几个帖子。该组织的管理部门并不知情，毕竟有很多匿名网友每天在网上发几十个帖子。论坛中的讨论一般不触及政治敏感话题，但不知何故，这一次论坛上冒出了一些有关“法轮功”的帖子，而且还被公安部门侦查到。调查之后，公安确定该组织与这些帖子没有直接干系，但要求管理部门对其论坛加强监控，以防此类帖子再次出现。³³

有时网站经营者会暂时关闭论坛，以防论坛成为抗议的场所。例如 2007 年 1 月 1 日，广州花都区的教师开展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有关示威的报道立即出现在一个人气很旺的教师论坛上。示威者得到了论坛网友的支持。然而，论坛于次日公布了如下消息：“因为广州市花都区教师的示威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论坛上的讨论已经严重偏离了论坛的初衷。因此，本论坛决定暂时关闭发帖功能。”³⁴

当官方认为一些违规行为很严重时，会永久地关闭网站，逮捕并起诉违犯者。一塌糊涂和水木清华这两个最有影响的大学 BBS，分别在 2004 年和 2005 年被关闭。一塌糊涂是北京大学的 BBS，水木清华是清华大学的论坛。它们不仅受到大学生的欢迎，而且大半的网友来自校外，有些是海外的校友。燕南网在 2005 年被关闭，世纪中国于 2006 年步其后尘。虽然有些内容无法嵌入网络，但并不代表它们不存在，而是被迫以秘密的或游击的形式存在着。在这种新的控制环境下，抵抗也采取了新的形式。

□ 矛盾与逆流

建立管制制度与结构并不是无人反对，而是受到多方面的挑战。挑战之一是制度内部的矛盾。另一个挑战来自更大的社会力量，具体而言是公众日益增强的信息权利意识。第三个挑战是信息时代的隐藏文本，即公民创造性地利用网络绕过、躲避、挑战和反抗控制的方式。我在这一节将简要讨论前两种挑战，本章其余部分会更具体地探讨电子“隐藏文本”。

郑永年区分了网络规制体制 (Internet regulatory regime) 和网络控制体制 (Internet control regime)，以突出说明提升信息经济和控制技术引发的政治风险是一对自相矛盾的“艰难的双重任务”。³⁵ 同时，郑永年恰当地强调了不同国家部门之间的内部分歧和利益冲突。信息产业部和公安部有各自的工作重点，这样就可能引起紧张和矛盾。其实矛盾从一开始就有。跟美国一样，中国网络的发展依靠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资金的投入。今天，当看到网络给威权控制带来挑战时，外部观察者可能无法理解当初中国为什么要在国内开通网络。事实上，中国国家领导人最初主要把网络看作新经济部门，而不是政治抗争的场域。1990 年代中早期，中国主流媒体大谈信息高速公路，形成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认为信息化就是现代化的关键。该媒体话语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说法：中国过去落后西方一个世纪，而在网络发展上，中国只落后了 10 年。如果我们不抓紧机会建立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中国将永远无法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因此，如果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网络的信息价值，他们也不过是将网络视

为传输党的政策方针的工具，而不是看作日常交流的工具。正如穆勒和谭自湘 (Mueller and Tan) 所言，中国领导人“相信网络不仅可以给他们带来现代化，而且可以加强中央的控制力，促进社会的稳定。确实，从中国共产党的角度看，中国的现状确实要求它加强对思想和信息流的控制”。³⁶

随着时间的推移，官方越来越看到网络颠覆性的一面，但对它的经济效益的热情依然不减。2007年6月3日至4日，中国政府召开了一次关于建设和管理中国式网络文化的全国性会议。据《网络传播》2007年7月号的封面报道，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怎样发展既繁荣又受管制的中国网络文化。因此，这次会议肯定了网络的繁荣和管制的重要性。这期杂志对文化部的一位副部长做了专访。在采访中，该部长阐述了繁荣与控制这两个明显矛盾的目标必须共存的思想。至于什么样的政策能解决这个矛盾，并没有答案。

除了这些矛盾，还有一些逆流也在削弱网络控制的体制，包括经济、文化、公民社会和全球化方面的因素，我将在后面的章节对这些因素加以分析。在这里，需要强调公众对政府透明度和责任感的要求以及对信息权的主张。在这一方面有个重要事件，是2007年4月国家信息公开条例的颁布。尽管同类条例在市一级政府业已存在，但新颁布的条例却是第一个全国性的法规。它的颁布反映了公众对知情权的要求，而网络行动有力地增强了该需求表达的声音。³⁷

最近几年，中国的风险社会状况（如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环境风险和工业事故）日益明显。2003年的SARS危机、2005年松花江的水污染与2008年的雪灾和地震，都是风险社会的表现。这些灾难使政府领导人和普通民众同样意识到，风险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对风险的管理需要更有效、更负责、更透明的制度。在这样一个风险社会中，信息公开和公民参与是国家能否对风险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回应的关键。因此，推动网络控制的举措，受到民众追求透明、问责和知情权的抗争这股逆流的牵制。公民通过日常抵抗形式为规避国家网络控制而进行的抗争，正是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下。

□ 议题机会与议题共鸣

网络行动的议题，反映了公民抗争中的政治妥协。研究社会运动的学者指出，政治结构对某些抗争议题更开放，对某些不开放，而开放的程度取决于议题的重要性和社会背景。³⁸ 在中国也是如此。不同的议题在中国政治中有着清晰的等级结构，政府对某些议题可以容忍，但另一些则不行。因此，民众抗争拥有特定议题机会（issue-specific opportunities）。如前所述，直接挑战党与国的议题几乎不可能得到容忍，不直接挑战国家权威的议题则有可能被宽容。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控制下，那些真正进入公共领域的议题，是有可能获得一定政治宽容的议题。我所搜集的网络行动的案例，主要有以下7种议题：

- (1) 大众民族主义；
- (2) 维权活动；
- (3) 腐败滥权；
- (4) 环境污染；
- (5) 文化争议；
- (6) 揭露丑闻；
- (7) 网络慈善活动。

其中，维权活动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同以下议题相关的活动：

- (1) 弱势群体；
- (2) 小区业主；
- (3) 强制搬迁；
- (4) 乙肝病毒携带者和糖尿病病人；
- (5) 广义消费者权利；
- (6) 人权；
- (7) 城市中产阶级关心的其他议题。

这里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议题，但以上列出的条目涵盖了我的样本案例中的议题。

这七大议题大部分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合法性。人权领域直接挑战中央政

府，因此其积极分子在网络积极分子中最有可能遭到控制。在其他议题上，抗争目标是外国政府（如日本是民族主义抗议的对象）、房地产商、软件公司、污染企业、腐败官员、大众文化偶像人物。中央政府部门无法控制的非法的和道德的商业行为，是一个重要的抗争目标。保护环境、维护消费者权益和遏制腐败这些活动表达了这样的需求。比如，保护消费者权益这一活动受到了国家的大力支持。政府部门和公民同样关注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正如贝弗利·胡波（Beverly Hooper）所言，“在消费领域，人们在主张权利时，不是站在了国家的对立面……而是站在市场的对立面，并获得了国家的支持和鼓励。”³⁹对弱势群体和脆弱人员权利的维护，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因为这类维权议题建立在“道德经济”（moral economy）的基础之上。裴宜理指出，对于这类抗争，“国家表现了一定的容忍甚至同情”。⁴⁰这些维权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只是在1993年《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通过之后更盛行起来。

大众民族主义这一议题要复杂一些。我的样本中有14个案例涉及网络民族主义抗争。其中7个针对日本，其他的个案反对美国、台湾地区、法国和西方媒体（如2008年反CNN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新民族主义有助于填补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虚空，因此国家支持这一表达。⁴¹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显然对民族主义采取了支持和默许的态度。所以才有作者指出，民族主义抗议是忠诚的体现，而不是异议的表达。⁴²但是民众抗争的历史表明，积极分子可能借用官方支持的运动，提出自己的诉求。反日民族主义抗争说明，网络民族主义抗争可能为公民行使话语权开辟空间。⁴³因此官方才会小心翼翼，而不放任大众民族主义自由发展。

要成为网络行动的主要议题，除了具有一定的政治容忍性（political tolerability），还要能引起公众的共鸣。每天都有大量的议题进入网络空间，但只有一部分引发了大众抗议。大多议题淹没在海量的帖子中，没人看，原因之一是它们缺乏共鸣度。一个大学生发帖抗议教室没有空调，可能会获得一些同学的支持，但这样的议题不太可能走出校园。总体而言，那些与更多人日常经历相关、能激起判断好坏的道德感、有着具体责任归因的议题，具有更高的共

鸣度。⁴⁴

网络行动的七大领域都有很高的公众共鸣度。它们代表了当今中国最热的社会、政治与文化议题，每个议题都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民族主义、环境保护、反腐和维护消费者权益，无疑是这样的议题。即使反对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运动也有广泛的基础，因为中国有 1.2 亿乙肝病毒携带者。⁴⁵ 争取游戏消费者权益的游戏社区，也拥有广泛的基础，因为中国在 2006 年已有 3100 万游戏玩家。⁴⁶ 即使这些群体的一小部分人组织起来，人数也蔚为可观。因此，网络行动的重要议题，多涉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 依法抗争和艺术性抗争

即使拥有政治容忍和公众共鸣，一些议题仍然可能被过滤掉。为了使议题不被过滤，网络积极分子像国内农村的依法抗争者一样，通过合法的抗争，规避镇压，并扩大交流的渠道。同依法抗争者一样，他们游走于“合法渠道的边界”。⁴⁷ 在自发性抗议中，依法抗争表现在呼吁进行理性的抗争，而不是走极端路线。例如，2000 年 5 月，在北京大学女生邱庆枫被杀事件引发的抗争的早期，因预计大学可能采取控制手段，北京大学 BBS 论坛上的帖子主张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并警告当局不要关闭 BBS。⁴⁸ 网友同时鼓励站务应该更放开手脚。“三角地”论坛的一个帖子写道：“站长，不要怕，让我们在这里尽情地宣泄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悲伤，我们对死者的悼念吧。如果因为可能的压力而屈服，那我们还能剩下什么呢？——jinni, 2000 年 5 月 23 日。”一些网友知道直言恶语可能起反作用，就提醒抗争必须采取有力有理的方式，例如，一则帖子写道：“请大家利用好 BBS，现在站务已对大家的情绪作出积极的反应，但万一站务受到高压，希望大家能体谅他们。——fina, 2000 年 5 月 23 日。”⁴⁹

在 2005 年反日抗议中，组织这场运动的核心网站在 4 月 11 日敦促“活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防止过激行为的出现”。⁵⁰ 在其他一些案例中，积极分子较少依赖 BBS 论坛上的自发抗议，而是通过大众媒体和诉讼渠道进行动员。比如，反对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运动的积极分子在 2003 年

赢得第一个诉讼后，向法院提起的诉讼在 2007 年达到了 30 多个。⁵¹ 诉讼前期的活动，通常包括在他们的网络社区（拥有 30 万注册用户）中进行前期的组织动员工作。2007 年 11 月，北京有关部门突然关闭他们的主网站，部分原因是他们在网上成功地开展了有组织的活动。

除了依法抗争，人们还参与各种形式的艺术性抗争。他们发明了各种克服控制、反抗控制以及表达不满的方法。首先，艺术性抗争必须要有艺术化的抗争路径，例如利用新的电子技术创造抗争产品。人们参与抗争性活动（特别是文化抗争活动）的一个原因，是追求和展示创新的渴望。很多颇具创造性的 Flash 视频在 SARS 和禽流感危机期间出现在网上，并被广泛地传播。也有一些有关民族主义和环保主题的 Flash 视频。这些视频一方面表现了积极分子在艺术上的创新，另一方面也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观点。⁵² 黑客攻击是通过侵犯行为表达创新能力的做法。在黑客文化中，拥有入侵精密网络的能力，是一种荣誉与威望。⁵³

其次，艺术性抗争需要有冲破中国网络控制结构的能力。官方对网络各部分控制的力度不均，对政府和官方网站的控制紧于对商业和私人网站的控制。另外，网站受欢迎的程度也不同。有的网络社区规模比较小，有的却有成千上万的注册用户。网络抗争更有可能在人气旺的或非官方的网站上传播，这一模式在 2000 年与邱庆枫之死相关的抗议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在那波抗议中，北京大学 BBS 首先发布了这一坏消息，论坛上掀起了抗议的浪潮。数小时之后，该消息被转载到几个受欢迎的商业网站和大学 BBS 论坛上。然而，官方主办的强国论坛直到次日才出现抗议帖子。很明显，强国论坛对与谋杀事件相关的帖子进行了审查，⁵⁴ 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该消息为什么在北京大学 BBS 上贴出 48 个小时左右之后才在强国论坛上出现。如果说关于该事件的抗议帖最终还是上了强国论坛，那仅仅是因为此类消息已在其他各大网络社区出现，因而不再有可能进行屏蔽了。

山西黑砖窑事件，也同样反映了艺术抗争需要冲破控制的能力。首先将该事件通过网络帖子公之于众的是一位女性，她非常谨慎地考虑了策略。她没有在家里或单位的电脑上发帖，而是借了朋友的电脑。刚开始，她试图在官方的

新华网上发帖。在新华网的论坛上，她用了规避审查的一般方法，即通过回复其他帖子的方式贴出自己的帖子，而不是以新的独立主题发帖。即使这样，她的帖子还是发不出了。最后，她用同样的方法在大河网的 BBS 论坛上发出了帖子。⁵⁵大河网是河南省的官方新闻网站，受到的规管与新华网不一样。

网络空间中的话语所具有的特征，使很多网络行动采用了语言说服（verbal persuasion）的方式。除了语言和修辞，积极分子还创造性地使用影音进行情感动员。⁵⁶在跨国倡议网络中，创造性地使用符号资源的策略，被称为“符号政治”（symbolic politics）。⁵⁷这种符号政治在中国的网络行动中也很重要，很少有哪个案例不是大量使用各种符号的。在抗争中产生的叙事，一般都强调受害者的无辜和他们所遭遇的不公，而作为对照，做恶者则常常被描述得凶恶无情。这类叙事所展现的，是善与恶的典型对照。例如，在邱庆枫之死引发的抗议中，一个广为传播的帖子，是一首描写受害者的年轻美丽与无辜的诗歌。诗的题目是《枫·飞——为逝去的魂灵》，它表达对美丽年轻生命逝去的哀悼，诗的开头几句是：

一个平常的周末
像任何挤满课程的日子
从容的考试过后，没有班车
一个女生独自走着，直到
下午过渡到某一个夜的尽头⁵⁸

2003年有关孙志刚之死的叙事，同样将他的年轻、无辜和智慧同警察的残酷进行对照。发布受害者的图片是符号政治的重要特征，而网络是达到这一目标的理想工具。与叙事一样，这些图片突出受害者的天真、美丽和他们所遭受的不公。在怒江反坝运动中，一群环保主义者从北京到偏远的怒江峡谷展开了一次田野调查。之后，他们在北京组织图片展，通过展示怒江的原生态美，动员公众的反坝情绪。这次展览的部分图片还被贴到了该运动的网站上。网站的首页展示了两个天真的小女孩在江中洗澡的图片。图片突显了小女孩的脆弱、

美丽和天真，就好像在敦促浏览者伸出援手，阻止将会破坏怒江、进而破坏年轻美丽生命的大坝工程。在山西黑砖窑事件中，那位女性通过辅以展示砖窑恐怖环境的图片，在公开信中呼吁拯救孩子。

□ 电子隐藏文本

在依法和艺术性抗争之外，还有另一种电子抗争形式，我称之为“网络时代的隐藏文本”，或称电子隐藏文本。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将“隐藏文本”视为“在强势力量背后存在的批判力量”。⁵⁹他指出，“隐藏文本不仅包括话语，还包括一整套行为……对很多农民来说，偷猎、偷窃、秘密避税、有意为地主做烂活是这一隐藏文本的重要组成部分。”⁶⁰

电子隐藏文本通过电子形式反抗权力。我们可以区分四种电子隐藏文本。

第一种涉及技术手段，主要包括用代码破译代码。比如使用代理、反拦截软件，而对于更机智的网友来说，可以通过重写电脑编码以破解原软件的过滤功能。在中国网络空间中有关技术和电脑的讨论中，到处是有关如何“翻墙”的实践建议和评论。

第二种电子隐藏文本类似网络游击战。如果网站被关闭，人们会开辟新的网站，这在技术上很容易做到。一位反腐网站站长在2004年因曝光山东省一位市长，网站不断遭到关闭。最后他不得不将网站放到海外服务器上。他同时还开了很多博客，说：“我先后做了大约80多个博客。有一段时间，有人组织对我的‘博客’进行封杀，先后有30多个被‘枪毙’了，目前我仍然保留‘博客’50多个。现在他们看到封杀没有用处，封杀的势头锐减。”⁶¹

第三种隐藏电子文本是语言式的。网络可以根据程序设计，过滤词汇，但语言比起电脑程序来具有无穷的创造性。通过不断实践，中国网友已经发展出一整套反过滤的符号策略。例如，在2000年5月北京大学学生被杀引发的网络抗议中，强国论坛的网友发现，带有北大二字的帖子遭到了屏蔽。他们通过在北大之间加标点符号和其他的字符躲过网络过滤，将帖子中的“北大”换成了“北·大”，或者“北2大”。这些细微的创新方法，甚至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亚

洲周刊》这一中文杂志有一则报道是这样写的：“通过研究和试探敏感词过滤，网友们总结出不少破解过滤的方法，包括字符隔断法、谐音法、拆字法、拼音化以及图像化等等。单一的方法不一定有效，往往要混合使用多种方法，才可以骗过计算机系统。当然，人脑始终是最聪明的，有条件的大网站会有专门人员审核上传的信息，如果敏感信息被网管或者网警发现，那么轻则被警告，重则被网警列入黑名单。”⁶² 语言的创新使用是如此普遍，以致有人发帖说除非彻底关闭网络，否则网络过滤词技术必定要失败，最糟糕的情形是会出现含有“◎# ! ◎ 111abc 疯 ×*():-)”⁶³ 这类全新的“火星”语。

第四种电子隐藏文本反映在组织形式创新上。网络活动采取了不同的形式，如网络请愿、言语抗议、建维权网。大多形式是公开的。但积极分子也发明了隐藏的形式，比如利用网络论坛召开“秘密会议”。电子隐藏文本因此既是政治环境的反映，也反映了这一环境中的人的创造性。直接的异见表达和有组织的活动，都使用了电子隐藏文本。

□ 结论

我在本章说明，中国过去 10 年已经形成了集法律、行政和技术手段于一体的管制网络言论自由的体制。控制的结构建在代码之上，并产生了一整套政治制度结构。然而，该体制深受部门之间在经济发展和意识形态控制方面的内部矛盾之累。另外，民众对政府透明度、问责以及知情权的渴求，形成了反控制的逆流。最后，中国网民和积极分子是灵活的社会行动者，创造性地发展出规避和反网络控制的方式。

本章的分析表明，控制和反抗尚无胜负之分。或许，目前最重要的结果，是通讯技术已经成为政治抗争的核心手段、利益和竞技场。对有关新技术在西方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曼威·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 1997 年的书中指出，“电子媒体已成为首要的政治空间。”⁶⁴ 处在新世纪之初的中国，情况亦然。控制与反抗的互动，已在中国催生了信息政治（information politics），其主要特征首先表现在囊括政府部门、行政与技术人员、法律法规和网警的规管

体制的形成。该体制既包括传统的管制方式，也包括隐秘的控制与管理的新手段。它日益依赖技术上的控制与监管手段。同时，因控制的复杂性与控制范围的有限性，该体制采取了选择性控制的方法。因此，这一制度有选择地打击网络异见人士、屏蔽国外网站、关闭国内网站；同时，对不同社会议题采取不同的打击力度，对一些议题的控制紧于另一些议题，甚至对同一议题的控制表现得时紧时松。

于公民而言，这一新的政治形式代表着一个新的抗争领域。最近几年来，在中国的公共话语中，对信息获取、信息公开、知情权和信息传播权的要求日增。这一新话语的出现与公民对新通讯技术的使用相关。它既反映了公民在使用新信息技术时的挫败感，也反映出公民对技术重要性的认知。公民反对网络控制的抗争，既同之前的抗争有一定的连续性，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这些新型抗争的特点是弥散的、流动的、游击式的，既有组织化的，也有无组织的，既有内外的联络，也有线上线下的互动。中国政治研究者久已认识到，中国现代史中的抗争具有原子化的特征，抗争活动通常与外界隔绝。虽然这一原子化的特征依然存在着，⁶⁵但我对网络抗争的分析，说明新的联盟、联网和联系的可能。分隔式的抗争正在演变为积极分子网络。

注释

- 1 Lessig, *Control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 2 Kluver, "The Architecture of Control" ; Brady, *Marketing Dictatorship*.
- 3 O'Brien and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2.
- 4 Migdal, Kohli, and Shue, "Introduction," 1-4.
- 5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1:54.
- 6 Giddens,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178.
- 7 Bourdieu, *Practical Reason*, 41.
- 8 同上。
- 9 宋永毅、孙大进编,《“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 10 Karnow, *Mao and China*, 177.
- 11 Link, *The Uses of Literature*, 193-197.
- 12 任毅,《生死悲歌:〈知青之歌〉冤狱始末》
- 13 童怀周主编,《伟大的四五运动》。
- 14 Dittmer and Liu, "Introduction," 5. 有关政治改革的全面评估, 参见: Yang,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 15 Qian and Wu,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 16 Perry,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 17 Perry and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Bernstein and Lü,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Shi and Cai, "Disaggregating the State" ; O'Brien and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Lee, *Against the Law*.
- 18 有关国家对网络挑战的适应, 参见 Deibert, *Printing, Parchment, and Hypermedia*; Everard, *Virtual States*.
- 19 关于中国网络规定的完整清单, 参见中国互联网中心的官方网站: <http://www.cnnic.net.cn>.
- 20 参见: <http://www.cnnic.net/html/Dir/1997/12/11/0650.htm>, 获取日期: 2007年12月15日
- 21 2008年6月, 信息产业部重组为工业和信息化部。
- 22 这一套规定被2005年9月25日颁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取代。
- 23 Kraus, *The Party and the Arty*, 116.
- 24 Braman, "The Emergent Global Information Policy Regime," 13.
- 25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http://www.people.com.cn/GB/42410/42764/3097243.html>, 获取日期: 2007年12月3日。有学者揭示了中国一个新趋势: 政府是在以法治国 (rule by law), 而不是依法治国 (rule of law)。参见: Lee, *Against the Law*.
- 26 *China Internet Development Report 2003-2004*, p. 216.
- 27 <http://www.cnnic.net.cn>, 获取日期: 2008年4月8日。
- 28 根据2007年5月14日《北京日报》的一则报道, 北京市网络宣传与管理办公室在2006年8月聘请了181名志愿者监控非法信息。每个志愿者在每个月内必须举报50条“有害信息”。参见王皓,“北京网络义务监督志愿者——用奉献精神营造网络蓝天”。
- 29 例如, 山东省济南市宣传部发布了一则通知, 指示“全市网络评论员要根据济南日报当天发表的我市中心工作的宣传内容、宣传口径, 结合各自所在单位在特殊敏感时期网络舆论舆情方面的突出要求, 参与和支持、配合全市网络宣传舆论和网络舆情紧急处置工作。”参见: 山东省济南市宣传部,《市委宣传部研究部署全市突发事件互联网舆论舆情和新闻宣传工作》, 2007年8月8日, 链接: <http://xc.e23.cn/news/534.html>, 获取日期: 2008年8月8日。
- 30 有关中国网站过滤的全面分析, 参见: OpenNet Initiative, "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 A

- Country Study,” OpenNet Initiative, *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 A Country Study*, April 14, 2005. 链接：http://www.opennetinitiative.net/studies/china/ONI_China_Country_Study.pdf, 获取日期：2005年5月24日。
- 31 正出于这个原因，几个协助中国建设网络的美国公司受到了批评。例如思科（Cisco）公司出售给中国的路由技术据称具有过滤数据包的功能。参见：OpenNet Initiative, “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 A Country Study,” April 14, 2005, 6–7. 链接：http://www.opennetinitiative.net/studies/china/ONI_China_Country_Study.pdf, 获取日期：2005年5月24日。
- 32 对一家商业门户网站的网络编辑的采访，2007年7月8日。
- 33 对某 NGO 组织者的访谈，2004年12月。
- 34 <http://bbs.21jiaoshi.com/thread-9910-1-1.html>, 获取日期：2007年1月3日。
- 35 Zhe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 36 Mueller and Tan, *China in the Information Age*, 12.
- 37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链接：http://www.gov.cn/zwgk/2007-04/24/content_592937.htm, 获取日期：2008年4月3日。
- 38 有学者指出，“社会运动产业（social movement sector）的不同领域有着特定的政治机会结构……并不是运动要解决的所有问题在政治场域中都具有同样的关切度。”参见：Kriesi et al.,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96. 梅耶和敏科夫在“界定政治机会”一文中指出：“显然，一个政体为一类参与提供了机会，但这可能会导致其他参与机会的消失。”参见：Meyer and Minkoff, “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1463.
- 39 Hooper, “The Consumer Citiz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 40 Perry,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xiv.
- 41 赵穗生在“中国的实用民族主义”一文中将国家主导的民族主义称为实用民族主义：“实用民族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统治工具，用以支持存在诸多问题的政治系统中的大众信仰，是在向后共产主义社会快速而动荡的过渡过程中团结全国的工具。”参见 Zhao, “China’s Pragmatic Nationalism,” 132. 关于中国的新民族主义，参见：Grie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 42 Zheng, *Technological Empowerment*. 然而，另有作者认为，大众民族主义是“独立于国家民族主义的自治的政治领域”，而网络民族主义“不仅挑战国家垄断国内民族主义话语的生产，而且为普通百姓实践‘公众话语权利’打开了新的可能。”参见：Liu, “China’s Popular Nationalism on the Internet.”
- 43 Liu, “China’s Popular Nationalism on the Internet.”
- 44 关于框释共鸣（frame resonance），参见：Lu Ju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the antidiscrimination movement of hepatitis-B carriers in China.” 关于议题共鸣，参见：Keck and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 45 Lu Ju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the antidiscrimination movement of hepatitis-B carriers in China.”
- 46 Ernkvist and ström, “Enmeshed in Games with the Government.”
- 47 O’Brien and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2.
- 48 虽然 BBS 没有被关闭，但有几次系统好像不能正常运行，这让学生怀疑是否发生了什么。
- 49 Yang,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471.
- 50 链接：<http://www.china918.net/91807/newxp/ReadNews.asp?NewsID=3190&BigClassName=%C3%E6%B6%D4%C8%D5%B1%BE&SmallClassName=%CD%F8%D3%D1%CE%C4%D5%C2&SpecialID=38>.
- 51 Lu Jun, “The past and future of the antidiscrimination movement of hepatitis-B carriers in China.”
- 52 王颖吉，《闪客江湖》。
- 53 王云斌编著，《红客出击：互联网上没有硝烟的战争》
- 54 这体现在一个题为“QGLT 正在极力屏蔽有关北京大学那个事件的新闻。这只会是徒劳！其他留言板到处都在讨论这件事”的帖子上（Wo zhetou sizhou!: 05/24/00, QGLT）。
- 55 朱红军，“山西黑砖窑风暴被她点燃——辛艳华”。

- 56 劳拉·古拉克 (Laura Gurak) 的研究显示, 修辞和语言在网络抗争中是有力的社会力量。她认为社区精神和新的电脑网络交流方式, 可以使社区得以延续, 并在没有共同在场或面对面互动的情况下提供行动的动机。参见: Gurak, *Persuasion and Privacy in Cyberspace*.
- 57 Keck and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 58 这首诗最初发表于北京大学网络论坛, 然后在 2000 年 5 月 26 日下午 5 点 18 分被转载到强国论坛 ((bbs.peopledaily.com.cn)。作者存档。
- 59 Scott,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xii.
- 60 同上, 14。
- 61 蒋玉生, “中国舆论监督网站的调查与思考”, 链接: <http://gx.people.com.cn/GB/channel71/200702/25/1327299.html>, 获取日期: 2008 年 1 月 14 日。
- 62 吴中校, “十七大前严管网络网警 VS 网民斗智”。
- 63 ID 为“人工生命”发的帖子, 时间: “2003-06-14 15:36:41”, 链接: <http://www2.qglt.com.cn/wsrmlt/wyzs/2003/06/14/061403.html>, 获取日期: 2008 年 3 月 4 日。
- 64 Castells, *The Power of Identity*, 311.
- 65 Lee, *Against the Law*.

抗争仪式与抗争体裁

抗争总是带有文化属性。它包括抗争表演，运用诸如叙事、语言、意象和音乐等符号资源。重复性的表演成为仪式，符号资源则区分不同的体裁(genre)。风格(style)是那些能够表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地区和社会阶层中所使用的符号资源特征的因素。¹因此，识别抗争文化，就要辨析抗争的仪式、体裁和风格。正是通过表现出的仪式、体裁和风格，积极分子才能表达诉求与怨恨、认定抗争对象、激发公众同情、建立团结意识，以及动员抗争参与。

文化是抗争的符号载体。民众抗争不是随意发生的，而是经由文化传播的。因此，抗争文化的变化，既反映又会引起抗争其他方面的变化，反之亦然。虽然古老的抗争仪式提供了现成的行动方式，但新的抗争仪式、体裁和风格反映了抗争内容与条件的变化。同样，抗争的创新可能从抗争文化的创新开始。

尽管中国网络行动的历史很短，但它已发展出自己的文化。本章研究网络行动的仪式与体裁，展示网络行动文化既包含传统民众抗争的元素，也有一些重要的创新。通过使用新媒体技术，人们已经创造出新的抗争仪式和体裁。通

过动员愤怒、喜乐、同情、幽默和欢笑等情感，这些电子仪式和体裁能十分有效地动员集体行动。²

网络行动的仪式和体裁是行动与表达的形式，是文化的形式。因此，雷蒙德·威廉姆斯有关文化形式（cultural form）的概念，为分析网络行动的仪式和体裁提供了有用的工具。

□ 文化形式与人的状况

威廉姆斯在讨论电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时，一开始就指出“电视技术和其他被认可的文化及社会活动之间具有复杂的互动关系”。³他认为，“电视在本质上是早期文化形式的结合与发展”，但他强调“这显然又不仅仅只是结合与发展的问题”，而是包含了“重要的变化”和“一些真正的质的不同”。⁴

例如，新闻是现有的最常与印刷媒体（报纸）相关的一种形式。通过电视播报的新闻，看起来像是将现有的形式整合到新的技术形式之中。但是，威廉姆斯提醒我们，电视上的新闻与报纸中的新闻是不完全一样的。它们除了在其他方面上有所不同，在呈现的次序和形式上也不同。这些不同之处，会影响到观众和编审控制的方式。报纸在一个版面能容纳许多不同的新闻故事。尽管各条新闻因其重要性不同，通常被分配到报纸的不同版面，但读者对先读什么后读什么，能够自主控制。然而，电视和广播中的新闻是通过线性方式呈现的，一条新闻接着一条，受众的控制力较小。因此，新闻的不同形式反映了编审控制的不同类型，同时导致了不同的受众行为。

以上观点意味着，新文化形式的出现是人类能动地回应特定社会状况的结果。因此，电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人类为了满足需要而创造出的新的文化形式。在威廉姆斯论电视的著作中，两个概念表达了这一中心命题。一是“流”（flow）的概念，他指出这是电视最核心的特征。在电视中，广告接着新闻，然后是其他节目，一个接着一个，没有中断，从而创造出自然流（natural flow）的印象。然而，自然流“是由人们对媒体的有意识的使用决定的，而不是由我们所使用的材料的特性决定的”。⁵归根结底，自然流是“特定文化的

意义和价值的流”。⁶威廉姆斯之所以强调电视背后人的意图和能动性，是为了揭露电视作为新的文化形式而被创造出来这一现象背后的权力关系。他的关注点是权力与统治。不过，人类主观能动性同时也表现为对权力的反抗，处于从属的和边缘化位置的社会行动者，也可以通过创造性地使用新旧文化形式去挑战权威。

形式与内容相关。在威廉姆斯看来，电视作为一种新的文化形式，反映了新的社会条件。他用“流动的私有化”（mobile privatization）这一概念描述新的社会条件的性质，即“两个貌似矛盾但又密切相关的现代工业城市生活的趋势：流动性与更加自足的家庭”。⁷因此，电视是作为一种“即时流动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一种流动的私有化”。⁸威廉姆斯认为，这一现代工业生活方式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紧密相连。根据这一观点，电视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产物，脱离这一现代的人类处境，我们将无法理解这一文化形式。

□ 现代中国的抗争文化

中国有着悠久的民众抗争传统，从封建帝制时代的农民叛乱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革命。裴宜理发现，在这一经久不衰的抗争传统中，创造性地篡用国家仪式和官方话语，是挑战权威的最成熟的方式之一。⁹和裴宜理一样，约瑟夫·艾什力克（Joseph Esherick）和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观察到，现代抗争不断地使用古老的仪式。这两个学者发现中国抗争传统中有如下若干元素：（1）颠覆利用国家仪式（如为国家领导人举行的追悼会）；¹⁰（2）坚持使用进谏和呈递请愿书等在传统上被认可的行为模式；¹¹（3）展示代表工作单位的旗帜；¹²（4）发誓要为信仰而献身（并因此成为烈士）；¹³（5）由传统剧目和从西方引入的文化形式组成的街头剧场。¹⁴

1980年代末的街头剧场充满了抗争表演，有喊口号、唱歌、拉旗帜标语、发表公众演说、发布公开请愿、分发传单和大字报等形式。艾什力克和华志坚在研究20世纪早期的学生抗议时指出，至少有一部分街头剧目来自国外，特

别是公开集会、示威和公众演说的文化。这些元素在国民党时期得到了实践，并且传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执政，国家本身通过其爱国主义大众动员和政治运动，促进了这一政治文化的传播。这一文化已经变得非常强大，以致邓小平在“文革”后进行经济改革时，也无法摆脱它。正如艾什力克和华志坚所言，“有些公众仪式总是不可少的，而在举行那些仪式时，总存在学生或其他行动者篡夺舞台、将官方仪式变成他们的政治舞台的危险”。¹⁵

裴宜理的分析为我们了解当代中国抗争方式提供了另一种途径。她强调，在历史上，国家对抗争的回应塑造了抗争的形式。裴宜理认为，挑战权威（或者说天命）是中国儒家传统文化中的合法内容。这一元素被保存了下来，甚至在儒家传统本身受到怀疑时，也可以看到它的存在，比如在五四运动和“文革”时期。然而，官方通常用不同的方式回应不同的抗争，而回应的方式则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裴宜理通过对三个当代案例的研究指出，中央政府能够容忍工人和农民基于生存的抗争，是因为在历史上，这些抗争背后的道德经济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享有一定的合法性，并且不被看作对政体构成特别的威胁。最后，面对1999年学生抗议中国驻贝尔格莱德（Belgrade）大使馆被炸时，官方感到左右为难。中国共产党自身脱胎于20世纪早期的这类学生运动。中央政府清楚地认识到，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都有可能导致不良的后果。所以，官方从反对到支持学生的集会反映了这一矛盾。政府最后选择支持示威，是因为这些活动发生于5月4日后不久，即发生于中国共产革命历史上神圣的五四运动纪念日之后不久。在这个时候反对学生，可能会“被指责没有能力保护国家主权”。¹⁶

现代中国的抗争方式反映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特殊关系。颠覆国家仪式和庆典、依循传统上被许可的行为模式、树立民族烈士的形象，甚至高举工作单位的旗帜，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与公民之间互授合法性（mutual legitimization）的关系。对公民而言，篡用国家仪式是将他们的抗争行为合法化的方式。抗争通常通过对国家仪式的篡用而获得力量。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应该观察不同的抗争形式如何反映权力的制度安排，以及它们同公民之间

的关系。

裴宜理发现，通过几个世纪形成的这一特殊的国家—社会关系，催生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传统意识” (intellectual traditionalism)，即现代中国民众抗争中的“帝王崇拜心态” (emperor-worship mentality)。这一心态，在 1980 年代末仍然很明显。这一知识分子的传统意识，是当代中国民众抗争的显著特征，这意味着儒家政治文化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¹⁷

黎安友在研究中国政治文化和民主内涵时，似乎同样认为中国存在着这种知识分子的传统意识。不过，他最关心的是中国在 20 世纪中争取民主的斗争。他认为，这一传统意识主要体现在面对民族救亡危机时民主派和国家所表现出的高度一致的利益上。他指出，所有现代中国的宪法都承认人民高于一切，但个人利益总是附属于更高的国家利益。自梁启超以来的民主派，与国家统治者之间有着共同的强国理想。一直到民主墙运动和 1980 年代末，很多民主积极分子和政府部门仍然对民主持有同样的工具性看法，把民主视为现代化的途径，而不是将其本身作为追求的目标。¹⁸ 这一观点源自追求国家富强的历史斗争。¹⁹

但是，黎安友也提出，民主墙运动中更为激进的积极分子对中国民主斗争还是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因为他们“坚持认为如果人们不能真正地行使权利，民主则不能发挥其功能……民主墙运动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因此体现在，它否定了将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轻易等同起来的思想，而该思想自梁启超以来一直主导着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²⁰ 黎安友表示，至少在那些更激进的积极分子中，“帝王崇拜心态”在 1970 年代晚期和 1980 年代早期已经消失。

□ 传统仪式的延续

在互联网时代，中国悠久的抗争文化仍在延续。很多传统实践被复制到网上。一方面传统的形式保持着生命力，另一方面人们也创造着新的形式。有些新形式是在新媒体条件下对传统实践进行的创造性改造，也有的形式是新媒体促成的传统形式的发展。首先来讨论抗争仪式的连续性。

抗争仪式可以分为言语和非言语的仪式。中国抗争文化中的大众语言仪式包括呈递请愿书、发表公开信、贴大字报、分发宣传册和传单、出版个人编辑的报纸和杂志、喊口号、唱歌、发表公共演说和进行辩论、伸冤等。非语言仪式包括集会、示威、静坐、串联、占领公共空间以及绝食。网络很自然地促进了语言仪式的实践，不过甚至有些非语言仪式也被复制到网上。在网上，街头聚会变成了BBS帖子的“围观”。在2003年12月和2004年1月，中国网民反对某法院轻判撞死农民的宝马车主。人们控诉法院的腐败，要求重新审判。2004年1月16日，一则帖子呼吁全世界的中国人“在所有中国BBS论坛上同时发帖，举行网络集会”。²¹

其次，大众抗争的传统为网络行动提供了文化工具包。因此，很多传统的抗争仪式，比如喊口号和贴大字报，被复制到了网上。在改革开放之前，喊口号和贴标语是抗争剧码的日常组成部分。喊口号一般发生在群体中，但大字报既可以出现在任何公共空间，也可以由个人完成。口号很容易写，不需要什么分析能力，表达的是强烈的意见和情感，而且容易记住。例如，“打倒这个，打倒那个”就是红卫兵运动甚至是后来的学运中最常见的口号。

网络空间中的抗争也充满了喊口号的行为。在北京大学学生邱庆枫之死引发的抗争中，搜狐“时事”论坛在2000年5月25日有一则题为“还我们校园的安全与和平”的帖子，有以下几条口号：

救救我们同胞！

救救我们自己！

站起来吧！我们的硬气！

我们的尊严！

2005年5月26日，同一论坛上的另一帖子呼吁：“我不仅因为北京大学女生被杀而感到愤怒，同时还因为学校当局在学生被杀前后的所为而愤怒！！！”²²这些抗议中经常使用很多感叹号，既表达了作者自己强烈的情感，同时为了直接唤起网上读者的情感。

网上的帖子在形式与功能上与大字报相似。像大字报一样，网络帖子有各种体裁：散文、信件、诗歌、口号、一句陈述、单个感叹词（如“是的”、“废话”）。²³ 例如，在之前提到的抗议中，有几首写给死者的诗歌在网络论坛中流传。我在前一章中提到过一首《枫·飞——为逝去的魂灵》这首诗。有些网友通过发表公开信，表达了强烈的团结感。一封信的开头这样写道：“很高兴这么快就收到了你的复信，此前我在吉安论坛和中国与世界论坛已分别见到你关于北大一事的帖子，并拜读。事情全部细节我并不十分清楚（无暇全程关注，也无渠道），但现有的，已经不妨碍我产生自己的想法。”²⁴ 这封信的作者然后解释，这场抗议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提出了一些群体的利益缺乏保护这个普遍的问题。

第三种被复制到网上的仪式是“串联”。串联的做法大概古已有之，或可追溯到早期人们长途跋涉告御状的做法。华志坚提到过发生在1931年的一个案例，并将它比作宗教上的朝圣。²⁵ 从红卫兵运动到后来学运中的串联，都是类似于告御状的朝圣之旅。串联是进行跨地区动员的有效策略，因此国家非常忌惮它。1966年“文化大革命”之所以得到迅速的传播，原因之一是学生走向全国各地，从而将其他城市的学生“串联”起来。在民主墙运动和后来的学运中，全国的积极分子再次串联了起来。有些是通过电话和邮件联系的，而有些是积极分子通过四处旅行、互相见面而获得联系。在这两个运动中，各省的积极分子都到北京去串联。这些串联活动成为抗争传播的重要手段。

在2000年5月由邱庆枫之死引发的抗争中，积极分子在网上用新的方式实现了串联。这些串联既包括线上线下的联系，也包括海内外的联系。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之间的联系有三种形式。首先，电子布告栏上的一些信息被打印出来，贴到校园的墙上，这些帖子因此变成了大字报。²⁶ 有个帖子的作者就说他在校园墙上读到的一张大字报，最早是出现在网上的。

其次，网络论坛被用于播报校园内的抗争事件，这使网络成为线下活动的组织空间。这种做法同时发生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例如，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网友组织了小规模纪念活动。²⁷ 一则广为传播的帖子报道了5月23日晚上

在北京进行的从清华大学到北京大学的游行示威活动。²⁸这一动员模式在随后的几年间不断重演,比如在2005年的反日游行和2007年的厦门“PX事件”中。

网络空间和线下空间的第三种联系方式,是在网上对校园事件进行几乎实时的报道。有帖子这样描述5月23日晚上的烛光纪念活动:“在三角地附近的台阶上,闪烁的蜡烛组成了一个心字型,心字中间摆着白色的纸花。”²⁹网络播报使关注此事的人们能够跟进现场正在发生之事,并为那些不在现场的人创造一种现场感,这样做可以激发情绪感染力。社会学家认为,社会运动必须保持“戏剧性”,以使“全体演员”和观众都有持续的兴趣。³⁰网络播报线下的新闻正是服务于这个目的。

除了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之间的联系,海内外布告栏之间也有着跨国的联系。有些帖子被转载到美国的中文论坛,中国一些BBS上的信息很明显是由海外网友发布的,特别是北京大学的校友。2000年5月29日,有位作者发了一则消息,说为个人利益抗争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抗争在美国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一位名叫“Wanderer”的网友同日在另一个论坛上发帖。这个自称是在美国某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赞扬美国校园的保安设施,并建议中国大学应该向美国大学学习。通过这些方式,线上线下的联系塑造了线上线下的抗争。网络播报使身处不同地方的人们能够跟进现场发生的事件。³¹

□ 网络行动的新仪式

集体抗争的剧码不容易变化。人们一旦熟悉某种特定的行为模式,就不会轻易抛弃。然而,当传统的“地方性/依赖性”(parochial/patronized)模式向现代的“全国性/自主性”模式转变时,就发生了抗争方式的模式变迁(modular change)。³²这一变迁随着现代印刷资本主义的崛起而发生。报纸和书籍通过情感纽带,将分散各地的人们联系起来,从而创造了远距离的想象社区或“印刷社区”(communities of print)。³³像美国和法国大革命这种强大的运动之所以发生,按西德尼·塔罗的说法是因为“印刷品、社团、报纸、传单和非正式网络创造了松散的联系,使得在不同群体和阶级之间产生一定程度上的协调

性集体行动成为可能，而社会阶级这种所谓的强关系却很难促成这样的协调行动”。³⁴

在当今中国，新的抗争形式——新仪式和新内容——正在出现。将网络创新地用于抗争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创新既反映了网络的技术能力，也反映了使用这些技术能力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我的样本中大部分个案都涉及至少一种以下的做法：

- (1) 参与 BBC 论坛中的争议
- (2) 发短消息
- (3) 写博客
- (4) 主持动员网站
- (5) 网络签名请愿
- (6) 黑客袭击网站

这些行动方式并不是全新的。即使是黑客袭击网站，也让人想起经常在街头抗议中出现的破坏或入侵公共场所或禁区的行为。然而，这些做法因为使用了新的电子技术，又具有创新性。除了个别例外的情况，BBS 论坛不是为抗争而设，它们是实现日常社会化（everyday socialization）的网络社区，但都有助于抗议和争论。³⁵ 所有重要的网络抗争事件都发生在 BBS 论坛上，这有其经济和社会的根源，我将在后面几章详细讨论。在这里，我们只需要提出以下观点，即 BBS 抗争成为新的抗争形式，是因为缺乏其他公共抗议的途径，街头抗议有政治风险，而网络文化又具有参与性。BBS 抗争也是网络行动形式中最强大的一种，因为它往往吸引大量的参与者。

短信也是一种创新仪式。有时，批判性的消息通过手机传播，这在 2003 年的 SARS 危机中经常发生。³⁶ 另一个我在后面要谈到的有名的例子是通过手机短信传播的讽刺诗，这首诗使其作者秦中飞被捕。最著名的例子要数厦门 PX 事件。2007 年 5 月底，在南方城市厦门，网络和手机用户开始收到有关 6 月 1 日在市中心进行“散步”的消息。该消息通过 BBS 论坛的帖子和短信传播。这次“散步”是为反对在城市附近建 PX 化工厂，因为据相关消息，PX 对人体健康具有极大的危害。厦门市官方得知酝酿中的“散步”后，为了阻止这次

行动，官员在该市报纸中讨论 PX 项目，并向市民保证项目的安全性。5 月 30 日，官方再次试图阻止计划中的示威，一位副市长在新闻发布会中宣布，该项目将被延后，官方将对之进行全面的环境影响评估。居民显然不相信，“散步”按原计划进行。

该事件中的用词值得注意。词语的选择是为了营造特殊的情绪感染力。通过号召市民加入“散步”，而不是参加预谋的示威，组织者为一起严肃的事件增添了轻松的气氛。对于潜在的参与者而言，这种做法降低了经常伴随此类活动的恐惧感和焦虑感。它同时也是一种防止镇压的有效策略。毕竟，再严厉的政府部门，也不能不让市民“散步”。³⁷

博客是经常用于抗争的新电子形式。在某些方面，博客是传统日记在网上的延伸。不仅“网络日志”一词本身就表明博客是一种日记形式，博客的实际用途也与传统日记相似。像日记一样，大部分博客除了讨论有关个人或公共利益的议题，还包括按时间顺序记录个人经历。像日记一样，博客的风格是非正式的，带有个人的烙印。博客与传统日记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虽然有些博文写出来是为了发表，但典型的日志是私密的。写日记，是给个人用，不是让别人阅读、传播和讨论。但博客就不一样了，它是发在网站上的公开文档。它们不仅是公共的，而且读者可以留言评论，或用其他方式与博主或别的读者互动。博主不仅希望人们访问并阅读他们的网站，而且努力去吸引读者。

这种对博客的需求，刺激了中国公民新闻（citizen journalism）的产生。公民新闻，或称参与性新闻（participatory journalism），是指由“人民创造的、服务于人民”的新闻。³⁸它由很多种类型组成，除了主流新闻媒体中的各种受众参与形式，还包括公民个体在他们自己的网站上贴出来的照片、视频和故事。³⁹世界各地无以计数的个人都在写博客，因此博客是生产公民新闻特别重要的途径。博客的很多特征，比如开放性和互动性，使之成为信息共享和交流的有效形式。

中国的博客写手经常报道受官方媒体忽视的、但引起社会关注的公共议题。最出名的博客写手可能要数周曙光，我将在下一章会更详细地谈到他。他因为报道了所谓的钉子户事件而出名。该事件中的钉子户是一个因未获得开发商合

理补偿而顽强抗拒搬迁的家庭。⁴⁰在房地产开发商贪婪扩张的时代，公民通常被迫搬迁，为发展让路，并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因此，当重庆的一对夫妇在施工已在住宅四周进行时仍拒绝搬迁，自然获得了很多公众的同情。看到一般公众对这一事件的关注，佐拉（周曙光网名）从他的家乡湖南赶到重庆去报道这一事件。

创办运动网站也是一种受欢迎的新形式。建立运动网站纯粹是为了实现抗议和争论的目的。这些网站根据主要功能可分为几类。其中，最重要的一类是维权网站，致力于在一系列议题上进行维权，相关议题包括消费者权益、民工权利、妇女权利、农民权利和业主权利等。第二类是监督、打假与反腐网站。《新语丝》有个监督网站，专门曝光中国学术界和科学团体中的腐败，中国舆论监督网（yuluncn.cn）和反腐网（ff.adbt.cn）是最有影响的反腐网站。第三种网站是专门为特定的运动而建的，因此存在时间往往比较短，随着运动的结束而消失。但因为它们有着特定的目标，应当前受关注的议题而生，所以可能产生的影响并不小。最好的例子可能莫过于反 CNN（anticnn.com）这个抗议网站。该网站是 2008 年 3 月为反对西方媒体对西藏骚乱报道而创建的，创建者是一名 23 岁的年轻人。该网站通过有效的视觉呈现，展示几个重要的西方媒体如何通过剪拼的照片歪曲西藏的街头冲突。该网站上还说明，有西方报道将尼泊尔警方与僧侣的冲突照片，当作西藏警方与僧侣冲突的图片来发布。这一小小的抗议网站，不仅受到中国大众媒体和主要的门户网站的引用，而且也被海外中文媒体引用。据报道，使用了将尼泊尔警方当作中国警方图片的新闻机构，为此作了道歉。⁴¹

另一种短暂存在的流行形式是网络签名请愿。有些请愿是在以 BBS 为基础的抗争过程中出现的。请愿书由个人起草，然后贴到网上，并在网民中传播。在因 1998 年王翰、2003 年孙志刚和黄静之死引发的抗议过程中，都有这种请愿书的传播。在另一些事件中，签名请愿活动由网站主持，并有特殊的电脑软件支撑。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签名活动发生在 2005 年，那时几个网络民族主义团体组织了反对日本申请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抗议请愿活动。这次请愿活动同时在 20 多个网站中启动，从 2005 年 3 月 21 日持续到 5 月 10 日，从

41个国家收集到4100万个签名。最后他们把这些签名呈递给当时的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⁴²

袭击网站(或称黑客行动)是一种破坏性的网络抗议形式。它最常发生在民族主义抗议中。例如,在1999年反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抗议中,中国黑客在三个美国政府部门的网站上植入了反对北约的信息。⁴³2001年3月,黑客们瞄准了日本的网站,抗议日本教科书对二战历史的歪曲以及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拜见靖国神社一事。

以上五种抗争形式被用于反对不同的目标,所具有的颠覆力也不同。通常,抗争越具颠覆性,其形式就越难预测且越具流动性。网络签名请愿和抗议网站是比较稳定的形式,它们往往拥有更多的合法性,不那么具有政治颠覆性。黑客攻击属侵犯性的行为,但在大多情况下,黑客攻击的是外国网站。在BBS论坛中和通过短信进行的抗议,属于最具颠覆性的抗议形式,同时也最具流动性、最难预测。颠覆性的程度与合法性程度、抗议活动的不可预测性程度相关。

□ 电子抗争的体裁

像抗争仪式一样,电子抗争的体裁也包括传统的和现代两种,体裁的变迁与抗争仪式的变迁一样缓慢。和仪式一样,很少有网络行动的体裁是全新的。对现有体裁的改进和延伸比全新体裁的发明更为常见。上访信和诗歌在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抗议形式。⁴⁴公共演说和宣言是在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期间从西方引进的。⁴⁵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使马克思主义思想传遍世界,并使宣言成为一种革命的体裁。⁴⁶在网络诞生之前,其他抗争体裁包括笑话、口号、对联、公开声明、歌曲、漫画、恶搞、誓言、咒骂以及诺什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所说的“原始的尖叫、姿势和叹息”。⁴⁷所有这些体裁都具有强烈的情绪感染力。诗歌和宣言经常激发英雄主义激情,笑话和漫画令人发笑,使人产生幽默感。在网络运动中,这些古老的体裁被保存下来,得到复兴和改进,或者以电子化的形式出现。比如,传统的日记在网上对应的形式是博客。被用于抗争的特定网络新形式包括BBS帖子、博客、短信、Flash视频、即时性聊天。

从大局看，不同的言语体裁（speech genres）正蓬勃发展。这种繁荣本身就对权力构成挑战。不知是因为缺乏政治想象力，还是仅仅因为没有幽默感，世界各地的权力机构所使用的言语体裁往往非常有限，常用的体裁就是公开声明和广播演说。多样化的体裁并不是网络抗争的发明，而是现代中国抗争的一个特征。诗歌、书信、文章、声明等等，常见于早期的社会运动之中。这些体裁承载着大众抗争的集体记忆，所以每次它们出现时，都会给作者和读者一种道德的合法性和话语的力量。⁴⁸

在中国众多言语体裁中，两个类别在网络行动中最常见。第一类是各种自我倾诉性的和自传的体裁，特别是日记、书信、文章和私人照片。大部分 BBS 帖子带有自传的特征，作者在帖中经常谈他们自己。私人照片和发表在网上的视频剪帖也属于自传的体裁。当然，博客是最典型的自曝体裁。另一大言语体裁可以按巴赫金（Bakhtin）的说法，称之为“戏仿—嘲讽”（parodic-travestyng）形式。它包括所有带有幽默的讽刺、反讽和单纯的娱乐形式。这些体裁有笑话、打油诗、讽刺（散文体和诗歌体）、顺口溜以及戏仿。戏仿与人类文明一样历史悠久，⁴⁹但它从来没有像在当今中国网络空间中那样得到复兴。一切可以想象得到的事情，特别是那些与有钱有势者相关的事，在中国网络空间中都可能遭到戏仿和嘲弄。表 3.1 列出了这两种体裁。

表 3.1 两种流行的网络行动体裁

自我倾诉式 / 自传式	戏仿 / 讽刺
日记	玩笑
信件	打油诗
散文	顺口溜
私人图片	诗歌
私人视频	歌曲
博客	Flash 视频

这两大类有时会有所重叠。例如，关于个人生活的 Flash 视频不一定带有嘲讽意味，而且每种体裁都混合了传统的形式和电子形式。但作此粗略的区分

还是有帮助的，这样可以强调每种体裁的突出特征。我先来讨论诗歌这一古老的体裁。将诗歌作为抗争的形式，具有悠久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孔子对《诗经》的评论。中国文人都擅长写诗，不仅用诗歌进行歌功颂德，而且也用这种形式表达不满。当诗歌被普通民众用于抗争时，就产生了各种幽默、反讽、讽刺和恶搞等特征的变体。对联是在清朝农民之中非常流行的抗争形式。⁵⁰ 被林培瑞 (Perry Link) 和周晓 (Kate Zhou) 形象地称为“流畅的短歌” (slippery jingles) 的顺口溜，和打油诗一样，是体现民众智慧的流行形式。有时这些简洁的诗歌配上音乐，成了流行歌曲。

诗歌是深受喜欢的抗争体裁，因为它是大众传播的有效方式。因其形式简单、易于记诵，所以能够口口相传。在历史上，每个重要的革命都有相应的诗歌和音乐流传。现代中国的社会运动也不例外。1976年的四五运动就是一次诗歌运动。那一次，普通公民在天安门广场张贴他们的愤怒的诗歌，人群则推搡着，争相抄写和阅读。“文革”期间，“知青”之歌因歌词的讽刺性被官方禁止，但却仍然在年轻人中间暗地里传唱。

如果说诗歌易于口口相传，那么它们在网络空间中传播得更快。具有政治讽刺意味的顺口溜贴到网络论坛上，通过邮件和短信群发出去。这些顺口溜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使得在网上出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顺口溜民间传统。有些中文网站专门收集顺口溜和其他幽默笑话。⁵¹ 我自己随便收集的这类顺口溜，包括2000年5月24日发在强国论坛上的一个帖子，长达14页。其中一首顺口溜，标题为“某官的一天”，意在嘲笑官员腐败的生活方式：

上午轮子转，
中午盘子转，
下午骰子转，
晚上裙子转。

这类讽刺诗，以幽默的方式暴露社会病。其影响力来自广泛的传播，但传播广泛不仅是因为传播的方式，还因为讽刺诗这一形式具有修辞感染力（从而

激发情感)。在历史上,官方竭尽全力追捕撰写反动诗歌的作者,但因口口相传,并不总是容易找到作者。最近一个事件表明官方忌惮这类诗歌在网上产生的力量,也说明官方怎样动员公安资源追捕作者。2006年8月,重庆市彭水县一个名叫秦中飞的政府工作人员,写了一首嘲笑县里官员腐败的诗歌。他觉得自己的诗很有趣,就用短信发给了朋友。9月1日,秦因涉嫌诽谤而被拘留。在网上,人们抗议对秦中飞的拘留,认为他只不过表达了公众对腐败的关注,地方政府非法拘捕他是为了止住民众之声。⁵²

古老的抗争体裁在网上仍然生机勃勃,同时新的体裁也出现了。博客是新风尚。⁵³到2006年中国已有700万活跃的博客,其中有些博客有时带有政治倾向也就不足为怪。Flash视频也是大众网络文化中的时尚,也有助于积极行动。网络行动使用的其他电子体裁,还包括数码照片和视频。

与博客相关的有影响的争议事件之一,是由2003年木子美在其博客中发表性日记引发的。木子美详细而开放地描述了她的众多性伴侣,这激起了有关当代社会性道德的全国性讨论。⁵⁴另一个有影响的案例是有关单亲妈妈的争议。2006年8月,一个叫“地瓜猪”的未婚先孕的博客写手,在她博客中宣布将生下孩子做单亲母亲。支持者(其中包括其他的单亲母亲)对其勇气表示钦佩。有些人建议创办单亲母亲的网站,以便交往和相互支持。批评者指出单亲母亲将会面对的社会压力,并认为孩子不能没有父亲。据报道,因问题激起了热烈的讨论,她的博客在一周内获得了30万个点击。⁵⁵

数码照片这样的视觉形象是重要的抗争体裁。在社会运动中,政治漫画是常见的表达体裁,它们在电子时代因其容易制作和传播而获得了新的力量。⁵⁶2006年11月,北京市民抗议市政府对养狗权利的控制,相关图片被载到网上传播,激起养狗者的抗议,同时也激起了那些声称生活受到狗的侵扰的人的反向抗议(counterprotest)。在2007年重庆钉子户事件中,周曙光上传了很多有关钉子户及其户主的照片。在厦门“PX事件”中,反对PX项目的图片,在BBS论坛和博客中得到了广泛传播。

在众多电子体裁中,Flash视频特别受欢迎,催生了“闪客”群体。“闪客”是模仿“黑客”和“博客”这类熟悉的名称而起的。

Flash 视频是由 Adobe's Shockwave Flash 软件制作的电子视频文件。这些文件很小，容易上传到网上和在线观看。Flash 短片有视觉和听觉上的吸引力，是中国网络文化中喜闻乐见的组成部分。专门收集 Flash 短片的最受欢迎的网站之一是闪客帝国 (flashempire.com)，创建于 1999 年。⁵⁷ 自那以后，很多具有创造才能的 Flash 艺术家涌现出来。中国的 Flash 视频涉及范围很广的争议性话题。女性艺术家创作了从女性的视角看世界的 Flash 视频。民族主义和环境保护也是常见的话题。⁵⁸

Flash 视频中最受欢迎的作品无疑是对名导演陈凯歌的大投入电影《无极》的恶搞。《无极》是一部有关古代中国战争时期的传奇故事。故事一开始的场景，是一个小女孩在战士死尸堆中寻找食物。她发现了一个馒头，却被一个淘气的男孩抢去。随后她又将馒头骗了回来，在被男孩追赶的时候却又将馒头扔到了河里。这时出现了一位女神，说可以给女孩一生的荣华富贵，但所有她爱的男人都会死去。女孩接受了这个承诺后，电影进入到充满战争和宫廷阴谋的成人世界。这时，长大成人的女孩，成为女主角，被三个男人追求。这三个人分别是君主、将军和奴隶。君主和将军最后都死了，而奴隶却活了下来。

《无极》在中国得到了负面的评价。影迷们一般认为，陈拍摄一部情节虚构而荒谬的电影是在浪费金钱，说陈想拍一部史诗般的电影作品，但结果失败了。BBS 论坛上充斥着批评的言论。人们还谴责电影摄制组给拍摄地——云南原始地区造成了环境破坏。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胡戈制作了《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这部长约 20 分钟的视频，以取笑《无极》。

31 岁的胡戈在上海工作，是音像设备销售员，兼音乐与音响效果编辑。他于 2005 年 12 月 18 日看了《无极》之后，在个人 BBS 论坛上对电影做了抨击。然后，他想到不妨用 Flash 软件，把电影改编成视频。他花了 5 天时间写剧本，又花了 4 天制作了声音和图像。视频做完之后，他发给朋友分享，并且上传到他的 BBS 论坛。这部短片很快在很多网站上出现，BBS 论坛上都在讨论它。主流电视台和报纸也对该事件做了报道，这次恶搞因此获得了全国性的关注。⁵⁹

陈凯歌在遭到胡戈的抨击后，谴责胡在未获允许的情况下使用了他电影中的片段，违反了知识产权法，扬言要起诉胡戈。陈的回应使这一事件再次成为

全国新闻。绝大多数公众同情胡戈。根据搜狐开展的一次网络调查，10,728名参与投票者中有93%的人支持胡戈。⁶⁰人们认为陈凯歌的反应有点过头。有律师主动提出要为胡戈义务辩护，也有学者发表文章讨论其中的法律问题。“馒头案”成为2006年最热的网络事件。胡戈这个“小人物”大获全胜，扬名全国。这一事件是中国网络空间中特殊的文化抗争的典型案例，即“小人物”挑战文化权力与权威。该事件的力量来自Flash视频这一体裁的创造性。

“馒头”视频的巧妙在于它结合传统与创新，制造幽默滑稽的效果。视频本身是新媒体形式的艺术表达。这一形式不仅容易制作、易于传播，而且可以融合不同的体裁和媒体效果。“馒头”将从《无极》中剪切下来的画面同在日常生活中为人所熟悉的画面和话语拼在一起，创造了一个既针对《无极》又影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共同关注的话题的故事情节。因此，这部Flash视频不仅充满幽默和娱乐，同时也有社会讽刺。例如，它使用了人们熟悉的中央电视台“法制在线”节目作为结构框架。在视频的开始，电视节目主持人宣布了一宗谋杀案：“2005年某月某日，某市发生了一场离奇的命案。”⁶¹接着，该视频展示了《无极》中的一些搏杀场景。《无极》中有一组镜头是两个主角在屋顶上打斗，镜头的画外音影射了中国拖欠工资这一普遍的社会问题：“据知情人透露，两人是因为两个多月没领到工资，才爬到楼顶以跳楼为要挟，索要工钱。”

《无极》中的另一组镜头是一个蒙面骑士杀害了屋顶上的两人之一。电视主持人然后问道：“这位神秘人物是谁？成了本案第一个疑团。……而根据群众举报，这匹马和服装正是该市城管局真田局长的。”真田是在《无极》中扮演将军的日本演员的名字。该视频接着显示的是真田与城管边殴打无证摊贩，边喊“我叫你摆摊！我叫你摆摊”，而摊贩苦苦求饶。该视频制作于2005年，反映了困扰中国城市的一个严重问题：臭名昭著的城管的放肆腐败与无情。两年之后，2008年1月发生了一起全国性的丑闻：湖北省天门市的城管杀害了一名试图拍摄他们殴打村民照片的旁观者（见第二章）。

第二个画外音影射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直接抄袭了毛泽东著名的《纪念白求恩》这篇文章：“真田局长原是日本人，50多岁了，为了向中国人民谢罪，他义无反顾投靠了中国，加入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来。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

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斜体部分完全摘自毛泽东的文章，这对大部分成年电视观众而言是非常熟悉的。脱离情境使用这些熟悉的语言，令人感到非常幽默；另外，这个视频通过使用熟悉的文化剧码（cultural repertoire），取得了吸引观众的修辞力量。

□ 结论

现代中国有一个光荣的抗争传统。网络的发展催生了电子抗争文化。这一电子文化对传统仪式、体裁、风格进行了改进，增添了新的创新形式。同之前的抗争文化相比，电子抗争文化平凡而不崇高，其仪式和体裁更贴近现实。然而，在精神上，这一抗争文化表现了对权力和权威的不敬，这可以从幽默、亵渎、笑话和网络行动对权力的彻底挑战中看出。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大规模的社会转型是这一风格变化的主要条件。

文化怎么影响集体行动？很多学者已经展示了符号、仪式、故事和意象的动员力量。⁶²本章从两个方面对这一议题作出了贡献。首先，我强调了体裁的重要性。马克·斯坦伯格（Marc Steinberg）是少数研究集体行动中的言语体裁的社会学家之一。他在研究英国纺织工人的抗争时发现，抗争者的话语剧码（discursive repertoire）非常有限，“主要是选择性地篡用政治经济学、政治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废奴主义，以及篡用其他反映作为统治者的工厂主他们心目中的社会秩序的体裁。”⁶³斯坦伯格因此强调了篡用官方体裁的重要性。我的研究展示了言语体裁塑造集体行动的两种方式，即通过传统和创新。言语体裁的变迁十分缓慢。抗争体裁的延续本身就为集体行动提供了现成的文化资源。特定抗争体裁的存在，将集体行动导入特定的表达形式。如果说风格的变化十分缓慢，那么当代中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变迁的难得的环境。技术的发展与快速的社会变迁，是创新体裁产生的背景。这些新体裁在动员抗争上具有新的力量。本章讨论的很多案例显示，这些体裁在动员人类情感和道德感上特别有效。它们通过动员诸如同情、幽默感和欢笑等情感，促进运动的动员和传播。

其次，研究体裁与仪式必须结合对媒体的分析。正如我在上文所述，抗争

的体裁和仪式愈来愈难以同媒体分离。当代的抗争仪式和抗争表演越来越媒体化。研究仪式和体裁的媒体化打开了新的研究路径。如果说仪式和体裁塑造了身份与团结感的表达，那么它们几乎总是依赖媒体。媒体不仅通过向受众展示意象和叙事，从而影响集体行动，同时也通过对仪式与体裁的塑造产生影响。这一观点在现有关于媒体的文献中尚不多见。

电子抗争文化并没有取代现代中国历史悠久的大众抗争文化，而是使之更丰富、更多样。首先，它代表着抗争形式的扩展。对传统抗争形式所进行的创造性的、电子化的改进，不仅产生了新的传播方式，同时也创造了表达身份和异议的新的仪式和体裁。这一电子文化不仅加速了抗争的传播速度，扩大了抗争的规模，也为文本的说服（textual persuasion）增加了视觉和听觉上的魅力。网络行动不是取代了线下的抗议，而是日益同线下行动交融在一起，从而创造出强大的反抗与抗议的网络。

第二，电子抗争文化扩大了中国的抗争领域。文化不仅是一种抗争的方式，同时也是斗争的筹码。所以，表达异议的文学作品，通常也事关政治斗争。此外，因为抗争表演和表达通常是经过了媒体的处理，因此媒体技术本身成为抗争的目标。网络行动中的新的仪式和表达体裁，比如通过电子方式传播的 Flash 视频和 Youtube 视频，通过新媒体技术将艺术行为变成更具抗争性的行为，同时将抗争变成日益艺术化的行为。这意味着获得使用网络的机会和创造性地使用网络，都难免要经过抗争，都来之不易。因此，网络行动将中国政治领域拓展到更加未知的领域。它通过延伸抗争的战场而对国家权力提出了挑战。

注释

- 1 弗莱 (Frye) 指出,“我们发现,在所有的文学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特质,我们可以称之为语言性格 (verbal personality) 或者言说的声音 (speaking voice),它与直接的演说虽然相关,但却不同。当这一特质被认为代表了作者本身的声音时,我们可以称之为风格。”参见:Frye,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258。
- 2 有关情感对社会运动的重要性,参见:Goodwin, Jasper, and Polletta, eds., *Passionate Politics*; 以及 Flam and King, ed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 3 Williams, *Television*, 39。
- 4 同上。
- 5 同上, 118。
- 6 同上, 119。
- 7 同上。
- 8 同上。
- 9 同上, xxiii。
- 10 Esherick and Wasserstrom, “Acting out Democracy,” 839 ; 也参见: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 11 Perry,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312。
- 12 Perry,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313. Esherick and Wasserstrom, “Acting out Democracy,” 854。
- 13 Perry,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316. Esherick and Wasserstrom, “Acting out Democracy,” 856–857。
- 14 Esherick and Wasserstrom, “Acting out Democracy,” 852。
- 15 同上, 855。
- 16 Perry,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xiv。
- 17 也参见赵鼎新关于学运中的传统主义的讨论。
- 18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225。
- 19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 20 Nathan, *Chinese Democracy*, 225–226。
- 21 该帖是2007年11月27日从<http://bbs.xnsc.com>上下载的,由作者存档。该消息最初是在2004年1月6日贴出。
- 22 Yang, “Contention in Cyberspace,” 140。
- 23 Frye,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328。弗莱称这种话语是“不清晰的表达,用一个词语 (通常是不适合印刷出版的 (unprintable) 作为整个句子的修辞装饰,包括形容词、动词、修饰语和标点符号。”有时这种语言“完全没有词语,于是变回了尖叫、姿势和叹息的原始语言。”从不同的角度看,弗莱所说的有关“尖叫、姿势和叹息”这种“不可打印”的语言,可能含有不同的意思。这种语言嘲笑权力的严肃性,就像充斥于闹市中的颠覆性语言。
- 24 Yang, “Contention in Cyberspace,” 140。
- 25 Wasserstrom,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88。
- 26 接下来的三段来自 Yang, “Contention in Cyberspace,” 137–138。
- 27 http://qqf_19.homechinaren.com/www/c1/w31.htm。
- 28 这则消息是按照如下顺序张贴的:cind, 2000年5月23日,02:29,清华大学BBS;Rocktor, 2000年5月23日,08:40,清华大学BBS;旁观者, 2000年5月23日,08:55,“三角地”论坛。
- 29 2000年5月23日由“Young”发在“三角地”论坛上。帖子中描述的10张照片可以从如下网页中看到,<http://mem.netor.com/m/photos/adindex.asp?BoardID=2309>,获取日期:2003年12月15日。
- 30 Benford and Hunt, “Dramaturgy and Social Movements.”

- 31 这里所用的一些数据来自：Yang, "Contention in Cyberspace."
- 32 Tilly, "Speaking Your Mind Without Elections, Surveys, or Social Movements."
- 33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45.
- 34 同上，51。
- 35 Gurak, *Persuasion and Privacy in Cyberspace*; Hill and Hughes, *Cyberpolitics*.
- 36 Yu, "Talking, Linking, Clicking."
- 37 "散步"正在成为中国抗争方式的新形式。2008年1月，这一形式再次被上海市民用于反对磁悬浮列车建设的抗议中，参见：Wasserstrom, "NIMBY Comes to China."
- 38 Gillmor, *We the Media*.
- 39 Lasica, "What Is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 40 农村“钉子户”的有趣讨论，参见：Li and O'Brien,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 41 EastSouthWestNorth, "Chinese Netizens Versus Western Media." 链接：http://www.zonaeuropa.com/20080326_1.htm，获取日期：2008年8月12日。
- 42 <http://www.china918.net/qm/news/0510.htm>.
- 43 Barr, "Anti-NATO Hackers Sabotage Three Web Sites."
- 44 相关例子参见：Pickowicz, "Rural Protest Letters."
- 45 Esherrick and Wasserstrom, "Acting out Democracy."
- 46 Puchner, *Poetry of the Revolution*.
- 47 Frye,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328.
- 48 有关抗争方式的连续性，参见：Perry, "'To Rebel Is Justified.'"
- 49 巴赫金指出：“从来没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直接的体裁，也没有哪种直接话语（在艺术、修辞、哲学、宗教、日常生活上）不存在戏仿和嘲讽这一对元素，即与其自身相对的漫画讽刺般的话语。”参见：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53. 中国文学也是如此。嘲笑与讽刺在古老的《诗经》中非常普遍。
- 50 Thornton, "Insinuation, Insult, and Invective."
- 51 如：<http://www.guaidou.com/shunkouliu>.
- 52 关于回应秦被拘一事的网络帖子，参见：<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97078>，获取日期：2006年11月2日。地方政府最终撤回了指控，秦被释放，并且得到了一笔赔偿金，弥补他在被拘留期间的损失。
- 53 关于博客写作，参见：MacKinnon, "Flatter World and Thicker Walls?"
- 54 法勒(Farrer)对木子美现象进行了有力的分析，清晰地说明了有关这一显现的话语具有的复调(heteroglossic)特征。参见：Farrer, "China's Women SexBloggers and Dialogic Sexual Politics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 55 王娟，“未婚妈妈博客引发争议，坦然面对质疑选择产子”。
- 56 Wettergren, "Mobilization and the Moral Shock."
- 57 该网站在2003年成立了公司，现在已经拥有100万注册用户。参见：<http://www.flashempire.com/corp/index.php>，获取日期：2008年6月18日。
- 58 王颖吉，《闪客江湖》。
- 59 吴飒，“胡戈：我挺严肃的只在作品里搞笑”。
- 60 <http://it.sohu.com/7/0404/35/column219983539.shtml>，获取日期：2007年10月3日。
- 61 这个Flash视频的剧本在网上很容易找到，我看到的版本是在2007年9月28日从以下网址下载的：<http://e.yesky.com/117/2273617.shtml>，所有的引用都是来自这个版本。
- 62 Tilly, *Stories,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Change*; Polletta, *It Was Like a Fever*; Jasper,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Jasper and Young, "The Rhetoric of Sociological Facts."
- 63 Steinberg, "The Talk and Back Talk of Collective Action," 770.

变迁中的抗争风格

像文学作品一样，民众抗争形式各有风格。有些社会运动阴沉严肃，有些则轻松、幽默、令人愉快。¹有些壮观而坚定，有些则简单而温和。有些运动风格如史诗，规模宏大，持续时间久。而有些则像小品文，只有一些小规模 and 间歇性的活动。文学风格表达了审美理想，运动风格同样表达了参与者的政治抱负和自我认知。风格引导并制约运动的进程。激进的革命者表达救世的愿景，采用夸张的政治斗争风格；改革派积极分子依循温和的风格。有时，现有的行动剧码（action repertoire）促进了运动的产生；有时，缺乏新的行动方式会限制运动的动员。一个运动周期（movement cycle）能够形成自己的风格。

现代中国经典的民众抗争形式具有史诗般的风格，抗议者表达了激昂的理想和誓死争取崇高目标的决心。²这一风格仍然存在于线上和线下。然而，与此相伴的，是平凡、戏谑之风格的日益凸显。我认为，平凡与戏谑的元素在网络行动风格中十分突出。在这个意义上，网络行动标志着一种新抗争风格的出现。这一风格的重要性，较少体现在可测量的政治结果上，而更多地表现为对

权力和权威形成的一种新的意识。尽管中国悠久的民众抗争传统带有“帝王崇拜的心态”，³但这一心态在网络时代的抗争文化中逐渐淡化。这一新风格不仅表现在网络行动上，还体现了中国新公民行动的总体特征。新风格的产生，不仅源于媒体技术的发展，而且根源于不断变化的社会与政治环境。

□ 宏大叙事的风格

198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在1989年终结。新启蒙理想脱胎于对“文革”的反省。当时的积极分子在民主墙运动中找到了有力的公共表达方式。从1978年冬到1979年，中国主要城市发生了一波抗争。在北京市中心西单路和长安街的交叉路口上，有一段不起眼的旧城墙，约两米高、百米长。这堵墙成了公众集会的非正式中心。有人将大字报贴到那里，有人到那里抄阅大字报。“民刊”是该运动最重要的特征，很多内容最早是贴在那堵墙上，或在那里散发。⁴另外也有集会、演说、辩论等活动的展开。

这次运动的墙报和民刊涌现出两个主题。一是谴责“文革”政策，要求纠正过去的错误，提高现在的生活水平。例如，下放知青在上海集会谴责下放政策，要求返城。⁵另一主题是要求进行改革，实行民主法治。民刊关于民主改革的呼唤，带着对国家现代化的使命感和对未来的乐观态度。《启蒙》杂志是这时期出现的第一份“民刊”，是整个时代开始的象征性标志。它在1978年10月11日发表的创刊词，对理解1980年代的氛围具有重要的意义。该创刊词宣布：“我们要为未来歌唱，我们要用生命点燃启蒙的火炬。”⁶《民主时代》创刊词中宣称：“我们创办这个杂志，希望能够表达人民的心声，提高人民的意识水平，提升社会现代化，加快四个现代化的进程。”⁷

在1980年代的文学运动、文化运动和大众抗争活动中，这样的抱负一次又一次地表达出来，又一次次地破灭。因为这一文化和社会行动的沸腾，一个基于非正式知识分子网络的公民社会开始萌生，同时形成了书籍出版和公共辩论的“文化热”。⁸最有影响的文化热产物是电视系列纪录片《河殇》。《河殇》最早于1988年6月播放，它用让人震惊的图像和隐喻，描绘了中国现代化的

曲折进程。它将以贫瘠的黄土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同以蓝色海洋为标志的开放活跃的西方文化进行对比，这部纪录片重新点燃了 20 世纪初期五四时代知识分子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怒火。⁹

后来所发生的故事，早成为难以触摸的历史。以宏大叙事创造历史的时代，从此终结。

进入 1990 年代，文学研究者王瑾在她的著作中有一章，抓住了她称之为“末世后的新时代”（the postapocalyptic new age）的时代精神。她说：“天真的时代已成过去。”¹⁰又说：“中国 1990 年代是一个耍态度的年代（age of attitude）。到处充斥着对社会的嘲笑，口水战成为街头剧场。人们习惯了一边讽刺随着消费主义而疯狂的社会，一边又同贪婪者和平共处着。”¹¹

白杰明（Geremie Barmé）也同样指出，“有关自 1970 年代晚期以来，以发现、创新、努力追赶东亚和西方、表达新观点为特征的新启蒙和文化发展，已经走到了尽头。”¹²白杰明用富有色彩的语言，将 1990 年代初的文化景观描绘成“灰色”，说它“是失望、不确定、焦虑、讽刺、嘲讽和严重的宿命感的综合征”。¹³

张旭东认为，随着 1990 年代的开始，以下这样一些曾经根深蒂固的思想逐渐消失：

（1）在维护社会稳定并引导人民经历大规模的社会变迁上，知识分子和国家官僚机构是天然的、不可分割的合作者；

（2）知识分子在道德上更同情人民，有能力并且有权为人民的需求和渴望说话；

（3）实现现代化是全中国人民的目标，知识分子是这一事业最高传教层的组成部分。¹⁴

□ 网络抗争的戏谑风格

对王瑾和白杰明而言，嘲笑与讽刺体现了 1990 年代正在崛起的消费文化的风格，它们后来很快就与戏谑的网络文化洪流汇聚到一起。前一章所讨论的戏仿形式的电子抗争，正体现了这种戏谑风格。

巴赫金在研究狂欢形式时表明，游戏是复调小说的组成部分。对巴赫金而言，小说是以多样性和多重的风格、言语类型、声音为特色的包容性体裁。小说中的不同元素之间互相联系，共同组成一个中心，正如迈克尔·霍奎斯特（Michael Holquist）所言，这是一个“向心力与离心力冲撞”¹⁵的交织点。巴赫金关于复调的观点是从语言哲学角度出发进行阐释的，该观点与笛卡尔式独白思想家的范式基本相悖。¹⁶巴赫金写道：

语言哲学、语言学和风格学，就其传承到现在的形式来说，都假定说话者同他那单一的、独属于自己的语言之间，存在一个简单、直接的关系。还假定这一语言可以通过个体的独白实现。这些学科事实上只知道语言生命的两个极端……一端是单一语言系统，另一端是讲这一语言的个体。¹⁷

对巴赫金而言，单一语言是“一种同质向心力，与复调现实正好相反”。¹⁸如果说“官方社会—意识形态的较高层面”讲的是单一语言，那么复调的离心力则处于下层的民众之中。因此，复调是普罗大众的语言，它有意识地反对官方话语和意识形态。

网络空间中的戏谑文化是当代中国文化复调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地方与全局层面不同生活经历和文化互动的结果。这一文化多元性释放出嘲弄权力与权威的创造性力量。中国网络空间传播着无数富有创造性和嘲讽意味的文化产品。前一章讨论到的胡戈对《无极》的恶搞就是很好的例子。让我再举一例。在2004年和2005年的禽流感危机中，一些人将流感怪罪于鸡而不是人类，把大规模杀鸡当做预防措施。网上流行的几部Flash视频，从“鸡”的角度表达了不满。一部Flash视频结合了音乐、动画和歌词。部分歌词如下：

我不想说我很清洁
我不想说我很安全
可是我不能拒绝人们的误解

.....

吃我的肉我没意见
拿我的蛋我也情愿
可是我不能容忍被当作污染

.....

禽流感，很危险
谁让咱有个鸟类祖先
孩子他爹已经处决
孩子他哥抓去做实验
这年头做只鸡比做人还艰难
就算熬过今天就算过了明天
后天估计也得玩儿完。¹⁹

这是首幽默的歌词，滑稽而有趣，但它却在恐惧的社会环境中，表达了让人警醒的异议。

像其他类型的艺术作品一样，Flash 视频丰富了公众表达的词汇，这可以从我的样本中一个有关乙肝病毒携带者争取权利和承认的案例中看出。2004年4月3日，一名叫“lonelyroise”的网民在乙肝病毒携带者主要的BBS论坛上发帖，表达了在撤回提交给全国人大有关提高乙肝病毒携带者人权的提案后的挫败感：“这让我想起我以前看过的一个关于禽流感的视频。刚刚又看了一遍，真是发人深省。要么干脆让我们像视频里的小鸡那样，自愿进焚炉，这样中国倒也可以丢掉乙肝病毒携带者大国的称号……要么就保护我们的作为人的权利……停止广泛的歧视。”²⁰ 该网民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处境，比作禽流感危机时鸡的处境。因此，该禽流感视频为反对歧视乙肝病毒携带者的运动，提供了新的表达异议的隐喻。

□ 网络抗争的平淡风格

网络行动的风格除了具有戏谑的元素，还有平淡的特征，体现在实事求是的做事方法和有意规避英雄主义的崇高这两方面。1997年，当时的积极分子曾创办过一本名为《隧道》²¹的电子刊物，编辑鼓励读者将杂志转发给他人，并细致地解释如何在传播这个信息过程中规避个人风险：

如果你不想让对方知道还有什么人同时收到你转发的《隧道》，你可以使用“盲抄送”（Bcc）一类功能。例如在Eudora上的“Bcc:”之后填入多个地址（或别名），每个收到者将只看到自己而不会看到其他人的名字。同时，千万别忘记关掉你的签名文件（signatur.pce），因为，你的签名文件包含了你的个人信息。²²

为了显示他们自觉地远离革命的话语和实践，编辑们进一步解释道：

不错，这里没有发刊词常见的激扬文字、慷慨陈词，因为我们建立的“隧道”，基础就在技术。自由和闪光的思想从来都存在，不同就在于是否能被传播。

计算机网络改变了这一点……问题已经变成了我们会不会利用这种技术。与其高谈阔论宏大道理，不如下于无声处耐心地钻研技术细节。我们的发刊词写成了技术说明，正是对这种主张的身体力行。沿着技术细节的小径，可能远比从情绪沸腾的广场更容易接近我们共同渴望的自由与民主。²³

在接下来的10年中，这一朴素的风格，即像技术手册式的事实描述与分析，逐渐取代了带有史诗般意象、预言家口吻和规范化理想的革命风格。2006年4月26日，深圳一名叫邹涛的博主，针对中国飙升的房地产价格，发表公开信，号召人们加入不买房运动。他的意思很简单：因为房地产价格虚高，所以在接

下来的3年时间内，人们应该停止买房，以此作为抗争的方式。这封长信没有激昂的理想，而是详细说明他认为人们变成房奴的原因：

深圳商品住宅价格依然涨势惊人的速度……而事实是否真的是因为开发商的成本上升呢？让我们来计算一下开发商的成本。低层住宅成本等于楼面地价+2000元/平方米左右的建安费用，高层住宅成本等于楼面地价+2500元/平方米的二建安费用。比如某地块，楼面地价为3000元/平方米，如果建成高层住宅，那么开发商的成本就是3000元/平方米+2500元/平方米=5500元/平方米。而现实呢，我在福田、罗湖等新盘售楼现场发现，每平方米均价超过9000元，有的甚至在一万元以上。如果开发商卖10000元每平方米，其中的利润就可想而知了，而我们的血汗钱，就这样轻易地被掠夺。²⁴

在信的最后，他号召人们延迟买房。邹涛的信在全国吸引了很多支持者。据2006年6月12日的新闻报道称，这一抵制运动在深圳拥有5000名会员，一万多人在网上表示了支持，从而形成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联盟。²⁵

另一案例是博客写手周曙光，网名佐拉。他因为报道重庆“钉子户”事件而出名。2007年4月3日，在该事件通过法庭裁决得到解决后，他写了一篇很长的博文，记录他在重庆的活动。这篇博文零星地提到了他的动机。²⁶ 他的行文口吻随意而戏谑，体现了网络抗争的新风格。他在博文的开头写道：

总而言之，我认为目前得到了一个完善结局。虽然很多长期压抑的愤怒让人们以为有一场官民的冲突暴发，但居然平静地度过了。而我本人，做了一件被众人以为有危险的事情，然后，我的运气极好，我极顺利地完成了报道，并且功成名就全身而退。以后，我确实有更多的社会资源可用了，我一定会好好卖菜，成就一番事业。我对时事把握的眼光还可以，呵呵……²⁷

在这篇博文的稍后部分，他提到他因报道重庆“钉子户”事件而出名，所以收到很多类似的求援的请求。他写道，他不认为自己通过向公民提供维权服务而收费的行为有何不妥，因为他“不想当公鸡下蛋的英雄”。

我不想当拆迁户的免费代言人，我也不想让维权成为我的生活的主要内容，不想让自己的随性的 BLOG 成为维权阵地。但是，应该做的公益我还是会做，属于商业的还是按商业来做，如果成功帮助别人维权，我还是会收费的。维护公民权利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我作为个人没有义务去做，我才不会像蠢得要死的深圳歌手丛飞一样去做公鸡下蛋的看上去很英雄的事。谁也别逼我当英雄，你们自己的利益自己争取，权利来自意识的觉醒，没有英雄要为你们自己的权利负责。²⁸

在博文的最后，他一五一十直白地列出了报道这一事件所用的科技产品：

网站（使用美国 Dreamhost 服务器，20G 的空间，2TB/ 月的流量，使用 wordpress 博客平台）

笔记本电脑

数码相机

手机

U 盘

Gmail

Skype

视频（先使用土豆网，后来使用了优酷网）

相册（用 fotolog.com.cn 储存照片，用 Picasa 来管理图片非常方便）

网吧

Blog

RSS（用“Zuola.com”在 blogsearch.google.com 和 zhuaxia.com 上订阅了 RSS）

在单子后面还有一个更长的名单，罗列了那些在他报道过程中给予过帮助的人们，包括那些花 20 元钱请他吃饭的人。这里大段引用的佐拉博客的博文，说明他在行动中既谨慎地注意细节，又带有戏谑和不恭敬的神气。这些都是网络行动新风格的具体体现。

□ 环保主义：新公民行动风格

本章的开头提到，网络行动的风格反映了中国更广阔的新公民行动的风格。为便于了解这一新公民行动的风格，下面简要讨论中国城市的环保行动。方兴未艾的环保行动体现了新公民行动的主要特征。

环保运动主要发生在城市，自 1994 年第一个环保非政府组织自然之友在北京成立后渐成规模。环保运动的第一个特点是多样化的目标和非政治性的目的。如果说现代史上典型的社会运动都直面国家权力，那么在环保运动中，运动的目标开始多样化。³⁰ 环保运动不再明确地针对国家，或者不再主要针对国家。各种破坏或危及环境的个人或群体行为都有可能受到挑战，包括消费者行为、商业行为和政府政策。因为中央政府在全国提倡环保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环保运动经常直接向环保总局等中央政府部门寻求支持。³¹ 同消费者权益保护行动一样，³² 政府经常被视为环保行动的同盟。而中央政府也会依靠环保运动曝光地方的商业做法，遏制地方政府违反环境法的行为。

环保运动的目的也与之前的社会运动有所不同。早期的社会运动旨在推动明确的政治变革，环保运动则旨在提高环境意识，解决环境问题和推动文化变迁。例如，自然之友的宗旨是“通过提高环境意识，在公众中促成一个‘绿色文化’，从而提高中国的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³³ 其重点落在了意识提高与教育上。北京地球村主任廖晓义宣称：“我从事的是环境保护，我不想将组织用于政治目的。”³⁴ 这并不意味着环保运动没有政治目的或政治影响。积极分子从事政策倡导，并且充分意识到他们的行动和组织代表了当代中国新的政治

发展。他们的工作方法是通过环保的道路寻求政治变革，这一政治围绕着环境议题。因此，环保运动不仅不对政治权力构成威胁，而且在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政策框架下享有很大的政治合法性。

环保运动的第二个特征是它有组织基础。早期的社会运动最多只有短暂的运动组织，而环境运动则有正常运行的正式与非正式的组织。这些组织享有或多或少的合法性。有的经过了官方的注册，有些是没有注册的志愿组织，但大趋势是这类组织数量在增加，影响在扩大。这是前所未有的现象，其主要特征是草根环保 NGO 的发展。³⁵自 1994 年以来，200 多个同类组织相继成立。此外，截至 2005 年，已有 1116 个大学生环保社团和 1382 个政府创办的环保 NGO。³⁶草根环保 NGO 相对独立，最接近一般意义上的自治的、非营利的和志愿的公民社会组织。

第三，环保主义者采用混合集体行动策略。现代中国最典型的抗争策略包括大众示威、集会、贴大字报和个体串联。这些方式主要是对抗的、挑衅的，是为了争取公众支持，敦促甚至刺激政府。这些策略方式能够成功地获取短期的的大众动员，但不利于保持长期的组织力量。今天的环保主义者通常避免对抗的方式，采用鼓励学习、合作、参与和对话的路径。它们的一些策略是定期开展的，包括举行公开讲座、工作坊、会议、沙龙和田野调查，也包括展示图片、出版简讯和书籍以及制作电视节目等。这些活动通常以“项目”（这类新词很多）的形式开展。“项目”这个词让人感觉这些活动具有常规化和制度化的特征。项目需要系统的计划、准备、执行和评估，传统社会运动通常不具有这些特征。这些方式更接近正式制度而不是非正式制度，主要目标是宣传与参与，而不是抗议和扰乱。³⁷

诉讼也是一种新的抗争策略。³⁸与欧博文所指的依法抗争相似，这些法律行动依靠制度化的途径。例如，在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CLAPV）这类组织的努力下，保护污染受害者、反抗污染企业的法律行动在增多。CLAPV 设了电话热线，接到几千个有关环境法律问题的电话。它代表污染受害者向法院提起 30 多次诉讼，其中半数获得胜诉。³⁹尽管 CLAPV 尤其独特性，但它的行动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意义。它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并

促进了这一意识的增长。⁴⁰ 该组织的副主任指出，环保诉讼稳步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学会“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⁴¹

中国的环保主义者也采取了一些不太常规化的行动策略，比如请愿、运动、媒体曝光和实地调查等。这些活动具有抗争性，但没有破坏性。为了将这些活动同官方发起的早期政治动员相区分，环保人士称这些活动为行动而不是运动。因此 1995 年保护金丝猴的运动被称为“保护云南金丝猴行动”。对中国环保主义者来说，“行动”这个词除了有主动的含义（transitive connotation）外，还似乎带有更多草根的意味。

环保运动的这些特征符合新抗争风格的特征，这一风格平淡理性，而不是激情澎湃，它与学运那种史诗般的风格构成鲜明的对比。自然之友发表在网站并在网上和电子邮件间传播的公开信就是一例。这封信获得 61 个公民组织和 99 个公民的签名，呼吁公开怒江水电发展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⁴² 公开信指出，签署的组织和个人得知政府已经评估了这个受争议的项目，因此要求公开环评报告：“我们认为，对于这样一个涉及当代和后代利益、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且潜在影响巨大的项目，应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国务院依法行政的原则要求，向社会公示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在公众充分知情并作出评议后方可做出决策。”公开信认为不公开报告违反了现有的法律规定：

这种决策过程不符合重大决策要求公众参与的法律规定，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决策程序，不符合《行政许可法》的规定，不符合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倡导并正在认真实施的信息公开原则。2003 年 9 月 1 日生效的《环境影响评价法》明确规定，“国家鼓励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以适当方式参与环境影响评价”。

信的结尾强调了“知情权”的重要性：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国务院和发改委及各级政府都已经行动起来，整顿水电的无序开发。但要从根本上改变这样的现状，必须建立

一套新的水电开发决策程序，让利益相关方能够有效地知情参与。在各利益相关方都获得了知情权、参与权的情况下，才能够开始在水电开发中对多种社会目标都给予适当的考虑，才有可能对利弊做出合理的权衡，才有可能对受到损害的利益群体和环境给予足够的补偿，才有可能真正认真地考虑替代方案。惟其如此，才能实现对江河资源的公平、公开、科学、理性、可持续地利用。这也是贯彻科学发展观，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必然选择。⁴³

这里使用的法律话语，与早期社会运动中典型的宣言式叙事的激昂口吻形成了鲜明对比。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关切是民族救亡。在拯救民族的奋斗中，他们一方面引进西方知识，一方面处于丧失中国传统的焦虑中。当代的环保主义者看起来再也没有这类使命感的负担。他们的目标非常切实，具体到所开展的项目。这一价值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更大的变化。其中最讽刺的变化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开始享受更舒适的物质生活时，他们的理想主义也相应地减少。也许，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的崛起已经使知识分子丧失了他们的道德追求。

□ 媒体、内容和抗争风格

仪式、类型、风格、语言——它们的变迁都十分缓慢。我们今天看到的，仍然是正在形成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已经看到这些形态的轮廓，那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它们的产生？

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媒体技术的发展以及相伴而生的新文化形式。查尔斯·梯利、西德尼·塔罗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以及其他学者对媒体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都提出过有启发的观点。他们都将社会运动的现代形式（如民族主义、跨地区的社会运动组织）的出现归因于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的发展。⁴⁴如果说印刷媒体引起了现代社会中社会运动风格的范式变迁，那么新电子抗争风格的出现与媒体技术的关系可能更密切。这是因为当

今媒体技术比早期印刷媒体所触及的范围更广，也因为电子抗争新仪式和新类型更多地采取媒体形式。博客、视频、邮件组、新闻组、BBS论坛和网络抗议，这些都是媒介化的行动，而演讲和街头表演却不是。另外，这些媒介化形式不单单、甚至不主要被用于抗争的目的。它们是更大的网络文化中被用于抗争的元素。电子抗争文化植根于更广阔的文化之中。

虽然网络抗争文化依靠新技术，但这种文化的形成是普通人学习使用新技术的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必然要受到他们的历史和文化的的影响。创造性来自于实践。这里所分析的网络抗争的仪式、类型和风格中的创新，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不是说新技术一出现，它们就随之产生。

原因很简单，风格和体裁都需要人的身体的承载 (embodied)。像身体的习惯一样，风格与类型的变化非常缓慢。学会用某一风格和类型进行书写，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一旦学会，它们便成为我们整个人的自然组成部分。我们要脱离这种习惯的模式去思考和行动的概率就会降低。例如，只要浏览一下1990年代初期北美中国学生创办的早期中文电子杂志，就可以看出它们与民主墙运动中发表的民刊相近，而有别于现今的电子杂志。早期中文电子刊物和个人网站的编辑、作者和读者，是在1980年代印刷杂志和报纸的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创造出的内容类别、风格和写作体裁，反映了他们在印刷文化中获得的社会化的烙印。

因此，文化的创造性在网络发展的早期比较有限——其他通讯技术在这一点上都一样。因为当一种新技术刚出现时，人们在使用时比较小心谨慎。一方面，他们往往将现有的知识与技能运用到使用新媒体的过程中。他们因此会编辑印刷杂志的网络版本。另一方面，人们将新技术运用到原来熟悉和常做的事物上面。⁴⁵只有在逐渐熟悉之后，他们才会开始采用更冒险、更创新的方式探索新技术。这些都说明，媒体技术对新电子抗争文化的出现虽然重要，但创作文化的终究是人而不是技术。要在这些方面期待更根本性的变化，需要等到新一世代的形成。如果说每一个历史时期有自己的风格和代表性的体裁类型，那也就是说风格和类型只是在与时俱变。

这就带出了我的下一个观点。抗争风格的变迁反映了抗争内容的变迁，这

不是说形式反映内容，而是说内容与形式共同演进、互相建构。这种关系有两个方面。首先，电子抗争文化反映了更广阔的中国抗争文化的变化，是后者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说网络行动的风格没有过去运动的风格那么宏大，那是因为公民行动这一更大的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风格变化。史诗般的抗争风格与革命运动紧密相连。这些运动让挑战者大胆地对抗国家权力。它们鼓舞英雄壮举，从而创造出英雄般的运动风格。新公民行动则更切实，它不挑战国家权力，而是为了维护公民利益、反对违反既有权利、建立新型的公民组织。农村地区的依法抗争和一些地区的工人抗议，越来越依靠法律渠道。小区业主和消费者也主要靠法律。我对环保主义的讨论也表明，环保主义者关注草根公民行动，没有提出宏大政治设计的主张。这不是说在这些问题上的抗争没有了英雄主义，只不过这是一种新的英雄主义。这一新英雄主义表现在日常生活之中，而不是表现在百万人的集会示威中。它需要一套不同的技能——比如使用创新媒体的技能，因此需要一种不同的奉献，比如坚持不懈的毅力、创新的眼光、长期的计划，甚至包括参与跨国活动的技能。⁴⁶

第二，这些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与政治中所发生的结构转型。威廉姆斯看到“形式、制度、与社会系统的相对稳定性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关系。”他写道：

大部分稳定的形式——那种可以看作集体的类型——都属于同样具有相对集体性和稳定性特征的社会系统。大部分流动的、创新的和实验性的形式，都存在于有同类特征的社会系统中。不同社会系统之间的重要过渡时期，通常会以新形式的出现为标志，这些形式最终会稳定下来，成为共有。⁴⁷

当代中国的转型无疑是一次重大的历史变迁。新的抗争形式与这一转型相关。一方面，中国政治在变化，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隔在扩大。政治权力的形式和实践在改变。尽管国家的镇压能力依然很强，但出现了更精致、更具规训力的控制形式。因此，网络抗争的新文化，是对新型权力的回应。此外，认同感与归属感的危机以及社会怨恨的扩大和加深，也迫使公民扩大表达的渠道，

创新抗争的形式。最后，在经济改革后出生的一代已经成长起来，这意味着新一代已经开始参与公民行动，这可以从 2008 年 5 月四川地震之后大学生的志愿行动中看出。这一代人对过去运动的印象十分模糊。⁴⁸ 尽管他们同父辈一同工作，并向他们学习，但他们的生活经历完全不同。他们不可避免地将一些新的元素带入行动。总之，同文学风格的变化标志着文学景观的变化一样，抗争风格的变化反映并推动着社会与政治的变迁。

□ 结论

本章认为，自 1990 年代以来，大众抗争的风格发生了变化。早期社会运动表现出史诗般的风格，而新公民行动更具戏谑和平淡的特征。网络行动既体现了这一新风格，也促进了该风格的产生。抗争风格的变迁，反映了抗争内容的变迁，特别反映了社会以及权力的制度与运作的变迁。

抗争的电子文化标志着公民对自己与权力和权威的关系有了新认识。当然，面对镇压性的权力而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是对权力的最高藐视。然而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在早期的社会运动中，这种对权力的藐视经常同威权主义心态相混合，这种心态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对被挑战的权威的恭敬。我并不认为这一心态在新网络文化中就没有了。但对仪式、体裁和抗争风格的分析表明，一种新精神已经产生。这是一种不恭不敬的精神，而不是威权主义心态。各式各样的网络抗争，都表达了对权力与权威的蔑视。在网络空间，没有什么是神圣的，有的只是亵渎。公民与国家关系要发生更深刻的变革，这种亵渎的精神是一个必需的文化条件。政治转型完全可能从一个新的文化革命开始，而网络行动恰恰代表这样一种文化革命。仪式、言语类型、语言、风格和声音的多样化，挑战和消蚀了国家在话语和意识形态上的霸权。谁都看到网络抗争的新形式——确切地说是中国的整个网络文化——已经渗透到更大的文化圈，改变着人们思考和说话的方式。网络行动文化为这种社会意识和情感的变化做出了贡献。

本章还突出了社会运动文化分析中另一个被忽略的方面，即风格。如果故

事、影像、修辞、符号、仪式和语言对理解抗争的文化生产和表达非常重要，那么风格分析更有助于这一理解。现有研究的薄弱点是不关心与特定运动、抗议、特定历史时期相关的影像、故事、修辞、符号和仪式之间的关系，忽视它们与意识形态、组织和目标等抗争内容的关系。研究抗争风格则有助于揭示这些关系。风格是不同元素之间潜在的统一体。小说家的“声音”就是他/她的风格，⁴⁹这种声音是作品中不同元素组合的总体效果。在这方面，社会运动与小说有相似之处。这里对中国现代社会运动风格变迁的解释，是对社会运动进行风格分析的初步尝试。通过分析抗争风格的变迁，本章揭示了中国社会中很多其他相关的变迁，包括媒体、国家和人们对权力与权威的观念的变化。

注释

- 1 Jasper,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 2 这部分反映了现代中国总体上的政治审美。参见：Wang, *The Sublime Figures of History*. 借用王德威 (David Wang) 对现代中国革命诗歌的说法，抗争者使用的激昂的风格是“革命在文字上的表现”。参见：Wang,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152.
- 3 Perry,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312.
- 4 这类文献的英文翻译，收入一个不错的集子，参见：Goodman, *Beijing Street Voices*.
- 5 Gold, “Back to the City.”
- 6 于 1979 年 1 月 9 日发表，参见《大陆地下刊物汇编》，3:86。
- 7 同上，2:218。
- 8 Calhoun,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 9 关于五四一代和中国启蒙运动，参见：Schwarcz,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 10 Wang, *High Culture Fever*, 261.
- 11 同上，263。
- 12 Barmé, *In the Red*, 214.
- 13 同上，100。
- 14 Zhang, “The Making of the Post-Tiananmen Intellectual Field,” 14–15.
- 15 Holquist, “Glossary,” 428.
- 16 哈贝马斯关于交往行动的理论也是建立在对意识范式的批判上。
- 17 Bakht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269.
- 18 同上，270 页。
- 19 可参见当时的资料。
- 20 链接：<http://cache.baidu.com/c?word=%CD%F5%3B%CE%AF%D4%B1%3B%B7%C5%C6%FA%3B%D2%E9%B0%B8&url=http%3A//bbs%2Ehbvhbv%2Ecom/printpage%2Easp%3FBoardID%3D1004%26ID%3D328421&p=c366c64ad7c01bf208e290265c41&user=baidu>，获取日期：2008 年 1 月 9 日。这个帖子中提到的“禽流感 Flash”，嘲笑了政府处理禽流感危机的措施。在 Flash 中，作为电视新闻主持人的一只鸡表达了它们真心乐意自愿走向焚化炉，为人类牺牲它们自己的利益。译者注：本文的中文原文未能找到，根据英文译回中文。
- 21 截止 2008 年 2 月 10 日，geocities.com 已经收集 208 期该杂志，最后一期发表于 2002 年 12 月 22 日，参见 <http://www.geocities.com/SiliconValley/Bay/5598/index.html>，获取日期：2008 年 2 月 10 日。
- 22 同上。
- 23 同上。
- 24 链接：<http://cache.baidu.com/c?word=%B5%D6%D6%C6%3B%B9%BA%B7%BF%3B%2B%3B%D7%DE%3B%C%CE&url=http%3A//bbs%2Enortheast%2Ecn/dispsbbs%5F406%5F141939%5F132%2Ehtml&p=aa39c00cce934eac5df7c7710c14bb&user=baidu>，获取日期：2008 年 1 月 15 日。
- 25 刘旭静 (音译)，“邹涛‘不买药运动’正在从深圳向北京推进”。这一运动没有发展起来，因为发起者邹涛据传被公安部门拘留。该结果并不为奇，因为开发商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合谋是常事。
- 26 <https://www.zuola.com/weblog/?p=786>，获取日期：2008 年 4 月 10 日。
- 27 Kennedy, “China: Citizen Blogger Treading New Ground?”
- 28 同上
- 29 同上
- 30 参照：Dyke, Soule, and Taylor, “The Targets of Social Movements.”

- 31 国家环保总局在 2008 年 3 月重组成新的国家环保部。
- 32 Hooper, "Consumer Voices."
- 33 <http://www.fon.org.cn/index.php>, 获取日期: 2002 年 6 月 3 日。
- 34 引自 Ho, "Greening Without Conflict?" 916.
- 35 Yang,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Yang and Calhoun, "Media, Civil Society, and the Rise of a Green Public Sphere in China."
- 36 中华环保联合会, "中国公民组织发展调查报告", 未发表, 2006。作者存档。
- 37 然而污染受害者发起的环保抗议在增加, 参见: Jing, "Environmental Protests in Rural China."
- 38 关于使用法律表达集体利益, 参见: Diamond, Lubman, and O'Brien, "Law and Socie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allagher, "Use the Law as Your Weapon!"; Lee, Against the Law. Cai, "Social Conflicts and Modes of Action in China"。值得注意的是, 在纠纷和抗议中, 城市居民比农民居民更经常使用法律。
- 39 万学忠, "热线帮助了万名受害者"。
- 40 有关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 参见: Pei, "Rights and Resistance"; O'Brien and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and essays in Goldman and Perry, eds., *Changing Meanings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
- 41 引自陆敏(音译), "污染受害者让我们来帮助你"。
- 42 <http://www.fon.org.cn/content.php?aid=8788>, 获取日期: 2008 年 1 月 14 日。
- 43 同上。
- 44 Tarrow, *Power in Movemen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 45 美国的电话使用正是如此, 参见: Fischer, *America Calling*.
- 46 根据科恩(Koehn)的观点, 跨国能力包括“分析的、情感的、创造性的、交往的与功能性的技术”, 在不同国界之间运作需要这些能力。这些技术还包括用英语进行交流的能力以及对国际 NGO 文化与实践的了解。参见: Koehn, "Fitting a Vital Linkage Piece Into the Multidimensional Emissions-Reduction Puzzle," 379.
- 47 Williams, *Marxism and Literature*, 189.
- 48 Bonnin, "The Threatened Hist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Lost Generation."
- 49 Frye,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268.

电子抗争经济

抗争向来有它的文化和政治，但有没有抗争经济，却并不明显。现代中国产生了无数的“职业革命家”，把革命当作职业也的确略带点企业家追求的意味。但过去的职业革命家无疑会拒绝与商业经济行为相联系。积极行动与经济的联姻需要市场经济，或者至少需要一点市场经济，才能产生抗争的经济模型。

一些西方学者已经用市场的观点研究抗争。在《反叛的市场》这本书中，克里夫德·鲍伯（Clifford Bob）用这一观点解释为什么一些地方挑战者变成了全球著名人物，而其他一些却默默无闻，他认为这取决于挑战者如何将自己推销给国际 NGO。这一市场的观点是我所指的抗争经济的部分内容，但不是全部。不仅积极分子有时会采用商业策略促进他们的事业，商业公司也有可能在抗争活动中有既得利益，因此发展相应策略以促进某些类型的抗争，从而在商业与积极行动之间创造了某种协作。

很多不同类型的商业都可能会对抗争感兴趣，但文化产业似乎尤为如此。中国的舆论管制严，但有的媒体通过打“擦边球”，发表了有争议性的报道。¹

这些报道通常涉及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因此会扩大销售。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比如在电影和艺术生产中，甚至存在着一种被白杰明称为“包装的异见”（packaged dissent）或“可获利的异见”（bankable dissent）——“由于镇压性的国家控制，非正式的或半非法的作品可能会自然增加一些市场价值……而不管（甚至有意忽视）它们自身的艺术价值。”²因此，一些具有国际市场眼光的精明导演，有时使用“中国禁”（banned in China）进行市场营销，因为一部影片在中国被禁，则会提高它在国际市场上的吸引力。³理查德·克劳斯对中国文化审查的研究同样使我们关注“中国禁”这一标签的宣传效果。他在评论西方对1995年中国艺术展的回应时指出，“大部分西方推介人员和艺术批评家倾向于将所有的画说成禁画”，即使“那些艺术展品从来没有在中国被收集或展览过”。⁴

然而，没有哪个文化产业像网络经济那样依赖抗争，其中的原因比表面看到的要复杂。这肯定是个眼球经济的问题，因为网站通过获取关注而吸引消费者。⁵在理论上，眼球经济的原则适用于整个网络经济，但网络经济与网络抗争的共生关系却不总那么显而易见。在本章中，我认为社会背景解释了中国经济与抗争的独特关系。特别是，我认为眼球经济的社会基础在中国尤为坚实，而其他公共表达途径的缺失则使网络特别容易容纳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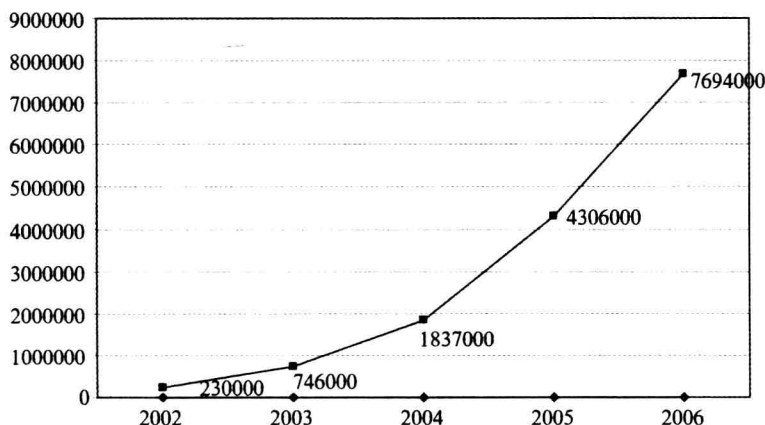
□ 社会生产与网络发展

要理解为什么网络经济对抗争感兴趣，就必须回顾中国网络发展的历史。与其他任何一个经济部门相比，中国网络经济史或许更是一部社会史。这一历史是由消费者和商业公司共同创造的。当然，国家和市场发挥了根本的作用，但我们没有注意到，其实网络消费者也起到了作用。网络消费者与市场上一般消费者不同的是，他们同时也是生产者。当他们在网络论坛上发帖、写博客、在 Youtube 上传视频时，他们生产着内容。用户生产的内容是网络经济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是当今“Web 2.0”时代的新传统智慧。⁶中国的情况无疑也是如此。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在2008年1月发布的网络调查报告的数据，在中国2.1亿网络用户中，约有66%的人曾为网络贡献过内容。超过35%的被调

查者表示在过去 6 个月内，他们在网络论坛中发过帖或回过帖，有 32% 的用户上传过照片，18% 的用户上传过电影、电视节目和其他视频。⁷

社会生产从一开始就是中国网络文化的一个特征。早期的网友热衷参与 BBS 中的讨论，他们至今依然如此。当能够获得个人网页空间时，他们成为热情的个人主页制作者，正如今天的他们是热情的博客写手。因为早期商业网站和政府网站上的内容十分有限，个人网站很受欢迎。用户们发布散文、日记、照片、文学作品、实践的与技术的的信息等等。最有影响的恐怕是学术网站，它们涉及众多社会议题，发布的文章可能非常具有批判性。⁸ 这些网站通常有论坛，网站之间互相链接，有时还链接到有影响的英文出版物。个人学术网站的繁荣折射出生活中其他领域缺乏自由的学术讨论。2001 年，最著名的个人学术网站“思想的境界”关闭。此后，个人网站渐渐失去了影响，不过其地位只是被新兴的博客所取代。2002 年，中国有 23 万活跃的博客，如图 5.1 所显示的，这一数字到 2006 年超过了 760 万。⁹

图 5.1 中国活跃博客数
(2002—2006)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06 年中国博客调查报告》

博客是典型的社会生产空间。空间是网络公司免费提供的，但内容由博客写手生产。然而，个人生产的内容可能成为大型门户网站有影响的头版新闻。

为了研究博客如何在中国网络空间中运作，我于2006年4月匿名在新浪网上开了自己的博客。我很快发现，尽管撰写博客是个人活动，但发布和接受博文却是社会性活动。首先，一篇博文一经发表，电脑系统会自动将之置于博客网页中心的“新发布博客”的顶端，因此将它带入整个社区的关注中心。但关注的时间非常短促，因为不断有新博文发表。如果一篇博文没有非常有趣和吸引人的内容，则注定会被立即淹没。如果它得到关注，有很多人访问，点击率高，之后网站的编辑才会决定是否将之“置顶”。置顶后，它会一直出现在主页上，这样很容易获得成千上万人的访问。

博客的发布和接受，还有其他的社会机制。中国的博客大多加入博客圈，很少孤立地存在。博客圈类似兴趣小组。网上有电影爱好者、环保主义者、前下放知青、社会学家、记者和文学翻译者之类的博客圈。任何在新浪上拥有博客的人都可以建立或加入博客圈。我所加入的博客圈列于我的博客之上，因此访问我博客的人可以看到我所属的圈，也可以登录那些圈。我加入的一个博客圈是“环境与社会”。当我发表博文时，这篇文章就被自动链接到该博客圈的主页上，这样圈友都可以看到。而且，如果其他博客写手访问我的博客，那么在他们访问之后，我的博客上会自动出现他们博客的链接。这一方面显示了访者的踪迹，另一方面也允许我回访他们的博客。线上的社会互惠与线下的一样重要。虽然只是偶尔写写博客，但我很快发现自己已在十几个博客圈中。这样，我对这些博客圈的扩大做了区区的贡献，自然也对运营博客的网络经济有所贡献。¹⁰

理解社会生产重要性的另一个途径，是将网络的社会用途与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进行比较。¹¹ 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都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推动，但可以说这两方面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中国网络公民社会的发展。评论家即使在对电子商务将来可能达到的规模和范围持乐观态度时，¹² 也注意到了它的缓慢发展。表5.1显示，从1999年到2002年这一时期，更多的人使用BBS和新闻组，而不是网络购物和网络支付。表5.2显示，从2003年到2007年，这一趋势保持不变：使用BBS和网络购物的用户都有所增长，但网购仍落后于BBS和其他网络社区的使用。一般而言，中国用户为网络所吸引，更主要的是因为它在社会而不

是商业方面的用途。2001年用户自我报告的对新闻组和布告栏的偏好有所下降，可能是受到政府推动电子商务而不鼓励新闻组和BBS活动的相关政策的影响，¹³但是，即使在政治控制收紧的情况下，还是有更多人参与网络的社会与政治活动，而不是商业活动。

表 5.1 中国最常用的网络服务（多选）
1999年6月—2004年6月（%）

	电邮	新闻组	BBS	网购	网付
1999年6月	90.9	21.4	28.0	3.2	N/A
1999年12月	71.7	17.0	16.3	7.8	1.8
2000年6月	87.7	25.4	21.2	14.1	3.7
2000年12月	87.7	19.3	16.7	12.5	2.7
2001年6月	74.9	10.7	9.0	8.0	1.8
2001年12月	92.2	13.4	9.8	7.8	2.1
2002年6月	92.9	20.4	18.9	10.3	N/A
2002年12月	92.6	21.3	18.9	11.5	N/A
2003年6月	91.8	20.7	22.6	11.7	N/A
2003年12月	88.4	N/A	18.8	7.3	N/A
2004年6月	84.3	N/A	21.3	7.3	N/A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报告。参见 <http://www.cnnic.net.cn>

表 5.2 中国最常用的网络服务（多选）
2003年6月—2007年6月（%）

	电邮	BBS	博客	网购
2003年6月	91.8	22.6	N/A	11.7
2003年12月	88.4	18.8	N/A	7.3
2004年6月	84.3	21.3	N/A	7.3
2004年12月	85.6	20.8	N/A	6.7
2005年6月	91.3	40.6	10.5	19.6
2005年12月	64.7	41.6	14.2	24.5
2006年6月	64.2	43.2	23.7	26.0
2006年12月	56.1	36.9	25.3	23.6
2007年6月	55.4	69.8	19.1	25.5

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调查报告。参见 <http://www.cnnic.net.cn>

1999年1月，中国政府启动了政府上网工程，目标是提高行政效率、降低成本，使公民更容易获得政府信息。大约在1年时间内，中国 gov.cn 域名总数从 982 个增长到 2479 个。截至 2002 年 12 月，中国共有 7796 个 gov.cn 域名，占有所有 .cn 域名的 4.3%。¹⁴ 尽管政府网站的数量不断增长，但它们的影响微乎其微。中国记者抱怨政府的网站通常不更新、信息过时，或者根本不提供有用的信息。¹⁵ 有研究指出，即使像当时位居中国电子政府网站前 5 名的青岛市政府网站，在 2000 年 12 月每天也不过只有 1500 个点击。¹⁶ 相比之下，大约在同一时期，在中国很受欢迎的强国论坛每天约有 10 万个点击和 1000 个帖子。¹⁷ 即使像中国知青论坛这一主要吸引中国知青一代的专门布告栏，¹⁸ 平均每天也有 700 个点击。自 2003 年以来，电子政务的运作有所提高，¹⁹ 但在规模和影响上依然十分有限。²⁰ 即使像 CCTV 这样大型媒体机构的网站，也在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方面远远落后于商业网站，因为它们有更多政治上的限制。²¹

如何解释网络在社会用途上所表现出来的活力？首先，公共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如信访制度）仍很微弱或无效，因而公民需要替代性沟通途径。网络比官方途径更能满足这一需求。在改革开放之前，政治参与受到严格控制，表达政治异见是危险行为。在改革时代，大众政治参与逐渐从政治舞台上消退，而出现了新的、个体化的政治参与模式。²² 史天健在研究政治参与时，列举了 28 种北京公民用以表达利益的政治行为。除了写大字报，其他政治行为都没有大众的参与。大部分行为，例如“通过官僚体系反映问题”，都只是表达个人的怨恨，而不可能引发公共讨论。²³ 因此，改革时代公民参与的途径虽然有所拓宽，但对普通公民而言不足以解决问题，而且也不够开放。网络提供了新的可能。

其次，中国公民社会的内在动态过程有利于网络的发展。这一动态过程表现在很多方面，比如个人权利和城市公共空间的扩大、民众抗争的激增、媒体权力的下放以及社交生活的拓展。²⁴ 这些动态过程源自当今中国人生活中存在的模糊、紧张、冲突和希冀之间惊人的结合与并置。举一个十分明显的例子：我们如何理解中国在大步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失业、嫖娼、腐败）？如何从这些社会病出发理解现代性？当一个人成为这些问题无助的受害者时，我们又如何理解个人生活的价值？这些担忧普遍存在于中国大

众之中，人们经常在日常生活中议论和感叹。当网络得到传播后，用户欣然将网络作为表达和讨论这些担忧的途径。于是，电子杂志和电子布告栏大受欢迎。政府在 2000 年底加强了规管网络的措施，以回应在这些社会问题上引发的广泛的网络讨论。²⁵

最后，公民社会的本质是公民参与公共生活。公民是否认为网络有利于公共参与，对网络的认识会影响网络行为。信念对现实创造的重要性，是为人熟知的社会学原理。一般的社会互动，依赖个人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信任。²⁶对早期中国报纸的研究显示，大众媒体的力量“源于想象的力量”。²⁷大众媒体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人们相信它有力量。迈克尔·舒德森认为：“媒体的力量在于专家和决策者认为一般公众受到大众媒体的影响，而不是大众媒体直接影响一般公众。”²⁸在有关公众如何看待以电脑为媒介的沟通方面，有个基于日本和韩国的比较研究，发现虽然日本在技术上更发达，但韩国人对作为交往工具的网络更有热情。韩国人热情更高，似乎主要源自对“自由表达的渴望，这一渴望在独裁统治（于 1987 年结束）年月遭到了压抑”。²⁹中国是否也有类似的自由表达的渴望？中国网友如何看待网络作为公众参与的方式？

强国论坛上曾有一个包含 289 个帖子的论集。这些帖子在 1999 年和 2000 年期间发表于该论坛。它们为我们了解民众对网络的开放与自由的热情，提供了一扇难得的窗户。在商业性网络社区红火之前，强国论坛大概是最受欢迎的 BBS 论坛和网络社区。强国论坛建于 1999 年 5 月 9 日，上面有很多有关当前社会与政治问题的讨论。讨论也包括一些有关论坛管理、论坛的性质和目的等方面的内容。在网友的建议下，强国论坛的站务将针对论坛事务的帖子结集存档。截至 2000 年 12 月 10 日，共有来自 158 个不同用户名的 289 个帖子被保存下来。³⁰第一个帖子发表于 1999 年 8 月 26 日，最后一个帖子发表于 2000 年 12 月 10 日。最长的帖子包括 17,894 个字节，最短的有 158 个字节，平均字节数为 2145。转化成中文，每个帖子平均有 1073 个汉字——单从长度而言，这一数字已很让人惊叹了。

强国论坛隶属《人民日报》。它与其他论坛相比受到更多的管制，因此它对于分析公众如何认识中国网络，属保守案例。³¹即便如此，这个案例传达出

的信息也十分清楚：即网络用户一般将网络视为更自由、更开放的公共参与空间。³² 网友把网络描述为普通人可以参与国事讨论、交流情感、表达意见的地方，是一个自我发现、自我表达的领地，一个要求民主监督和独立思考的空间，一个“不能拒绝顾客，也不能决定人们讨论什么”³³的“咖啡屋”。他们通常将BBS论坛的民主潜能，与传统媒体在民主方面的缺乏做对比，因而对公共表达有了新的可能而激动。因此有位帖子的作者将强国论坛称为“让我们第一次尝到神圣的言论自由权是什么滋味的圣殿”，并且相信强国论坛“为表达长期被压抑和被屏蔽的草根声音提供了机会”。³⁴ 虽然强国论坛的管制做法不断遭到批判，³⁵ 但大部分网友将网络视为公共参与的空间。这种看法使他们有可能参与网络沟通。

□ 积极分子对市场策略的运用

在网络时代之前，很难相信商业与抗争之间存在任何正相关的关系。在早期的社会运动中，商业体也支持过抗争性活动。在五四运动期间，学生得到了商人的支持。在后来的一些运动中，店主、街上摊贩、出租车司机通过提供免费的饮料、食物、乘车等，支持抗议者。然而这种支持不属于商业关系，无关利润，商业机构的捐款和其他形式的物质帮助，是出于慷慨和同情。在“文革”期间，商业和抗争之间是另一种关系——商业成为斗争和攻击的目标。1966年8月，北京一群中学生红卫兵公开宣布100条禁令。在这百条禁令中有如下规定：“商店的橱窗中不能摆设香油香水……服装店严禁生产紧身裤、港式套装、男女奇装异服。”³⁶

在“文革”的最后几年和改革开放初期，出现了小规模私营经济行为。那些从事这类商业行为的人不仅缺乏政治合法性或社会声誉，而且受到社会压力，面临政治风险。他们勉强可以被称为经济积极分子，为争取另一种生存方式的合法性而斗争。在城里，被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称为“小私营行业”（petty private sector）的那一小部分人，即沿街叫卖者和小摊贩，像游击队战士一样，跟城里的官方部门玩着猫和老鼠的游戏。³⁷

只有自 1990 年代以来，商业与抗争之间才产生了互利关系。毋庸置疑，反映这一关系的首要案例是消费维权者王海的故事，他曾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³⁸1995 年，来自山东的 21 岁小伙子王海到北京工作。不过他开始专门从事消费者维权，却是在偶然发现前一年生效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一条规定之后。该法第 49 条规定，买到假货的消费者，可以退还商品，并获得所购商品价格的双倍退款。王海在北京几家商店碰了运气，购买假名牌产品并索要双倍价格的退款，结果居然奏效。于是他将自己变成了全国著名的职业“打假英雄”。根据《纽约时报》1998 年 6 月 7 日的报道，依靠这一简单而有利可图的技术：

他的经营从一个人的表演变成拥有 10 名员工的公司，其中包括一名可以起诉任何一家不愿退款的商店的律师。他的北京大海商业资讯有限公司还拥有基于 200 个消息提供者的全国性网络，这些人通过电话报告可疑的假货；公司还设有广为公开的热线电话，被欺骗的消费者可以致电求助。（消息提供者每次会获得报酬，该公司收取所获退款的部分作为费用。）³⁹

2001 年，王海与人合伙创办了网络商业企业，wanghai.com。该网站致力于消费者权益保护行动，后来成为名牌维权网站。⁴⁰王海仍然是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的名人。⁴¹

在有关他作为消费者权益维护者的早期职业生涯的自传中，王海自豪地声称：“我是刁民！”⁴²刁民在传统上是带有贬义的词语，用来指代那些不服从的、精明的人。诋毁者认为王海的行为像刁民，是因为他就其购买的假货，无情地索取赔偿。王海毫不畏惧地、高兴地戴上写有刁民的帽子，从而赋予这个词语新的含义——人们有权根据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这样做并不可耻。李连江和欧博文在研究农村抗争者时，将农民分为三类，其中一种是“精明而坚定”的刁民。他们发现刁民是那些依法抗争者，“运用法律、政策和其他官方信息维护自己的利益”。⁴³对其对手而言，刁民最难对付，不仅因为他们没有违抗法

律，更因为他们事实上运用法律作为武器维护自己的权利。王海的故事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不仅运用法律争取自己的权益，同时获得了声誉和金钱。在这一方面，王海不是单兵作战，他代表了中国一种新型积极分子，即企业家积极分子（entrepreneur-activist）。

企业家积极分子不同于创业型积极分子（entrepreneurial activists）。很多积极分子具有创业精神，但没有将积极行动转化为有利可图的商业行为。有的人则开始将积极行动与商业结合起来，是因为他们意识到自己也需要谋生。在网络行动中，一些参与民族主义抗议的中国黑客，很快发现他们可以将自己的电脑技术转化成商业。⁴⁴ 在深圳，两个黑客群体合并资源，成立了一家电脑安全公司。我在第四章中讨论的公民博客周曙光，也公开表示他有时候向接受他维权服务的人（如小区业主）收费。

□ 网络公司促进抗争

当积极分子采用市场策略推动他们的网络事业时，网络公司也把抗争用作市场营销的策略。前面谈到，社会生产对中国网络的发展至关重要。社会生产的功能之一是创造和提升网络流量，这是衡量网络经济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指标。著名的 Alexa 网站，专门追踪全球网络经济的发展，通过网络流量给全球网站排名。在中国 BBS 和博客社区中，网络流量通过帖子的点击率和主题的回复数加以衡量。天涯社区一个著名的版主谈到：“在互联网，所有的网编（网络编辑）都知道一句话，点击是王道。网站对网编最重要的考评是每天的点击率。在新浪，考评落实到每一部门。在搜狐，考评则落实到每一个网编。网站的流量代表了盈利能力，而考评则影响到每位网编的奖金收入。”⁴⁵

商业公司为了提高网络流量，使用多种策略。利用媒体事件进行营销就是其中一个策略，而被利用的媒体事件有的具有抗争内容，有的则没有多少。中国网络发展早期有几个成功的案例，均是媒体事件的产物。新浪 BBS 的“体育沙龙”就是其中一例。1997 年，在四通利方与总部在美国的华渊资讯合并成今天的新浪网之前，四通的 CEO 王志东从美国访问回来后，着手创办公司的

新项目——“冲浪项目”。投资者和管理层不看好这个战略举措，敦促王志东关闭网站的 BBS 论坛。那时，世界杯正在法国举办。王志东的员工开了一个名叫“体育沙龙”的论坛，立即吸引了很多足球迷。在那段时期，四通的 BBS 论坛每天记录有 300 多万的点击量。⁴⁶“体育沙龙”因报道世界杯而成为新浪网的品牌论坛。⁴⁷

另一个例子是强国论坛。强国论坛由人民网创建，作为中国公民发表对北约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抗理论坛。论坛立即取得了成功，无数人登录到论坛抗议使馆被炸。抗议平静之后，人民网将它的名字从“抗理论坛”改成“强国论坛”。即使今天，强国论坛依然是中国网络空间中最大的网络社区之一。尽管日益加强的管制将它面目大变，但它凭着它的品牌——通过从大使馆被炸而引发的抗议事件中建立起来的名声，依然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

在媒体事件创造网络成功的例子中，最成功的要数“木子美事件”。木子美是一个在广州的年轻女博主的用户名。2003 年 6 月 19 日，她开始在博客中国的个人博客中连载她的性日记。博文中详细描述了她的性活动，大胆地直接挑战了有关性、婚姻、男女关系和自由表达的主流价值观。詹姆斯·法勒 (James Farrer) 所做的精致的分析，引用了木子美日记的以下内容：

人的自我解放，总要受到社会观念的阻止，而被各种禁忌束缚的人，如果不能跨越自己的“奴性”，他永远不会有真正的自我。当我写性专栏时，自认为“人性解放”的写作意义大于“身体写作”，人在性交中所流露的真是日常交往中难以流露的。或者说，裸体、性交，是暴露人性的最有效方式。⁴⁸

到 10 月份，木子美的博客已非常有名（对其批判者而言则是声名狼藉），每天吸引成千上万的点击。她的博客促进了博客在中国的流行，博客仅在前一年才引入中国。木子美的性日记不仅使她自己的博客和博客中国网站出了名，同时也提升了很多其他激烈讨论她的性日记的网站的流量。例如，2003 年 11 月 11 日，新浪网设专栏，转载木子美的日记，并发表公众的回应。在 10 天内，

新浪的点击率维持在每天 3000 万次的水平，而平时只有 2000 万。⁴⁹

新浪对木子美现象的回应是网络公司对抗争性事件回应的典型。我曾经采访一个大型门户网站的编辑，当我问到商业网站如何回应有关争议的网络事件，他回答：

我们作为大型网站有三个原则：快速、深度、安全。快速地获得有可能的热点事件是第一要素，我们获得的途径是我们的编辑自己的发现、寻找，或者不停地盯着其他热点网站的最新热点新闻；深度，因为我们不可能每次都会是第一次发现热点新闻，所以作为大型网站，我们就需要从深度上进行挖掘。因为是大型的门户，在热点爆发之后，我们会很多的网络写手给出很多深度的报道，这是我们的主要优势；安全，中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言论有一定的自由，但是也需要一定的监控，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我们会持续地炒作一个热点事件，但是如果一个热点新闻有违国家的标准，我们是非常配合地将一个热点新闻撤掉。⁵⁰

当我询问他们应对 BBS 论坛上的激进言论的策略时，他说：

对于论坛里的激烈言辞，我们一般是持观望态度。我们有自己的监控部门，会时刻掌握着一些舆论的动向。如果一些特别激烈的言语出现，我们的监控部门会直接行使删除权限。而对于论坛本身，我们是比较希望有一些针锋相对的言论出现的，因为这样有利于事件的持续关注，有争执，才会有热点。但是前提是要有度。如果总结的话，那就是前期任其自然发展，等待有关部门的反应，如果有关部门要求进行限制，我们会进行处理；如果有关部门持支持态度或者不予批示的话，我们会加大热炒。⁵¹

□ 虎，虎，明亮如火

网易对“华南虎事件”的报道说明了网络公司可以提升抗争性事件。⁵² 2007年10月12日，陕西省林业局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在该地区的山上发现了华南虎（濒危物种）。这一发现的证据是农民猎人周正龙拍摄的照片。据称，政府委任的专家团鉴定了照片的真实性。

网友们对照片的真实性立即提出了质疑。周正龙和陕西省林业局的一名官员则以生命和荣誉保证照片是真的。争论在大众媒体和网络上激烈地展开。⁵³ 11月16日，有人在一个网络论坛上发表了一张中国传统中国虎年画的图片，并认为周的老虎是画中老虎的照片。热心的网友很快找到了年画的作者。尽管证据压倒性地表明周的照片是赝品，陕西省林业局依然保持沉默。2007年12月19日，中国国家林业局作出指示，要求属下的陕西省林业局重新鉴定照片。2008年2月4日，陕西省林业局发表公开道歉信，称其不应在进行妥善鉴定前公布发现华南虎。该道歉信称，鉴定一旦完成，就会将结果公之于众。最后，到2008年7月，政府公开承认照片是假的。直接涉及此事的几个官员受到撤职惩罚。

华南虎案是全国性的媒体事件。官方媒体和商业网站都做了广泛的报道。网易的报道体现了商业网站和抗争性事件之间存在的共生关系的几个特征。首先，网易的报道非常迅速、全面而有深度。网易针对华南虎案在其网站上设了专版，其中包括对科学家和政府官员的采访、新闻跟进、照片集、专家意见、网民的评论、相关分析、网易编辑在现场收集信息的视频、有关周正龙家乡所发生的事件的报道、来自兄弟媒体的报道，甚至还有供网民就有关照片真伪进行网上投票的热线链接。网易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发表周正龙拍摄的全部40张老虎数码照片的网站。

这家网站的报道显然超越了中国网络新闻规定的许可范围。商业网站可以转载官方新闻机构发布的新闻，但不能发表原创新闻报道。事实上，很少有商业网站在有新闻价值的事件上不提供自己的报道。它们一般的策略是同官方新闻网站合作，虽发表的是它们自己的新闻报道，但却将新闻来源显示为合作的官方机构。有位博客写手指出，这显然是网易报道华南虎事件的策略。网易上

的很多报道虽说引自湖南官方新闻网，但很多报道却只能在网易上找到。⁵⁴ 有关老虎案的报道给网易提供了一个在中国新闻界打擦边球的机会。

另外，网易标志性的“新闻跟帖”功能在这一事件期间得到了充分发挥。该功能可以让读者评论新闻报道。据网易副主编方三文称，网易“新闻跟帖”的功能允许读者表达自己、质疑新闻内容的真实性、丰富新闻报道，甚至改写新闻。⁵⁵ 事实上，该功能附加了澄清、批判性介入、深入探索事件与议题这些功能。读者通过发表评论和回帖，可以就争议事件进行辩论，并引起其他的社会关注。例如，在2008年2月4日陕西省林业局的官员发表公开道歉后，很多读者回复了这一新闻，认为这只是政府与人民玩的另一个游戏。以下是三个评论的例子：

刚开始，陕西省林业局在玩假虎照的游戏，现在在玩拖延时间的游戏。尽管国家林业局要求它重新鉴定照片，但它却没有设个时限……如果照片被证明是真的，他们会立即宣布；如果不是，结果永远不会被公布。（2008年2月10日）⁵⁶

这是个巨大的谎言。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居然不能鉴定一张照片。开什么玩笑！（2008年2月6日）⁵⁷

我不接受这样的道歉……我要求公布事实……公众需要有关这一事件的事实。（2008年2月6日）⁵⁸

还有评论称，虎照事件正是泛滥的腐败问题的体现，它涉及政府官员甚至是科学与学术圈的腐败。毕竟，网友小题大做该事件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腐败事件，是政府官员和受委任鉴定照片的专家之间的共谋。有读者评论到：“虎照事件是观察更大的社会的一个窗口，它暴露了中国官场的丑陋（2008年2月9日）”。⁵⁹ 另一个读者使用官方和谐社会的话语，要求追究刑事责任：“和谐社会必须是个法治社会……法律不能让任何违法行为逍遥法外。如果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那真是太可悲了。和谐社会必须惩恶扬善（2008年2月11日）。”⁶⁰

显然，网易对虎照事件的全面报道，有助于它的商业。2008年2月15日我查阅网易，发现从2007年10月中旬到2008年2月初，有关华南虎的新闻报道的回复数量惊人，达到122,524条，有2300页之多。有网民这样评论网易的报道：“这次网易做得很好。它一次性发了那么多照片。我相信无数聪明的网友和专家现在可以看清楚了。太有趣了！”⁶¹

□ 抗争市场化的条件

显然，积极分子运用市场化策略开展行动，而网络公司则发现网络活动可以带来经济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行动明显地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市场化。这是什么条件促成的呢？诚然，抗争中总要有一定的策略，其中有些策略恰好也是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如果说抗争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紧密，那是因为中国社会本身变得更加市场化。在这个市场社会中，购买服务，包括带有抗争性的服务（如起诉销售假货的商家），渐渐被认可。从网络公司的角度来说，只要抗争性活动有利可图，它们即便冒一定的政治危险，也会鼓励这类活动。这种情况为市场促进民主的观点提供了支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网络发展的最初10年促进了政治自由化。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发展，因此网络的政治作用也具有历史性，会不断变化。这让我们联想起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过程中早期资本主义市场发展所起的作用。市场只是到后来才侵蚀了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自主性。

网络经济的私有化为商业公司提供了追求商业利润的必要的政治独立和商业动机。当网络公司的利润变得如此依赖网络流量时，它们会采用营销策略来提高流量。我在前面提到过，抗争性事件可以带来网络流量，因此争议可能会意味着好生意。然而，市场与政治自由化的关系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其他资本主义社会，网络行动与商业的关系没有那么密切？当然，网络行动在中国和其他地方都很普遍。作为常规社会运动组织所采用的一种行动模式，网络行动在中国以外的地区或许更常见。⁶²然而像当今中国如此普遍的大规模的、自发的网络事件，在别的地方远没有如此频繁地发生，规模也小得多。有

两个额外的条件——我在前面都曾提到过——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一方面，公共参与的制度化途径（如信访制度）在中国十分有限，效率待增，因此公民需要替代性的沟通渠道，而网络比其他官方渠道更能满足这个需求。另外，与中国大转型相伴的社会两极分化、认同感危机和不断增长的公民意识，引发了有关自我表达、社会承认和社会正义的渴望。网络行动是这些渴望在网上的表现。

□ 网络推手：人为制造争议的可能

像阿多诺、霍克海姆、哈贝马斯这一脉络的批判理论家，都揭露了商业化文化产业对批判公共领域的威胁。哈贝马斯的分析有个核心观点，即在大众传媒时代可能出现受操纵的公共领域。在这个衰败的公共领域中，文化争论型公众（culture-debating public）变成了消费文化型公众（culture-consuming public）：“人们清醒而乐意地做着消费者，这体现在一种虚假的意识上，他们自认为是有批判和反思精神的私人，并以这样的角色负责地对公共舆论的形成做出自己的贡献。”⁶³ 哈贝马斯写道：

今天，对话本身是受到控制的。讲台上的专业对话、小组讨论和圆桌展示——这种私人的理性讨论变成了广播和电视明星的一个生产数字，成为能够获得票房收入的可销售的产品；即使在人人可以“参与”的“会议”上，它也呈现为商品的形式。讨论现在成了“商业”，有固定的形式……以这种方式进行的批判性辩论，无疑具有重要的社会—心理功能，可以替代积极行动，具有镇静剂的作用。但它却逐渐失去了公共的功能。⁶⁴

中国的网络空间，确实存在讨论受操纵的危险。当机智的网编意识到抗争中蕴含利益时，他们开始制造媒体事件，作为营销的噱头。这种做法足以使很多撰写有关事件营销这类商业营销书籍的作者自叹弗如。中国媒体的商业化已经渗透到诸如“炒作”新闻这类商业化行为。炒作是通过引起公众轰动而创

造消费者兴趣的一种手段。在网上“推手”是指那些“炒作”网络事件的精明网编。“推手”是中国功夫的手法，其基本要领是回避、迂回，借对手之力获胜。“网络推手”是指通过策略性地将一些事件推到公众关注的前台，从而制造出网络事件的人，多为网络编辑。《南方人物周刊》在2007年第1期中报道了一个“网络推手”的故事。他的网络ID叫“浪兄”。2005年，“浪兄”在云南旅游时，给一个年轻羌族女子拍了一组照片。他回到北京后，将照片发到一个人气很旺的网站上。他发现人们很喜欢他照片中的女子，于是返回云南，重新找到那个女子，又给她拍了很多照片发到网上。这个年轻女子很快变成网络名人，被称为“天仙妹妹”。一年之内，她就签到了价值200万元的商业合同。“浪兄”作为她的经纪人，同她共享利润。“天仙妹妹”在网上有着巨大的粉丝团。“浪兄”解释道：“你想想嘛，当时，中国男人的视野里全都是超级女声、芙蓉姐姐⁶⁵、木子美，不是中性人就是搞怪的，妹妹无疑就像一股山野里吹来的清风，她美丽、勤劳、善良、孝顺父母，具备中国传统女性的所有美德。”⁶⁶

这些评论说明，“天仙妹妹”的案例反映了商业营销的另一面，即对性和女性身体的营销。如果“炒作”新闻不是网络经济特有的现象，那么通过性进行营销的策略则反映了商业化时代的文化生产的大趋势。波尼·麦克道格(Bonnie McDougall)和其他的文学研究者在研究轰动一时的“少女小说”和“美人小说”时，揭示了这些文化产品的深层矛盾。一方面，他们批判了女性身体的商业化。梅根·费利(Megan Ferry)指出当代女性小说将女人的性别本质化(essentialization)了。⁶⁷波尼·麦克道格认为：

在少女小说中，对大肆渲染的亲密经历进行商业炒作，体现了作者、出版商和读者对隐私权的不尊重。隐私的含义只剩下女性的性，其他私密体验被忽略或有意忽视。隐私成为商品，同其他的商品一样可以交换，还有成名和金钱的额外诱惑。⁶⁸

另一方面，学者们从这些女性小说中看到了越界的可能和女性的能动力。麦克道格提到，“这类作品在促进保护女性隐私权的事业之外，同时还起到了

打破话语樊篱、开启有关一般隐私权公众讨论的作用。”⁶⁹ 麦克道格也非常注意分析少女小说兴起的历史原因，将它视为抚慰创伤的方式：

1980年代，文化人在小说中以及通过国家经济复苏所辛苦建立起来的自我价值感，被后来的创伤及其余波深深动摇，几乎摧毁。因为缺乏其他的重建机制，读者通过有关私密生活的读物寻求智慧和刺激。回忆录、忏悔录、自传和有关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作为重构成年之前的天真的方式，似乎还被用以建构历史自我（historical self），一个连续的、永久的、可以用来确定自我价值和作为价值与理想储备的自我。⁷⁰

因而，商业化的网络公众与人为制造的抗争的威胁确实存在。不过我们必须以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这些危险，而不是把它们夸大。有几个因素对这样的危险可以起到抑制作用。首先，在网络经济与抗争关系背后的社会生产逻辑，可以抑制纯粹的操控。社会互动、彼此共享以及分散式协作生产，这些做法有自我纠错、知识积累的机制，这可以从维基百科中看到。⁷¹ 其实，根据我在前文所引的网易副总编的话，网易有名的“新闻跟帖”就是一个自我纠错的机制。其次，中国的网络公众是多元的，而不是同质的。知识分子、积极分子、妇女和提倡别样生活方式的人，分属不同的公众阵营，他们与商业公众并存。⁷² 这些公众可能有所重叠或彼此相连，但他们互不相同。驱动商业公众的利润原则可能不适用于其他的公众。比如，有些积极分子可能反抗和挑战网络的商业化，尽管他们行列中的有些人采取了市场化的策略。第三，就连报纸和电视公众也不像他们有时看起来的那样消极，⁷³ 网络公众更不至于如此。中国网络空间的抗争性表明，中国网民不但是文化消费者，同时也是积极的文化争论型公众。即使是常被不屑地说成沉迷于纯粹玩乐的网络游戏玩家，也可能成为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积极分子。⁷⁴ 哈贝马斯有关消费者的观点低估了消费者的批判力以及草根阶层和大众文化形式中蕴含的力量。最后，网络公众不只是在网络空间活动，网络抗争也没有取代其他形式的社会行动。线上和线下公众的互动创造了

一个联动机制，制约腐蚀性的商业影响。网络空间中受操纵的争议会受到这些不同群体的挑战。

□ 结论

本章阐述了中国网络行动与网络经济的关系。在这里，网络积极分子开始采用市场化的策略促进他们的事业。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网络经济体可以从网络抗争中获利，因为这些活动可以带来网络流量，从而带来利润。这一发现绝不意味着积极分子变得唯利是图，也不是说网络经济体利他地支持社会正义。但是，该发现却有几方面的意义。在纯经验层面上，它揭示了社会行动动态过程中的一些新模型，还揭示了现代中国抗争史上前所未有的在经济行为与社会行动之间存在的协作关系。

这一发现也提出了更大的理论问题。网络经济与网络行动之间的关系，是经济活动与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从理想形态来看，这一关系是互相嵌入、互相建构的。经济行为找到了社会基础，而社会行为产生了经济利益。如果这个观点说得通，那么它的意义将十分深远。它将意味着社会生产的逻辑比尤查·本克勒所说的信息经济的逻辑更重要。相反，这是卡尔·波兰尼所分析的嵌入性经济所有的前资本主义和前工业化的逻辑，该逻辑在新信息技术时代得到了复兴。本克勒的确提到社会生产逻辑不是全新的，但他所想的，不是波兰尼所分析的社会经济生产的前工业化逻辑，而是诸如现代科学这些领域中的累积性增长。总体而言，本克勒将它视为新逻辑：“我们从网络信息经济中看到的是它突然增长的重要性以及突然产生的信息集中。”⁷⁵他继续写道：

鉴于信息生产的物质条件和电子网络环境中的交往的特征，信息生产的社会实践本身具有可持续性。这些模式我们不太熟悉，它们在如何进行生产方面与我们的制度有所摩擦，与我们在20世纪建立起来的规范信息和文化生产的制度安排不断产生摩擦。⁷⁶

波兰尼认为，早期社会中的经济制度的特征是“没有基于经济动机之上的独立的、清晰的制度”以及“因循非经济动机运作”。⁷⁷他写道：

一般而言，一个人的经济浸染于他的社会网络之中，他的行动不是保护获得的物质产品上的个人利益，而是保护他的社会地位、社会诉求（social claims）和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产品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时，他才会珍惜那些物质产品。生产与分配的过程都不与附加于产品获得的特定经济利益相联，那一过程中的每一步都与一些社会利益相适应，而社会利益又确保必要的步骤得以践行。⁷⁸

因此，经济生产在那些社会里是一种社会生产，反之亦然。这两个过程是互相嵌入的，而不是彼此分离，这事实上是本克勒所分析的信息经济中的社会生产逻辑。如果这不是一个新逻辑，那么什么因素导致了它的复兴？诚然，新的技术形式非常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维基百科是成功的社会生产的典范，但它的成功应主要归功于社会因素，而不是技术条件。正如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所言，“我们也可以找到维基做不好的因素。如果有很多破坏者，抑或贡献者很困惑或经常出错，抑或人们就是不愿意免费贡献劳动，维基百科的成功就变得不可复制。”⁷⁹

桑斯坦没有解释为什么不存在这些不利因素，也没有解释什么样的有利条件创造了维基百科这样的成功故事。本克勒将这一成功归因于社会规范的存在，但没有解释这些规范最初是怎么形成的，也没有说明这些规范为什么在这一历史节点上以这种形式存在。我在前文和其他章节（特别是第七章）中讨论到的中国的经验表明，维基的成功，依靠的是社会性因素，而非经济性因素。在中国，这些因素部分是对纯粹工具理性、市场逻辑以及日益主宰社会的价值所做出的抵制。取而代之的是肯定共享社会伦理的实践。这种实践在网上和线下公民社会组织中均在发生着。这些实践不仅体现了非市场的逻辑，即社会生产的非专有化，同时也挑战了市场逻辑和私有的、以市场为中心的经济生产。

因此，新发现的有关网络经济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系，使我们得以窥见古

老关系的复兴，它体现了人类对古老关系的怀旧之情。这一关系的未来尚不明朗。哈贝马斯已经向我们展示，最初促进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产生的市场很快地渗透并腐蚀了公共领域。通过分析网络经济体操控网络抗争的可能，我在上文所作的分析也揭示了很多矛盾，但结果如何，并不是注定的。网络经济与网络行动将来的关系，将被新的历史条件所塑造。

本章分析对我们经常谈论的市场经济与民主的关系有重要意义。我的分析表明，这一关系是虚设的，至于原因，目前还知之甚少。哈贝马斯曾将民主界定为“一种有关整体的、公共的交往的固定制度形式，它解决这一实际问题：人们在控制能力日益增长的客观条件下，如何能够并且愿意生活”。⁸⁰对威廉姆斯而言，民主“不能被囿于简单的政治变迁”，而应是有关“开放社会和自由合作的个体的观念，只有这样的观念才能够把工作技术和交往的变迁中存在的创造性潜能释放出来”。⁸¹如果我们能够接受他们对民主的理解，那么市场行动只有在它满足了使个体发挥潜能的社会需求时，才能有助于民主的实现。市场与民主的关系必须被重新表述成一种社会关系，这是一种程度不同的相互嵌入的关系。有关市场与民主关系的批判理论所面临的任務，就是要分析什么样的条件导致社会的因素愈来愈被排除出市场与民主这一关系之外。

注释

- 1 如迈克尔·基恩 (Michael Keane) 所说：“擦边球在媒体与新闻界得到广泛的运用，它用来指代创造性的遵从。该词的意思来自乒乓球比赛，球擦到桌边就可得分。”参见：Keane, “Broadcasting Policy, Creative Compliance, and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796. 潘忠党将擦边球解释为“将球打到乒乓球桌最边角的地方，以合法地得分。”参见：Pan, “Media Change Through Bounded Innovations,” 105.
- 2 Barmé, *In the Red*, 188.
- 3 关于中国导演使用“中国禁”作为国际营销策略，彼得·洛尔 (Peter Loehr) 曾说：“我真的碰到一个经销商问我，是否可以将我们的电影说成禁片，即使它们没有被禁。”参见：Palmer, “Taming the Dragon.”
- 4 Kraus, *The Party and the Arts*, 133.
- 5 这是网站会提供电子邮件和网页空间等免费服务的原因。
- 6 尤查·本克勒最新的研究通过强调该经济是一个非市场的、非专有的社会生产，详细阐述了这一新经济的理论基础。参见：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 7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网络发展调查报告》，链接：www.cnnic.net.cn，获取日期：2008年3月27日。
- 8 可能出于这个原因，最著名的学术网站“思想的境界”，在2001年初由其主人李永刚（一位大学教授）自行关闭。主人自己的回应是他不能处理经营网站所需的数量巨大的工作。有关该案例的研究，参见：Zhou, *Historicizing Online Politics*.
- 9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将活跃的博客界定为至少平均每月更新一次的博客。
- 10 桑斯坦恩 (Sunstein) 观察到的在美国博客圈中存在观点极化的趋势，在中国网络空间中也同样存在。尽管桑斯坦恩对博客有所批评，但他承认博客“扩大了意见的范围”，而这是一个“很大的优点”。参见：Sunstein, *Infotopia*, 190, 191.
- 11 这一节的其他部分基于 Yang, “The Co-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414–416.
- 12 Dieter and He, “The Future of E-commerce in China.”
- 13 中国政府在2000年11月颁布的针对电子布告栏的规定，明确要求BBS应获得执业执照，用户要为其网上言论负责。这可能对新闻组和BBS的使用造成了负面的影响。有关中国网络规定的清单，参见：<http://www.cnnic.net.cn>。
- 14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3年1月，链接：<http://www.cnnic.net.cn/develop/2003-1>。
- 15 《政府网站何时活起来》，链接：http://www.gov.cn/news/detail.asp?sort_ID=7391，获取日期：2003年4月2日。
- 16 Zhang, “China’s ‘Government Online’ and Attempts to Gain Technical Legitimacy.” 对照杭州市的电子政府情况，参见：Hartford, “Dear Mayor”。
- 17 这些数字来自我在做网络民族志研究时所收集的数据。每天100,000个点击是2000年5月的数据，每天1000个帖子是2000年12月的数据。
- 18 该论坛的中文名叫“华夏知青论坛”。“知青一代有时被称为红卫兵一代或“文革”一代。它指的是在“上山下乡”运动中被下放到农村的一群人。这一运动从1968年开始，直到1980年被正式取消。参见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 (1966-1980)》。
- 19 Hartford, “Dear Mayor.” 有关电子政务，也见：Holliday and Yep, “E-government in China.”
- 20 2007年的一个调查报告发现，中国网络用户对政府网站的熟悉程度很低。参见：中国社科院报告，“2007年中国7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郭良主持，2007年10月。
- 21 对CCTV编辑的采访，2007年7月10日。
- 22 Tang and Parish, *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
- 23 Shi,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 24 参见：Davis et al.,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Davis, ed.,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 and Perry and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 25 中国政府在 2000 年 11 月颁布了一些有关网络的规定,其中包括对 BBS 的规定。参见:<http://www.cnnic.net.cn>。
- 26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 27 Mittler, *A Newspaper for China?*, 420.
- 28 Schudson, *The Power of News*, 21
- 29 Fouser, “‘Culture,’ Computer Literacy, and the Media in Creating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MC in Japan and Korea,” 271.
- 30 当我于 2000 年 12 月 20 日下载这些帖子时,它们存档于以下网址:http://202.99.23.237/cgi-bbs/elite_list?typeid=14&whichfile=12,该地址已经不复存在,这个集子由作者存档。
- 31 2000 年 5 月强国论坛号称拥有 3 万注册用户,每天平均有 1000 个帖子。截至 2003 年 4 月 2 日,强国论坛这一网络社区拥有 196,402 个注册用户。强国论坛中的讨论大多有关时事。论坛的开放有时限,每天从早上 10 点至晚上 10 点,它设有网络过滤器,有专门的管理员监测发帖。
- 32 一项网络调查的结果支持了这一发现。该调查显示,与报纸、电视和广播相比,网络被认为更有利于表达个人的观点。参见:郭良、卜卫,“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的调查报告”。
- 33 来自 2000 年 4 月 8 日强国论坛上的帖子,作者存档。
- 34 来自 1999 年 11 月 9 日强国论坛上的帖子,作者存档。
- 35 以下一则消息只是带有这类批判的众多例子之一:“强国能走到今天,一是人民日报的支持,二是网友的热情。任何人都应该盛气凌人,更不该高高在上。人是平等的,希望管理者和版主深思。……我们看惯了千篇一律的东西,应该了解从不同角度对某个事件的报道,这很正常,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能来强国的人都有能力鉴别,这一点水平每个网友都有。”
- 36 Schoenhals, ed.,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214.
- 37 Solinger,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250.
- 38 York, “Chinese ‘Nader’ Uses Detective Flair to Explore Products.”
- 39 Rosenthal, “Finding Fakes in China, and Fame and Fortune Too.”
- 40 据报道,王海曾与他的商业伙伴就网站域名的所有权有过争执。参见:“王海打假后院起火,昔日合作伙伴开打‘口水战’”,《北京晨报》,2004 年 5 月 24 日。
- 41 York, “Chinese ‘Nader’ Uses Detective Flair to Explore Products.”
- 42 王海、刘元、于今,《王海自己的故事》
- 43 Li and O'Brien,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31.
- 44 王云斌编著,《红客出击:互联网上没有硝烟的战争》。
- 45 彭苏,“网络造星的幕后推手”, 25。
- 46 Gluckman, “Ahead of the Curve.”
- 47 林木,《网事十年》。
- 48 引自:Farrer, “China's Women Sex Bloggers and Dialogic Sexual Politics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24.
- 49 Yardley, “Internet Sex Column Thrills, and Inflames, China.”
- 50 电邮访问某门户网站网编,2008 年 1 月 22 日。
- 51 同上。
- 52 网易是中国最重要的门户网站之一。
- 53 谭人玮,“纸老虎露原型”。
- 54 周不同,“网易借力‘华南虎事件’实现新闻采编突破”。
- 55 方是在 2007 年 6 月 29 日在北京举行的一个新媒体论坛上所作的演讲时阐述这些功能的。以上总结我在论坛期间所做的笔记整理而成。

- 56 获取日期：2008年2月10日。译者注：该帖由英文译回中文。
- 57 http://comment.news.163.com/reply/post.jsp?type=main&board=news_guonei6_bbs&threadid=3T7O5BOC0001124J&showdistrict=&pagex=52，获取日期：2008年2月15日。译者注：该帖由英文译回中文。
- 58 http://comment.news.163.com/reply/post.jsp?type=main&board=news_guonei6_bbs&threadid=3T7O5BOC0001124J&showdistrict=&pagex=56，获取日期：2008年2月15日。译者注：该帖由英文译回中文。
- 59 http://comment.news.163.com/reply/post.jsp?type=main&board=news_guonei6_bbs&threadid=3T7O5BOC0001124J&showdistrict=&pagex=12，获取日期：2008年2月15日。译者注：该帖由英文译回中文。
- 60 http://comment.news.163.com/news_guonei6_bbs/4448K2NV0001124J.html，获取日期：2008年2月15日。译者注：该帖由英文译回中文。
- 61 http://comment.news.163.com/news_guonei6_bbs/main/3T7O5BOC0001124J.html，获取日期：2007年11月26日。译者注：该帖由英文译回中文。
- 62 一个有关西方社会中的网络行动的文獻回顾表明，大部分网络行动涉及的是现有社会运动组织对网络的使用，参见：Garrett, "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lso see Earl, "Pursuing Social Change Online"; Earl and Schussman, "The New Site of Activism."
- 63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194.
- 64 同上 164。
- 65 芙蓉姐姐是由网络制造的另一名人。她的情况与天仙妹妹不同，因为她自己就是一个精明的网民。她之所以成名，是因为她通过不断地在网上贴一些不太好看的照片，并且不停地发表有关自己美貌与才智的自恋评论，从而给人留下一个滑稽的形象。
- 66 彭苏，"网络造星的幕后推手"，24。
- 67 Ferry, "Marketing Chinese Women Writers in the 1990s, or the Politics of Self-Fashioning."
- 68 McDougall, "Discourse on Privacy by Women Writers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China," 111.
- 69 同上，113。
- 70 同上，111。
- 71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也见 Sunstein, *Infotopia*.
- 72 同性恋公众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参见：Ho, "The Gay Space in Chinese Cyberspace."
- 73 有关早期中国大众媒体的一个道德公众 (moral public) 如何被激活的精彩历史分析，参见：Lean, *Public Passions*.
- 74 我收集到的一个案例，是有关游戏社区联盟开展的网络请愿活动。参见：<http://bbs.boxbbs.com/articles/2024965.html>，获取日期：2007年12月21日。
- 75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63.
- 76 同上，57-58。
- 77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49, 48.
- 78 同上，48。
- 79 Sunstein, *Infotopia*, 195.
- 80 Habermas,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57.
- 81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121.

网络公民社团

组织在集体行动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但每个组织拥有的资源差别很大。制度化的公民社会组织在当今很多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中国却基本上长期缺席，直到近些年才出现。¹从红卫兵运动到1980年代末，学校和工作单位是运动组织最重要的社会基础，²积极分子将国家设计的组织结构转化为运动动员的资源。虽然独立的运动组织在这些运动期间出现过，但都是稍纵即逝。合法的、国家体制之外的组织基础得不到发展。在1980年代，社会组织得到迅猛发展。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这样的组织发展说明，社会组织基本上由国家资助，它们只能通过体制内的活动，寻求社会与政治的变革。³

1990年代初期，自愿组织开始复兴，新型草根公民社团的出现标志着这一时期发展的新方向。与1980年代社会组织相比，⁴这些新组织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⁵它们在形式上更加多样，有经官方注册的公民组织、非正式的草根社团、学生社团、娱乐俱乐部、互助型团体（support group）以及随着网络传播而产生的电子组织形式，比如网络社区。

本书研究两种形式的新公民社团：公民社团和网络社区。第一种主要是线下组织，第二种主要（但不是完全）依靠网络而运作。在这两种类型的社团与网络行动的关系上，有两组不太相同的问题。对网络社区而言，主要的问题是：人们为什么加入社区？它们如何制造抗争？我将在下一章回答这些问题。本章主要关注公民组织，并探讨（1）它们在何种程度上将网络纳入自己的议程；（2）组织和技术之间相互建构的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公民组织的网络能力（internet capacity）和网络使用情况有个基本的了解。首先这些组织能否上网？它们在日常运作中如何使用网络？网络使用给组织发展带来什么影响？我将用在2003年10月到2004年1月搜集到的调查数据回答这些问题。

这次调查有四个发现：首先，城市草根组织网络能力最低；其次，对这些组织而言，网络最大的用处在于信息公开、信息传播、联系同类组织和国际组织；第三，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组织、刚成立的组织、在北京的组织比商业协会类组织、老牌组织和北京之外的组织更经常使用网络；第四，网络设备简单的组织比设备更好的组织更经常使用网络。这些发现意味着网络对那些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相对新型的组织尤其具有吸引力，同时也意味着公民社会“网”已经在中国出现。在调查分析之后，我将介绍四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环保群体，说明草根公民组织如何利用网络寻求社会变革与组织发展。

□ 信息与社团的双重革命

当网络开始在中国流行之时，另一社会潮流的势头也逐渐增强，即自愿社团的复苏。在1980年代，社会组织已经迅速增加，但在1989年之后，新成立的组织的数量急剧下降。⁶而且，1990年代自愿组织的复苏有些新的特征，其中最重要的特征是以社会服务和社会变革为目标的组织的大量涌现。裴敏欣在其研究中发现，虽然1980年代商业与行业协会非常发达，但那时有关公共事务的组织却非常缺乏。⁷裘德·豪威尔（Jude Howell）观察到，从1990年代早期到中期，有“一股公民社会的新风”，为农民工和艾滋病病人等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社团得到了迅速发展。⁸她总结道，用来分析中国公民组织的法团主

义框架已经无法抓住中国公民组织“日益多样与分化的事实”。⁹这一观点在其他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也得到支持。有研究认为这类组织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相对于国家的自主性。¹⁰另有研究显示，农村的非政府组织与“国家法团主义”模型中的组织不同，它“既不是中央政府也不是地方政府的傀儡”，而是“真正的民间组织，是由当地社区创建并为社区利益服务的。”¹¹环保 NGO 的出现进一步证明这股“公民社会新风”的兴起。¹²

网络的出现在中国开启了信息革命，而新型自愿社团的兴起标志着社团革命的开始。¹³从表面上看，这两个现象不一定有联系。不管有没有现代交通和通讯工具，人们向来都有结社的行为。网络真的重要吗？

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公民社会行动者较早开始使用网络，因为网络文化与公民社会文化有着高度的选择亲和性 (elective affinity)。¹⁴有人认为，作为公共产品的横向交流与信息共享，是公民社会组织使用新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两个显著特征。¹⁵有关使用新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社会科学研究支持了如下假设：公民社会组织欣然接受网络，是因为它是一种既用得起又有效的通信技术。有学者发现，使用这些技术会导致信息流和社会关系的重组。¹⁶还有学者指出，在东欧这样的转型社会中，公民社会使用新信息与通讯技术导致了组织的创新。¹⁷此外，学界也关注公民社会组织如何运用网络促进他们的社会事业。¹⁸这些研究传达的一个共同信息是：网络对公民组织很重要。技术变迁可以为组织发展和制度转型提供新的机会和资源。

因此，当今社会科学研究将影响公民社团网络使用的组织与生态因素考虑到研究框架中。这类研究通常假定公民社团在开放而民主的环境中运作，同时假定网络也在同样开放而民主的环境中运作。然而，这两个假定在中国都不成立，因为网络和公民社团在中国都受到控制。那么，中国的政治环境如何塑造网络与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

政治是中国公民社团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事实，它通过两个机制影响公民社团。一个机制是为公民社团建立一套游戏规则，包括一般性的和具体的规则。最神圣的一般性规则是我在第二章提到的“政党至上的原则”。这一原则有利于理解中国公民社团面临的政治挑战。用稍微不同的方式来说，它意味着中国

允许公民社团的发展，但他们不能挑战党与国的合法性。当公民社团被认为危及党与国，对它们的管制就会收紧。

实质上，“政党至上”的原则将所有公民社团置于相对于党与国的从属地位。在实践中，它转化成管理公民社团的国家法团主义框架。国家法团主义的观点认为，国家允许社会组织（如 NGOs）的发展，只要它们经过国家批准并服从国家在它们选择领导和表达需求方面的控制。¹⁹1995年，昂格尔和陈佩华(Unger and Chan)通过观察社会组织在1980年代的发展，有力地阐述了有关中国社会的国家法团主义视角。²⁰但是，自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资金来源、员工任免和行政管理上独立于国家的新型公民组织出现了。²¹尽管公民社团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从属与支配的关系，但这一关系的内容和动态过程变得更为复杂。

首先，正如我在第二章所说的，国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有着多层党政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复杂系统。它不仅面临来自政策执行上的巨大挑战，而且还面临党内和政府内部利益矛盾和部门之争。比如，国家环保总局可能因为环境原因而不批准某一建坝项目，但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则可能给该项目开绿灯，因为发展经济是它的首要目标。另外，中国政治有很多非正式的方面，国家官僚机构经常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²²中国国家的异质性以及中国政治的非正式特征，为公民社团提供了发展机会。比如，环保 NGO 发现国家环保总局的一些官员可以成为它们强大的同盟，而国家环保总局的官员则经常依靠环保组织，在一些因为考虑到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关系而不愿公开发表意见的议题上发出声音。

其次，中国公民社团不独立于党与国，党与国本身也不是说就不受外界影响。在1990年代，这些外在因素包括社会本身、全球化、市场和信息革命。比较政治学者认为，“社会对国家的影响与国家对社会的影响一样大，甚至可能更大”。²³第三，公民社团本身是有策略的行动者。作为一个不稳定的、新兴领域中的从属性群体，“它们尽可能地运用制度所提供的机会，摆脱地位牢固的领域中支配群体的控制”，从而“保持它们群体的团结和对挑战权力的希望”。²⁴它们可以策略性地使用同党与国的关系，与国家谈判，寻求组织的发展。²⁵

另外，它们可以动员其他的资源，促进组织的发展。

□ 社团对网络的使用

对中国公民社团而言，它从属于国家的地位导致了一个情况：它们必须从其他社会领域中寻求同国家谈判的资源和支持。因特网是一张富有信息与交流的巨网，它是公民社团可能获得力量的新领域。尽管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研究中国的网络，却很少有人关注公民社团对网络的运用。²⁶

为了了解公民社团在电脑设备及电脑使用方面的情况，即它们的网络能力和网络使用情况，在戴建中教授的支持和帮助下，我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1月对城市民间社团做了一次调查。²⁷因为在调查期间农村地区还很少有人使用网络，因此主要关注城市的组织。我对国际电信联盟使用的衡量国家电信技术发展的指标体系加以改进，用来测量网络能力。²⁸该信息化指标体系将信息技术同电话和手机相区分，用个人电脑台数、电脑主机数²⁹和网络用户数来测量国家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将该指标体系用于组织层面，设计了4个指标来衡量组织的网络能力，即电脑台数，主机数，电脑台数与员工数之比、电脑主机数与员工数之比。³⁰我的调查样本包括550个组织，问卷回收率是25%，最后获得138个公民组织的有效样本。通过对问卷数据的初步判断，我发现8个极端案例，并将它们从样本中删除。³¹剩下的129个案例是我进行分析的基础。这129个案例包括了公民社团的主要类型，即（1）商业社团；（2）环保组织；（3）妇女组织；（4）社会服务、健康与社区发展组织；以及（5）其他（如宗教与文化组织）。数量最多的是商业社团这一类，在129个组织中占了56个，这反映了公民社团发展的大趋势。商业社团主要是行业协会和商会。该样本还有16个环保组织，占样本的12%，比例相对较高，这也反映了1990年代的新趋势。

样本中的组织的历史都比较短，大部分创建于1990年代。截至2003年，它们的平均组织年龄是9.5岁。在122个有年龄信息的组织中，82个（67%）是在1991年及之后创建的。只有7个组织是在1984年及之前建立的。大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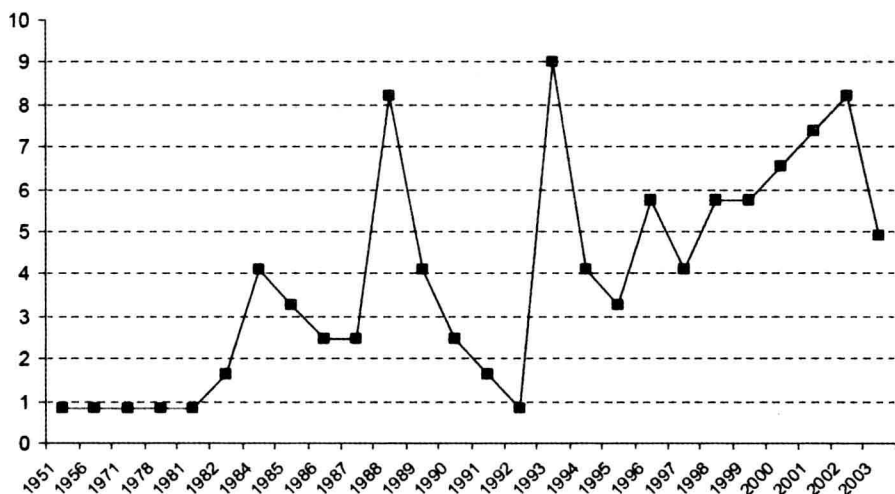
表 6.1 不同类型公民社团的组织年龄和全职员工数
(2003 年 12 月)

组织类型	在 2003 年的组织年龄 (均值)	全职员工数 (均值)
社会服务、健康、 社区发展	7.8 (n=36)	10.1 (n=33)
妇女	7.6 (n=8)	8.3 (n=7)
环境	7.3 (n=16)	7.2 (n=13)
商业社团	11.3 (n=53)	9.3 (n=53)
其他 (宗教、 文化、教育等)	11.8 (n=9)	5.4 (n=8)
合计	9.5 (n=122)	9.0 (n=114)

组织规模都不大, 平均有 9 个全职员工。在 112 个有注册信息的组织中, 100 个组织经过了官方的注册, 占样本的 89%; 12 个 (11%) 组织未经注册。表 6.1 显示的是不同类型组织的平均年龄和全职员工数。

我的调查发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公民社团增长的 3 个高峰期, 分别是 1988 年、1993 年和 2000—2002 年。122 个组织中有 10 个创建于 1988 年, 11 个创建于 1993 年, 还有 27 个建于 2000—2002 年。这些组织占了样本的 39%。第一个增长阶段与裴敏欣的研究发现一致。裴研究的是 1979 年到 1992 年这段历史, 他发现在 1981、1988 和 1989 这 3 年中, 新成立的社团在数量上有明显增加, 而在 1983 年和 1990 年, 则明显下降。³² 裴观察到的社团创建的第一波浪潮在我的研究中没有得到反映, 但我的样本很好地反映了裴所说的第二个增长阶段 (1988 和 1989 年)。另外, 我的样本抓住了 1992 年 (也就是裴的数据的截止年份) 之后的一些新趋势。如图 6.1 所示, 新创建的公民社团数在 1993 年再次出现增长, 这一增长在整个 1990 年代一直保持强劲的态势, 直到 2002 年达到顶峰。这一特点与王绍光和何建宇的一个研究发现相似。³³ 与他们的研究不同的是, 王与何观察到的在 1990 年代中期和 21 世纪初期出现的新建组织数的锐减, 在我的研究中出现得稍晚一些。这可能是因为我样本包括 12 个 (11%) 未注册的组织, 而王与何的研究样本只包括注册组织。正如王与何所说, 中国政府在 1998 年实行了更加严厉的社团更新与登记标准, 这

图 6.1 中国公民社团创建的情况
1951—2003(%, n=122)



可能导致注册组织的下降，但却不一定会影响到非注册组织。

关于 1988 年和 1989 年出现的公民社团的急剧增长，裴敏欣归因于 1988 年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³⁴ 裴还发现，在公民社团的所有类型中，行业协会和商业社团在数量上增长最快，这反映了市场改革的深化。我们的样本反映的第一波公民社团数量的增长，其原因也是裴所指出的结构因素。在我们的样本中，那些创建于 1988 年的社团与裴的样本中的社团处于同样的政治环境之中。另外一点和裴的研究相似的是，1988 年创建的商业社团的数量相对比较多：10 个组织中有 6 个是商会。

平均而言，在我的样本中，非商业类社团的历史比商业类的短，它们更有可能是在 1990 年代及之后创建的。裴的研究发现，虽然在 1980 年代商业和行业社团得到了繁荣发展，但那时与公共事务相关的组织却十分缺乏。³⁵ 裘德·霍威尔观察到，从 1990 年代的早期一直到中期，中国公民社会的显著发展体现在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的社团的快速发展上。³⁶ 我的研究支持了裴敏欣与霍威尔的发现。

几个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可以解释 1993 年新公民社团在数量上的猛增和之

后相对稳定的增长。从国际方面看，1995 年在北京召开的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对中国 NGO（特别是妇女组织）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³⁷ 另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国际 NGO 在中国开展活动。例如，裘德·霍威尔认为：“在中国，外部机构在培育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方面的作用，比原先理解的要大得多。”³⁸ 基斯、林和黄（Keith, Lin, and Huang）也同样指出，与国际 NGO 的联系对本土 NGO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³⁹

从国内方面看，正如霍威尔所言，1992 年以来对市场改革的深化，使社会主义福利制度终结，从而产生了大批急需社会支持的边缘人群。⁴⁰ 这一结构变迁，迫切需要新型社会服务组织的出现。对占据 12% 样本数的环保群体而言，我们还要补充的一点是，1990 年代市场改革的加快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恶化。草根环保组织的出现，至少部分是对中国环境危机的回应。另外，与公民社团复兴并行的网络的发展，也是一个有利条件。从下文的分析可以看到，网络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工具；它对资源贫乏的弱小组织而言，是策略性的资源与机会，可以帮助这类组织在约束性的政治环境中得以生存。

□ 社团的网络能力

要使用网络必须有电脑等基本设备。虽然很多观察家认为，在很多工业社会，联网对公民社会组织来说已经不再是个主要问题；⁴¹ 但对发展中国家的组织而言，仍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电子鸿沟依然是很大的障碍。中国有很大的网络用户群，但相对于人口总数而言其数量仍很小，调查时只有 10% 的人口可以上网，大部分人被网络时代抛在后头。⁴² 因此，要想了解中国的公民社团如何使用网络，必须首先了解它们的基本网络能力。

我们的调查显示，中国公民社团有最低水平的网络能力。平均而言，每个组织约有 6 台电脑，其中有 5 台联网。在联网方式上，119 个组织中有 43 个（36%）使用拨号，52 个（43.7%）使用宽带，还有 24 个（20%）同时使用拨号和宽带。在 129 个组织中，只有两个组织没有电脑。约有一半（60 个）组织有 3 台或 3 台以下的电脑，22 个组织（12%）只有一台电脑。表 6.2 显示的是中国公民社

表 6.2 中国公民社团拥有的电脑台数和电脑主机数
(2003 年 12 月)

电脑台数	组织数 (n=129)	电脑主机数	组织数 (n=117)
0	2 (1.5%)	0	2 (1.7%)
1	22 (17%)	1	35 (29.9%)
2	20 (16%)	2	19 (16.2%)
3	16 (12.4%)	3	12 (10.3%)
4	11 (8.5%)	4	11 (9.4%)
5	8 (6.2%)	5	4 (3.4%)
6	6 (4.7%)	6	4 (3.4%)
7	5 (3.9%)	7	4 (3.4%)
8	7 (5.4%)	8	10 (8.5%)
9	5 (3.9%)	9	3 (2.6%)
10 个以上	26 (20.2%)	10 个以上	14 (12%)

团拥有的电脑台数和电脑主机数。

电脑台数与电脑主机数相对于员工人数的比例较低。平均而言，大约两个全职工作人员共用 1 台电脑或电脑主机。如果将兼职工作人员考虑进来，比例就更低。样本中的社团平均有 9 名全职工作人员，如将全职和兼职工作人员相加，每个组织大约有 19 名工作人员。这意味着平均有 3 个以上的工作人员（全职与兼职）共用 1 台电脑，每 4 人共用 1 台主机。这比当时全国网络主机数与网络用户数的比例还要低。从全国层面看，那些每周至少上网一个小时的用户，每 2.5 人共享 1 台电脑。⁴³

中国公民社团的网络能力，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公民社团相比，大体相似，但落后于发达国家中的组织。马克·瑟曼 (Mark Surman) 在 2001 年编撰的数据显示，截至 2000 年，英国 97% 的自愿组织和小型商业组织已经拥有网络连接，87% 的美国自愿组织办有网站。⁴⁴ 尽管瑟曼没有提供具体的电脑或电脑主机数，他用是否拥有没过时的电脑和是否有拨号或高速网络连接来衡量组织的网络使用情况。他所研究的自愿组织使用网络的比例之高，使他得出一个结论，“网络连接和使用对大部分自愿组织而言不再是个主要问题”。⁴⁵

有关拉美、非洲和东南欧的自愿组织的研究显示，这些地区自愿组织的网

络能力低于美国和英国的同类组织。比如，一个有关 100 个阿根廷、巴西和墨西哥的促进性别平等组织的研究发现，三分之一的组织没有电脑、或只有一台电脑、或使用家庭电脑工作，42% 的组织的电脑没有联网。⁴⁶ 一项对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市 78 个公民社会组织信息与通信技术使用情况的研究发现，只有三分之一的组织有网络连接，每个组织平均有 5 台电脑。该文也对乌拉圭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市 60 个 NGO 做了研究，发现 87% 的组织至少有一台电脑，60% 的组织有网络连接。⁴⁷ 最后，在 2001 年开展的对东南欧 6 个地区的一项研究发现，尽管整个东南欧信息与通信技术能力表现得很不平衡，但样本中几乎所有的 NGO 都至少有一台电脑，尽管只有 9% 的组织有主页。⁴⁸ 相比之下，中国公民社团的网络能力既不名列前茅，也没落后太多。中国公民社团拥有了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公民社团相当的最低限度的网络能力。

□ 联网状况与常用的网络服务

中国公民社团既然拥有最低限度的网络能力，那么它们是如何运用电脑的？联网情况如何？什么时候开始上网？有没有主页，什么时候建的主页？它们常用的网络服务是什么？我们的调查显示，中国公民社团的联网水平就其网络能力而言非常高。截至 2003 年 12 月，在 129 个组织中，106 个（82%）组织能够上网，69 个（65%）组织有网站。如图 6.2 所示，大部分组织是在 1998 年到 2004 年间开始上网的，1998 年经历了第一个增长高峰，接下来每年保持稳步增长。在 106 个联网的组织中，只有 8 个是在 1995 年和 1997 年间开始上网。网站创办的情况也相似。只有两个组织是在 1997 年前建立网站，网站创办在 2000 有个跳跃发展，86%（59 个）的组织是在 2000—2003 年间创办了网站（参见图 6.3）。自然，网站创办要比组织的最初联网晚一到两年，这说明组织并不是一联网就开办网站。

与公民社团联网和创办网站平行发展的，是网络在全国范围内的扩散。虽然中国在 1994 年已联网，但大约到了 1998 年，网络才获得广泛的运用。1994 年，

图 6.2 历年公民社团联网情况
1995—2003(%, n=1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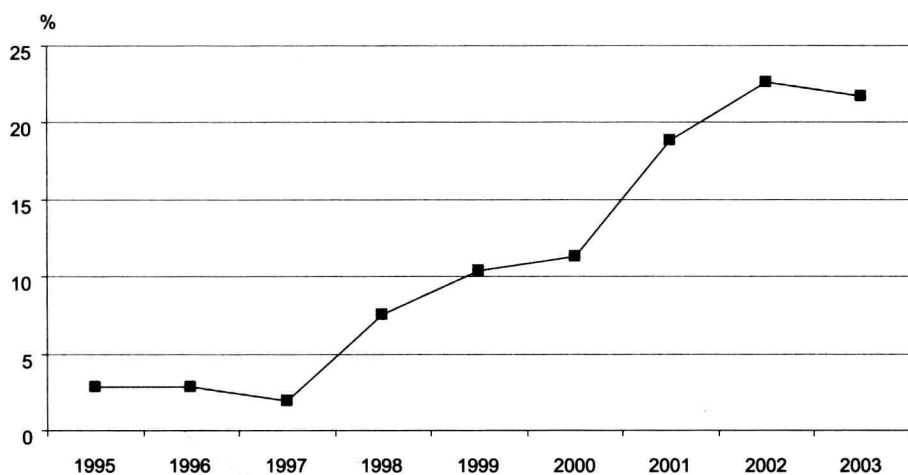


图 6.3 创办主页的中国公民社团
1996—2003(%, n=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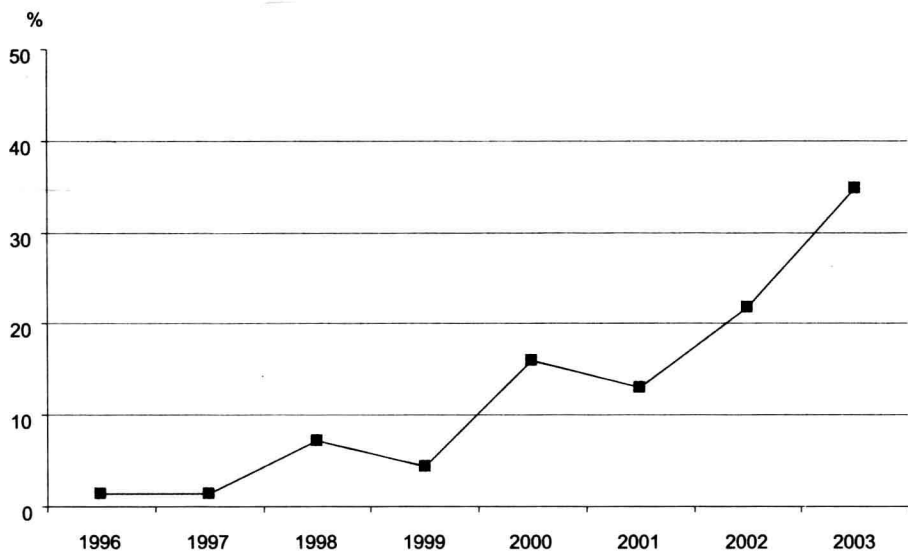


表 6.3 中国公民社团最常用的网络服务
2003 年 12 月 (多选, %)

电子邮件	95.5
搜索引擎	58.9
主页	47.7
电子通讯	25.0
BBS	14.3
视频会议	2.7

中国只有一万个网络用户,而在 1998 年 12 月,网络用户的数量超过了 200 万,网络主机数达到 70 万。因此,网络得到了加速发展。在 1997—2004 这 8 年间,电脑主机数和网络用户数在 1999 年和 2000 年出现了最显著的增长。⁴⁹

因特网有多种网络应用。其中,电子邮件是中国公民社团最常用的,接下来是搜索引擎和网站。如表 6.3 所示,电子通讯和 BBS 也经常被用到。被调查的组织中有 25% 经常使用电子通讯,而有 14.3% 的组织经常使用 BBS。瑟曼在此前提到的报告中发现英美非盈利组织很少使用这类论坛,⁵⁰ 而中国公民社团则较多使用 BBS,这是值得注意的差别。对英国自愿组织利用网络情况做过几项研究的埃莉诺·伯特 (Eleanor Burt),对我的调查显示的中国公民社团有“相对较多的网络讨论”感到吃惊,指出“网络讨论在英国自愿部门中发展得很慢”。⁵¹

公民社团使用网络服务的类型与全国个体网络用户的使用类型相似。如表 6.4 所示,从全国情况来看,个体用户也同样偏好电子邮件和搜索引擎。这清晰地表明,自愿性和非营利性部门的网络能力和网络使用,与国家网络发展的总体水平相关。国家网络发展是重要的前提条件。另外,公民社团的网络使用可能反映了全国的网络文化。因此,如果说 BBS 论坛在中国公民社团中比在发达国家的社团中更受欢迎,可能是因为中国的 BBS 文化更活跃。确实,我自己所作的网络民族志研究显示,公民社团运作的 BBS 论坛和在全国受欢迎的论坛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互生互补 (crossfertilization) 的关系,这两个类型的论坛之间互相转载消息是常有之事。⁵²

表 6.4 中国网民最常用的网络服务
2003 年 12 月 (多选, %)

电子邮件	88.4
搜索引擎	61.6
浏览网页	47.2
BBS、社区、新闻组	18.8
免费个人主页	5.0
电子杂志	3.9
视频会议	0.4

来源：中国互联网络调查中心报告，2004 年 1 月

□ 网络在组织活动中的作用

拥有相对较高水平的网络连接和网络使用，中国公民社团是否利用网络从事核心的组织活动？什么网络服务用于何种活动？网络对完成各种组织任务有多重要？

在这些问题上，我收集了定性与定量两类数据。问卷的一个问题要求被调查者回答网络对他们组织是否具有特殊意义以及有什么意义。难能可贵的是，40 个组织对这一问题提供了书面回答。虽然大部分评论都很短，但都一致肯定网络对他们组织的重要性。以下是一些回答的例子：

“是的，网络是加强合作与沟通的重要工具。”

“低成本、宽接触、方便。”

“网络对我们组织的发展很重要。它可以被用来联系和理解外部世界，缩短距离，扩大我们的视野。”

“对残疾人而言，网络是交往与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途径。”

“是的。它提高了我们的社会影响力。”

“是的。它加快了信息交流，促进同海外组织的互动。它节约了时间和成本。”

表 6.5 调查问题：总体而言，网络在您的组织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2003 年 12 月（5= 最重要，1= 最不重要）

组织发展	4.1
组织活动	3.97
同国际组织互动	3.87
同国内组织互动	3.86
同政府机构互动	3.53
招募成员	3.07
募捐	2.99

“是的。它缩短我们同其他组织的距离，促进了互动，加快了信息流通。”

定量数据支持了这些评论所传递的信息，但对网络在不同的组织任务中的作用，呈现了更具体的信息。表 6.5 显示，网络对“组织发展”和“组织活动”最重要。对构建交往网络也很重要，尽管在这一点上有些有趣的不同。网络对与同类组织或国际组织互动比同政府机构的互动重要，这说明网络更多地用于水平交往。这意味着，对中国公民社团而言，网络不是一个同政府官员交往或游说政府官员的有效方式，但可能是动员同类社团和国际组织的有效手段。

主页的使用呈现出同样的特征。当被问到使用主页的目的是什么时，超过 90% 的组织选择了“宣传组织”，超过 70% 的组织选择“宣传法律、法规和其他信息”以及“与国内组织沟通”，接下来的两个选项是“与国际组织沟通”和“与政府机构沟通”（参见表 6.6）。值得注意的是，更多组织将主页用于网络讨论，而不是募款或招募成员。网络对成员招募与募款的作用最小。

显然，网络对不同目的的重要性不同。它是传统交往方式的补充，而不是替代，这一点在组织被问到如何发布有关活动与招募信息时表现得更加突出。如表 6.7 所示，发布招募信息最常用的方式依次是熟人、电话、组织宣传、网站和电子邮件。

表 6.7 显示，传统大众媒体（报纸、电视和广播）似乎最不常被用于招募

表 6.6 中国公民社团对主页的主要用途
2003 年 12 月 (%)

宣传组织	90.9
宣传法律、法规和其他信息	75.8
与国内组织沟通	74.2
与国际组织沟通	45.5
与政府沟通	33.3
网络讨论	24.2
招募志愿者	10.6
募款	6.1

表 6.7 中国公民社团公布信息的几种方式
(2003 年 12 月)

公布招募信息的主要方式 (n=127, %)		公布活动的主要方式 (n=127, %)	
熟人	36.0	电话	68.5
电话	30.6	电邮	41.7
组织出版物	24.8	组织出版物	39.4
网站	19.2	公共展示	33.9
电邮	18.4	网站	26.0
报纸	16.8	报纸	15.7
公共展示	13.6	杂志	16.5
杂志	9.6	熟人	11.8
电视	8.8	电视	11.0
广播	4.8	广播	7.1

和公布活动信息。一个明显的原因是在大众媒体上投放广告花费巨大。表 6.7 还显示，在公布招募信息方面，面对面交流和电话交流明显比基于网络的交流更常用，即使电子邮件在公布活动消息时变得更加重要。这意味着，网络对组织宣传与信息发布可能特别重要，但对涉及诸如成员招募这种人际关系方面的活动，传统的交流方式可能更合适。当然，这不是说网络无助于人际交往。BBS 论坛的受欢迎表明，很多这样的互动发生在网上，但网络互动通常是匿名

的，因此不同于面对面互动或电话互动。

从总体上看，我们的调查显示，网络在同国际组织互动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特别值得重视，因为前面提到，国际组织在中国新型公民社团的发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如果国际组织明显地促进了中国公民社团的发展，那么我们应该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存在较多的交往。网络服务的技术特征促进远距离的交流。中国公民社团是否利用网络同国际组织进行沟通？如果是的话，有哪些互动？

调查显示，在 126 个组织中，有 90 个（71%）称与国际组织有联系。51 个组织联络的国际组织少于 5 个，28 个组织称与 6—10 个国际组织有联系，7 个组织同 11—30 个国际组织有联系。中国公民社团与国际组织的联系有多种目的，如信息交流、项目合作、互访和咨询。在 90 个组织中，71 个组织称信息交流是它们同国际组织交流的主要方面，68% 的组织选择了“项目合作”，48% 的选了“互访”，还有 26% 的组织选择“咨询”。按重要性从高至低的顺序，同国际组织沟通的主要方式分别有电子邮件、传真、电话和平信。⁵³ 这与公民社团同国内同类组织沟通方式的重要性形成有趣的对比，国内交往的情况是：电话是最重要的交流方式，其次是电子邮件，传真居第三，最后是平信。⁵⁴ 电子邮件对国际交往的重要性可能是由于它的速度、便捷和低成本。

□ 网络能力和网络使用的变化

我在前面已经讨论了中国公民社团在网络能力和网络使用方面的总体特征。我将样本按组织类型、地域和组织年龄进行分类后，不同组织在网络能力和网络使用上就表现出差异。在样本中，商业组织占了 43%（在 129 个组织中占 56 个），其他类型的组织有环保组织、妇女组织、健康组织、社会服务与社区发展组织、文化与教育组织。在这些其他类型中，我们的数据库在每一类型上只有很少的样本数，因此，我将样本按组织类型分为两大类：商业社团和非商业社团。同样，我们的数据库含有 71 个北京的组织，样本中其他各个省和地区都只有很少数量的组织。因此，我按地域将组织分为两类：北京（n=71）

表 6.8 不同类型、地域和年龄的组织网络能力和网络使用
(2003 年 12 月)

	均值	组织类型		地域		创建年份	
		商业 n=56	其他 n=73	背景 n=71	其他 n=58	-1990 n=40	1991+ n=82
电脑台数 (均值)	5.86	6.16	5.63	7.01	4.42	5.93	5.46
主机数 (均值)	4.47	5.08	3.98	5.54	3.13	4.42	4.12
全职员工数	8.97	9.34	8.66	9.8	7.92	9.23	8.36
员工 / 电脑	1.53	1.52	1.54	1.4	1.79	1.56	1.53
网站 (占组织总数的百分比)	62	58	66	66	57	57	62
网络在组织发展中的地位 (最大 =5)*	4.21	4.00	4.37	4.26	4.14	4.11	4.23
网络在组织活动中的作用	3.97	3.78	4.11	3.97	3.98	3.89	4.01
网络在同国内组织沟通中的作用	3.86	3.52	4.1	3.88	3.84	3.78	3.88
网络在同国际 NGO 沟通中的作用	3.87	3.35	4.25	3.78	3.98	3.79	3.89
网络在同政府沟通中的作用	3.53	3.63	3.46	3.70	3.30	3.72	3.37
网络在成员招募中的作用	3.07	3.05	3.08	3.19	2.89	2.93	3.08
网络在募款中的作用	2.99	2.28	3.50	2.67	3.41	2.83	3.00

* 调查问题：“总体而言，网络在你们组织中发挥了什么作用？”

和其他 (n=58)。我同时将组织分为成立于 1990 年及之前和成立于 1991 年及之后。分析的结果显示在表 6.8 中。

表 6.8 揭示了三个有意义的模式。首先，商业社团的网络设备好于非商业社团，但它们对网络的运用没有后者多。平均而言，商业社团比非商业社团拥有更多的电脑和电脑主机，但只有 58% 的组织有网站，而相比之下，66% 的非商业组织有网站。对商业社团而言，除了一个方面，网络在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都相对较小。在同政府沟通上，网络似乎对商业社团比其他社团重要。不过，这可能只是反映了另一个现象：商业社团比非商业社团在任何活动上都与政府有更多的互动，包括了基于网络的互动。调查的另一个发现证实了这一点：75% 的商业社团表示它们经常与政府部门互动，而只有 62% 的非商业社

团这样做。

其次，老牌组织（即创建于1990年及以前）比年轻组织网络能力强，但使用的却更少。和商业社团一样，网络对老牌组织各个方面的作用都比较小，除了一个方面。老牌组织更经常使用网络同政府沟通，这再次反映了上文提到的事实：老牌组织只不过是任何方面与政府的互动都比较多，不管是电话还是电子邮件。91%的创建于1990年及之前的组织称其经常同政府机构沟通，而相比只有59%的创建于1991年及之后的组织这样做。⁵⁵

第三，北京的社团拥有较高的网络能力。它们平均每个组织拥有7台电脑，比不在北京的组织至少多出2台。总体而言，与其他地区的组织相比，网络在各项活动上对北京的组织更重要，但差异不甚明显。

对于这些差别，我们可以作出几个初步的解释。首先，组织的宗旨可能影响它对网络的使用。非商业组织（如妇女或环保组织）大部分是为了推动社会变革，而商业社团大部分是为成员的利益代言。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组织需要接触更广泛的公众，它们必须动员大量的公民。另外，它们的很多活动（比如环境教育）是为了向一般公众传播信息，网络则提供了容易获得的、省钱的工具。出于这些原因，非商业社团比商业社团更多地使用网络，即使商业社团有更高的网络能力。

老牌组织的设备比年轻组织的好，但它们更少使用网络，这一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以上结论。因此，资源不是影响网络能力和网络使用的决定性因素。拥有良好网络资源的组织，并不一定会很好地利用。资源贫乏的小组织，虽然设备简陋，但可能会更好地利用现有的资源。这一发现与我们的直觉相反，但却不难理解。致力于社会变革的、资源贫乏的草根组织，在拥有最低程度的网络能力之时，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网络。相对于更成熟、资源更丰富的组织，网络对小组织而言是更重要的资源。实际上，网络不再是一般性的资源（如办公空间），而是能生成资源的资源（resource-generating resource）。利用网络与国际组织进行沟通、传播信息、组织活动，是一种提高组织能见度、影响力和社会资本的重要方式，而之后这些资源可能促进其他类型资源的生成，如项目资助与人员招募。

除了组织宗旨，网络文化和组织文化也影响到组织的网络使用。一般而言，公民社团的网络能力和网络使用水平应该反映一般的网络文化，网络文化更发达的城市中的公民社团更有可能使用网络。因此，网络对北京地区的公民社团比对其他地区的公民社团发挥的作用略微大些，这或许部分因为北京有更发达的网络文化和更大的网络人群。2003年12月，也就是我们开展调查的时间，北京在中国所有城市中拥有占总人口比例最大的网络人口（28%）。另外，四分之一的.cn域名是在北京注册的，中国595,500个网站中有五分之一集中在北京。⁵⁶ 这些因素对那里的公民社团的网络使用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至于组织文化，组织理论假定，组织变迁的可能性随着组织年龄的提高而降低。⁵⁷ 因此，成熟组织在采用新技术上可能会遇到困难，因为这些技术需要新的组织能力。⁵⁸ 也有人认为，“组织在其创建过程中可能采用重要的技术”。⁵⁹ 这些理论视角可以部分地解释我的样本中老牌组织为何虽然拥有更好的设备，但更少使用网络。也许它们有资源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缺乏使用新技术的创新冲动。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他们是较成熟的组织，因而比起年轻组织来，不那么迫切地需要使用新技术。

□ 网络使用的障碍

中国公民社团在使用网络时面临很多挑战。有些挑战是中国所有网民（个体用户或组织用户）都要面对的，有些则是公民社团特有的挑战。监管是其中一个障碍。如果商业网站、公共网站和BBS论坛经常受到监管，我们不能指望公民社团不会不受到。由于该问题的政治敏感性，我没有在调查问卷中设计有关公民社团如何受监管的问题，但我的访谈资料确实显示监管的存在。我在2004年12月访谈一个NGO负责人时获知，该组织曾因其BBS论坛上出现一些有关“法轮功”的帖子而受到公安部门的调查。调查的方式是公安人员“友好地”访问该组织。在确定该组织与那些帖子没有关系后，公安人员要求组织将来加强对其BBS论坛的监控。

表 6.9 调查问题：你们组织对网络的以下几个方面满意度如何？

	数量	均值 (最大值 =5)
使用的方便性	107	3.59
功能的多样性	103	3.48
中文信息的丰富性	102	3.44
速度	114	3.32
信息开放度	10	3.21
内容的真实性	104	3.13
网络安全	103	3.12
成本	105	3.08
网络服务提供商的 服务质量	91	3.07

除了监管,还有很多障碍影响公民社团更好地利用网络。我们的调查显示,公民社团对网络各方面的满意度较低。如表 6.9 显示,问卷回答者在“使用方便”上表达了最高的满意度,但即便如此,该项的得分也只有平平的 3.59 (按 1—5 的量表)。在网络服务商提供的服务、成本、网络安全,甚至包括网络内容的可信度和信息的开放度方面,回答者也有担忧。对网速的满意度是 3.32。考虑到 119 个组织中有 43 个(36%)还使用拨号上网,它们对网速满意度必然不高,因此只能说这样低的满意度并不足为奇。

□ 四个环保组织的诞生

中国环保 NGO 与中国网络的发展并驾齐驱。自然之友创建于 1994 年,同年中国实现了联网。1998 年后,中国网络用户的数量开始快速增长,从 1997 年 10 月的 62 万跳跃到 1998 年 12 月的 200 万。环保群体的发展亦是如此。1994 年,中国只有 9 个环保 NGO,其中 4 个是大学生组织。到 1996 年,该数字增长到 28 个,其中包括 10 个学生组织。从 1997 年到 1999 年,环保 NGO 的数量出现显著的增长。单单在那 3 年里,至少有 69 个环保 NGO 创建,其

中 43 个是学生组织。2001 年 4 月，学生环保组织的数量达到 184 个。2002 年，非学生环保 NGO 已增至 73 个。⁶⁰ 环保 NGO 的发展显示，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羽翼未丰的公民团体，可以创造性地利用网络和其他新媒体而获得发展。以下讨论的四个环保群体可以视作典型。绿色北京和绿网脱胎于网络，而藏羚羊信息中心和瀚海沙是从“线下”的绿色行动倡导转化而成的。⁶¹

绿色北京起源于网络。该网络最初是一位宋先生在 1998 年 11 月设计并创建的。最初几年，该网站在全国网站设计大赛中获奖，并受到报纸和电视新闻节目的广泛报道。绿色北京的环保论坛变成了大众 BBS，到 2002 年，注册会员达到 2700 个。绿色北京的成员通过开展三种活动来促进绿色文化——运作网站、开展环境保护项目和组织提高环保意识的志愿活动。绿色北京的网络论坛促进了线下的环保行动。比如，1999 年，早期网络讨论中有一个案例涉及废电池的回收，该讨论激励了厦门一中的学生，他们成功地组织了一次社区废电池回收活动。绿色北京在 2001 年 1 月发起的“保护藏羚羊网络联盟”，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网络项目，在全国引起了对这一濒危动物的关注。该网络联盟的创立，促使绿色北京和来自 27 个大学的环保主义者在很多大学校园里联合组织了环保巡回展。

和绿色北京一样，绿网也是源于网络，成立于 1999 年 12 月。高先生是主要的创办者，此前在网易这一影响很大的门户网上的“绿色论坛”做了两年网络管理志愿者。创办独立环保网站的想法，最初来自绿色论坛上的讨论。绿网刚开始是个虚拟社区，截至 2002 年 7 月拥有 4000 个注册用户（2008 年 2 月 10 日有 7009 个）。绿网成为网络讨论和交流环境问题的空间，但它的目标是发展成中国环境保护的门户网站。与绿色北京相同的是，绿网的志愿者也开展一些社区环保行动，并发起运动。他们在 2002 年开展的一个项目叫“绿色夏夜”，是有关推动社区教育的活动。开展这项活动时，绿网志愿者借来音像设备，在北京公园里推出环保展览，播放环保纪录片。同年，绿网还发起了网络请愿活动，抗议开发北京郊区的湿地和鸟类栖息地，因为地方政府打算在湿地附近修建娱乐中心和高尔夫球场，这可能破坏鸟类栖息地。该计划在 2001 年 10 月被媒体曝光。绿网加入刚兴起的反对发展计划的抗议，并发起网上请愿活动，该

活动从 2002 年 2 月 2 日一直持续到 4 月 12 日。绿网的请愿活动收集到几百个网络签名，它给大约 10 个政府机构发了请愿信，这些行动得到了媒体的报道。根据在绿网上发表的总结报告，地方政府最终取消了这一开发计划。

胡佳在 1998 年同环保界的朋友一起创办了藏羚羊信息中心。该网站由志愿者维护，用几个国际环保 NGO 的资助租用了服务器空间。该网站在保护藏羚羊上起到了信息与交流中心的作用。它在 2002 年 7 月分为 7 个部分，包括藏羚羊档案、相关研究、工作人员、数据中心、新闻、如何帮助保护的链接等。新闻部分报道在战场——青藏高原——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一战场中，环保人士和当地社区组队反击非法偷猎行为。藏羚羊信息中心的成员，与青藏高原反偷猎巡逻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通过募款、充任当地环保群体与北京和国外的环保 NGO 的信息联络员，支持当地对环境保护所作的努力。

瀚海沙是一个致力于沙漠化问题的志愿者网络。2001 年，一位杨先生与北京其他几个年轻的环保人士计划建立这个网络。2002 年 3 月，通过发送电子邮件、在自然之友和绿网的网络论坛上发表公告，他们招募到第一批志愿者，共 50 人。这些志愿者在 4 个月内聚合了 2 次，在 2002 年 6 月创办了瀚海沙网站和电子通讯。瀚海沙旨在提升公众对沙漠化的意识，动员社区的努力去解决现实问题。它强调通过网络，以及同受沙漠化之害或威胁的专家和志愿者合作，从而收集和传播信息。它与赤峰市沙漠绿化工程院这个内蒙古当地的环保 NGO 合作，以提高公众对沙漠化挑战的意识。当我在 2002 年 7 月访问它的主要负责人时，瀚海沙还没有电脑，完全依靠它的志愿者。

□ 发展、变迁与挑战

我是在 2002 年第一次研究这 4 个环保组织的，到现在已经过了 5 年多。一个重要的变化是藏羚羊中心随着胡佳的离开而关闭，胡继续参与环保行动，但他的关注点已经转向艾滋病问题。因此，藏羚羊信息中心的关闭，不一定是个失败的标志。它的主要领导者不是因为放弃行动而离开，而是加入更具抗争性的行动领域。然而，其他三个组织却都成长了起来，都通过持续地、创造

性地使用网络而获得了发展。绿色北京将它的英文名字从 Greener Beijing 改成 Greener Beijing Institute，重新设计并扩大了网站，继续维护活跃的网络论坛，组织线下活动和抗议行动。⁶²2005 年，当我再次见到瀚海沙的主要负责人时，瀚海沙已经找到了新的方向。它的成员刚刚开始宣传“心灵环保”这一概念，其基本理念是：环境变迁必须从自我转变开始，而自我转变必须从日常生活开始。⁶³因此，它的项目开始更关注人文教育、草根社区的建设以及提倡有机农业。它的成员经常到农村去调查；在城里，它们组织电影放映，还建了一个有 1000 多张 DVD 的影像资料库。在他们的网站上，BBS 论坛上的讨论依然活跃。瀚海沙的电子通讯在内容上得到了扩充，他们将每一期发给订阅者，并传到网站以供下载。

绿网的发展恰当地说明了一个组织如何通过利用网络而得到发展。绿网不断地开展项目，发动抗议活动。截至 2008 年 2 月 16 日，列在绿网网络论坛上的项目或抗议活动有 20 多个。⁶⁴2004 年，绿网成功地发动了一次保护北京动物园的抗议活动。那年 4 月，绿网志愿者从北京动物园现址处获知它的搬迁计划。志愿者将该消息发到 BBS 论坛和其他的网络论坛上，引起公众对该问题的激烈讨论。志愿者同时利用电子邮件和电话动员大众媒体。最终建设部修改了有关城市动物园管理的规定。这一规定包含一个新的条款，即规定城市动物园设计规划书必须经过公开听证。这一条款的生效意味着迁移北京动物园的任何计划，必须经过公开听证程序。⁶⁵

2003 年，绿网开始致力于组织发展。它在 8 月份组织了第一次成员会议，选出一个协调小组作为领导机构。第二次成员会议于 2007 年召开，此次会议选出了新的协调小组。自第二次会议之后，新的团队就开始在绿网博客上发表它的会议纪要。比如，在 2007 年 4 月 2 日召开的第二次会议上，有一项重要的议程是有关表达对绿网的看法的头脑风暴。有小组成员提议每人写下一组用来描述绿网的关键词。结果就有了下面一个单子：“志愿精神”、“孤独”、“交流”、“人民”、“行动”、“成长”、“认同”、“尊重”、“可持续发展”、“快乐”、“多样性”、“承认”、“坚持”、“摆脱”、“环境友好生活方式”、“变革”、“支持”。根据这个单子，一位与会者造了下面一个句子：“保持多样性，摆脱孤独，坚持可持续

发展的行动”。另一位造的句子是：“在尊敬与容忍之间成长，在变革与行动之间发展。”⁶⁶ 第五次会议在 2007 年 5 月 16 日召开，会议记录包括一项有关如何启动绿网网站改版的决议。会议决定将在论坛上发布一则消息，征求所有论坛成员的意见，然后让论坛成员就是否及如何修改论坛网站进行投票。⁶⁷

绿网的会议记录也反映了它的成员如何就信息管理进行协商。第五次会议上有一项议程，关于是否在网站上发布一个男女同性恋夏令营的公告。据会议记录，有关该议题的讨论极其激烈，差点失控。讨论最终达成了一个决定，有 4 个人赞同 3 个人反对。小组最终决定发布了这则公告，并同时发布免责声明。小组还决定，论坛用户将来的异议也必须用同样的方式处理：争议必须立即通过群发邮件发给协调小组的所有成员，以投票的形式达成协议。

□ 结论

本章首次对中国公民社团的网络能力和网络使用作了经验分析。分析得出 5 个结论。首先，我的调查显示，中国公民社团具备最低限度的网络能力。在这些组织中，超过 80% 的组织已经联网，一半以上拥有自己的网站。在调查时，129 个组织中只有 2 个没有电脑，其他所有组织至少拥有 1 台电脑。鉴于设备简陋的小组织事实上更好地利用网络，没有电脑与有 1 台电脑的不同应该有质的区别，因为即使只有 1 台电脑，一个组织就能够跟外界相连。

其次，我的分析显示，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组织、年轻的组织和在北京的组织比商业社团、老牌组织和北京以外的组织更经常使用电脑，即使前者的网络能力比后者低。这一发现意味着，组织宗旨、组织文化和网络文化会影响组织对网络的使用：致力于社会变革的组织的目标是接触更广泛的公众，创建于 1991 年及之后的组织与网络并行发展，因此更能适应网络，而在北京的组织处于高网络密度的文化中。因此，要提高公民社团对网络的利用，必须建立致力于平等关系和开放信息流动的全国网络文化和组织文化。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一发现可能意味着，将网络用于公共目的需要一个民主的社会与政治环境，而这样的使用有利于培育这一环境。

第三，设备简陋的组织会更有效地利用它们所拥有的资源，而资源丰富的、设备更好的组织反而未必会很好地利用。网络对那些资金很少的组织可能更重要。⁶⁸ 在世界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中，公民社会组织比政府部门和商业机构更加积极地接受网络。⁶⁹ 这并不是因为公民社会组织拥有更多资源，而是因为它们更需要网络，因此它们会最大限度地使用已有资源。⁷⁰ 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公民社团即便拥有较低的网络能力，但对网络的使用却很积极。对公民社团而言，拥有最低限度的网络能力十分重要，但网络能力不决定对网络的使用。对那些通过充分利用新技术能力而获得策略性发展的公民社会组织，我们还要理解新技术最能满足它们的哪些需求。

第四，我的调查显示，网络对于组织宣传、信息传播以及与同类组织和国际组织沟通方面最有用。在同政府沟通、招募成员或者募集资金方面，中国公民社团更依靠面对面的沟通和电话沟通。这一发现表明，在任何社会，相对于等级化的权利结构，存在着交流媒介的等级化。在这个等级化的结构中，不同类型的组织任务通过不同的交流媒介完成。因此，对中国公民社团而言，网络在信息传播、与同行组织和国际组织沟通上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但在同政府机构的互动方面作用要小一些。

最后，对四个基于网络的环保群体的个案研究，说明了草根组织如何通过使用网络而获得组织发展。四个群体中有两个脱胎于网络互动，另外两个先是在网下组织起来，然后转到了线上。四个组织都明显地依赖它们的网站去建立组织认同感、动员资源以及组织活动，它们都参与了网络环保行动。因此，组织为发动网络行动提供了基础，而网络行动是组织建设的方式。这四个案例反映了网络与公民社会互相建构的动态过程。

所有这些发现表明，中国公民社团与网络之间的互动已经在中国创建了一个公民社团的“网络”，这个网络积极地参与公民事务。这张社团网在中国政治环境下具有特殊意义。中国公民社团必须与设法管制它们的国家进行谈判。或许正是因为中国公民社团必须面对这个困难的环境，它们才需要建立最低限度的网络能力，这一能力对组织生存十分重要。这里蕴藏着一个有关技术变迁与制度转型的重要信息。当新的制度形式(如中国公民社团)与新技术(如网络)

的发展同时进行，它们之间的互动便不再只是随意发生的。即使变革的阻力大，新技术也可能成为获得组织与社会发展的策略性机会与资源。这一策略性的机会和资源不会总是自动出现，即使出现了，也不一定总被抓住。本章说明了中国城市中的草根公民社团如何抓住这一机会，从而获得了组织发展，并推动了社会变革。

注释

- 1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公民社会组织在中华帝国晚期十分活跃。参见：Rankin, “Some Observations on a Chinese Public Sphere”；Rowe,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2 Calhoun,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 3 有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与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的比较研究，参见：Keyser, *Professionalizing Research in Post-Mao China*, 119。凯泽（Keyser）很有见地地指出，“1980年代的焦点是如何在体制内寻求自主性，到了1990年代变成了挣扎在体制外以宣称自主。”
- 4 乔纳森·昂格和陈佩华（Jonathan Ungar and Anita Chan）、玛格丽特·皮尔森（Margaret Pearson）、怀特、霍威尔和商（White, Howell, and Shang），参见：White et al.,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 5 Keith et al.,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NGO.” 类似地，张欣（Xin Zhang）和理查德·鲍姆（Richard Baum）认为，与“国家法团主义”模型中的组织不同的是，他们研究的农村 NGO 既不是中央政府也不是地方政府的傀儡，它们是由当地社区建立，并为当地利益服务的。
- 6 Pei, “Chinese Civic Associations.”
- 7 同上，294。
- 8 Howell, “New Directions in Civil Society,” 145。其他一些研究也使我们关注1990年代以来新型草根组织的崛起。参见：Shang, “Looking for a Better Way to Care for Children”；Keith et al.,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NGO”；Zhang and Baum, “Civil Society and the Anatomy of a Rural NGO.”
- 9 Howell, “New Directions in Civil Society,” 163.
- 10 Keith et al.,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NGO.”
- 11 Zhang and Baum, “Civil Society and the Anatomy of a Rural NGO.”
- 12 Yang,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 13 Wang and He,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 in China.”
- 14 Whaley, “Human Rights NGOs,” 34.
- 15 Edwards, “NGOs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 16 Burt and Tayl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Burt and Taylor, “When ‘Virtual’ Meets Values.”
- 17 Bach and Stark, “Innovative Ambiguities”；Bruszt, Vedres, and Stark, “Shaping the Web of Civic Participation.”
- 18 参见：McNutt and Boland, “Electronic Advocacy b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Social Welfare Policy”；Mele, “Cyberspace and Disadvantaged Communities”；Friedman, “The Reality of Virtual Reality.”
- 19 Schmitter, “Still a Century of Corporatism?”
- 20 Ungar and Chan,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 21 Howell, “New Directions in Civil Society.”
- 22 Dittmer,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 23 Migdal, Kohli, and Shue, “Introduction: Developing a State-in-society Perspective,” 2.
- 24 Fligstein, “Social Skill and the Theory of Fields,” 117.
- 25 Saich, “Negotiating the State.”
- 26 我用“公民社团”指自愿性和非盈利组织。在社会科学文献中类似的概念还有公民社会组织、非政府组织（NGO）、非盈利组织（NPO）。
- 27 我通过四个渠道获得样本。两个主要的来源是：《250个中国非政府组织：正在形成中的公民社会》，是由《中国发展简报》编辑；另一个是清华大学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编辑的《500个非政府组织》。这是两个最新的公民社团目录。虽然它们既不全面，也没有代表性，但为研究当代中国草根组织提供了最好的现成样

本。从操作层面看，这两个数据源比较新，可能包括最新的联系方式。两个目录都包含了一些政府发起的 NGO (GONGO)，比如中国妇联。我将这些组织排除出样本，因为它们更像政府机构，而不像非政府组织。第三个抽样框是北京工商联制作的组织目录。最后，在抽取四川的组织时，我依赖的是在成都的两位业内人士所提供的信息。最后的样本包括 141 个北京的组织、28 个四川的组织 and 381 个其他地方的组织，共 550 个。这一样本包括了来自中国大陆所有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组织。大部分问卷在 2003 年 12 月或之前收回，少部分是在 2004 年 1 月份收回。因此我将 2003 年 12 月作为截止点。做这一调查最大的挑战是抽样，因为没有全面的、最新的公民社团组织的目录作为抽样框。裴敏欣的研究是基于樊伯君（音译）所编的《中国公民社团手册大全》，这本手册汇集的是 1992 年前注册的组织。参见：Pei, “Chinese Civic Associations.” 另一个类似的目录是由陈东东主编的《中国社会团体大观》，收录的组织大部分是在 1990 年代创办的。有关在中国做调查的问题和挑战，参见：Manion, “Survey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 对在北京和四川被抽到的组织所进行的调查，是由经过训练的调查员前往各个组织，对组织的办公室主任进行问卷调查。在北京的 141 个组织中，有 40 个组织拒绝了调查请求，27 个组织无法找到，最后共收回 74 份有效问卷。在四川的 28 个组织中，5 个拒绝了采访请求，9 个无法找到，收回 14 份有效问卷。对于 381 个被抽到的其他地方的组织，是于 2003 年 10 月 6 日通过平信寄出标准化的问卷进行调查的。到 2004 年 1 月底，收回了 50 份有效问卷。没有问卷返回的地区包括黑龙江、内蒙古、山东、江苏、湖南、江西、海南、青海和西藏。因此，这些地区的组织的情况在这个研究中不能得到体现。

- 28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Yearbook of Statistics*.
- 29 根据国际电信联盟的定义，我将电脑主机界定为直接连接到因特网的电脑。参见：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Yearbook of Statistics*.
- 30 我所指的网络能力是指更一般的“信息技术能力”（这与国际电信联盟所用的语言一致），不过我强调的是网络。
- 31 三个案例的组织年龄超过了 92 岁，而该数据库中的组织年龄的中位数是 10 岁。另外有三个组织报告的全职工作人员数分别是 150 人、180 人和 219 人，而全职工作人员数的中位数是 7 人。还有三个异常值是在电脑拥有台数上分别报告为 180 台、150 台和 200 台，而我们样本中电脑台数的中位数只有 4 台。
- 32 Pei, “Chinese Civic Associations.”
- 33 Wang and He,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 in China.”
- 34 然而，正如裴敏欣所指出的，在他的样本中，鉴于学运之后的政治保守主义，公民社团在 1989 年奇怪地在数量上得到了增长。这一趋势没有在我的样本中得到反映，相反，与 1988 年相比，创建于 1989 年的公民社团组织的数量明显下降。
- 35 Pei, “Chinese Civic Associations,” 294.
- 36 Howell, “New Directions in Civil Society,” 145.
- 37 Howell, “Post-Beijing Reflections”; Hsiung and Wong, “Jie Gui—Connecting the Tracks.”
- 38 Howell, “New Directions in Civil Society,” 165.
- 39 Keith et al.,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NGO,” 39. 有关国际 NGO 在中国环保组织发展中的作用，参见 Yang,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Morton, “Transnational Advocacy at the Grassroots.”
- 40 Howell, “New Directions in Civil Society,” 147.
- 41 Surman, “From Access to Applications.”
- 42 Harwit, *China’s Tele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 43 2003 年 12 月，中国有 3089 万台电脑主机和 7900 个网络用户，两者之间的比例是 0.39。参见中国互联网网络信息中心在 2004 年 1 月发表的调查报告，链接：www.cnnic.net.cn.
- 44 Surman, “From Access to Applications.”
- 45 同上，10。
- 46 Friedman, “The Reality of Virtual Reality.”
- 47 Finkelievich, “Electronic Democracy: Buenos Aires and Montevideo.”

- 48 One World International and 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Southeast Europe."
- 49 中国互联网络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5,链接:<http://www.cnnic.net.cn>.
- 50 Surman, "From Access to Applications," 15.
- 51 Burt, e-mail to author on March 7, 2005.
- 52 2005 年上半年方舟子和中国环保主义者在中国环境保护行为上的辩论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参见方舟子创办的《新语丝》(www.xys.org)网站和自然之友 BBS 论坛(www.fon.org.cn)上对该辩论的专门报道。
- 53 按从 1 到 5 的量表,5 表示最重要,电子邮件得分是 4.63,传真 4.03,电话 3.87,平信是 2.76。
- 54 按从 1 到 5 的量表,5 表示最重要,电话得分是 4.44,电子邮件是 4.06,传真是 3.80,平信是 3.03。
- 55 老牌组织与商业社团在这方面的相似性,可能是因为这两类组织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相关性。平均而言,商业社团年龄比其他社团的大,它们在 2003 年的平均年龄是 11.3 岁 (n=53),而样本中所有组织的平均年龄是 9.5 岁。
- 56 中国互联网络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4,链接:<http://www.cnnic.net.cn>。
- 57 Hannan and Freeman, "Structural Inertia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 58 Henderson and Clark,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s."
- 59 Guthrie,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Use of Technology," 586.
- 60 这些数字不包括创建于 2003 年及之后的环保 NGO、学生环保社团或者政府主办的 NGO。虽然没有固定而客观的标准判断一个组织是不是政府主办的 NGO,但总体而言,我排除了陈东东(音译)主编的《中国社会团体大观》一书中包含的环保组织,它们是传统的政府主办的 NGO。有关学生环保社团的统计数据,是来自四川大学卢红雁及其同事在 2001 年 4 月做的一次调查。需要指出的是,按我的算法,非学生环保 NGO 有 73 个,但因为其中两个组织的创建时间不详,第三个数字因此显示为 71。卢调查到 184 个学生组织,但该数据库只有 75 个组织有创建时间的信息。
- 61 我最初是在 2002 年夏开始研究这些群体的,我当时采访了它们的领导者。自那以后,我通过与这些领导者保持联系,阅读来自它们的电子通讯以及经常访问它们的网站,跟踪这些群体的发展。
- 62 它的 BBS 论坛的注册用户从 2002 年的 2700 个增长到 2008 年 2 月 10 日的 7229 个。当我在 2 月 10 日(北京时间 2 月 11 日)打开论坛时,系统显示论坛上有 74 人在线。它的年度志愿者植树活动从 2001 年开始一直没有停止过。它还启动了推动绿色奥运的新项目。
- 63 <http://bbs.green-web.org/showthread.php?s=&threadid=11741>, 获取日期:2008 年 2 月 18 日。
- 64 <http://bbs.green-web.org/showthread.php?s=&threadid=11741>, 获取日期:2008 年 2 月 18 日。
- 65 绿网 2003-2004 年度报告,链接:<http://www.green-web.org/infocenter/show.php?id=17230>。获取时间 2005 年 6 月 1 日。
- 66 <http://www.green-web.org/blog/?p=7>, 获取日期:2007 年 6 月 1 日。
- 67 <http://www.green-web.org/blog/?p=14>, 获取日期:2007 年 6 月 1 日。
- 68 伊利莎白·杰伊·弗里德曼 (Elisabeth Jay Friedman) 对拉丁美洲公民社会组织的研究证实了这一发现。参见: Friedman, "The Reality of Virtual Reality."
- 69 Bissio, "The Network Society, 1990-2000; Whaley, "Human Rights NGOs."
- 70 Warkentin, Reshaping World Politics, 144.

网络社区中的乌托邦现实主义

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借鉴恩斯特·布洛赫 (Ernst Bloch) 在《希望的原则》中的研究,区分了乌托邦蓝图 (utopia as program) 和乌托邦冲动 (utopia as impulse)。作为蓝图的乌托邦是发现新社会的系统努力,比如革命和公社。乌托邦蓝图较少,但乌托邦冲动却随处可见,它会“借着各种隐秘的表达和习惯浮到表面”。¹ 詹明信举了一些冲动乌托邦的例子,比如政治与社会理论、社会民主与自由改革。对詹明信而言,乌托邦的价值在于它“是一个消极批判的概念,它不提供完整的表达,而是对与它相反的整体表达加以质疑和去神秘化”。² 他认为乌托邦的功能“不在于它的自身,而在于它能够激进地否定它的反面”。³

在当今失去乌托邦梦想的世界中,詹明信对乌托邦的价值给予了肯定。他的著作也只是代表了这方面最新的学术研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的“乌托邦现实主义”,也属于这方面的思想。⁴ 对吉登斯而言,乌托邦现实主义是根植于现实而不是幻想的希望。面对似乎注定失败的现代性,吉登斯通过肯定内在制

度自我转型在理论上的可能，以及拥抱人类解放和自我实现的规划，表达了一丝希望。对詹明信和吉登斯而言，重新肯定乌托邦的价值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这一后乌托邦世界提供了一条路径。

詹明信和吉登斯所表达的愿景，停留在理论层面。詹明信研究的是科幻小说；吉登斯的愿景来自他对当代西方现代性的批判理论，但他对这一愿景的表述，与其说是基于对现实斗争的分析，不如说是表达一种信念。他们都没有揭示出社会实践中的乌托邦冲动。

当今中国的现实斗争包含了乌托邦的冲动。这在新公民行动中的很多领域都有所表现，比如环保主义者向往替代性世界观和替代性社会。在中国的网络社区，乌托邦的冲动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表现得更为活跃。网络的使用产生了一个新的电子型构（digital formation）。⁵ 网络社区是 1990 年代以来出现的最重要的结社新形式，有百万之众，存在于新闻组、邮件组、聊天室、BBS 论坛和博客之中。网络社区数量之大意味着它们包含了无论高低贵贱的人类动机与行为的完整谱系。本章的目标，是分析这一谱系中最有活力却不被注意的一面，即乌托邦冲动。

中国的网络社区，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它在实际与功利方面的众多用途，而是它如何培育道德情感。和所有乌托邦一样，这一乌托邦冲动是对现实的批判，是对更美好世界的渴望。它源于与市场转型相关的社会、文化与政治的错位。在错位的条件下，网络社区变成重新寻找方向的空间。借用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概念，可以说它们是人们实践“想象的能力”（the work of the imagination）⁶ 的空间。想象中的替代性世界，总带有一些理想化的色彩。然而这一理想化，或称乌托邦思想，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源于对现实世界的不满。乌托邦冲动不仅表现在思想上，它也经常表现在社会实践中。建设网络社区就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因为这是一个界定与肯定共同价值的过程，其中最神圣的价值就是那些在当今社会受到破坏的自由、信任与正义。乌托邦冲动在实践中的表现，也经常可以从线下的行动中看到。本章后面的个案研究将说明乌托邦冲动如何交织在思想与行动之间，又如何在网上社区与线下社区之间转换。正是因为乌托邦冲动根源于现实、希望和行动，我才借用吉登斯的语言，把它看

作乌托邦现实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

□ 空间、社区与中国的现代性

一般社会科学对网络社区给予了很多关注。早期研究集中争论的是网络社区是“真实”的还是虚拟的，以及网络能否“创造出精彩的新式社区，抑或完全摧毁社区”。⁷这一说法的作者巴里·威尔曼（Barry Wellman）和米蕾娜·古里亚（Milena Gulia）在他们文章的开头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人们能否利用网络找到社区？彼此从未见面、体味和倾听的人们之间的关系是否具有互助性和亲密感？”⁸因为要证明网络的真实性，研究者所关注的是网络社区的实用功能，强调网络社区的实用与功利方面，而有关快乐、游戏、认同和道德等非功利性的议题却很少受到关注。

中国网络空间中的网络社区虽然繁荣，但相关的学术研究却很少。在已有的研究中，贺麦晓（Michel Hockx）通过对文学网站榕树下的个案研究，考察了网络文学社区。他发现今天的文学社区与20世纪初期的文学杂志之间有很多连续性。比如，网络社区使用了一些同以往相似的社区建设方法，如组织文学俱乐部、为读者举办工作坊、举行文学竞赛。⁹另外，早期的文学杂志与当今的网络文学社区都有读者对有关社会问题的辩论，都促进一些重要议题进入公共视野。因此，贺麦晓的研究凸显了网络社区在社区建设的目标和方法上的历史渊源。

中国国内有些学者对网络社区有所研究。目前最系统的经验研究是人类学家刘华芹对天涯社区所做的民族志研究。¹⁰刘的研究显示，天涯社区具有线下社会组织普遍存在的社会分层与社会矛盾的特征。她的研究关注网络社区的内部特征，而没有联系更大的社会背景。她反对假定网络社区的兴起是对线下组织衰弱的回应，是在迷惘的社会中寻找意义的体现。她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心理学指出，网络社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满足了不同的需求，包括人们无法在现实中获得满足的一些需求。她对天涯社区内部结构的详细分析，表明网络社区是线下社会组织的复制品，淡化了网络社区的独特性及其对线下社区的

超越。我们熟悉的社会实践不可避免地会被带到网络空间，但我认为，网络社区同已有的社会结构在一些方面有着本质的不同。

有关中国网络社区的研究比较贫乏，因为很多学者把精力集中到网络的政治维度，比如政治控制；另外也受到这样一个缺乏批判性的观点的影响，即认为中国网民上网大多是为了娱乐，而不是参与政治。这个观点通过媒体报道得到强化，在各类网络发展调查报告中得到证实。但这种看法对政治的理解非常狭隘，而且过分简单地认为娱乐就是玩乐而没有政治可言。¹¹

在网络研究领域之外，有关中国空间转型的深入研究，为分析网络社区提出了直接相关的重要问题。《当代中国的城市空间》一书描述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初日益提高的个体自由感和新型社区的兴起。¹²该书展示了物理空间的变化如何引起城市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转型，以及社会实践如何将物理空间转变成社会空间。陈南希（Nancy Chen）所写的《城市空间与气功体验》一文就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她探讨了1980年代中期流行练气功的现象。气功练习出现在各种公共场所——城市公园、工作单位的大院以及街边人行道上。这些公共场所的活动，比如“呼吸练习”和探戈，¹³将公共场所转化成有组织生活的社会空间。陈认为，正是在这些空间中，各种官方与半官方的气功社团得到了迅速的发展。¹⁴“法轮功”最初就是这样。

1990年代以来市场改革的深化引发了空间错位的危机。在农村和城市地区，空间变成了政治斗争与抗争的场所，人类学家刘欣（Xin Liu）、杨美惠（Mayfair Yang）和张力（Li Zhang）都认为空间是理解当代中国城市的重要概念。刘欣通过审视中国城市问题，认为“理解中国转型的关键在于理解转型的空间特征”，因为“空间已经变成日常意识的支配形式”，社会关系的生产日益通过空间的生产得以实现。¹⁵ 张力通过分析“有关‘进步’与‘倒退’、‘现代’与‘落后’的观念如何生产出特定类型的城市重构”，¹⁶记录了你对现代性的追求。

杨美惠对温州一个农村社区的研究显示，农村中供奉大众信仰的神灵的仪式空间，是“地方社区争取重新分配空间”的战场：

在这些具有避风港功能的空间里，人们建构了新的替代性认同，

通过非国家铺就的小路走到了一起。在这里，人们通过践行各种仪式，使他们的身体在现世领域与神圣领域中得到调和，从而帮助他们驱散国家—资本这一抽象空间的垄断。他们也尝试了新的组织与决策的形式、社区空间的生产以及集体抗争。¹⁷

网络社区作为新的空间形式，同这些农村社区一样，也是“空间的避风港”，是反抗的地点。它们是公民建构替代性认同、想象新世界、体验新组织形式和参与新形式反抗的另一条战线。

□ 中国网络社区的发展

中国网络社区是历史环境的产物。从一开始，它们就满足了人们在社会、文化与政治方面的需求。最早的中文网络社区，在1980年代出现于散居海外的华人之中。海外中国学生中的新闻组和电子刊物是网络社区最原始的形式。这些社区由远离家庭和祖国的人们建立，这是它们最显著的特征。他们当时只能用传统媒体——航空邮件和电话——同国内保持联系，而这些通讯方式要么速度很慢，要么很贵。¹⁸对那时的中国学生而言，有关中国新闻的主要来源是他们大学图书馆里的中国报纸，而这些报纸通常是出版几周之后才能上架。因此，他们编辑并在网上传播的网络通讯和电子刊物，成为海外华人的重要信息来源¹⁹也就不足为奇了。

中国最早的网络杂志在1990年代初期由北美中国学生创办。它们通常以大学为基地。有些杂志很快销声匿迹，但有些坚持办了下来，甚至有些转变成有影响的非营利组织或商业门户网站。在所有电子刊物中，最出名的要数《橄榄树》(wenxue.com)和《华夏文摘》(cnd.org)，它们现在都成为在美国运作的非盈利组织。《橄榄树》创办于1995年，是文学月刊。它的宗旨是“为新的中文文学作品和文化评论建立大众媒介平台，这个平台没有一般大众市场上那么多的在政治、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限制。”²⁰《橄榄树》的编辑都是志愿者，来自中国、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在国家认同上，他们不属于任何国家。

表 7.1 《华夏文摘》的读者数
(1989—1999)

时期	订阅者	地区和国家
1989年3月	400	2
1990年3月	16,000	N/A
1993年3月	24,148	30
1994年3月	34,281	40
1995年3月	35,200	50
1997年3月	47,600	63
1999年3月	57,120*	111

来源：中国新闻文摘，1992年3月6日，1993，1994，1995，1997，1999

* 这是对1999年3月订阅者的估计。根据《华夏文摘》的数据，1997年它的读者总数估计有150,000人，其中订阅者有47,600人。1999年，《华夏文摘》估计它的读者达到了180,000人，但它没有公布订阅者的数字。因为47,600个订阅者占读者总数的31.7%，依此比例推算，在180,000个读者中，有31.7%即57,120个订阅者。

《华夏文摘》(CND) 是于1989年3月6日由在加拿大和美国的4个中国学生创办的。CND最初用英语出版，旨在成为北美中国学生的交流网络，到现在已经发展成全球网络，提供英语新闻服务、网络中文周刊、论坛以及有关中国历史上重要事件的网上档案馆，包括“文革”和1989年风波的纪念馆。CND的读者逐渐增多：1989年刚建立时，它只有400个订阅者，且都来自美国和加拿大；到了1999年，CND的订阅者来自111个国家和地区，约有5万名。表7.1显示了CND从1989年到1999年这段时间中读者的增长。

海外网络中文社区在生产 and 发布内容上表现出一些与新媒体相关的重要特征。特征之一是自愿性的自助出版。历史上，中国印刷杂志的生产与发布是集中的，必须经过严格的执照申请程序，并受到严格的内容控制。而电子中文刊物的出版却是自我组织的，从一开始就具有自愿性。它们有些是附属于中国学生会，其他则由个人创办和管理。即使那些附属于学生会的电子刊物，比如加拿大的枫华园，它们在编辑和生产过程中也是依靠志愿者。

与这些电子刊物生产相关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跨国合作。大部分电子刊物

的编辑人员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的志愿者组成。作为编辑的志愿者因为居住在不同时区，又因为没有一个大大家容易凑到一起的编辑办公室，因此他们主要通过电子邮件进行讨论。在《华夏文摘》出版第 100 期杂志时，一位编辑写道：

《华夏文摘》是中文杂志，可因为我们散居在世界各个角落，编务讨论多通过电脑网络用英文电子邮件（E-mail）进行。随着旨在促进中文网络通信的中文软件（特别是亚桂写的 ZW D O S²¹）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编辑像温冰所说的那样：“喜欢上中文伊妹儿（E-mail）²²了！”

我们有时通过网络“对讲”（Talk）来商讨 CND 事务，有一次我和熊波一聊就聊了整个晚上，直到他那边天亮了。有时还跟读者、作者“对讲”。可以说对现代电脑网络技术的应用已经习以为常。可有一次我的印象特别深：那是去年 7 月初与几千里外的明辉第一次在网络“对讲”时直接用 ZW D O S 写汉字。虽然写得慢，各自只写了几个汉字，却足以使我欣喜若狂，在家里大肆跺脚乱叫。²³

在中国，最早的网络社区是大学学生的 BBS 论坛。BBS 论坛始于大学，然后才发展到商业门户网站，因此第一波 BBS 网络社区是在大学生中出现的。清华大学走在了前列，于 1995 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 BBS——水木清华（SMTH）。其他的大学，如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等，也紧跟其后。2000 年 11 月，搜狐列出了 70 个大学 BBS。²⁴ 所有 BBS 几乎都支持很多按话题分类的论坛。例如，在 2000 年 12 月 8 日，北京大学的 BBS 有 149 个论坛，西安交通大学的 BBS 有 129 个论坛。²⁵ 有关时事和私人关系的论坛通常很受欢迎，但话题的广度也表明人们是出于不同目的加入论坛的。表 7.2 和 7.3 分别列出的是 2000 年 5 月 21 日汕头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的十大 BBS 论坛，表 7.4 显示的是 2002 年 4 月 23 日北京大学 BBS 的十大论坛。

表 7.2 汕头大学郁金香 BBS 十大论坛
(2000 年 5 月 21 日)

排名	论坛名	发帖数
1	新闻	3086
2	情感	2245
3	医学院	2065
4	爱情	1940
5	武侠世界	1871
6	女生	1561
7	英语	1555
8	诗词歌赋	1552
9	流行音乐	1489
10	历史	1469

来源 : bbs.stu.edu.cn/bbs-cgi/bbsall, 获取日期 : 2000 年 5 月 21 日

表 7.3 西安交通大学按点击率排名的十大论坛
(2000 年 5 月 20 日)

排名	论坛名	点击率	花在网上的分钟
1	说说咱交大	77440	238
2	女孩子	40652	156
3	因为有爱	40249	175
4	闲聊	37811	115
5	时事	37452	357
6	心情驿站	30320	133
7	足球	29267	261
8	轻松话题	23872	139
9	单身贵族	22352	100
10	站长工作室	18755	102

来源 : bbs.xjtu.edu.cn/cgi-bin/bbsanc?path=/bbslist/board2, 获取日期 : 2000 年 5 月 20 日

表 7.4 北京大学按点击率排名的十大论坛
(2002 年 4 月 23 日)

排名	论坛名	点击率	花在网上的分钟
1	三角地	43292	3607:42
2	时事	20665	1819:44
3	谈情说爱	20266	1251:6
4	飞跃重洋	18345	1490:59
5	跳蚤市场	14679	901:26
6	电影	13827	735:29
7	笑话	13786	1426:1
8	时尚	13293	791:59
9	未名湖	13208	270:9
10	电脑技术	13186	673:46

来源: bbs.xjtu.edu.cn/cgi-bin/bbsanc?path=/bbslist/board2, 获取日期: 2000 年 5 月 20 日

当 BBS 出现在大学校园时, 官方媒体机构也开始上网, 商业网站为个人主页提供了免费的网络空间, 在 BBS 论坛之上形成的社区数量迅速增长。第一个受政府资助而创办网站的杂志是《神州学人》, 这是一本针对中国留学生的杂志。该杂志于 1995 年上网, 与清华大学创办水木清华 BBS 同年。《中国贸易报》和《中国日报》也于同年上网。到 1996 年年底, 共有 30 多家报纸创办了网站。²⁶

第一个商业化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 (ISP) 于 1995 年由张树新 (Jasmine Zhang) 创办。²⁷ 张的公司可能是第一个提供 BBS 服务的私营企业, 它也是最早在中国开网吧的公司。从 1996 年到 1997 年这两年间, 中国出现了第一波网络商业化的浪潮。结果, 如欧内斯特·威尔逊三世 (Ernest Wilson III) 所说的, “到了 1996 年, 每个只要拥有足够经济能力和认知水平的中国人, 都可以用网络接收邮件, 以及使用网络世界的其他服务”。²⁸

这些其他的 service 包括 BBS 以及开发个人网页的免费网络空间。四通利方在 1996 年已经提供了 BBS 服务。1998 年, 四通利方与总部设在硅谷的华渊合

并成为新浪。刚开始，四通设立 BBS 论坛是为了提供客服，CEO 王志东曾亲自用 BBS 论坛回答顾客的问题。但他们很快发现，BBS 论坛中的网友来自世界各地，讨论很快从技术问题转向其他各种话题。王志东回忆道：

后来大家不再限于聊技术问题，各种各样的聊天都开始了。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最早的做法是踢人，把与技术无关的东西剔除，但用户不答应。我们就商量着把一个论坛变成两个，由技术论坛分出一个“谈天说地”，五花八门的东西都到那个谈天说地的屋子去说。²⁹

在个人网页的发展上，1997 年 5 月网易的创立是个有影响的事件。网易提供了巨大的免费网络空间支持个人主页，使 1997 年成为个人主页年。据相关估计，截至 1999 年，中国超过 80% 的个人主页都在网易。³⁰ 虽然这些主页是“个人”的，但通过与多个网站链接、用电子邮件同多个网页的主人交流、使用留言板或 BBS 论坛进行互动等方式，很多个人主页实际上成为小型的网络社区。它们是博客的前身。

博客出现后，有人预计它会迅速取代 BBS 论坛，但这并没有发生。相反，基于 BBS 的网络社区变得更流行，愈发有活力。1999 年，28% 的网络用户（超过 100 万）经常使用 BBS。多年以来网友对 BBS 的喜欢虽然有波动，但 BBS 的使用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参见表 5.2 和表 5.3）。据估计，截至 2003 年，中国有 10 万个 BBS 社区。³¹ 到 2005 年，中国 1.03 亿网络用户中超过 40% 的人使用 BBS 论坛。表 7.5 显示的是 Geocities.com 按主题分类列出的截至 2002 年 4 月 13 日的 BBS 论坛数。表 7.6 显示的是 2000 年 11 月 27 日按发帖数排名的十大中文 BBS 论坛。

表 7.5 按主题分类的中文 BBS 论坛数
(2002 年 4 月 13 日)

主题类别	BBS 数
一般主题	45
政治	77
军事	21
文化、体育、艺术	113
大学校园、海外学生、海外生活	70
科学与经济	70
情感交流	47
总数	443

来源 : <http://www.geocities.com/Paris/Lights/4323/top20.html>

表 7.6 Geocities.com 列出的十大中文 BBS 论坛
(2000 年 11 月 27 日)

论坛名	发帖数
强国论坛	1258720
新浪体育沙龙	808912
实达 BBS 军事论坛	277931
世界军事论坛	234327
复兴	75863
北美自由论坛	67340
中国性爱论坛	54014
人人论坛	44622
亚洲军事	44050
木子网	20000

来源 : www.geocities.com/Paris/Lights/4323/top20.html, 获取日期 : 2000 年 11 月 27 日

正是企业家意识到了用户生成内容的重要性,才使网络社区得以不断壮大。一个典型的网络社区是整合 BBS 论坛、博客、播客、视频播放以及其他功能于

表 7.7 《中国新闻周刊》列出的中国 20 大网络社区
(2007 年 7 月 20 日)

网站	创办年份
Mop.com	1997
Xici.net	1998
Tianya.cn	1999
Xilu.com	1999
bbs.people.com.cn	1999
55188.com	1999
xitek.com	2000
doyouhike.net	2000
hl365.net	2001
tiexue.net	2001
xcar.com.cn	2002
Verycd.com	2003
55bbs.com	2004
Wealink.com	2004
lpart.cn	2005
Douban.com	2005
51credit.com	2005
tudou.com	2005
maxpda.com	2006
babytree.com	2007

一体的庞大系统。最大的几个网络社区，如天涯，有几百万的注册用户。2007 年 7 月 20 日，《互联网周刊》发表了有关网络社区的封面新闻。一篇文章宣称：“如果你不懂网络社区，你的生活和做生意的成本在接下来的 20 年内会非常巨大。”³² 另一篇文章描述的是南京一个整合了网络社区和线下邻里的社区计划。该计划建立在南京一个品牌网络社区——西祠胡同——的基础上。建设该新社区的开发商同西祠胡同签订合同，使其线下社区可以使用网络社区的一些名字。

比如，西祠胡同有个很受欢迎的电影评论论坛叫“后窗看电影”，这一线下社区中的主要电影院后来也以此命名。新的线下社区建立起来后，网络社区的成员可以在社会互动中轻易地穿梭于线上与线下。³³ 同期《互联网周刊》还列出了截至 2007 年 7 月 20 日最有影响的网络社区（重新制成表 7.7 的格式）。

这些网络社区分别迎合了不同网络用户群体的需求。比如，天涯和西陆网（xilu.com）因其知识性而出名，猫扑（mop.com）和爱情公寓（ipart.cn）受年轻人的欢迎，我爱购物网（55bbs.com）受白领女消费者的青睐，宝宝树（babytree.com）是面向年轻父母的新网站。社区成为积极行动空间的可能性，因他们关注领域的不同而不同。因为天涯社区有很多涉及时事及社会文化议题的论坛，因此它成了孕育抗争的温床。其他综合性的网络社区，如新浪、搜狐和网易，情况亦然。当专门的网络社区成员特别关注某些议题时，他们也可能被动员起来。宝宝树的成员最有可能是年轻的父母，如果他们发现喂给宝宝吃的奶粉是假冒伪劣产品，那么他们被动员起来的概率会很大。

□ 网络社区中自由的形象

要理解人们如何把自己的理想寄托于网络社区，可以去看他们用什么样的形象去描述。人们固然会用各种方式去想象社区，但我的研究发现有三组形象最为突出。第一组形象包括广场、茶馆、咖啡店和集市，这些都是有关开放与自由的形象。第二组形象包括家庭及其成员。这些形象强调社会性、团结、友谊、归属感和同志情谊。第三组形象借用了武侠小说和电影的语言，其中最核心的形象是“江湖”。江湖形象是武侠作者对自由、冒险、正义以及阴谋与背叛世界的经典想象。

自由、团结和正义这三组想象不是彼此孤立的。对自由的渴望有时表现为对团结与正义的渴望，反之亦然。他们以不同的程度和不同的组合表现在不同的网络社区中。然而，经过仔细审查，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变化。自由的形象在中国网络发展的早期最普遍，这段时期大约从 1997 年持续到 2000 年。这些形象生动地表达了人们最初发现可在网络论坛上进行自由表达时的兴奋。今天，

中国网络空间得到了拓展，更成为冒险、社会表达、政治斗争的空间，武侠形象于是变得更加普遍。对自由表达的渴望被日益增强的政治控制所抑制，但它从未消失。相反，它表现为在日益被视为善恶杂糅的网络空间——江湖世界——中的自觉斗争。有关家和家人的形象一直表现得很强烈，并且通常与其他两组形象混合在一起。

这些形象明确了人们对网络社区的想象、他们所珍视的价值，以及他们所追求的理想。接下来，我将用社区成员的声音，来凸显这些形象的意义。然后，我将通过对一起抗争性事件的个案研究，来说明对这些价值的渴望如何引导公民行动，维持社区纯洁的渴望又如何导致诸如网络黑客这样的激进行动。

自由的形象在网络发展的早期无处不在，可以在很多帖子和有上网经历的个人故事中发现。新浪曾经存有一个网络档案，是有关 80 个来自全国不同地方的人如何邂逅网吧的故事，其中包括来自一些很偏远的小地方的人。这些故事中有很多表达了人们在网上找到的自由感。比如，当网吧开始在全国涌现时，一个九江的用户在 1999 年 2 月写道：

细细想来，这“网”构筑的虚拟空间比起历代人们脑际中的“海”来，要宽广得更加浩浩荡荡，愈发横无际涯。人们在无限的想象空间中畅行无阻，禁忌比在有限的现实空间中少了不知多少。通过无尽的想象改变有限的现实，提高人类自身生存的质量，这大概是人类进步发展的基本规律吧。³⁴

这段话的作者尽管浪漫化地看待人类文明的进步，但却清楚地表达了网络对“想象能力”的重要性。我所征集到的网络自传，同样表达了这种自由感。一位 21 岁的男性大学生写道：“上网就像我的第二人生。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在网上很容易交朋友，如果你遇到一个人，而你又不想继续同他交往，你可以立即不见他。真是太好了！”

人们不但为网上的社会自由而激动，更为切切体会到的政治自由而激动。在第四章中，我以强国论坛上的 289 个帖子为例，讨论了其中反映出的人们对

网络的热情。人们肯花时间和精力去写有关论坛的帖子，本身就表现了热情。据我的计算，这 289 个帖子至少提出了 150 个关于如何加强强国论坛的具体建议。其中有一类建议事关论坛的运作与管理。这些帖子提出了一些技术性建议，但核心的关注是如何建立一套开放而有规则的管理制度。第 14 帖的作者解释道：

我想论坛管理方面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先确立一个明确的尺度（制度），再将它公布于众，无论这尺度是否公正、合理（因为毕竟是党报论坛，倾向性总是会有的）。然后只要严格遵守，估计网友们是不会有太大意见的。其实版主们就是现在把你们内部的删帖标准贴上来，我想大多数网友也都会理解的。³⁵

第 168 帖的作者讨论了强国论坛上的两个矛盾：该论坛是自由的网络空间，但自由导致了口水战和人身攻击。强国论坛作为网络论坛，应该有言论自由，但因它有官方背景，所以要施加一定的管制。作者然后解释，正因为存在着这些矛盾，所以在论坛用户和管理员之间要有一定的妥协，这样才能使论坛运作得更好。强国论坛必须制定并严格遵守一套规则，因为理性的网络讨论需要这些规则。同时，因为强国论坛深受欢迎以及它享有的特殊地位，它应该创造一个开放自由的环境，从而向政府展示新媒体可以在自由的环境下运作，并且教会用户如何使用他们的言论自由权。

另一种建议同讨论的形式和内容相关。其中一个建议提出，强国论坛不应人为地限制讨论的题目或问题，而应该欢迎批评政府的帖子，正如第 149 帖的作者认为的，因为办网络论坛不是为了增加一个对政府歌功颂德的地方——官方媒体在这方面已经做得太好。

最后，有些帖子讨论了强国论坛的潜在功能。网友意识到强国论坛开始发挥“世界新闻、不同观点和不同声音的信息集散地”的功能（第 199 帖）。这些建议共同建构了理想论坛的想象。有人提议，强国论坛应该服务于中国的民主治理。第 8 帖主张，强国论坛应该成为中国政府的网络兰德（RAND）公司。

第 82 帖建议“强国论坛应该成为倾听人民声音的地方，为政府献计献策”。其他的帖子强调民主参与：强国论坛应该成为普通公民参与政府的途径，“这个论坛应该成为人民的民主广场”（第 50 帖），论坛中的各种声音应该在官方新闻媒体上发表（第 23 帖和第 99 帖）。强国论坛上最常讨论的话题是如何利用它的特殊地位促进中国的民主政治。

□ 网络社区中家园的形象

有关网络社区的第二组形象集中在家和家人上。当人们在 1990 年代后期开始上网并建立个人主页时，他们习惯将自己的网站比喻成家。网站的主人经常发表有关他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建立网站的个人声明。其中一个个人网站的主人写道：“我上网快两年了，我经常想建一个漂亮的主页。但因为我不太懂[主页制作]，我的第一个主页直到 1999 年 5 月才出现。无论如何，我终于在网上有个‘家’了。”³⁶ 写于 2000 年 8 月 25 日的一篇日志说道：“今天，我决定制作个人主页，我很早就想做这件事了。我想在网上建一个家，把我最喜欢的东西放上去。我之前从来没有制作过主页，但现在已经用上了 FP2000。”³⁷ 我不在乎网页做得好不好，先做个试试。”³⁸ 写于 2000 年 9 月 2 日的日志描述道：“今天，我终于上传了我的主页，我欢欣雀跃。尽管发现不少漏洞，但不管怎样，我终于有个家了。呵呵。”³⁹

在我搜集到的网络自传中，家的形象给人最突出的印象。比如，一个男青年写了如下网络经历：

记得曾经有个叫“搜 3”的 BBS，吸引了很多时尚青年。我也被引入那个圈子当中。在那里，有文学板块，可供文学爱好者们交流切磋，也有许多的文学著作供人欣赏。……慢慢的，我就被这个 BBS 吸引了。在那里，发表任何言论都不受限制。不必像在校园里一样，说句话都得按课本的思路走，一不小心就要被老师批评。在那里，任何你看来不顺心或者有意见的事情，都可以反驳。经常在那里和人吵得一塌糊

涂，甚至争论一夜也不睡觉。那种乐趣，在现实世界中是从来没有体会过的。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我就和那些网友们打成一片，成了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但那毕竟是网络，一个虚拟的世界。我们决定转虚拟为真实，组织一次网友聚会。筹办聚会的资金由每位参加的网友平摊。在聚会中，我们像是分别已久的老朋友，那种激动的心情，不言而喻。（男，21，自传 H1）

这位男青年被他在网上发现的自由和社会归属感所深深吸引。辩论是快乐的，即使吵架也成了乐趣。他比较了可以跟网友一起做的事情和他不能在学校做的事情，在学校里他感到必须服从教科书规定的思维方式。

下面是一则年轻女孩的故事：

两年前的今天，在妹妹兔子的个人贴吧⁴⁰里邂逅了花的小孩，那位一直在幽吧活跃的灌水女王⁴¹，我们很合得来，于是，我、兔子还有花花便开始了幽吧灌水生涯……2005年底，花花申请建立观水吧，观水组正式成立……观水逐渐成为了一个大家庭，大家和睦相处，其乐融融。然而，就在我在水塔和观水两地快乐的灌水的时候，高三不知不觉降临了，家人觉得电脑对我的影响太大，于是在2006年1月的时候撤掉了我的电脑，我不是没有反抗过，但是自然没有用……只好向网友们挥泪作别，这一别就是四个月……在这四个月里，发呆的时候，寂寞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想起网上的家，好像那里成为了我的精神支柱，我有可以回去的地方，我有在等待着我的朋友们，只要想起这些，就会无比温暖。（女，19，大学生，自传 10）

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对网络社区的激动与兴奋。但同样，这份感觉不是来自网络的实际功用，而是源于自由感和友谊。年轻女孩原先的这种喜悦感在她被迫放弃网友后变得更加强烈。她写道，当她孤单时，就会想起“网上那个家”的巨大的温暖。她写的自传具有鲜明的色彩，用非传统的语言和风格进行

表达。很多词语和 ID 名听起来十分怪异，让人摸不着头脑，但她说到它们时，就像是她生活中自然的一部分。

这两个故事的作者都是大学生，他们的父辈是怎样的呢？以下一则故事来自一个前下放青年（“文革”一代），也表达了同样的喜悦：

我用电脑五六年，打打字而已，很是方便。偶尔也上网逛逛，但没觉得有什么大意思。个中原因，一是网速慢，半天打不开一个网页……单位开通局域网，家里也上了宽带，哈，速度飞快。我一有空就上网乱击一通，主要是搜寻有关老知青方面的网站。多少年来，我一直怀着深厚的知青情结，想与有着共同经历的老知青们建立一种联系，想找到一个属于老知青的家。可是，有大半年的时间，我竟没找到一个。当时，我真为我们知青悲哀，以为老知青们不是退休就是下岗，作为一个群体，已经被社会遗忘。以为网络只是年青人的天下，老知青们哪有这个闲情逸致。以为自己是游荡在网上的孤魂……在一次随意的点击之后，我进入了华夏知青网，然后是华知论坛、漫谈天地、老三届，一个全新的世界出现在我的面前：这不就是我苦苦寻觅的家么！⁴²

□ 网络社区中的武侠形象

第三组形象借用了武侠小说的语言，其中最核心的形象是江湖。江湖是武侠心目中世界的形象，是指背离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另一种世界。这是充满冒险、自由、越轨和神圣正义的世界，也是充斥着背叛、阴谋与邪恶的世界。江湖中的英雄通过伸张正义而追求名誉和荣耀。因此，江湖的最高行为准则是荣誉，具体就体现在“侠”上。“侠”的理想人格是几千年来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最早刻画了这一人格特征：“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⁴³这一理想影响了现代武侠小说，正如约翰·哈姆（John Hamm）在研究现代体裁时所言：

江湖世界是传统道家和儒家隐者的“山林”的积极替代，它同样远离权力宝座，但不满足于安静的修身养性。江湖的边缘地位、替代性社会政治制度的建立、土匪们“替天行道”的侠义感，都对传统上被视为全面的、等级化的、完全受神圣权威约束的现存秩序构成潜在的威胁。⁴⁴

然而，正如约翰·哈姆所说，江湖世界是“围绕善与恶这两个根本对立的力量建构起来的”。⁴⁵ 因此，它同时也是充满阴谋与邪恶的奸诈世界。

对很多网友而言，网络社区（以及整个网络）是他们的江湖。他们在其中寻找自由、冒险，甚至英雄感。把网络称为江湖是最近几年才流行起来的。2006年出版的《闪客江湖》是一本有关Flash短片文化的著作，它将闪客世界比作江湖。⁴⁶2006年，新浪将它的10周年庆典命名为“十年江湖”。在新浪致论坛网友的一封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十年了——还记得那些江湖上的人事吗？那些往日的故事，有的也许已经忘却，有的会永远记住，慢慢成为神奇的传说。江湖充满了故事。将来，当人们回首往事，他们会记得我们吗？拍砖⁴⁷、灌水、吵架——这是江湖上的三大绝技。这个世界任你遨游！⁴⁸

2007年12月奥一网（oeeee.com）BBS论坛上有个帖子列出了2007年60大网络英雄的名单，明确地将他们与武侠英雄对比。⁴⁹ 这个名单的开场白写道：“网络是江湖，BBS是战场。回首2007年，奥一网风起云涌，ID们前赴后继。有的壮烈牺牲，有的巍然屹立。真可谓各色人等盛装登场。”⁵⁰

一本名为《网络江湖游》的网络畅销书的宣传广告将网络描述为充满善与恶、神圣与诱惑的世界：

什么是江湖？

江湖是魔！

江湖是道！

江湖是血！

……

什么是网络？

网络是神！

网络是鬼！⁵¹

将网络比作江湖反映了人们对当今社会的观点。中国有学者指出，当代中国社会已沦为江湖。⁵²它正变得无法无纪：警察与有组织的犯罪勾结，地方政府彻底腐败，现有制度不能很好地运转，权力与金钱掌控了一切。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公民必须组织起来自卫，争取正义和自由。正是在社会沦为江湖的背景下，以下的个案研究才格外发人深省。

□ 一个求助帖引发整个社区的同情

网络社区动员的很多例子表明，网络行动的动力是自由、团结和正义，而这些价值也在行动中得到进一步的肯定。2005年发生了一起颇有影响的复杂事件，即所谓“卖身救母”案，故事是这样开始的。2005年9月15日，一则“卖身救母”的帖子出现在天涯社区。帖子的作者——我在这里称之为XY——声称她是重庆一个20岁的大学生，父亲在她11岁时死于肝病。她说她的母亲也得了肝病，生命垂危，因此必须接受肝脏移植。她非常感人地详细描述了她和母亲在求医过程中所经历的艰辛，她在文末求助道：“我多么希望有好心人能救救我妈妈!!!我宁愿卖掉我自己!!!可以以任何形式或者甘愿毕业后无条件地为他(她)打工，我保证我的自身条件是相当好的!我用我的人格和尊严担保，这是一个在校大学生为挽救病危母亲的生命而发自内心的呼声!!!”⁵³她在求助信后附了两个电话号码和一个电子邮件地址。

林郁沁在研究1930年代的公众同情时指出，通过媒体倾泻出来的公众同情，召唤出新型的公众。XY事件也体现了相似的过程。在XY发出求救帖后，

天涯社区的成员做出了迅速反应。XY 的帖子于 20:23 发在“天涯杂谈”上，20:48 有了第一个回帖，鼓励道：“不要灰心。我们大家都在给你想办法。”一分钟以后，另一个人回复道：“大家支持你的，希望会有的。”第三个帖子出现于 20:55：“女孩请坚强。大家先到各个论坛发帖，先让更多人知道女孩的情况！”有几个帖子让 XY 提供银行账号接受捐款。虽然有人警惕诈骗的可能，要求核查信息的真实性，但绝大多数人表示了同情与支持。有人引用屈原的名句评论道：“哀民生之多艰兮，长太息以掩涕。”另一个写道：“我的妈妈也病了，癌症……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妈妈都好起来。”还有人回道：“非常地同情你，孝心可嘉，我愿尽我的绵薄之力帮助你！”⁵⁴ 捐款立即蜂拥而至。XY 在 9 月 17 日汇报已收到 16,000 元人民币的捐助。重庆的地方报纸报道了 XY 的故事，她所在的大学和她母亲的工作单位也发起了捐款活动。⁵⁵ 11 月 8 日，一则以 XY 的名义发的帖子，公布了她收到捐助的具体数字。她共收到来自 217 人的捐款，其中包括来自外国银行的加币、美元和欧元。XY 没有去领外币，也没有领一些小额的捐款。除了这些以外，她共收到捐款 114,550 元人民币。⁵⁶

□ 一位网侠的诞生

正当社区成员对 XY 表示同情时，事情在 9 月 18 日有了出人意料的转折，因为一个叫“蓝恋儿”的人发帖质疑 XY 故事的可信度。该帖的作者说他/她本人认识 XY，称 XY 穿着最新款的阿迪达斯和耐克的鞋子，同时拥有手机和小灵通，戴一副 500 多元的隐形眼镜，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⁵⁷ “蓝恋儿”的帖子使社区陷入危机。如果 XY 确实欺骗了社区，这就等于她滥用了人们给予她的巨大的信任和同情，因此这些社区价值受到了威胁。一则发于 2005 年 9 月 30 日的帖子提议，社区应该选出 10 个信得过的人去重庆调查真相，因为“我们不要再生活在一个到处都是欺骗、人人都不可信的社会中了。”⁵⁸

虽然网上没有进行推选，一位名叫“八分斋”的网友却独自做了一次调查。“八分斋”生于 1975 年，在深圳做网络编辑。他分别在 9 月 30 日和 10 月 4 日发帖，敦促 XY 公布她的账户，将捐款委托给慈善组织管理。他因没有得到回应，

遂决定飞到重庆去调查。他解释道：

仔细一想，觉得善良不容践踏，善行不容亵渎，这件事情无论如何都应该有个结果。这个结果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实地调查，还原真相，弘扬善良……我想到了天涯网友的善良，并且这种可贵的善良已经付诸了行动，从想到说，然后到做，这是个质变的过程，十分不易！但我没想到这些力量同样储积得猛烈，高涨的情绪促使大家自发组成团队，一边表示支持有人去做调查，一边同心协力地要捐出费用，在这个别人看来虚拟的世界，真情却那么真实……但 XY 事件让这些善良之士觉得忧虑和愤怒。……唯有做独立调查，才能最终解决所有问题。⁵⁹

XY 在 10 月 8 日作出回应，邀请社区成员到重庆调查。“八分斋”于 10 月 9 日飞往重庆，加入调查的还有两名天涯社区在当地的网友以及另一名来自上海的网友。他们访问了 XY 的大学、宿舍以及住处，访谈了 XY 和她的母亲，分析了她的银行账户。他们发现 XY 在捐款上不是非常坦诚，她的故事有很多漏洞。⁶⁰回到深圳后，“八分斋”开始发布他的调查报告，从 10 月 19 日到 22 日分 9 部分在天涯社区上连载。

“八分斋”的调查报告的公布整个社区活跃起来。大量帖子赞扬“八分斋”和他的同伴金官人自费调查的英雄义举。我从 2005 年 10 月 19 日（“八分斋”发表第一部分调查报告）到 2005 年 12 月 23 日（天涯缓存的最后一天）这一期间下载的帖子，多达 1960 张单倍行距的页面。网友们通过赞扬“八分斋”和金官人，表达了并且加强了理想社区的价值。有人赞扬他们的行动：“一大善举，为以后网络捐助规范化做出了贡献！（2005-10-19 23:16:51）”⁶¹另一些人称他们是“侠”，赞扬他们的胆量、勇气和力量：“敬重八分斋和金官人的侠肝义胆。（2005-10-21 14:08:02）。”还有帖子使用了带有性别色彩的语言，把调查者标榜为男子汉的榜样。有人高度评价道：“八分斋 GG 是真正的大侠！（2005-10-23）”另一个说道：“金大哥和八哥都是真汉子，敢做敢当的男人。（2005-10-19

23:26:46)”

很多评论者说他们在这腐败的世界中看到了希望，因为还有勇敢的人为正义而战。一个人说：“PF 那些到现场的朋友，是你们让俺觉得人间还有正义。(2005-10-19 23:47:31)”另一个更详细地说道：

我赞成大家捐钱弥补八分斋和金官人的误工费、差旅费和调查费。对八分斋和金官人铁肩担道义的侠义行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我建议天涯杂坛的网友全体起立，放下手中的鼠标，共同为二位大侠的胜利归来热烈鼓掌三分钟!!! (2005-10-20 00:25:54)

□ 隐私与信任

对“八分斋”的赞扬持续了好几天，他的调查报告的每一次连载都引来无数仰慕和热情的讨论，讨论的话题非常广泛，涉及当今社会主要的严重问题，包括信任、正义、慈善、孝道、隐私和性等等。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一事件的历史重要性。有人认为，该事件可能是 2005 年最重要的网络事件，甚至是中国网络文化历史上的重要事件。⁶²

这些有关正义、英雄主义、自私、信任和慈善的激烈讨论，显示了网友对社区纯洁的强烈渴望，事实上是纯洁社区的冲动。正是在这些讨论过程中，一些激进的行为发生了。黑客以寻求正义、曝光 XY 的名义，入侵她的个人邮箱，获得她在 QQ 上的聊天记录，将其在网上曝光。这些黑客立即被冠之以江湖中的英雄豪侠。然而，也有不同的声音，对黑客获取 XY 个人信息的做法提出质疑。在一则长度超过 2000 个汉字的帖子中，作者认为：

QQ 的聊天记录应该说是基本准确的记录了 XY 母女操做整件事情的初衷和实施的心理过程……我们在道德上对她们作出批评或者批判，是因为道德体现了社会的公正性，正义性，必须去约束和抑制生活里那些利益至上的不道德手段。XY 母女的行为从根本上说还是破

坏了大家在经济利益和基本权利上的对等关系，侵犯了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的权益，这是我对这个事情定性。

但 XY 母女的行为就一定十恶不赦的吗？……我想谴责的是那位或者那些手法高明潜入 XY 电脑的侠客朋友们，你们采用的这些手段难道就不该是被我们批判的吗？……如果今天您进入了 XY 的电脑暴露人家的隐私而不受谴责的话，那么明天就会有更多人的电脑同样被侵袭，就会有更多人的隐私同样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坚定地认为：用不合法的手段获得的真相和结果，不应该被我们接纳。⁶³

有关隐私和正义的讨论非常激烈，引发了正义与信任之外的很多问题。正当这些讨论热烈地展开之时，传来了 XY 母亲于 10 月 24 日在动手术时去世的消息。这一消息使社区再次陷入危机。有些网友指责是“八分斋”加速了 XY 母亲的死亡，因为他无情地曝光 XY。他们认为，XY 的母亲选择动手术而不是等待肝脏移植，是因为她知道可能死于手术，她想通过自己的死亡为女儿正名。也有人对 XY 母亲的死亡表示哀悼，但仍支持“八分斋”，认为虽然很多人说要找出真相，但只有“八分斋”一人不怕费事地飞到重庆去实地调查。因此，很多人坚持认为 XY 仍应公布捐款账目。有人认为，如果 XY 不公布详细的捐款数目，她将背叛捐款给她的人和她在其中求助并得到巨大同情与支持的整个天涯社区。⁶⁴有人用两个简单的词回帖道：“支持诚信。(2005-10-24 11:19:13)”还有人详细分析道：

有些人认为，XY 的母亲已经去世了，为了不要再在 XY 的伤口上撒把盐，不要再追究了，这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观点。窃以为，“卖身救母”事件体现了一个网络救济的新社会现象，把“卖身救母”事情调查清楚，从这件事情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为以后网络救济探索出一条可行之路，使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得到帮助，因而，一个清晰的调查结果是必需的。⁶⁵

因此，对“八分斋”的支持者而言，社区最初因信任而共同行动，但又因信任被违背而受到威胁，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修复并重建社区的信任。11月8日，一则以XY的名义发的帖子公布了捐款的详细账目。在她收到的114,550元人民币的捐款中，42,707.06元用于她母亲的手术，剩下的71,842.94元转赠给一家针对白血病患儿的地方基金会。⁶⁶此后，这件事才平息下去。

□ 自私社会中的利他行动

XY事件是网络行动的重要个案，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该案例反映了网络社区与网络行动相互建构的复杂动态过程。在这个案例中，天涯社区为表达社会关注、组织集体行动提供了社会结构。这一争议事件既肯定了道德社区的价值，也暴露了它的一些弱点。其次，网络慈善是较新的议题，是不断扩大的当代积极行动议题领域的一部分。第三，该案例中的行动形式在多维动态以及行动方式的说服力方面是个典范。这一事件结合了线上与线下行动，包括个体与集体、网络与官方媒体等不同行动者的互动。线上与线下行动的结合尤为重要，因为这表明网络社区有足够强大的集体情感和团结意识以产生有效的线下行动，而线下行动会促进网络社区的重建。

第四，该事件涉及的问题的性质表明，网络慈善活动的政治，与中国常见的社会运动的政治有所不同。首先，它是有关当今中国社会危机的强有力的象征性宣言。就这点而言，它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在该案例中，社会危机的两个方面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一是贫弱病穷者急需社会救助。XY卖身救母的求助反映了绝望的严重程度；救助在社区中激起的回应反映了危机的普遍性。此外，该案例反映出社会危机的另一方面，即中国社会的信任受到了严重破坏。在整个事件中，社区成员最核心的关注是信任的重建。

再次，该案例里还暴露了中国国家福利制度的可叹境地。社区成员经常提到的是国家福利制度的缺憾，以及现存制度如何无法应对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网友们对中国政府的看法不同于对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看法，他们认为照顾公民是国家的责任。一则帖子提到重庆一家慈善组织发言人说他们的组织不能合

法地接受给 XY 的捐款，因为只有少数全国性的组织才有资格接受捐款。⁶⁷ 另有人解释他 / 她不会捐款的原因，是认为问题出在政府社会福利制度的缺陷以及制度运转的不足。⁶⁸

最后，这是一个有关网络时代积极参与的公民的权利意识觉醒的个案。面对一个网络求助帖，天涯社区的网友通过迅速动员和积极参与加以回应。他们用行动表明，在政府失灵的情况下，他们可以自主采取行动，重建社区与道德。一个 BBS 求助帖，得到 217 人的捐款回应，有力地说明他们对受道德与信任威胁的社会仍怀有信心。另外，即使只有两个人不远千里去寻找真相，但他们在做这件事时并不是孤立无援的。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支持，激励了社区，使关爱、同情、责任这些在当代社会中受到破坏的价值重放光彩。这些价值都是公民性价值。该案例和其他个案的重大意义，归根结底在于它们对这些价值给予了肯定。⁶⁹

梅鲁西在研究当代社会运动时，将利他行为视为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运动。这种运动“表现出来的特征，是参与者之间自愿性的团结关系，他们并非通过参与获得任何经济利益”。⁷⁰ 他之所以认为这些行动是社会运动，是因为它所拥有的符号意义。“在这些行动中，冲突性的行为直接冲击了主流文化符码的形成过程。正是通过这一行动，权力的语言和工具理性符号受到了挑战。单单这一行动的存在就挑战了权力、搅乱了权力的逻辑，并建构了替代性的意义。”⁷¹

我所研究的个案与梅鲁西有关集体行动的见解相契合。该个案是中国现代性条件下的利他集体行动的体现。有人认为，在日益商业化和自私的社会中谈利他行为纯属空想。在社会主义利他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也仅仅保存了对他们那时的理想的回忆。⁷² 一个新的“我世代”出现了，自恋的渴望充斥着这个时代。⁷³ 这些都发生在中国社会两极化和碎片化的过程中。或许正是这些冲突引发的幻灭感，为乌托邦冲动的产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网络行动是乌托邦冲动有力的表现形式，但不是唯一的表现形式。乌托邦冲动在中国生活中无处不在，正如詹明信所言，它体现在生活中的人和事上，体现在美、完整、力量和完美这些乌托邦符号之上。而我还要补充的是，它还体现在追求正义、信任与团结的渴望之上。

□ 结论

本章说明，网络社区是人们实践他们想象能力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想象成果是吉登斯所说的乌托邦现实主义和詹明信所言的乌托邦冲动。在中国无数网络社区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追求归属感、自由和正义的强烈愿望。这一渴望是在中国社会日益碎片化的历史背景下出现的，表达了对中国现实的强烈批判和寻找替代性世界的抱负。它通过语言和行动表达出来，表达的过程则将网络社区变成了道德空间，⁷⁴理想化的社会愿景在那里得到考验、质疑和肯定。本章通过展示乌托邦价值如何活跃社区和激发道德行动，展示了中国网民如何在一个反乌托邦的时代对乌托邦的积极价值予以肯定。他们对变革与替代性现代化存在的可能性给予了肯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乌托邦的冲动是现实的。

网络社区并不是没有自己的问题。讨论较多的问题是网络上的辱骂行为 (flaming)，中文称之为“网络语言暴力”。2007年夏我在北京，正值中国主流媒体就此展开讨论，认为中国网络空间深受语言暴力之害，并把网络语言暴力归咎于网络的匿名性和互动性。类似的论调通常得出政府必须加强网络控制的结论。这一观点的意识形态特征十分明显，它的错误性也一样突出。首先，这一观点对事实有所夸大。网络语言暴力，或称暴力对话，并没有像一般描述的那么普遍。⁷⁵在我经常访问的BBS论坛中，更多的是友好愉快的对话和讨论。当人们抗议社会不公时，的确会骂人。但在那样的情境下，就那种性质的讨论，出现这样的表达方式也不足为奇，他们毕竟在抗争。这一观点更严重的错误在于，它将暴力对话的出现怪罪于媒体，好像人们一旦获得自由表达的权利就会自动参与语言暴力。它忽视了中国现实中更大的背景，即不仅暴力对话在增多，诸如示威和骚乱等暴力形式的集体行动的数量也在增长。如果说网络空间中的暴力语言增多了，那么它与街头上经常出现的抗争性行为有着相同的根源。交往的危机源于社区的危机。

中国网络社区的乌托邦冲动，带有沉重的语气，传达了社会的危机。武侠里的江湖意象，算得上是当今中国网络最常用的隐喻。它表达了在这个善恶杂糅的世界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它所表达的，既是理想，也是现实。这一现实不

仅关乎网络,也关乎社会。同网络一样,中国社会现实也有阴暗面。同网络一样,中国社会正沦为江湖,其中不断衰弱的制度、文化和社区正导致无法无纪的状态。⁷⁶ 公民愈来愈像传说中的武侠英雄那样,被迫奋起去重建信任、正义和道德。他们面对的挑战之严峻,犹如形势之紧迫。

希望在于社区的重建。阿帕杜莱在研究跨国和国家以下的公社形式时认为:“这些公社是自在社区 (communities in themselves), 但它们也是潜在的自为社区 (communities for themselves), 能够从共同的想象, 跨向集体行动。”⁷⁷ 本章所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跨越。在这里,网络社区的成员不仅试图一起想象新的价值,同时也努力将它们付诸实践。中国网络社区中的乌托邦冲动是对道德社会的渴望。

注释

- 1 Jameson,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3.
- 2 同上 175。
- 3 同上 197。
- 4 Giddens,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1991.
- 5 罗伯特·莱瑟姆 (Robert Latham) 和萨斯基亚·萨森 (Saskia Sassen) 讨论了一些电子型构的例子, 如电子市场、基于网络的大规模对话、由 NGO 网络产生的知识空间。他们提出, 当“一个有关组织、空间和互动的连贯结构”可以得到辨认时, 电子型构就能被辨认。参见: Latham and Sassen, “Introduction: Digital Formations,” 9。我使用“网络社区”而不是“虚拟社区”, 是为了避免让人产生虚拟的是不真实的感觉。威尔曼和古里亚在“网络冲浪者不独耍”(“Net-surfers Don't Ride Alone”)一文中指出, 电脑网络是社会网络。因此, 虚拟网络是真实的网络。有关虚拟网络, 参见: Rheingold, *The Virtual Community*, 5.
- 6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 7 Wellman and Gulia, “Net-surfers Don't Ride Alone,” 331.
- 8 同上。
- 9 Hockx, “Links with the Past.”
- 10 刘华芹, 《天涯虚拟社区: 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
- 11 人类学家和文学家已做了一些最好的研究展示了游戏的政治意义。参见: Turner, *From Ritual to Theatre*. Also see Bakhtin, *Rabelais and His World*. 学者已开始将网络中的游戏视为一个复杂的社会与政治现象, 参见: Ernkvist and Ström, “Enmeshed in Games with the Government.”
- 12 Davis et al.,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13 Kraus, “Public Monuments and Private Pleasures in the Parks of Nanjing.”
- 14 Chen, “Urban Spaces and Experiences of Qigong.” See also Chen, *Breathing Spaces*.
- 15 Liu Xin, “Urban Anthropolog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in China,” 123, 124.
- 16 Zhang Li, “Contesting Spatial Modernity in Late Socialist China,” 464.
- 17 Yang, “Spatial Struggles,” 750.
- 18 1994年, 当我刚开始在美国的研究生院读书时, 打到中国的电话1分钟大约要花1到2美元。现在, 如果人们还使用电话的话, 他们可以用10美元买到1张1000分钟的电话卡。
- 19 那时候还没有万维网, 人们用ftp服务器下载电子杂志阅读。
- 20 <http://www.wenxue.com/mediakit.htm>, 获取日期: 2001年8月4日。译者注: 根据英文译回中文。
- 21 ZWDOS 是在汉字解码普遍运用于网络浏览系统之前用于阅读汉字的小软件程序。
- 22 伊妹儿是“E-mail”很流行的中文音译, 字面意思是“那个妹妹”, 这个翻译给该词增添了可爱而浪漫的色彩。
- 23 “《华夏文摘》编辑电脑‘键’谈会”。
- 24 http://www.sohu.com/Education/CHat_BBS/University_bbs/index.html, 获取日期: 2000年11月30日。
- 25 这两个网站的网址分别是 <http://bbs.pku.edu.cn> 和 <http://bbs.xjtu.edu.cn/cgi-bin/bbsall>
- 26 彭兰, 《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
- 27 Wilson,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236.
- 28 同上。
- 29 林木, 《网事十年》。
- 30 陆群, 《中国网虫传奇》。
- 31 Wang and He,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 in China.”
- 32 董晓常, 《打碎旧世界》。

- 33 同上。
- 34 于 1999 年 2 月 21 日贴在 bbs6.sina.com.cn 帖子, 获取日期: 2006 年 4 月 26 日。
- 35 强国论坛精华帖子集, 作者存档。
- 36 <http://ago99.51.net/ago/ago-7/index.htm>, 获取日期: 2001 年 2 月 25 日。
- 37 即微软公司开发的用于制作网络和图表的 FrontPage 2000。
- 38 <http://vinci2000.home.chinaren.com/diary.html>, 获取日期: 2001 年 2 月 25 日。
- 39 同上。
- 40 贴吧是百度的网络社区, 据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网络社区。
- 41 灌水是网络俚语, 指无止尽地发帖。
- 42 “河水” [用户名], “上网三月之体会”。
- 43 Yang Lien-sheng, “The Concept of ‘Pao’ as a Basis for Social Relations in China,” 294.
- 44 Hamm, *Paper Swordsmen*, 17.
- 45 同上, 138。
- 46 王颖吉, 《闪客江湖》。
- 47 在中国网络用语中, “砖”是指批评一个帖子的帖子。
- 48 “十年江湖·新浪论坛致网友的一封信”, 链接: <http://forum.service.sina.com.cn/cgi-bin/viewone.cgi=79&fid=4260&itemid=28568>, 获取日期: 2006 年 11 月 2 日。
- 49 奥一网 (oeeee.com) 是深圳的一家公司。截至 2008 年 1 月 31 日, 它的 BBS 论坛 (<http://webbbs1.oeeee.com/index.html>) 拥有 1,136,384 个注册用户, 论坛上平均每天有 2000 多个帖子。
- 50 <http://webbbs1.oeeee.com/bin/content.asp?artno=6218086&board=1035>, 获取日期: 2008 年 1 月 31 日。译者注: 根据英文译回中文。
- 51 <http://www.d9cn.com/d9info/2/2415.htm>, 获取日期: 2008 年 2 月 20 日。
- 52 于洋, 《江湖中国》。
- 53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1744000&Key=521562>, 获取日期: 2006 年 3 月 8 日。
- 54 以上所有引用的帖子都来自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Article=339532&strItem=free>, 获取日期: 2008 年 1 月 31 日。
- 55 谭人玮, “‘卖身救母’引发网络风暴”。
- 56 关于这笔钱, 42,707.06 元花在给她妈妈做手术上, 剩下的 71,842.94 元转赠给当地一家针对白血病患儿的基金会, 参见下文。也见: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free&idArticle=377210&flag=1>, 获取日期: 2006 年 3 月 8 日。
- 57 <http://www9.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341118.shtml>, 2006 年 3 月 8 日。
- 58 “insmile,” 2005-9-30 12:27:33. 参见: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Article=339532&strItem=free>, 获取日期: 2008 年 1 月 31 日。
- 59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360494.shtml>, 获取日期: 2007 年 10 月 8 日。
- 60 比如, XY 称她从邮局或海外收到很小数量的汇款。参见: 谭人玮, “‘卖身救母’引发网络风暴”。
- 61 以下引用的帖子来自: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360494.shtml> and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361650.shtml>, 获取日期: 2007 年 10 月 8 日。
- 62 “网不管”于 2005-10-21 17:17:09 发的帖, 参见: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361650.shtml>, 获取日期: 2007 年 10 月 8 日。
- 63 时间戳: 2005-10-22 13:13:58, 参见: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361650.shtml>, 获取日期: 2007 年 10 月 8 日。
- 64 “终于不懂”, 2005-10-24 14:20:01, 参见: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363730.shtml>, 获

- 取日期：2007年10月8日。
- 65 “秋凝水” 2005-10-24 12:01:49, 参见：<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363730.shtml>, 获取日期：2007年10月8日。
- 66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free&idArticle=377210&flag=1>, 获取日期：2007年10月8日。
- 67 “麦纳麦内”, 2005-10-24 16:24:43, 参见：<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363730.shtml>, 获取日期：2007年10月8日。
- 68 “yeah_luo,” 2005-10-26 17:53:05, 参见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free/1/363730.shtml>, 获取日期：2007年10月8日。
- 69 对XY隐私权的侵犯伤害了道德社区，但同时将讨论的范围延伸到正义与隐私、自私自利与社区之间的平衡问题。
- 70 Melucci, *Challenging Codes*, 167.
- 71 同上, 169。
- 72 Yang, “China’s Zhiqing Generation.”
- 73 参见文章《我世代》。
- 74 Orgad, “The Internet as a Moral Space.”
- 75 有关西方社会英文新闻组中的辱骂行为的研究，也显示这一现象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普遍。参见：Kayany, “Contexts of Uninhibited Online Behavior.”
- 76 将中国社会比作武侠世界的江湖的著作因此才会受欢迎。参见于洋, 《江湖中国》。
- 77 Appadurai, *Modernity at Large*, 8.

跨国网络行动

本章讨论网络行动的最后一个动力，即跨国主义。我的样本中很多案例具有跨国特征。在有的案例中，国内积极分子主动向国际行动者寻求帮助；有的是国内积极分子通过网络攻击外国政府或公司；还有的是有关国际非国家行动者试图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压力影响中国政治。当抗争行为中的非国家行动者跨越了国家边界，我便称之为跨国行动。¹参与其中的行动者为跨国行动者。跨国行动不是新事物，但同网络结合而成的跨国网络行动却是新的。

转入对中国网络空间中的跨国行动的讨论，就进入了网络行动的新世界。这里有我在前几章中分析到的所有形式的网络行动，但其中也有新内容。中国网络行动中一些最激进、最具颠覆性的事件和议题，均具有跨国性。如果用直接挑战国家的程度去衡量激进程度，那么中国网络行动的激进程度似乎与跨国程度成正比。跨国程度越高，网络行动变得越激进。本章将分析跨国网络行动的不同类型，探讨跨国化对中国网络行动的影响。本章表明，跨国化拓展并激化了网络行动，提高了网络行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我将跨国行动分为两种：

一种源于中国国内，另一种来自国外。地缘政治可以大体解释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总体而言，来自国外的行动比国内的行动更激进，对国家的合法性更具颠覆性，但在每种类型之中，都或多或少有些激进形式。这一不同是由另外几个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最重要的是行动者个人和组织的特征。

跨国网络行动中的行动者可分为三类：国内的、侨民的和国际的。国内的跨国网络行动者在中国国内活动，但试图通过与外部的联系加强他们的影响。侨民行动者是居住在海外的华裔，他们希望从外部影响国内政治，这点与 NGO 这样的国际非国家行动者相同。三个群体参与的网络行动在形式上有重合，但也有所不同，这反映了他们在议程、资源及在地缘政治中所处地位上的不同。我首先回顾中国跨国行动的历史条件。

□ 晚近中国历史上的跨国行动

在中国，虽然跨国行动很早之前就存在，²但最近几十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全球化，制造了新的怨恨，并提供了新的机会，从而直接促进了新一波跨国行动的兴起。³在中国，这些因素以特殊的组合方式，塑造了网络行动的跨国性。第一个因素是现代中国民众抗争的历史与文化。这个历史不仅产生了全球框释 (global framing)⁴ 和全球思维 (global thinking)，而且确实表达了面向世界的理想，五四运动期间通过宣言风格表达的对科学与民主价值的渴望就是这样的理想。随着 1978 年经济改革的开始，这种文化渴望得到更强烈的表达。对启蒙的渴望不仅在 1978 年民主墙运动中再次得到表达，更为重要的是，民主墙运动的积极分子已经策略性地寻求国际压力，去推动他们的事业。在那次运动中，一封致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总统的公开信在 1978 年 12 月 10 日贴到民主墙上，另一封写给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的信，于 12 月 15 日贴上墙。关于中国，致布热津斯基的信写道：“人权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但这一事实却仍然被完全否认……我们希望您和卡特总统将来能更多关注我们国家的人权运动。”⁵

种种原因使得现代中国民众抗争文化中的全球因素散落世界各地，为跨国

抗争文化创造了社会基础。随着海外中国学生数量的增多，他们在继续关心祖国的问题之时，也拓展了国际网络，其中有些人，成为不断发展的国际跨国行动的“纽带”。⁶

这些联系人在发展过程中与国际非政府积极分子和组织相遇，这为中国网络行动的跨国化提供了第三个条件。我在第五章已经讨论到，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公民群体数量不断增长，影响力有所提高，在中国工作的国际NGO的数量同期也成倍地增加。⁷根据《中国发展简报》在网上公布的中国国际NGO的目录，截至2004年，仅在环保领域，在中国的国际NGO就有40个。它们大部分是在1990年代末期或2000初期才开始出现的。

最后，中国网络的历史与文化有利于中国网络行动的跨国化。中国网络社会史是从1980年代末期海外中国学生和学者在中国之外开始的。中国学生最早使用的以社区为基础的网络服务是邮件组和新闻组，最主要的文化产品是电子中文杂志。因此，从一开始，中国网络文化就是一个跨国性的文化。此外，当网络进入中国后，中国网友迫切地阅读海外的中文网站，因为那时国内网站的内容还很贫乏。中国网络企业家也从海外中文网站那里获得了灵感。例如，“黄金书屋”的创始人回忆道，他之所以在1998年创办网站，是因为他访问了设在美国的“新语丝”网站之后，意识到他也可以在中国建立一个相似的文学网。⁸

□ 在中国的国际NGO

与中国公民行动相关的国际非政府行动者有两种：在中国之外运作的组织和在中国国内活动（比如设立办公室或项目）的组织。它们大部分是国际组织。总体而言，在中国的国际NGO避免直接挑战国家权威。它们和中国的同类组织一样，在政治不确定和行政模糊的环境中运作。很多这样的国际组织没有注册，或注册成商业组织，正如凯瑟琳·默顿（Katherine Morton）所说的，“在实践中，他们往往牺牲自己的原则，与政府机构和地方合作者达成妥协”。⁹它们避免采用对抗性方法，这反映了国内的政治环境。与中国的同类组织一样，

它们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公众教育、意识提高、能力建设以及在政治上安全的其他活动。比如，尽管绿色和平组织以使用激进策略出名，但据它的项目官员称，它在北京的办公室主要依赖媒体动员，而不是扰乱性的策略。¹⁰ 这一点可以在中国绿色和平组织办公室的介绍中看到。

在西方，壮观的“直接行动”策略使绿色和平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但绿色和平不打算在中国再次尝试直接抗议行动，据北京办公室主任曾彭春说，他们将集中“使处理方式适应环境”。他相信中国政府会回应建设性的倡导，而且中国大众媒体也能接受绿色和平提出的重要议题。¹¹

在中国的国际 NGO，通过能力建设、公共交流和提高公民参与等方式促进网络行动。它们对网络的使用方式也相类似。比如，全球自然基金（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办有内容广泛的中文网站。在网站上，志愿者可以注册并参与活动，记者可以登记他们有兴趣报道的特定议题，网友可以加入 BBS 论坛中的讨论。英特新闻（Internews）是一家设在加州的国际媒体发展 NGO，它与中国当地机构合作，为媒体和法律行业开发网络信息和教育资源。

《中国发展简报》是另一家在中国关注公众教育和能力建设的国际 NGO。它在 2007 年被关闭，说明国际 NGO 在中国政治环境中的微妙地位。《中国发展简报》创办于 1996 年，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的出版物，其创办宗旨是为中国日益增长的非盈利部门和慈善部门提供一个信息平台和能力建设工具。该网站英文版的宗旨是“帮助外国人更了解和理解中国”，2001 创建的中文版网站旨在“帮助中国的行动者更了解和理解国际上的发展路径”。它的网站每个月有成千上万的访客。¹² 然而，2007 年 10 月 7 日，《中国发展简报》编辑高扬（Nick Young）却宣布他们的网站迫于压力而关闭：“作为英文版《中国发展简报》的编辑，我因‘非法调查’被指犯有违反 1983 年统计法的罪，并接到命令必须停止出版。显然，这个网站（服务器在英国）上发布的报告都会被认作是未经许可的调查所得出的结果。”¹³

□ 中国之外的国际 NGO

在中国之外的国际 NGO 涉及与中国相关的议题更为广泛，策略也更加多样，更具对抗性。在网络使用和网络行动领域，有参与能力建设、信息共享、价值倡导和媒体动员的国际 NGO。全球绿色资助基金是从事能力建设的一个国际 NGO。该组织旨在培育全球积极分子团体的草根社区，2000 年以来一直支持草根公民团体。它资助的领域之一是建设作为交流网络和资源中心的网站。根据其网站上列出的受助者名单，全球绿色资助基金已经资助了很多小公民团体的网站建设。比如，2001 年它给藏羚羊信息中心提供了 1000 美元的资助，“以改进发布偷猎濒危动物藏羚羊信息的英文网站”。¹⁴ 2002 年，它资助了大约 10 个公民团体创建网站。其中包括给一个组织资助了 3000 美元，“帮助提高环境问题的公众意识、维护网站、为中国绿色 NGO 编辑电子季刊”。另一家组织获 2000 美元，“资助其网站创建以及制作学生环保组织网络的交流材料”。¹⁵ 2006 年，它资助 3000 美元给贵州人网——“一个以网站为基础的致力于提高农村教育、改善生活条件、促进环境保护的社区”。¹⁶

很多在中国之外的国际 NGO，宣称致力于“促进人权”和“言论自由”。它们使用了在国际 NGO 文化中被广为接受的行动剧码。这些组织有“大赦国际”、“无国界记者”、“人权观察”、“中国人权”等。

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个新趋势：在中国之外，越来越多的以网络为基础的项目——特别是博客——致力于公开和提倡与中国相关的议题。例如，中国数字时代 (China Digital Times) 和全球之声 (Global Voices)，都广泛地报道中国公民行动的事件。它们也经常及时地发表中文网络帖子的英文翻译，因而有助于向全球观众传播中国积极分子的抗争性消息。比如，全球之声报道了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公民记者”周曙光的行动。¹⁷ 我在第四章已谈到，周曙光在 2007 年 3 月坐了两天火车，赶到重庆报道“钉子户事件”，即有关一对夫妇因未获得足额补偿而拒绝搬迁的故事。以下是全球之声网站上有关周曙光博客文章的众多英语翻译之一：

As everyone knows, some reports of news like this which involves the government will surely never be reported, and [online] stories will be deleted at the request of unknown “relevant departments.” There had been a Sina blog reporting 24 hours a day on the situation, but that blog later disappeared. That’s why I realized this is a one-time chance, and so from far, far away I came to Chongqing to conduct a thorough investigation, in an attempt to understand a variety of viewpoints.¹⁸

众所周知，这种涉及官方政府的新闻肯定会有一些报道不能面世，或者新闻稿件在不知名的“相关部门”的要求下被删除。之前在新浪有一个 BLOG 在全程 24 小时报道，但后来那个 BLOG 消失了。所以我意识到这是一次机会，我决定千里迢迢来重庆明察暗访，企图了解多方观点。

□ 网络上的华人离散社群

华侨是个异质的群体。学者经常说，广泛的华侨网络在改革时代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华侨对中国政治事务的影响也丝毫不弱。正如我在第一章提到的，华侨对网络行动的介入可追溯到 1989 年，当时海外的中国学生利用网络为国内的学生动员提供支持。

跨国网络行动中至少有四类海外华人的参与。第一类是通过进入中国 BBS 论坛并在其中发帖所进行的个体性的直接参与。我的样本中有些大型的网络抗议，其中有很多证据表明有华侨参与。比如，在 2000 年邱庆枫之死引发的抗议中，中国各 BBS 上的一些帖子，很明显是由在美国的网友发布的。这些网友往往称他们是北大校友。比如，一个叫“Wanderer”的人于 5 月 29 日在强国论坛上发了一则帖子。“Wanderer”自称是在美国念书的中国学生，她 / 他赞扬美国校园的安全措施，并建议中国大学可以向美国学习。

第二类侨民积极分子网络是国外大学里的中国学生社团。1978 年，中国

开始实行开放政策，中国学生开始到海外留学。留学生多的地方，大都会组建“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这些组织为离家的学生提供帮助和归属感，也是其他各种组织活动的基础，其中包括跨国积极行动。比如，在1989年，海外中国学生社团积极利用新闻组和电子邮件，为国内的抗议者争取支持。1996年的一起网络运动，抗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NBC）对参加1996年奥运会的中国运动员的报道。¹⁹1998年，网络抗议和线下示威共同反对在印尼发生的种族暴力。

1998年的这起事件，很好地说明了网络行动的跨国广度。²⁰从1998年5月12日至15日，印尼雅加达发生了骚乱和暴力事件，伴有大规模抢夺和破坏华裔印尼人的财产以及骚乱之后几天内集体强奸华裔女性的行为。针对这些暴行的全球性抗议是由新西兰的谭乔（Joe Tan）先生发起的，他“因等闲视之而感到羞耻，并对大部分人的冷漠态度而感到厌恶”。²¹他同加拿大的研发工程师蔡谈（Tan Tse）、三藩市的律师爱德华·刘（Edward Liu）以及在加州甲骨文公司（Oracle）工作的华裔马来西亚人洛依（W. W. Looi）共同建立了世界华人联盟（www.huaren.org），直接用文化中国的概念，在全球范围内举行抗议印尼种族暴力的行动。²²

华裔菲律宾人威廉·韦（William Wee）在美国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大学教计算机科学。他敦促那里的中国学生社团去首都华盛顿组织示威活动，韦的呼吁使抗议活动升级。他用英文撰写的有关示威计划的信，于1998年7月17日发表在北美自由论坛上。²³他们建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动员人们参与华盛顿的示威活动，还通过网络制定相应的计划，以协调世界各地的示威。在接下来几周内发生的事情，令人惊叹。1998年8月7日，抗议印尼暴行的示威活动在华盛顿、芝加哥、三藩市、洛杉矶、休斯顿、纽约和多伦多等地举行。8月8日，芬兰的赫尔辛基市和新西兰的奥克兰市举行了示威。8月15日和16日，亚特兰大和温哥华两地分别发生了示威活动。8月22日，达拉斯也有类似的抗议活动。

第三类侨民积极分子是海外异见人士团体。异见团体有不同的类型，他们可能有不同的政治目的，寻求不同的支持者，使用策略与手段各有不同，但他

们的共同点是对网络的创造性使用。近几年来，侨民积极分子的网络行动一直非常显著。²⁴

这些社区中的跨国网络行动有几个特征。特征之一是很早认识到网络可以成为表达的工具。在这点上，他们与国内的人有着共同的眼光，如第三章中讨论到的《隧道》杂志的编辑和发布，在海外则有《大参考》。根据1999年《洛杉矶时报》的一则报道，《大参考》是总部设在美国的中文杂志，它的编辑们给国内25万个电子邮箱发送杂志，杂志用不同的邮件地址随机发送。²⁵特征之二是采用各种策略，从而接触读者。这包括通过电子邮件、聊天室、BBS论坛、网络抗议、网络杂志发送，以及有时采用黑客行动等双向和单向的交流。²⁶第三个特征是发展出集结电视、报纸、广播和网络的复合交流网络，使运动受到关注。赵月枝对“法轮功”媒体行动的分析表明了这一特征。²⁷

第四类侨民积极分子是非盈利的、以网络为基础的组织。新语丝网站就是个有影响的例子，它是发挥有效监督功能的跨国网络行动的典型。新语丝是方是民（笔名方舟子）创办的网站，他是在加州的生物化学家。新语丝创办于1994年，是一个登载新闻与文学作品的中文电子杂志。近些年来它以曝光抄袭和中国科学与学术圈其他腐败的、不道德的行为而闻名于中国国内。²⁸在过去几年中，这些网络出版物得到中国学术圈的热烈回应，新语丝因而成为海外最有影响的监督网站之一。其中一个案例是新语丝有关中国生物化学家滥用科学权威的报道，促使中国生物化学家协会出台了一个规定，禁止会员以协会的名义参与商业广告活动。²⁹方舟子的文章已经结集在中国和日本出版，反映了该网站在线下的影响力。2004年，广州一家杂志将方舟子列为中国最有影响的50个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以表彰他揭露300多个学术腐败事件，以及他对个人自主和理性判断的持续尊重。³⁰

另一个有影响的案例是《华夏文摘》。《华夏文摘》在早期具有积极行动的倾向，之后发展出自己的特色，比如创办了“文化大革命”的虚拟博物馆。“文化大革命虚拟博物馆”是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最多的网络资源，是海外华人的独特案例。

□ 网上“文革”博物馆

“文化大革命”是受限的公共讨论话题。³¹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将“文革”定性为十年浩劫，³²但“文革”历史一直备受争议。通过对媒体的管制，这种观点依然占据最重要地位。在1980至1990年代，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布了几个有关出版与“文革”相关的图书的规定。1988年的规定指出，“有关‘文化大革命’的辞典等工具书，今后相当时期内，各出版社均不得安排”，以及“凡属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著作及专门叙述‘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著作，一般不要安排”。³³199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给出版社下发了有关汇报“重大”出版计划的更多规定，其中包括与“文革”相关的出版计划。³⁴总之，因为“文革”历史的争议性，与之相关的出版物受到严格控制。

网络为“文革”叙述提供了新途径。它使传统记忆类型转变成新的形式，创造了瓦格纳—帕西菲西（Wagner-Pacifici）所说的“突破体裁的”、“出格的纪念形式”³⁵（参见第三章有关文化形式的讨论）。博物馆就是这样一种形式。在1980年代，中国著名作家巴金呼吁建立“文化大革命”博物馆。³⁶1990年代，随着网络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致力于“文革”研究的网站。中国的这类网站，规模大多非常小。然而到了1996年，在加拿大和美国的一群中国学生和学者，发起创建了网上“文革”博物馆。自那以后，这一虚拟博物馆迅速地发展起来。截至2006年6月，该博物馆每天约有2000个访客。³⁷

虚拟博物馆是由传统博物馆发展而来的新形式。在名称和结构上，网上“文革”博物馆与传统的博物馆相似，例如，它也有“展厅”和“特别展出”。但在其他很多方面，它不同于传统的博物馆。它不囿于物理空间，可以在不同地点参观，一旦存入光盘或电脑就可以移动。

网络同时也创造了新的记忆形式。虽然网上“文革”博物馆像传统博物馆那样，将自己命名为博物馆，但很多研究“文革”的网站不是传统的名称所能涵盖的。这些网站是一种新的记忆方式。“文革研究网”（Cultural Revolution Research Net）是其中一例。根据网站首页的信息，该网站创建于2005年7月

29日。我在2005年11月30日访问该网站时，它已有340个订阅者，获得了77,741个点击。它分若干栏目，包括BBS论坛和几个电子档案，分别是“文革”艺术、“文革”文学、“文革”文件和电子书。在某些方面，它像一个图书馆和历史档案馆，但电子档案和公开论坛的结合使它同传统的档案馆或图书馆有所区别。

网上“文革”博物馆和“文革研究网”都提出了对“文革”的其他看法。虚拟博物馆的目标是，搜集与“文革”有关的文艺作品以及有关“文革”的“所有真实的资料与记载”。³⁸博物馆里的材料既包括有关“文革”的悲剧、恐怖和残忍的回忆录，也包括关于快乐日子的回忆。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形形色色，其中包括那些在中国受限的昔日造反派。“文革研究网”带有激进的左派倾向。它的支持者认为“文革”被歪曲了，因而必须恢复名誉。这点可以从我第一次访问该网站时首页上的江青“烈士”画像中清楚地看出。将江青神圣化为“烈士”，而官方把她作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作出谴责。

这些网络记忆项目的一个策略是通过建立历史文件的电子档案，揭示主流话语中不清晰的或被压抑的过去。这一策略用历史文件中不同的真实性(authenticity claim)挑战个人回忆中的真实性。网上“文革”博物馆和“文革研究网”都存有大量的电子档案。比如“文革研究网”有大量可供下载的文件，是关于“大庆精神”、“大寨精神”、革命样板戏、社会主义电影和文学、红卫兵运动和下放运动等资料。网站特别列出了一个很长的有关浩然作品的清单，浩然最著名的作品是歌颂农村集体化的多卷本小说《金光大道》。再比如网站上有个PDF文件，是长达1000多页、题为《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四卷本书。³⁹

网上“文革”博物馆和“文革研究网”在国外，这并不意味着国内没有关于“文革”的网站。⁴⁰但是，像这么系统和大规模的集体记忆项目，很难在收紧的网络环境中存在。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最初是通过政治运动和对媒体的管制，影响了人们对“文革”的记忆。在1990年代，商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使管制得到放松，促进了怀旧文学的繁荣。随着网络影响力的扩大，互联网也成为新的战场。

□ 国内的跨国积极分子

中国国内有各种跨国积极分子。就网络积极行动而言，有三类积极分子比较突出：非政府组织、人权积极分子和网络民族主义者。西德尼·塔罗延伸了科克和西金克有关回飞镖效应的分析，提出了三种实现跨国行动外化的方式：

(1) 信息方式：国内积极分子在国外传播信息以寻求回飞镖效应；

(2) 制度方式：积极分子利用国际组织的权威，将国内的要求变成约束性规则；

(3) “直接行动”方式：积极分子组织直接挑战他们的反对者的行动。⁴¹

在三种跨国积极分子中，NGO 倾向于使用信息方式，网络民族主义者偏爱直接行动，而维权积极分子综合利用三种方式。

我在前文说明了像全球绿色资助基金这样的国际 NGO 如何资助中国 NGO 进行能力建设。接受资助的中国 NGO 也是跨国的。第六章对 NGO 的网络使用的分析，表明了网络对它们同国际 NGO 的联络与互动的重要性，说明信息方式对跨国网络行动的重要性。两个最活跃的公民行动领域——艾滋病和环保领域——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这两个领域的 NGO 都与国际社会联系紧密。它们通过电子通讯和巨大的电子邮件组，定时发送信息更新、活动预告、新闻跟踪 (news feeds)，接收者通常是国内和国际 NGO 的积极分子以及媒体从业人员。⁴² 在这类信息传播中有一个颠覆性的事件，即艾滋病积极分子、中国爱知行项目主任万延海，将河南省有关血液收集的政府文件转发给一个电子邮件组，因此曝光了血液收集中的丑闻，同时也导致他被拘留。⁴³

国内第二种跨国积极分子是网上民族主义者。当民族主义者抗议的是外国政府、企业、商品和文化时，他们的行动就具有国际性。网络民族主义者参与各种形式的抗争，在 BBS 论坛上进行口头抗议是最经常的形式，其他还有网络签名请愿、利用网络动员线下参与以及黑客袭击网站。网络民族主义最具跨国性的方面也最具侵犯性：根据一些分析家所言，黑客袭击外国网站可能达到网络战争的规模。⁴⁴ 我在这里仅对黑客袭击行动做些讨论。

2005年初，在很有影响的中国黑客组织“红客联盟”（cnhonker.com）解散之际，媒体研究者闵大洪在网上发表文章，描述了由中国大陆黑客发起的六波主要的黑客袭击。第一波发生于1998年8月，反对印尼对华裔施加的暴力。第二波是在1999年5月，回应北约轰炸中国驻前南斯拉夫大使馆，攻击目标是美国政府网站。第三波袭击发生于1999年7月，回应当时台湾“总统”李登辉公开宣称海峡两岸的关系属于“国家间”的关系，攻击的目标是台湾网站。第四波袭击发生在2000年1月，回应日本右翼保守派否认日本侵华时期进行的南京大屠杀，攻击目标是日本的网站。第五波发生在2001年2至3月，黑客袭击日本网站，回应日本教科书对二战历史的歪曲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一事。第六波发生于2001年4月，回应美国EP3侦察机与中国飞机相撞并致中国飞行员死亡一事。⁴⁵在这些攻击中，黑客成功地侵入目标网站，将原来的信息换成抗议内容。⁴⁶攻击中，他们都遭到来自目标国家黑客的反击，由此引发了有些分析家所说的网络战争。

国内第三种跨国积极分子是人权积极分子。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中国网络积极分子的映像（mirror images）。激进的网络民族主义黑客攻击外国网站，而人权积极分子主动向国际社区寻求帮助与支持，抗议国内的政府部门。不过他们在行动方式上却有明显的不同。

在世界范围内，人权行动是最具国际性的抗争议题。⁴⁷维权积极分子在年龄、职业和其他很多方面上存在差异。⁴⁸他们参与的人权议题也多种多样，从言论自由到工人权利。言论自由大概是网络行动领域最重要的议题。国内的积极分子同海外积极分子一样，很早就认识到网络可以成为争取言论自由的工具。因此，网络在这些斗争中从一开始就具有国际性也就不足为奇了。早期刊物《隧道》的发行是典型的案例。《隧道》是在国内编辑、通过电子邮件发布的电子杂志。截至2008年2月10日，geocities.com存有208期该杂志，最后一期刊发于2002年12月22日。⁴⁹

1997年7月25日，《隧道》在第13期上发表了一个访谈，编辑在访谈中说明了杂志如何编辑如何发布：

必须承认的是，《隧道》现在还不能公开吸引订阅，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将杂志直接发送到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的邮件地址中……⁵⁰

维权积极分子的共同特点是，他们在日常斗争中都格外善于使用新信息技术，例子不胜枚举，此处不赘述。

□ 跨国行动产生的原因

网络行动的日益跨国化提出了几个重要问题：人们为什么极力跨越国界去宣传他们的事业？他们的行动要达到什么目标？虽然三种跨国积极分子出于不同理由而参与行动，但他们有个共同点：即对他们而言，跨境是建立联盟和集体认同感的方式，新的复杂的国际化条件⁵¹——包括新通讯技术的发展——为这一过程提供了机会和资源。

国内积极分子的跨国行动比较容易理解。对他们而言，国际 NGO 和积极分子给他们带来名声、资助、技术和见识。例如，中国环保 NGO 利用国际环保社区的资源，获得了成长，提高了影响力。⁵²正如第六章所述，对各类公民社团而言，网络都是它们同国际社会进行沟通的重要方式。

除了公民社团这些利用网络的温和形式之外，跨国行动还有一些最激进的网络行动。大致来说，积极分子与国际社会联系越紧密，就越可能采用激进的、对抗的行动方式。这不是说与国际联系紧密的积极分子都是激进分子，而是说积极分子很少是与外界隔绝的个体。与国际社会联系，意味着可能获得道义上的支持。当人们认识到他们不是一个人在行动，而是有整个世界在支持他们时，他们会比独立行动时表现得更大胆。这也是为什么集体行动可以制造英雄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积极分子参与网络行动，就是参与国际媒体行动。以前，全世界都只通过电视而关注着；现在，全世界都在写博客、发布 Youtube 视频、开播客。全球舞台没有因为网络而缩小，反而因为它的出现而扩大。

国际 NGO 参与有关中国的行动的原因要复杂些。一方面，国际 NGO 的参与反映了全球化的总体趋势——世界不同区域间的日益整合以及中国与世界

的日益接轨。如果说当代生活中其他领域的跨国互动增加了，积极分子的跨国互动及其行动的抗争性自然也相应地增加。当然也有更具体的理由。恐怕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地方渴望（local aspirations）和全球意图（global intentions）之间出现了一个新的协作关系。当地方积极分子在他们的国土之外，放眼寻找理想与联盟时，国际 NGO 和积极分子提供了现成的资源。两个并行的进程促进了这些互动。一方面，支持这些事业的国际机构在增长。⁵³ 用克里夫德·鲍伯的话说，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全球抗争市场，地方积极分子和国际 NGO 在其中进行着复杂的交换。⁵⁴ 另一方面，全球交流网络，如飞机运输、全球媒体，当然还有手机和网络，也加强了这一协作关系。

海外华人作为第三类跨国积极分子，在他们参与同中国相关的网络行动时，同样得益于几个复杂的因素。基本条件是全球通讯网络的出现以及交往的相对容易，但还有更根本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个人经历。比较积极和激进的侨胞积极分子，是晚近中国社会运动的参与者，有些还曾是那些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很多人在运动中获得了深刻的转化经历。他们是作为流亡者离开的。有关社会运动对个体生活轨迹影响的研究表明，因为有了这些个人经历和历史，积极分子会继续参与政治活动。⁵⁵ 这在恶劣环境下如此，在有利环境下只能更是如此。当这些积极分子到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之时，他们抵达的社会无疑比过去在国内更有利于开展实现他们抱负的行动。他们中的名声显赫者，在到达美国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其他的人得到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支持，使他们能够开展抗议活动、出版杂志、创办网站。因此，个人经历和历史这两个因素共同使之前的积极分子继续从事跨国行动。

另外，华侨积极分子作为新移民的经历也塑造了他们的政治行动。我所讨论的四种华侨网络，主要是由第一代新移民构成的。参与跨国行动，除了有政治功能和目的外，还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它创造并维持了一种社区感和一种身份认同。在美国的民主积极分子刊物，经常刊出聚会、社交舞会和其他团体活动的照片。虽然其中的照片经常尖锐地批判国内，倡导各种有关社会正义和人权的思想，但这些照片也传达了同志情谊、同事情谊（collegiality）和社区归属感。到最后，行动与社区之间变得如此互相依赖，牺牲一个无疑会损害另一个。

最后，华侨参与的跨国行动，不仅包括与中国相关的议题，还包括更广泛的与华裔相关的议题，比如 1998 年在印尼发生的对华裔施加暴力的事件，这使我们开始考虑以网络为基础的跨国中国文化领域出现的可能性。这些事件无疑反映了共享文化剧码的人们所关注的问题。⁵⁶ 这种共享的文化剧码可能是某些共同的历史，也一定包括表达符号，如共同的语言（即使仅仅是书写语言）。正是这一文化剧码，才使跨国的中国文化领域成为可能。⁵⁷ 同时，这些事件也反映了在全球化时代作为中国人的焦虑。在讨论中国文明作为中国文化话语的根源时，杜维明认为，“通过强调文化根源，在台湾、香港和北美的中国知识分子希望建立一个跨国网络，以探讨在全球化背景下作为中国人的意义”。⁵⁸ 我们也可以认为，华侨的跨国积极行动，不管是有关中国的民主，还是有关印尼华裔遭受的暴力，本质上可以看作在全球化时代探索作为中国人的意义的一种方式。正如诺尼尼和王爱华（Nonini and Ong）所说，跨国积极行动反映了在全球背景下跨国“旅行者”的自由。⁵⁹

□ 结论

本章的分析可总结如下：

- (1) 在中国有合法身份的国际 NGO 往往采取比较温和的网络行动方式。
- (2) 相反，在中国没有直接活动的国际 NGO，特别是人权 NGO，通常直接批判中国政府。
- (3) 侨民积极分子采用了一些直接批判政权的、最具对抗性的网络行动形式，尽管他们也使用一些更温和的形式。
- (4) 在国内，草根组织通常采取温和的、非对抗的行动形式。
- (5) 但是，国内网络民主主义者的抗议通常是最激进的。
- (6) 最后，国内人权积极分子有可能直接批判政府，但往往面临巨大的风险。

这些发现指出了一个更一般的规律：网络行动形式的激进程度，似乎与跨国程度直接成正比。⁶⁰ 一个行动越具有跨国性，那么它就越激进，越有对抗性。

这一现象该如何解释？

很明显，最重要的因素是地缘政治。脱离民族国家的管辖，意味着脱离镇压的风险，获得了批判政权的自由。这是中国之外的跨国网络行动往往比国内的更激进、更具对抗性的原因。网络民族主义行动作为国内最激进的形式，也是这个原因，因为他们针对的是中国政府之外的国家。但是，地缘政治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国家中，某些形式的跨国行动比其他形式的行动更激进。因此，必须考虑其他一些因素。

首先要看议题。有的议题比其他一些议题更能引起共鸣。正如很多学者认为的，在跨国社会运动领域，人权议题最引人注目。⁶¹ 在国内，经济发展背后严重的社会不公和某些对人权的侵犯，使这一议题更显著，在道德上更具合法性。因此，跨国网络行动最激进的形式发生在这一议题上也就不足为奇了。

其次，采用激进的、对抗性的行动方式的倾向与个人历史密切相关。人不是生来就是积极分子，他们是练就的。社会学家充分认识到，个人经历与社会历史的交融能够铸造出最激进的革命者。菲利普·艾布拉姆斯（Philip Abrams）写道：“逮捕和处罚是革命职业阶梯的重要梯级。”⁶² 在中国的网络空间中，最激进的网络积极分子，通常都有很丰富的个人经历。

因此，跨国化与抗争策略的激化相关。它又是如何影响网络行动的其他方面呢？

要想充分理解跨国化的作用，很重要的一点是将其视为中国网络行动整个动态过程的重要纽带。就此而言，跨国化的一个重要作用是促成了规模升级（scale shift）：“协作性抗争行动在数量上和层次上的改变，导致了涉及更广泛的行动者的、连接诉求与认同的抗争。”⁶³ 国内网络行动的跨国化，使地方行动的规模提升到国际层次。另外，跨国化为国内积极分子扩大了政治机会，提供了资源，削弱了对网络的政治控制。国内积极分子可以通过跨国联系散布信息，一些人选择在海外服务器上运营自己的网站和博客。从海外积极分子这方面来看，他们极力披露并渗透日益加紧的网络管制。第三，跨国化为国内积极分子极大地扩大了学习和创造的可能性。跨国化的基本形式是来自不同文化和社会中的众多行动者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是相互学习的过程。人类学家有时

用文化翻译这一概念，来命名这些互相学习的过程。文化翻译的概念强调了约束中的能动力，因为翻译者是受限制的、艺术性的创新者。这一过程充满了张力：一些元素被复制，一些因地制宜地得到了改进，或与其他地方形式杂糅在一起，还有一些受到争议或被摒弃。⁶⁴其结果是导致了混杂形式的出现，这种形式既适应地方情境和行动者的资源，也受到它们的限制。在网络行动及其他领域，这种文化翻译普遍存在于新的组织形式、行动方式以及中国积极分子采用的规范和话语中。因此，跨国化既是网络行动复杂动态过程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有更大的社会与文化影响。

注释

- 1 这一定义建立在塔罗的研究上。塔罗将跨国抗争界定为“将跨国行动者联系在一起的冲突，或同国家和国际机构联系在一起的冲突”。他将跨国行动者界定为“特定国家中的人和群体，他们加入到充满联系与冲突的跨国网络之中。”Tarrow,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25, 29. 我强调的是非国家行动者，因为当国家介入时，跨国行动就变成了国际政治。
- 2 参见；Zito, “Secularizing the Pain of Footbinding in China.”
- 3 Smith, “Explo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Glob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258.
- 4 Tarrow,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60. 塔罗将全球框架界定为“使用外部的符号去定位当地或全国性的诉求”。
- 5 引自；Goodman, *Beijing Street Voices*, 65. 这些公开信不仅是跨国渴望的早期例子，同时它们也最早明确地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
- 6 崔大伟 (David Zweig) 用“联系人”(linkage agents) 这个词指代中国国际化背后的主要行动者，包括“地方政府领导、半公共的公司、开发区、企业、大学、实验室、官僚机构以及海外华人和当地拥有海外关系的中国人。”参见；Zweig, *Internationalizing China*, 39.
- 7 Howell, “New Directions in Civil Society.”
- 8 吴过，“网上有间‘黄金书屋’”。
- 9 Morton, “Transnational Advocacy at the Grassroots,” 200.
- 10 绿色和平组织驻北京办公室的媒体官员所作的演讲，2007年7月12日，北京大学。来自个人笔记。
- 11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com/dingo/Sector/Environment/2-12-0-76-0-0.html>，获取日期：2007年3月8日。
- 12 “About China Development Brief.” 链接：<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com/node/260>，获取日期：2008年2月4日。
- 13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com/node/508>，获取日期：2008年2月4日。
- 14 [http://www.greengrants.org/grantsdisplay.php?country\[\]=China&year=2001](http://www.greengrants.org/grantsdisplay.php?country[]=China&year=2001)，获取日期：2008年2月4日。
- 15 [http://www.greengrants.org/grantsdisplay.php?country\[\]=China&year=2002](http://www.greengrants.org/grantsdisplay.php?country[]=China&year=2002)，获取日期：2008年2月4日。
- 16 [http://www.greengrants.org/grantsdisplay.php?country\[\]=China&year=2006](http://www.greengrants.org/grantsdisplay.php?country[]=China&year=2006)，获取日期：2008年2月4日。
- 17 Kennedy, “China: Nation’s First Citizen Reporter?”
- 18 <http://www.globalvoicesonline.org/2007/03/30/china-nations-first-citizenreporter>，获取日期：2008年2月4日。
- 19 有关这起抗争事件的争论，参见：Lu Suping, “Nationalistic Feelings and Sports”；and Friedman, “Comments on ‘Nationalistic Feelings and Sports.’”
- 20 对这一事件的讨论最早见于：Yang, “The Internet and the Rise of a Transna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phere.”
- 21 《海峡时报》(*The Strait Times*)，1998年8月20日。
- 22 Arnold, “Chinese Diaspora Using Internet to Aid Plight of Brethren Abroad.”
- 23 我在2001年7月13日从<http://www.nacb.com/bbs/pub/yourvoice/messages/3.html>这个网址获得含有韦的信件的消息。
- 24 例子之一是21世纪基金会支持的“签名网”(www.qian-ming.net)，是由民主积极分子创办的。我在2008年2月6日访问该网站时，它正在进行几个积极的签名运动，同时还建有已完成签名运动的档案。
- 25 Farley, “Dissidents Hack Holes in China’s New Wall.”
- 26 Chase and Mulvenon, *You’ve Got Dissent!* 有关黑客行动，参见“Activism, Hacktivism, and Cyberterrorism.”
- 27 Zhao, “Falun Gong, Identity, and the Struggle Over Meaning Inside and Outside China.”
- 28 《科学》在2001年8月10日发表的那期杂志中报道了方舟子的故事。参见：Xiong Lei, “Biochemist Wages

- Online War Against Ethical Lapses,” 1039.
- 29 Fang Zhouzi, “In the Name of ‘Science’ and ‘Patriotism.’”
- 30 《南方人物周刊》, “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 50 人”, 37.
- 31 本小节的材料来自: Yang, “A Portrait of Martyr Jiang Qing.”
- 32 中央委员会,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韩丁 (Harding) 认为, “这一文件标志着中共正式接受邓小平的政治经济改革计划, 否定了 ‘文化大革命’。”参见: Harding,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64–65.
- 33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 “中央关于出版 ‘文化大革命’ 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 英文翻译参见: Schoenhals, ed.,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310–312.
- 34 新闻出版署, “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 238.
- 35 Wagner-Pacifi, “Memories in the Making,” 310.
- 36 巴金在他的回忆录中的一篇散文中提出了这个想法。参见: 巴金, 《巴金随想录》。
- 37 与网站编辑华新民的电子邮件通信, 2006 年 7 月 3 日。
- 38 《华夏周刊》编辑部, “让我们携手在网上共建一个 ‘文革’ 博物馆”。
- 39 老田, “1968 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版次说明”。
- 40 因为网络管制, 有关 “文革” 的网站规模很小。比如, 著名的学术网站燕然网建有有关 “文革” 的网络档案和一个 BBS 论坛。2005 年 9 月 30 日, 燕然网上公开讨论广东省太石村正在进行的农民问题而被关闭。
- 41 Tarrow,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158.
- 42 我加入一些邮件组中已有数年。
- 43 “Chinese AIDS Activist Honoured Despite Ongoing Detention” (2002 年 9 月 12 日), 链接: <http://www.aidslaw.ca/publications/interfaces/downloadDocumentFile.php?ref=430>, 获取日期: 2008 年 2 月 8 日。
- 44 参见: Arquilla and Ronfeldt, eds., *Networks and Netwars*, 239–288.
- 45 闵大洪, “告别中国黑客的激情年代——写在 ‘中国红客联盟’ 解散之际”。
- 46 比如, 有关《华盛顿邮报》在 1999 年 5 月对中国黑客袭击的报道, 参见: Barr, “Anti-NATO Hackers Sabotage 3 Web Sites.”
- 47 杰基·史密斯 (Jackie Smith) 发现, “人权的主题, 一直受到最大量的国际社会运动组织的关注, 在所有群体中, 有四分之一的组织基本上围绕该议题行动。”参见: Smith, “Explo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Glob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296.
- 48 特里莎·莱特 (Teresa Wright) 对民主党成员的研究说明了该党成员的多样性。参见: Wright,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in the 1980s–1990s.”
- 49 <http://www.geocities.com/SiliconValley/Bay/5598/index.html>, 获取日期: 2008 年 2 月 10 日。
- 50 <http://www.geocities.com/SiliconValley/Bay/5598/97/sd9707e.txt>, 获取日期: 2008 年 2 月 10 日。
- 51 Tarrow and della Porta, “Conclusion: ‘Globalization,’ Complex Internationalism, and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
- 52 Yang,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也参见: Morton, “Transnational Advocacy at the Grassroots.”
- 53 Smith, “Explo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Glob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 54 Bob, *The Marketing of Rebellion*.
- 55 McAdam, “The Biographical Consequences of Activism.”
- 56 社会学家安·斯威德勒 (Ann Swidler) 认为, 文化对行动的影响, “不是通过为人们提供行动的目的, 而是为他们提供意义的词汇 (vocabulary of meanings)、表达的符号和情感剧码”。参见: Swidler, “Cultural Power and Social Movements,” 27.
- 57 然而, 该剧码也只是剧码而已。文化传统嵌入于这一剧码, 传统不是通过提供共同的目标指导行动。在北美的中国侨民的目标不同于印尼华裔的目标。但是, 在危机时刻, 这两个群体可以在网上和线下互相联系。

- 58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25.
- 59 Nonini and Ong,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s an Alternative Modernity.
- 60 这一规律与中国民众抗争更大的图景不符，在后者中，激进的、对抗式的街头抗议经常出现。
- 61 Smith, "Explo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Glob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See also Sidney Tarrow,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 62 Abrams, *Historical Sociology*, 296.
- 63 McAdam, Tarrow, and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331.
- 64 See Merry, "Trans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Local Activism."

中国的长期革命

中国网络行动出现于 1990 年代中期。此后，网络行动日渐频繁，影响也越来越大。我在书中探讨了 70 多个案例，涉及数百个公民团体、网络社区、网站以及无数参与者。其中有些个案是持久的斗争，其他的则是偶发事件。一些个案包括大规模、自发的抗议活动，其他的个案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采取温和的或秘密的形式。这些个案涉及的议题十分广泛，从骇人听闻的人力剥削到有关单亲父母和性道德的争议。这一切共同组成了一幅充满矛盾与冲突的不安社会图景。网络行动同当代中国更大的抗争洪流一起，标志着革命精神的鲜活复兴。

在宏观层面上，中国网络行动是对现代性后果的总体性回应。它既是根源于物质怨恨的反向运动，也是急剧变迁引发的认同危机所导致的认同感运动。在现实中，大部分行动有着多重关注。因此，第一章讨论的糖尿病患者和乙肝病毒携带者的反歧视斗争，虽然关注的是个人尊严，但也涉及就业安置或教育机会这些现实问题。在同一章中，孙志刚与魏文华的例子，代表的是对过去

10 年才开始经常发生的一种政治压迫形式的反抗。这种压迫随意而无情地对公民施加暴力。在孙志刚事件中，警察是凶手；在魏文华事件中，为恶者是城管。这两类凶手都是执法人员。两个事件反映了执法部门不良的状况。¹如果急剧变迁与错位的状态加剧了认同问题，增强了人们对承认与归属感的渴望，那么政治压迫却是反叛的土壤。

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网络行动反映了中国公民的抗争与政治、文化、社会、经济和国际环境的互动。动态的多维互动反映了全球化时代日益复杂的环境。中国的社会行动是对复杂环境的回应。

首先，网络行动的议题和形式，反映了公民与政治权力协商的创新方式。人民对网络受到严格的管制有所了解，对各类网络公民行动却知之较少。我在第二章中提出，议题共鸣与特定议题的政治机会是影响抗争性议题能否进入公共领域的重要因素。我区分了三种公民用以创造性应对网络管制的方式——依法抗争、艺术性抗争以及电子隐藏文本。当控制的形式发生变化时，反抗的形式也随之变化。道理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管制必然会遭到抵制。不过简单的道理却容易被遗忘。

在网络行动多元互动模型中，第二个因素是文化。网络空间中的抗争表达依赖文化工具和符号资源。它使用语言、符号、图像、声音和修辞习惯。即使利用网络去动员街头示威，也是一个文化活动。网络行动的文化受到历史与传统的影响。悠久的抗争仪式和体裁在网络时代持续存在着。它们像思维结构 (mental structures) 一样，为当代积极行动提供了文化规则 (cultural schemas)。²中国抗争文化中的语言和非语言仪式，都已在网络空间中得到了运用。作为请愿形式的传统串联也被复制到网上，并增加了在网络条件下才有可能的新形式。我讨论到的语言仪式和体裁，包括了口号、大字报和诗歌。这些是在现代中国民众抗争中经常出现的元素，但在网络空间中，它们因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大、发表之易，表现为新的形式，产生了新的力量。比如，“顺口溜”式的政治讽刺，最常以电子邮件和短信形式相互转发，由此形成了一个暴露各种社会问题的真正的电子民谣传统。

同时，网络行动展示了巨大的文化创造性和创新性。现有的文化形式被赋

予了新的力量，新形式和新实践大量涌现。我在第三章中分析的新实践，包括在 BBS 论坛中进行抗争、发短信、写博客、黑客袭击、办运动网站和开展网络签名请愿活动等。一些新形式，比如博客，带有文本传播这一传统的烙印。其他形式是多媒体化的，混合了文本与图像、声音和视频。网络行动中最具创新性的体裁和实践是 Flash 视频、数码照片和数码视频。像传统文本一样，它们由个人或群体创造，但它们需要一种不同的创造能力，即掌握创新软件和其他电子技术的才能。这些体裁的力量既依赖传播的便捷，也来自直接的视觉与听觉吸引力。

与早期社会运动相比，网络行动表现出不同的风格。一方面它变得更富戏剧性，同时也更趋于平淡，而早期社会运动的风格常带有史诗般的宏大特征，适宜表达对未来的崇高理想。因得益于便利而具有创新潜能的新媒体技术，戏仿的形式在网络抗争中无处不在。新抗争风格的平淡一面，体现在用直白的方式表达诉求，比如第四章提到的邹涛通过详细计算房地产价格，来号召人们开展不买房运动。我在下文将指出，网络行动的新风格，是中国社会其他方面变迁的表征。

第三，网络行动有商业的一面。似乎为了紧跟中国社会的市场化潮流，积极行动也获得了市场价值。有些积极分子采用市场策略推进他们的事业。消费者权益积极分子王海，利用网站曝光假货，同时以其提供的法律服务向消费者收费。更重要的是，网络公司在网络抗争中有既得利益，因为抗争性活动可以提高网络流量。因此，主要网站欢迎并接纳争议性的媒体事件，鼓励他们的用户参与。这在中国网络发展的早期是这样，在近几年更是如此。我在第五章对“华南虎事件”的分析，阐述了一个网络公司在一起抗争性事件发生时所采取的商业策略。政府的规定只允许商业网站发布来自官方新闻机构的信息，不允许它们发布自己采编的新闻。但该网络公司通过与省级官方网站建立名义上的合作关系，规避了这一规定。同时，该公司通过“新闻跟帖”的功能，促进了网友的参与和讨论。但是，第五章也说明，网络中的商业利益有可能导致人为的操控，因此可能会破坏公共讨论。虽然抗争经济必须得到批判性的审视，但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一新现象的重要性。尽管媒体商业化常受到批判，但市场与政治

的关系往往比想象的复杂。在特定历史环境下，市场可能为更开放的政治参与提供条件。

第四个因素是公民社会，我探讨了两个组成部分。其中，城市公民社团是比较正式的组成部分，它们尽管缺乏资源，但积极使用网络。很明显，公民社会已经网络化。在公民社会受到政治限制的情况下，网络成为社团获得组织发展和促进社会变迁的策略性机会与资源。公民社会另一个比较不正式的组成部分是网络社区。我在这方面的发现，超越了现有的对中国和其他地方网络社区的研究。很多研究正确地肯定了虚拟社区的“真实性”，认为它们同线下社区一样真实。这类分析强调网络社区实用的方面，但忽略了他们作为认同和道德探索空间的意义。同时，这类分析通常集中研究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互动的内部动态过程，很少关注这些动态过程同当代生活大趋势有什么联系。

第七章的分析揭示了中国网络社区中充满活力的乌托邦冲动。这一冲动表现在将网络社区理想化为自由、团结与社会正义的空间。涂尔干(Emile Durkheim)在他有关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的著名研究中写道：“社会如果没有同时创造出一个理想，则很难自造或再造。”³ 创造理想是社会自造和再造的方式。理想代表着社区的神圣价值。因此，中国网络社区既是社会再生的结果，也是社会再生的工具。通过网络社区，人们践行他们的想象能力。自由、团结与正义的价值，既推动了中国网络行动，又在行动过程中再次得到肯定。这一社会再生十分迫切，因为中国现代性的新条件，比如新型社会不公，已经严重损害了社区和社会正义。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为个人生活创造了极大的自由。对大多数人而言，生活的选择成倍地增加了，但这一自由伴随着新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乌托邦冲动根源于这些更大的社会转型。只要这些条件保持不变，人们会继续从网络社区寻找自由、正义和团结。但我的分析也说明，他们不会将自己的想法和行动限于网络，而是不可避免地将之带到现实生活，影响他们所处的社会空间。当然，我所说的这些并不意味着网络社区的所有行为按公民标准都是有道德的。

网络行动多元动态模型的第五个因素是跨国主义。第八章探讨了三种跨国积极分子：华侨、国际 NGO 和国内积极分子。一个主要的发现是，网络行动

的激化程度与跨国化的程度成正比。⁴网络行动越具跨国性，就越激进，越有对抗性。这一发现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全球化时代政治控制的局限性。中国网络控制的观察者通常忽视了中国网络文化的抗争性，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没能看到其他的平衡条件，比如行动者的创造性、商业利益、公民社会的倡议，以及远距离跨国行动参与的可能。如果跨国化提高了更激进的行动的可能，那是因为它加强了国内和国际积极分子之间的联系，从而给予国内积极分子在其他情况下不可能获得的某种力量。这一发现并不是否定国家持续的重要性，而是说明国家和它的挑战者处于日益复杂和联系的世界中。当挑战者获得更多力量，国家就会受到更多的压力。

□ 文化的革命

驱动中国网络行动的多元互动，说明了网络行动是当代中国社会紧张与冲突的一个核心。分析网络行动，为理解更大的社会潮流提供了独特的视角。网络行动的形式、动态和结果，包含了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元素。我认为，中国网络行动是当代中国传播革命的标志。这一传播革命显著地扩大了普通人学习与交流的视野，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一场文化革命。这一传播革命也是社会革命，因为普通人在社会变迁上发挥了史无前例的作用，还因为新的社会型构是这一革命最深刻的结果。

最后，这一传播革命扩大了公民的非正式民主。威廉姆斯所说的长期革命的一个重要元素——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化，在中国的长期革命中尚待完成。但是，正如威廉姆斯所指出的，民主方面的进步不局限于简单的政治变革。它最终依靠“开放社会和自由合作的个体的观念，而只有这些观念才能释放在工作技巧和交流方面的变迁的创新潜能”。长期的革命“不仅是在追求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它的意义更在于带来有关自我、社会和政治的新观点和实践。⁵最终，这些新的观念和实践，是民主政治制度的社会与文化基础。

先谈文化革命。网络行动的文化充满活力与创造性，它标志着晚近中国历史在抗争风格上的巨大变化。但是，它的重要性超越了作为一种抗争形式的意

义。它既体现又影响了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深远趋势。即使同 1980 年代这一见证了非凡文化热潮的晚近时期相比，这一变迁也是深远的。从 1980 年代早期的“朦胧诗”，到这一时代后期的“文化热”，文化运动一个接着一个。艺术与文学领域充满了创造性，出版的著作令人眼花缭乱，文学杂志的销售量以数百万册计，读者的数量则只能会更大。⁶但是，这一文化繁荣的主要动力是知识分子、作家、艺术家和教授，有明显的精英倾向。1980 年代末，学生和知识分子虽然努力联合工人与农民，但他们不仅支配了政治行动的舞台，还有意识地极力将自己标榜成启蒙者——“上帝的宠儿”。

网络在中国最先被大学和研究机构采用，从这个意义上看，它有精英的起源。但是，它在全国范围内快速的传播，很快便成为能被普通城市消费者使用的技术，尽管电子鸿沟一直存在。随之而来的是文化上的拓展，而网络行动正是其中最激烈的表达形式。这种文化拓展表现在三个方面，即信息的来源与学习的手段、文化生产与创新的工具以及交流的空间。

首先，对大部分网友而言，网络最令他们激动的是，它打开了信息与学习的新世界。互联网络中心自 1997 年以来的一年两度的调查一直显示，大部分人使用网络是为了获取信息。我收集到的在中国网络发展初期的网络自传，对网络提供的新的可能也表达了激动之情。今天，当越来越多的人不以网络为奇时，人们第一次登上网络时所经历的那份激动，已经开始被遗忘。这也显示了中国人在短短的十几年已经走了很远，但信息源扩张的历史重要性再怎么夸大也不为过。

无疑，现有的电子鸿沟意味着很多人仍然无法获得网络信息。⁷然而，即使在这里，也有一些有趣的新实验。比如，在有些边远地区，县政府启动了项目，通过间接的方式将村庄联网。有研究发现，在甘肃省金塔县，县里的信息中心将从网上搜集并整理的农业信息发到网上。然后，乡村学校里的老师利用学校的电脑设备，打印并复印这些信息，然后分发给农民。⁸在其他农村地区，网吧和手机在没有家庭网络连接的情况下成为替代性的选择。事实上，截至 2007 年 12 月，农村地区接近一半的网友是在网吧上网，23% 的网友利用手机上网。⁹在农民工中，手机和网吧文化同中国更大的网络文化一样多彩而富有

活力。¹⁰ 有学者相信，这些替代性的上网方式，将成为缩小电子鸿沟的有效途径。¹¹ 从长远来看，真正的鸿沟不是能否上网，而是怎样使用网络以及使用网络的能力，而这两方面是由整个社会分层与社会不平等的结构塑造的。因此，最根本的解决路径取决于能否抑制社会不公。

其次是文化生产与创新工具的增多。在这方面，网络行动再次反映并引领了更广泛的文化创新潮流。网络行动包括典型的文化生产与创新活动，这一点在本书讨论的每一个案例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写 BBS 帖子、创作 Flash 视频和数码视频、发起并维持运动和请愿网站以及各种形式的“艺术性抗争”和电子“隐藏文本”，这些都是创造性的活动。网络和其他新信息技术为这些创新活动提供了工具，这一事实本身具有重要意义，但真正的意义在于这些工具的民主化。文化生产与创新的工具什么时代都有，但少有能让普通人广泛获得的。诚然，因为电子鸿沟的存在，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获得并有能力使用这些新的创新工具。但是，在这里值得再次强调的是，尽管电子鸿沟是个难于逾越的屏障，但它没有掩盖信息革命这一真正的进步。在过去 10 年，总的趋势是这些技术可及性的迅速扩大。与以往任何创新技术相比，这些新信息技术为普通人更好地创造自己的文化产品提供了工具。

普通人因此变成了出版家、编辑、作家和艺术家，而不仅仅是消费者、观众和读者。他们成了知识生产者，而不只是极力接受和消化死去的作者或活着的权威所生产的知识。¹² 普通人中巨大的创造潜能得到释放，这对纠正知识生产中的不对称关系十分重要。在现代社会，知识生产有其社会组织方式。它使少数的专家、权威和机构控制了知识生产和认证的过程。社会的支配性思想是这些少数派的思想，这本身与民主文化的原则相悖。因此，当普通人成为知识生产者后，他们为社会注入了一股新文化。他们提供了另类的视角、不同的观点以及多彩的人生经历。他们别样的经历和视角可以挑战文化刻板印象、纠正错误信息和抵抗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符号暴力是指文化精英通过标签、分类和其他话语形式给社会施加的暴力）。

本书中网络行动的个案，都以某种方式涉及作为知识生产者的普通人。他们所生产的知识，通常颠覆了大多数人的看法或流行的观点。因此，乙肝病毒

携带者积极分子挑战了有关乙肝病毒传播载体的一般看法，并且指出歧视性的政府政策助长了错误的流行观点。同样，2005年禽流感危机期间有关保护动物的Flash视频，通过鸟类和鸡的眼光，揭示了人类在危机时可能表现出的不理智、偏执与残忍。当然，以曝光假货为主的消费者权益保护行动也属此列。

文化创造工具的扩展以及普通人创新能量的释放，直接促进了现有文化形式的延伸以及新文化形式的产生。网络行动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体裁和仪式的多样性。这些文化形式是公民行动的工具，也是民众情绪的载体。它们的重要性正体现在这里。因为它们所表达的，最终是普通人的关注与渴望。顺口溜是流行的文化形式，Flash视频、Youtube视频、博客和BBS帖子亦然。它们交流的经验、观点和价值，经常与官方形式所传播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在大众形式与官方形式之间总存在着冲突的原因。一方企图支配，另一方起而反抗。反抗越有创造性，则越有效。

文化扩张的第三个方面是公民话语空间的产生。所谓公民话语空间，是指人们能够表达关注、感受和观点的地方。¹³扩大公民话语空间是新公民行动的重要目标。毫无疑问，这方面的一个主要成就是对网络空间的社会建构。没有什么别的地方，能使草根民众如此积极和直接地讨论公共事务，也没有其他地方可以每天将那么多的社会议题带入公共讨论之中。

新概念脱胎于新的现实，并进而塑造现实。“话语空间”是与当今中国公民行动有关的新词之一。其他的例子还有“话语权”、“维权”、“弱势群体”、“知情权”、“公民权”、“公众参与”、“草根”、“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其中一些概念，比如“知情权”和“公共领域”，完全是新造的词或直译过来的词汇。¹⁴其他词语使用了过去使用的概念和表达，但老概念转化成了强调公民参与的新词。比如，在早期，“基层”是英文词语“grassroots”对应的中文翻译。“基层”的字面意思是“基础”或“基础设施”，它是一个有革命历史传统的词语。所谓的群众路线，¹⁵是1949年以来组织工作方法的标志，其基本思想是党的声音必须渗透到中国生活的最基层。新的表达则舍去“基层”一词，采用了英文单词“grassroots”的直译——“草根”。

因此，公民话语空间也是塑造新语言和新身份的空间。在网络空间中塑造

的最重要的新身份,也许就是一个最普通的词——“网民”。网民是指网络用户,不管是在中文还是在英文,该词都带有公民的意思,因为它是由“网络”和“公民”两个词合并而成。但在当代中国,平凡的网民等于无畏的、有见识的、激情的以及不容易受骗的人。有时他们被污蔑为网络暴民,在历史上,每当普通人采取什么行动,他们就被诬蔑为暴民。中国网络空间中充斥大量的激进主义,这是事实,但正如我在本书所说明的,网络激进主义者通常是在更激化的社会不公的刺激下产生的。广受欢迎的《南方都市报》在2008年1月13日有则报道,题目是“谁都别想蒙网民”。这篇报道提到了很多本书讨论到的发生于2007年的网络抗争。该报道认为,这些网络事件有力地说明,在网络时代,网民不会让自己被人欺骗,因为“压抑与蒙蔽,只会让网民的表达欲望不断升级”。¹⁶

□ 社会的革命

中国的传播革命同时也是社会革命。之所以是社会革命,是因为传播革命的动态过程是社会动态过程,因为变迁的主要行动者是普通人,还因为它最深远的影响是新社会型构的形成。这场社会变革具有革命性,不是因为它发生之突然,而是因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网络革命表现了、伴随着并影响着中国社会所有领域的深刻变迁。

传播革命扎根于当代社会环境。我在第一章指出,网络行动是对中国现代性的两个后果的回应。一个后果是与中国迅速的经济增长相伴的社会两极分化。经济增长不会自动产生社会进步;相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各种潜在形式的社会不平等,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不断加剧。现代性的另一后果是社会错位。社会不公发生在穷人、弱者和无权者身上,而社会错位在一个急剧变迁的社会中影响到每个人,包括向上流动的和向下流动的人。社会错位的结果是认同焦虑和危机。因此,网络运动也是认同运动,表现为对社会承认、个人自尊和社区归属感的渴望与争取。

毫无疑问,对正义、认同感和社区的渴望会转化为交流行为,因为交流的核心是社区,反之亦然。¹⁷因此,交流的革命必然是社会的革命。网络的快速

发展既是技术的变迁，又是社会的变迁。信息技术的新发展通常会引发社会变迁，社会变迁也会触发信息技术的发展。新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在回应社会需求。如果对交流没有强烈的社会渴望，就不会有充满活力的、具有参与性的网络文化。社会不仅是信息革命的原因，而且信息革命的动态过程也具有社会性。社会参与从来没有像它在当今网络中表现的那样，成为如此重要的技术发展引擎。没有社会参与，网络也不是今天的样子。网络参与是一种生产性的活动。网络公司要投入资源提供免费的博客和在线论坛，正是因为这些免费的交流空间也是社会与经济生产的空间。

正如与网络相关的文化革命创造了新的文化形式，它的社会结果也因此表现为新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型构的出现。过去 10 年中的网络交流，创造了很多网络社区。新的社会类型大量涌现，包括公民记者、博客写手、黑客、网络民族主义者、BBS 论坛版主、Flash 动画影片创作者、网络游戏玩家，当然还包括网络积极分子。公民社团保持积极的网络活动，利用网络宣传自己的组织，推动社会变迁的事业。

这些新的社会形式和社会型构的重要性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它们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公民的组织化程度一直较低。过去也不是没有公民的组织化，但是它缺乏合法的和制度化的基础。今天，公民的组织化有了一定程度的制度化，网络社区是合法的社会型构，而且正如第七章所述，网络社区的活动经常扩展到线下。像 NGO 这类公民社团，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必须要考虑严格的国家规定，但它们享有事实上或法律上的合法性，并且享有一定的运作空间。这不是低估它们所面对的政治约束，而是承认新社会形式制度化的重要性。

其次，公民组织的规模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最大的网络社区有几百万注册用户，规模除了小于执政党，比其他任何社会组织都大。网上还有成千上万的小型社区。社会组织化的范围也同样很显著，很多社区中的成员，不仅分散在不同的城市，而且散居于世界各地。社会互动在很多层面上进行。这一切转化为社会互动的巨大能量，对任何政治统治者而言，都是必须正视的社会力量。日益加紧的网络控制，部分地反映了国家对这一新型社会力量的

认识。

第三，新的社会型构对他们所代表的价值而言很重要。我在第七章分析的网络社区表明，网络社区的成员不仅对社会现实加以批判，并肯定那些在他们看来已在当代社会遭到破坏的价值，而且他们也能够遵循他们所珍视的价值行动。他们表现了高度的公民参与，或者用中国学者所用的词语——“公民性”。¹⁸ 在中国社会深受信任危机之害时，网民之间居然仍能找到信任，似乎颇具讽刺意味。第七章讲到，网络社区的成员既表现出高度的信任，同时也在努力巩固它。因此，这一讽刺只是表面现象。事实是，如果交流保持畅通无阻，人们之间就会建立起信任。信任的缺乏只不过是交流的缺乏。

最后，新形式和新的社会型构代表着公民社会的新发展。公民社会是一个载有价值观念的概念，当今中国的历史发展已经赋予了它新的意义。当“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这些概念在1980年代晚期最初被引入中国学术话语时，它们对中国人而言是陌生的。虽然这些词在西方学术界备受争议，但在当今中国，它们却成为学术话语、大众话语和新闻话语的关键词。有中国学者最近指出，随着公民社团的繁荣，中国已迈入公民社会的门槛。¹⁹ 暂且不管是否迈入了门槛，我对网络组织化和网络社区的分析表明，一个真正的中国社团革命正在发生。²⁰ 网络社会型构是这一社团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强调的是，因其开放性和动态性，网络型构总处于不断建构的状态。不同的观点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力量必然会交汇，它们之间必然有紧张与冲突。因此，这些社会型构的未来尚不确定，存在着继续转型的可能。

□ 草根民主实践

由传播革命引发的文化与社会转型，都包括了政治动态过程，产生了政治影响。但是，传播革命也产生了更直接的政治后果。它塑造了国家政治，促进了草根阶层和公民政治的产生。因此，虽然民主作为一个政治制度仍是一个理想，而不是现实，但在草根层面上，人们已经开始实践和实验公民民主的各种不同形式。正如威廉姆斯所言，“如果人们不能享有正式民主，他们将会创造

任何可能形式的非正式民主，包括武装反叛或暴动、‘非正式’罢工或限制出卖劳力以及最安静但最令人恐慌的形式——一种普遍的愠怒与隐退 (withdrawal of interest)。”²¹ 非正式民主在中国的表现形式，是草根民主的实践。本书说明，隐退不是中国人民争取草根民主斗争的特征，参与才是。我在下文还会再讨论该问题。但是，因为公民政治的出现与国家权力直接相关，因此有必要回顾一下网络时代国家权力的演进。

我在这方面的基本观点是，技术变迁使公民行动新的形式和动态过程成为可能，但它也为国家行动者调整和改善管理的制度、观念和方法提供了机会。这些改进既反映了草根要求民主参与的压力，也反映了精英阶层试图加紧政治管制的努力。因此，我们看到了在提高政府透明度和公民参与方面，有些缓慢而有限的制度建设。这是整个改革时期持续的进程，虽然政策时紧时松，学界对该进程的原因有所争议。²² 网络行动对这一进程的贡献在于，它给政府施加了压力，要求提高政府透明度和公民参与。虽然进展有限，但值得一提。发展之一是电子政务的出现。我在第五章中指出，电子政务的发展，落后于电子商务和网络公民社会的发展。但是，重大的电子政务项目已经开展多年，辅之以运动的形式要求各级政府部门建立网站，利用网站公布政府政策，鼓励公民参与。比如，贺康玲 (Kathleen Hartford) 对两个电子政务项目的研究，表明市民能通过市长信箱，促使市政府注意到广泛的社会议题。这些信箱邀请市民作出反馈，因此提高了政府的透明度。²³

除了电子政务项目外，政府还有提高信息公开的努力。在这方面，2007年有特殊的重要性。2007年4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这是在中央政府层面上的第一个同类法律，旨在“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以及“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²⁴ 同月，国家环保总局颁发了有史以来第一个《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要求政府和企业公开环境信息，以保障公民获取与环境相关的信息的权利。这一规定的制定过程反映了民众的压力。几年来，国家环保总局的官员与环保 NGO 密切合作，提高有关环境议题决策上的公众参与。比如，2005年4月，国家环保总局就北京西城圆明园公园湖底保护这一环境项目上的争议，第一次举行了听

听证会。²⁵ 在公开听证之后，政府取消了该项目。此次听证会得以召开，是因为环保主义者发起媒体运动抵制该项目，并要求举行听证会。

然而，在提高政府透明度和公民参与方面的制度建设，远远落后于政府加强和改善控制与管理办法的努力。在这方面，网络控制是国家实验新的治理方法的典型领域。第二章中指出，在不到 15 年的时间中，国家网络控制体制已经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在每个新的发展阶段，控制方法都变得更精细、更成熟。总体的趋势是，控制逐渐从依靠强制力过渡到规训力，从硬性控制过渡到柔性管理。从 2003 年至今，主导的权力模式是规训。一方面国家加紧了网络控制，这明显地表现在自 2003 年以来颁布的关于网络的新规定。

另一方面，国家充分认识到网络经济具有的生产力，所以不愿因采取粗暴控制方法而牺牲经济效益。官方部门希望同时保持繁荣与控制，正在将控制技术改进为福柯式的生物权力（biopower）。生物权力的本质是利用个体为国家目标服务。它是生产力，因为它使知识、主体和需求的生产成为可能。²⁶ 这一基于生物权力之上的新制度的核心要素是柔性管理。与硬性控制相比，柔性管理这一从经济管理借用来的概念，更强调自律、间接指导、有效管理、正面诱导以及依法治理。我在第二章引用的 2004 年中共十六大四中全会规定的治理新原则，体现了柔性管理的思想。提高自律和文明使用网络的努力，以及通过官方资助的网站让网民自愿检举网络侵犯的新制度，都体现了柔性管理的思想。当权力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power）以自我的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的面目出现时，也就是说它们促使主体自愿地转变自身时，它们才是最有效的。从这一视角看，网络也有可能转变成权力的技术。

向更具规训力的权力模式转变不仅只发生在网络控制方面。但是，网络作为新的、首要的控制领域，为国家调整和完善整个治理与控制的机构提供了策略性的机会。因此，针对网络控制的精湛的方式，也见之于其他领域，比如国家对大众媒体的控制也变得越来越完善。

权力的不断进化将使中国的长期革命这一争取更加开放与民主的社会的努力，成为十分艰难的过程。但是，我们必须看到进步的迹象。那么，中国网络行动取得了哪些政治成果？在中国长期革命的历程中，有哪些政治进步

的迹象？

最重要的发展体现在公民的草根民主实践。网络行动是中国新公民行动的缩影，也是其中最具有活力的支流。在这个意义上，网络行动标志着草根阶层和公民民主的扩张。它之所以是草根式民主，是因为其思想与行动的倡议来自公民，扩张明显地体现在意识和实践上。在意识上，主要的发展是中国人民公民权意识的提高，以及对权力和权威观念的转变。不是说这两个发展只体现在网络行动上，而是它们因网络行动而得到了深化。中国人争取公民权的斗争，恐怕是自 1990 年以来公民行动的核心，本书引文涉及的很多学者对这一点都有所论述。网络行动在宣传公民知情权以及加强民众对公民知情权的意识方面，起了最重要的作用。言论自由是早期社会运动的主要目标，现在依然如此。信息权，比如公民的知情权，对政府提出了更多的要求。公民不仅要求有权表达他们的观点，而且要求知晓与他们福利相关的问题的信息。

网络行动通过腐蚀信息控制与宣传，提高了民众的知情权意识，它使政府部门和新闻机构更难控制信息。2001 年，江西省一个农村学校发生爆炸，致使 42 人遇难；2002 年南京的一起食物中毒，导致 40 多人死亡。在这两个事件中，政府企图封锁消息，但最终因为网络上的曝光和争议，不得不公布事实。这些事件使一位有影响的媒体研究者宣称，网络已导致基于对新闻和信息集中控制的宣传模式的死亡。²⁷ 至于这一所谓的死亡是否真正发生，有待商榷，但显然，集中的信息控制已经日益难以为继。

负面的经验也提供了有意义的教训，突显了信息权的重要性。在 2003 年 SARS 危机以及 2005 年松花江水污染危机期间，最初的信息控制加剧了人们的困惑和不安。如果人们不明情况，谣言就会四起。如果谣言泛滥，恐惧就会加深，人们就容易失去做出正确判断和理智行动的能力。在政府迫于压力疏通信息渠道后，信心和秩序才得以恢复。

与日益增长的公民权并存的，是对权力与权威观念的转变。在当代中国，权力与权威备受敬畏。在某种程度上，“文革”之前和“文革”期间对官僚机构和官僚权力的攻击，已经被颠倒了过来，传统的官本位文化变本加厉地回归中国社会。现在，官本位的思想无处不在，而且得到官方管制的大众媒体和文

化产业的不断宣传。在大众文化中，美化帝王将相的电视剧和电影，充斥着文化市场。它们歌颂权力与财富，灌输盲目遵从的思想。新闻联播式的新闻播报，保持几十年前的模式不变，用大部分时间报道相关的领导。

富有幽默和戏谑的网络文化与官本位文化相悖，因此具有特殊意义。戏谑带有不敬之意，总是令有权者难堪。在晚近中国文化历史中，王朔的“痞子小说”所具有的颠覆力来自它的戏谑精神。²⁸ 网络行动以及整个中国网络文化，大多因这一精神而富有生气。如果说王朔的痞子小说在 1980 年代刚出现时，读者为之震惊，甚至称其为异端，那么同滑稽的、不顺从的网络文化相比，它现在却显得有些腴腆和过时。在中国网络空间中，没有什么是神圣的。卖弄权威的行为是网友最喜欢攻击的目标。这一不敬的文化不仅仅局限于网络，而且与当今更大的民众文化合流。如果说宗教是对外在权力的信仰，我们也许可以说中国只有到现在才进入世俗时代。这一世俗化对政治变迁的影响，只能会慢慢地展现。

草根民主拓展的第二个领域是实践。与日益增长的公民权相称的，是在公共事务上的各种形式的公民参与的激增。网络行动也是这一扩张的表征，在当代生活的其他领域，这样的例子也很多。我在第三章讨论到的利用短信动员的厦门 PX 事件是个典型，因为它将参与和抵抗联系起来，将网络行动与线下行动结合起来。

PX 事件是一次抵抗行动。网络讨论和街头示威，表达了居民对在其社区建设化工厂的反对。PX 项目是市政府支持的，因此，公众的反对挑战了企业和地方政府。PX 事件也是一次公民参与行动，公民有能力参与有关自身福利问题的决策，这是任何民主的基本条件。快速的经济没有改善公民参与民主决策的机会。我在第一章谈到的日益增强的认同危机和焦虑感，说明人们日益感到他们的生活超出了自己的控制范围。正是出于对这一失控状态的反应，公民开始更积极地参与公共事务。厦门的一些居民从网络论坛上得知 PX 项目，更多人通过一条呼吁人们“散步”的手机短信获知正在酝酿中的示威。厦门大学附近墙上的反 PX 项目的涂画，被拍成照片在网上流传。人们虽然知道信息，但他们可以不参与。而事实是，他们参与了，仅仅是因为看到一条手机短信或

一则网络帖子，这反映了他们要求控制与自己相关事务的渴望。他们的参与，是基于对政府信任的缺乏。²⁹

最近有论著专门讨论法治与民主，讨论的前提是，在 21 世纪初这两者在中国都待发育。³⁰ 中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一直在试图建立一套法律体系，尽管有些断续而有限的进步，但这一体系仍缺透明度、责任感和正当的程序。因此，公民日益依靠抗争的方式争取更加公正的社会也就不足为奇了。网络满足了即时性的社会需求。它为公民发声、串联以及行动起来反抗权力、腐败和社会不公，提供了新的媒介。通过使用网络发声、串联和行动，中国公民以自告奋勇的方式参与政治。他们实践着自己的草根民主。

网络行动代表了中国人民争取自由、正义和社区归属感的斗争。它表达了人们对基本公民权的渴望，这些权利包括可以对政府政策发表个人意见、知晓那些影响他们生活的问题、自由结社保护自身利益、公开挑战权威和社会不公、享受平等和人的尊严。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普普通通，并不表达争取宏大政治目标的崇高愿望，但就在这些平凡的斗争的背后，流淌着能量巨大的暗流。作为中国新公民行动的一部分，网络行动的沸腾显示了革命冲动的复兴。网络的力量在于揭示了这一冲动。这是另类的革命。它可能没有以往的革命号角，但未必缺乏革命的力量。

注释

- 1 比如, 夏明研究了政府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勾结。参见: Xia, "Organizational Formations of Organized Crime in China."
- 2 Sewell, "A Theory of Structure."
- 3 Durkheim,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470.
- 4 这一规律并不适用于中国更大的民众抗争图景。在这里, 激进的、对抗性的街头抗议经常发生。
- 5 Williams, *The Long Revolution*, 121.
- 6 Kong, *Consuming Literature*.
- 7 Harwit, *China's Tele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 8 赵靳秋, 郝晓鸣, "中国西部农村互联网技术的扩散模式"。
- 9 中国互联网络中心, "中国农村互联网调查"。
- 10 Chu and Yang, "Mobile Phones and New Migrant Workers in a South China Village"; Qiu, "The Accidental Accomplishment of Little Smart."
- 11 对中国网络研究者的访谈, 2007年7月23日。
- 12 关于社会运动和知识生产者, 参见: Escobar, "Actors, Networks, and New Knowledge Producers."
- 13 根据沃纳 (Warner) 的定义, "公众是一个仅仅由话语构成的话语空间。" 参见: Warner, "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 50.
- 14 公共领域的概念最初在 1980 年代晚期引进, 但只是在最近几年才融入日常语言。
- 15 Blecher, "The Mass Line and Leader-Mass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in Basic level Rural Communities."
- 16 胡传吉, "网络公民的崛起: 谁都别想蒙网民"。
- 17 约翰·杜威 (John Dewey) 相信, 交流就是建立公共社区。公共社区是人们共享目标、信仰、渴望等价值的地方。"在共同的语言、社区和交流之间不仅是一个语言的联系。人们凭借共同的东西在一个社区内生活。他们必须共享目标、信仰、渴望和知识, 即一个共同的理解。" 参见: Dewey,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5-6. 威廉姆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写道, 真正的交流不是传递观念, 而是关乎接纳、理解和社区。
- 18 Shi Zengzhi and Yang Boxu, "Civicism as Reflected in Recent 'Internet Incidents' and Its Significance."
- 19 Gao Bingzhong and Yuan Ruijun, "Introduction."
- 20 Wang and He,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 in China."
- 21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315.
- 22 Nathan,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6-17; Harding, "Will China Democratize?"; Perry,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 23 Hartford, "Dear Mayor."
- 24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链接: http://www.gov.cn/zwggk/2007-04/24/content_592937.htm, 获取日期: 2008年4月3日。
- 25 "China Holds Environment Hearing Over Disputed Project in Imperial Garden" (2005年4月14日, 链接: http://english.peopledaily.com.cn/200504/14/eng20050414_181007.html, 获取日期: 2008年4月3日。
- 26 有关当代中国城市生活中的生物权力, 参见: Farquhar and Zhang, "Biopolitical Beijing."
- 27 Li Xiguang, "ICT and the Demise of Propaganda in China."
- 28 Wang, *High Culture Fever*.
- 29 政府一直隐瞒有关该项目的信息, 直到厦门大学一位化学教授公布了这一项目。参见: 谢良兵, "厦门 PX 事件: 新媒体时代的民意表达"。
- 30 Zhao, ed.,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中国网络行动的新发展

2009年6月本书英文版面世以来，中国的网络行动经历了一些新的发展：新的重要的抗争个案不断涌现；政治和商业力量的影响变得更为微妙，更加无孔不入；新的网络服务，特别是微博，开始流行起来。因此有必要把这些新的内容补充进来，并做些批判性的反思。

□ 网络行动的持续

自1990年代后期到2008年，网络行动在中国风起云涌。2009和2010这两年，我搜集到了56个网络抗争事件的新个案，这些个案虽然有些新的特征，但基本上与本书中所研究的个案相似，说明网络行动的主要特征并没有改变。这些新的个案涉及本书提到的所有议题。网民关注的重点仍然是强拆强迁、强征农地、贪污腐败、公权滥用、环境污染以及公共卫生问题。抗争的矛头最常指向地方政府和官员，特别是执法部门。抗争的动态过程同之前的个案也非常

相似，很多还是先从大型网络社区（如天涯）的 BBS 开始，然后散布到其他的门户网站，最后得到大众媒体的关注。不少个案是对街头抗议的自发回应，这种回应使街头行动的规模和影响得以扩大。

网络行动的形式和规避网络控制的方式一如既往地富有创意。每当出现新的技术形态或新政策，新的抗争形式也应运而生。在 2009 年年初，有关部门发起了一次“反网络低俗”的运动，打击网上传播的色情与不雅内容。当这一运动开始波及那些政论性网站时，网民们反戈一击，创意性地发明了“草泥马”。草泥马是一种样子很天真的神话动物，同时该词本身却是一个汉语粗口的双关语，成为网民用来回应网络管制的颠覆性符号。这一神马的形象很快演变成各种多媒体的电子版本，并配有歌词和曲调优美的童谣。我们很容易从网上看到，这一神马经常出现在与河蟹作史诗般战斗的场景中，而河蟹则是象征网络审查的双关语。¹

我最初在书中分析的“维权”和“贪腐滥权”这两个议题，在近两年比以往更加普遍。新收集到的 56 个个案，几乎都涉及这两个议题之一。比如“躲猫猫”这一离奇事件，就与孙志刚案非常相似。

“躲猫猫”是捉迷藏的汉语俗语。2009 年 2 月 12 日，云南省的公安部门宣布，李荞明在一地方看守所被拘留期间，因玩“躲猫猫”而受重伤死亡。网民对这个奇怪的解释十分怀疑，于是抗议，并要求调查。云南省政府部门回应说，将组织调查委员会，并邀请网民参与。在 510 个申请者中，选出了 10 个网民，他们与四个政府官员和三个记者组成了调查委员会。² 在调查的基础上，政府部门随后宣布李荞明是因遭狱友殴打致死，并宣布看守所的人会受到相应的惩罚。³

在网络抗争中，“维权”和“贪腐滥权”两个议题的普遍存在，表明官方可能正遭遇信任危机。几乎在所有的个案中，网民的抗争都是因为不相信官方对事件的解释，或者是因为官方隐瞒了信息。市民要的是一个开放而负责任的政府。网络抗争表明市民对政府部门，尤其是对地方政府机构和官员缺乏信任。在“躲猫猫”事件中，云南省政府请网民加入调查委员会的决定，正是为了提高政府的可信度，因为该事件之所以引起关注，问题的实质与其说是李荞明的

死亡，不如说是政府的可信度。⁴

□ 网络与工人罢工

2010年上半年发生了多起工人罢工，网络和手机在罢工中得到应用，这是网络行动重要的新发展。整个改革时期，罢工都很普遍，但正如李静君所指出的，不同罢工事件之间彼此孤立，每个罢工独立地发生于一地。⁵然而，2010年的罢工却引发了连锁的抗争。第一次主要的罢工始于5月中旬，发生在广东佛山的本田汽车配件厂，抗争的结果是工人工资的提高。这一胜利以及富士康集团的一系列员工跳楼自杀行为，似乎产生了一种触发效应（triggering effect）。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期间，中国17个城市中的40多个外资企业发生了工人罢工。⁶

虽然罢工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包括2008年新劳动法的颁布），但这些罢工有个突出的特征，就是工人利用网络和手机进行动员。在第一次罢工中，佛山本田汽配厂的工人利用BBS论坛讨论工作条件，传播罢工的消息。⁷这一做法启发了后来罢工中的工人，比如广东中山本田锁厂从2010年6月9日开始的罢工就是一例。《纽约时报》甚至称本田锁厂的罢工为“通过发送短信和上传视频而进行的工人反叛”，因为工人“发短信呼吁同事反抗来自工厂老板的压力”，同时还“上传了本田锁厂的保安殴打员工的视频”。⁸

与他们的父辈不同的是，青年工人是使用电子技术的一代。网络、手机和QQ伴随着他们的成长。至少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农民工中间，一个活跃的工人阶层的电子文化已经形成。青年工人在网上聊自己的生活经历，甚至在自己的网络论坛上发表诗歌，⁹这令人想起汤普森（E. P. Thompson）所研究的英国工人阶层的文化。工人们虽然在工作时互相隔绝，但他们通过手机记录联系方式，维持着社会网络（有报道说，当一个年轻女工丢失手机时，她几乎感到彻底无助了，因为丢了手机就等于没了社会网络）。¹⁰

其他的社会团体和公民社团早就开始利用网络开展行动。女权主义网络、宗教团体、NGO、民族主义者、同性恋社区、维权律师以及公共知识分子，

都利用网络开展活动。¹¹对农民工而言，他们所处的环境，特别是他们集中居住的工厂宿舍区，一直以来为他们提供了动员罢工的主要交流渠道。¹²2010年的罢工，是有组织的工人大规模使用网络的第一次尝试。

这次罢工浪潮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各类社会群体中，政府向来特别关注独立的工人组织，因为中国革命历史最清楚地表明工人组织起来后的力量。因为网站可能被用于开展积极行动，所以政府对工人网站的管制尤其严格，有影响的工人网站之所以少可能与此有关。中国工人网（www.zggr.org）是少数工人网站之一，促进了有关工人状况、工业政策和社会不公的讨论，它在2006年2月22日关闭。

2010年的罢工再现了中国现代历史上强大的工人阶级的形象。然而，这一形象已经不再是改革开放之前宣传画里摇着红旗的健壮男性，而是使用电子技术的新一代青年男女，他们举起手机拍摄照片或者发送短信，传播着他们的抗争。

□ 微博

虽然早在2007年中国就有了推特（Twitter）的克隆版，¹³但微博的流行还是在2009年8月新浪网提供微博服务之后。搜狐、网易、腾讯等主要商业网站以及官方的人民网，都纷纷开始提供微博服务。仅在一年时间里，新浪微博的注册网友就达到了900万。虽然历史很短，但微博在社会动员方面已经展示出巨大的潜能。

推特在其首页上写道，“发现世界各地正在发生之事”。网络上的信息日益膨胀，且信息流向不清，推特基本的跟踪功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比较清晰的信息结构。推特网友通过跟踪别的网友，可以自动地收到他们发出的信息，即推帖（tweets）。当红的推客（twitterers）拥有众多的粉丝。截至2010年8月23日，Lady Gaga拥有5,734,612个粉丝，超过布兰妮·斯皮尔斯（Britney Spears）而成为推特“加冕”的“皇后”。影视明星姚晨是新浪微博的“皇后”，截至2010年8月26日，粉丝数达到2,638,183。由于粉丝功能呈现出纵横交错、

网络化的形态，所以谁粉丝众多，谁就有巨大的信息发布能力。推特的社会网络功能因一些外部应用程序而得到进一步加强，比如那些能够阅读、接收和发送推帖的手机程序。

推特和微博在实时的宏观传播和目标明确的微观交流中都非常有效。宏观传播包括大量的信息发布，常见于重要的媒体事件、自然灾害以及像2010年2月智利地震这样的危机形势。微观交流与目标市场营销相似。在这一形式中，微博通过汇集分散的信息以及网友的集体智慧，进行精确的交流与合作。例如在2010年3月，中国的推客通过这一形式挽救了一条生命。3月16日，青岛某大学生在推特上发信息，说对生活厌倦，决定自杀。几分钟后，这条信息在推特上传播起来。有人发帖问：“有没有青岛大学的？打电话给青岛大学！让他们去救一个叫张涤凡的学生！赶快啊！”拥有众多粉丝的“zuola”和“amoiist”回复了该帖，进一步寻求帮助。很快，又有人回复推帖道：“我已经联系了张涤凡学习的青岛大学，他们现在应该正在联系他。”¹⁴第二天，当地报纸报道，证实因为推客采取了迅速的行动，张涤凡得以获救。¹⁵

中国的推客动员过多次重要的网络抗争事件。2009年7月，在“魔兽世界”迷的百度“贴吧”，¹⁶以“贾君鹏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为题的神秘匿名帖，像病毒一样蔓延起来。虽然帖子只有标题没有内容，这句令人莫名其妙的话却成为中国网络流行语，后来还被用于政治行动。在贾君鹏帖出现的前一天，某博客写手被福建省马尾公安分局拘留。在公安局里，该写手悄悄在推特上发了一条紧急求助的消息：“我被马尾警察局抓了，SOS。”他的朋友收到该推后，展开了营救工作。受贾君鹏帖的启发，有人号召人们给拘留地的公安局寄送写有“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的明信片，由此引发了一场“明信片运动”。被拘留的博客写手本人认为是该运动迫使公安局释放了他。¹⁷

微博与中文推特圈有所不同，非政治性话语占绝大多数。新浪有意将其微博打造成分享个人情感的平台，一个温情的所在。为了推销这一理念，新浪炮制了一个新词——围脖——来描述它的微博服务。“围脖”作为“微博”的同音词，象征着温暖和亲密。这个理念受到欢迎，在微博上线的最初一段时间，正值寒冷的冬季，“围脖”成为微博的昵称。

同国内其他的网络服务一样，微博删帖也是家常便饭。¹⁸即使这样，中国的微博圈仍然制造出大量的抗争话语。我在书中描述的七种议题的抗争，在微博上也很普遍。

方舟子在其微博上曝光微软前执行总裁唐骏的学位作假行为，属于微博初期较有影响的案例。在他的自传中，唐骏称从著名的加州理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2010年7月，方舟子在他的新浪微博中曝光，唐的学位不是加州理工的，而是一所不知名的美国大学，该校基本上是一个卖学术文凭的工厂，已被美国当局关闭。该事件成为全国性新闻，再一次让人们注意到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信任危机问题。¹⁹

尽管微博一推出就广受欢迎，但它并没有取代其他成熟的网络服务。旧日美好的BBS一如既往地受欢迎，而且依然是网络抗争的最重要的平台。大部分新的抗争事件仍然从BBS支撑的网络社区开始，因为BBS论坛更具互动性和匿名性，不像在博客和微博，越来越多的写手使用真名。面对网警的监管和来自网络社区的语言暴力，匿名互动的环境为网友多少提供了一层保护。更重要的是，只有在互动的情况下，经过网友的回帖和论帖，被讨论的议题才有可能变成抗争事件。BBS论坛持续生成抗争事件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的历史。正因为人气旺的网络社区经常引发抗争，并因这些抗争活动而出名，所以当人们希望引起公众关注某事时，他们首先会考虑去这些社区。²⁰习惯一经形成则难以改变。

出于以上原因，微博并没有取代其他的网络服务。目前的趋势是，多种功能的界面融合，这样网友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选择不同的服务。现有的各种运用程序的界面，可以很容易地将不同的服务连到一起。

□ 全面的网络控制模型

我对网络行动的分析，主要关注的是制度与文化的影响，即国家、市场、抗争文化与市民社会（本土的与全球性的、线上的和线下的）这些因素的作用。我在历史框架中探讨这些因素，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以此来突出网络行动在

宏大的多维动力网之中的重要性。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网络行动继续反映出这些交互力量的影响。不同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大致保持了 2009 年时的态势。然而，有两个新的现象需要引起重视，即国家网络管理策略的不断完善以及商业利益影响的日益渗透。这是政治和商业力量对日益壮大的网络力量所作出的回应。

在 2004 年作出的有关加强执政能力的决定的指导下，中国的网络管制制度不断完善，已经形成所谓的网络“管理”的全面策略。2010 年 6 月 8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白皮书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要把管制策略发展为一套“中国互联网管理模式”：“中国坚持依法管理、科学管理和有效管理互联网，努力完善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和社会教育相结合的互联网管理体系。”²¹ 虽然白皮书中的有些观点受到争议，²² 但它承认网络公众意见的合法性，文中指出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上反映的社情民意。互联网在政府与公众之间架起了直接沟通的桥梁”。²³

该模式强调网络管理与控制必须采取积极的路径。在中国提升软实力的全球战略的大背景下，²⁴ 这一模式已经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政府提出了一个主要的新方案，即通过市场机制鼓励官方新闻网站的成长。这一做法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官方新闻媒体在网络上的有力展示，将提升党媒的正面影响。尽管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官方新闻媒体上网，但政府一直禁止官方新闻网站进入 A 股。像《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这些大的新闻机构的网站只不过是这些机构的附属。由于资金不足，又囿于官方新闻模式的框框，它们难以企及商业网站的红火与成功。²⁵ 然而在 2010 年 5 月，有报道称，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在内的 10 个官方新闻网站已获准进入 A 股，这标志着官方新闻网站市场化的开始。²⁶

作为积极网络控制策略的一个方面，中央政府正在培养地方政府回应网络抗争的能力。自 2009 年 7 月以来，《人民日报》新成立的舆情监测室一直在发布有关地方政府回应“网络群体性事件”情况的季度报告。第一个报告列出 2009 年上半年发生的 10 起事件，并根据地方政府处理的情况进行评级。级别的评定建立在 6 个指标之上：政府响应、信息透明度、政府公信力、动态反

应、官员问责、网络技巧。根据各项得分的加总，该报告给相关地方政府评定四级级别中的一种颜色级别。蓝色意味着“政府应对总体较为得体”，黄色代表“政府应对有待进一步加强”，橙色是指“政府应对存在明显问题”，红色表示“政府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湖北省石首市政府因为在2009年6月的骚乱中处置不当，引发了大量的网络抗议，因而市政府被处以红色警报级别的评定。

这份报告不仅进行评级，而且还提出政策建议。它指出，中国网民已经成为新的“压力群体”，因为网民有各种渠道发布网络信息，所以挡不住他们发声。因此，政府官员必须回应网络上的意见，学会在不激化社会矛盾的情况下进行处理。该报告建议，信息公布比信息控制更好，另外在网络抗议发生时，地方政府应该采取“分离”的策略，以保护政府的形象，也就是说要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草根社会、各级政府与坏官员区分开来，这样每一组中的前者就不会像是在支持后者的行为。²⁷

对网络行动采取更具回应性的方式，并不意味着网络管制的放松。事实上，政府为了加强管制，采取了新的行动。2009年5月19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决定，要求从7月1日起，所有在中国销售的电脑必须预装“绿坝·花季护航”过滤软件，不过该决定最终没有实施。工信部称，设计此政策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免受色情文化的毒害，然而却引发了对可能带来的更广泛的网络监管的异议。

虽然迫于国内外的压力，过滤软件的方案最终被迫暂停，但工信部随后却制定了其他加强网络管制的政策。2010年2月，工信部发布决定，要求域名服务提供商必须核实域名申请者的个人信息，记录身份证号码。²⁸这一决定与要求在新网站和主要的商业门户网站建立实名注册系统的做法如出一辙。²⁹实名制则是另一项可能对政治参与产生深远影响的方案。

如果白皮书中提出的网络治理模式得到充分的执行，可能对网络行动产生两方面的影响。从表面上看，该模式给网络抗争提供了更多的政治机会，因为它承认网络公众意见的合法性。它强调电信工业对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性重要地位，这意味着网络作为新兴工业将会继续得到发展。然而，它同时还提出网

络管理的中国模式，强调主权与国家安全以及依法管理等措施，这意味着网络控制将会呈现出更加微妙而精细的形式。官方新闻门户网站将会更加努力地去催发“正面”的公众意见，同时以隐蔽的形式对网络空间和积极分子网络的渗透也会加强。这些因素都将削弱网络行动的力量。

□ 形迹可疑的商业行为

在中国网络发展的早期，公民社会对网络的使用程度远高于商业。这种情况至今依然如此，尽管商业对网络的运用程度得到了大幅提升。2003年6月，中国6800万网络网友中只有11.7%的人经常使用网络购物，而接近23%的网友经常光顾BBS论坛。到2008年6月，网友总数升至2.53亿，其中有25%的人经常在网上购物，39%的使用过BBS。到了2010年6月，网友数达到4.2亿，接近34%的网友经常使用网络购物，而使用BBS和博客的网友分别占31.5%和55%。³⁰网络的商业性运用和社会性运用的增长可谓齐头并进。

网络因网民的参与而繁荣，网民不但消费而且生产网络内容。因此，网络经济能否成功要看它们能否吸引网民，甚至包括那些试图通过网络达到抗争性目的的网民。这种情况使市场和维权行动之间产生了一种新型的关系，也就是积极分子使用网络可能会有益于商业目的，而网站也欢迎或认可他们的网络平台被用于抗争。除了强调这一关系对网络行动的意义之外，对于“网络推手”的商业行为有可能导致虚假抗争的危险，我在书中也已经提出。

在过去的一年里，“网络推手”现象变得更为普遍。当然也许是因为主流媒体对该现象报道得更多。³¹“网络推手”号称是有效的网络营销方式，其做法多种多样。或发表有误导信息的帖子，人为制造有轰动效应的网络事件，或屏蔽和删除对自己的产品或公众形象不利的信息。由于这类信息具有欺骗性，商业型网络推手的行为，从长远看有可能会损害网络信息的可靠性，削弱网络作为市民行动平台的力量。

假设某企业要推广某产品，它可能会聘请网络推手代理机构。受聘机构会设计方案，雇佣网友作“推手”。这些网友会通过写博客或发BBS帖子，挑起争端，

引起反应，促进网络互动。帖子一旦在网络上引起足够的注意，大众媒体就会跟进报道。有了大众媒体的报道，也就制造了一起公众事件，推手也就成功地推广了代理的产品。

王老吉凉茶的营销策略是网络商业“推”销的知名案例。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之后，王老吉凉茶公司宣布捐1亿元善款赈灾。受聘推广该产品的咨询公司设计了一个营销策略。他们雇佣网友在各个网络社区中发表匿名帖子，不是赞扬王老吉公司的慷慨，而是攻击它捐这一巨款只是为了故作“高傲”。一个题为《让王老吉从中国的货架上消失！封杀它！》的轰动帖子在网上迅速传播。网民们质问并讨论为什么要封杀一家如此慷慨的公司的产品。不久，主流媒体开始关注该事件，并将它变成全国性新闻。结果，王老吉成为2008年夏天最受欢迎的饮料。只不过当网民们后来知道了背后的营销伎俩时，便颇有受骗上当之感。³²

“网络推手”的行当是营利性的。根据一份报告，每个帖子的价格在5毛左右（与政治推手的网评员即所谓的“五毛党”的报酬相当）。如果一个帖子在某主要BBS论坛上受到关注，那么该帖子的价格便升至600—1000元。网络流量十分关键。如果某个帖子得到10,000个点击，那它就成了“热帖”，价格在100,000元左右。³³贴在百度某论坛上的一个招聘广告是这样推销他们的工作的：“只要你是网民，能每天在线6小时以上，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本公司郑重承诺，每人每月工资不低于1000元。”³⁴

据估计，中国有成千上万的公司专门做网络“推手”。³⁵在北京某公司的官方网站上，“网络推手”项目中包括如下服务：“网络品牌推广、网站推广、信息发布、商品营销、销售渠道、客户服务、客户关系以及网络研究。”³⁶该公司在几个博客上宣传业务，其中一个博客上有这么一则英文信息，我在此逐字引用：“我们拥有专业的创作设计团队、写作团队和执行团队。借助于长期积累的网络传播经验，我们已经收集了成千上万的信息源，同时也同很多著名的专业网站和媒体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这可以将您的信息迅速地在网上传播，提高公司和个人的知名度。”³⁷

商业公司还可能花钱屏蔽不利于公司形象或者产品的消息，百度与毒牛奶丑闻的瓜葛就是最好的例证。2008年末，三鹿集团生产的婴儿奶粉被指可能

对数以百计的儿童肾脏造成了损伤，因为该公司为了让奶粉看起来更有营养，在奶粉中加兑了有害的化学物质。据报道，三鹿集团提出支付 300 万元给中国的搜索引擎大户百度，让百度屏蔽有关三鹿的负面信息。³⁸ 虽然面对公众的指控，百度否认了与三鹿有任何交易，但该事件却也显示了网络公司面对商业利益的脆弱性。

为了了解商业型网络推手的行为可能降低网友信任网络信息的程度，我在 2010 年 7 月于北京举行的某公共论坛上，与几家网络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在回应我提出的问题时，强调了三点，并认为这三点可以有助于保护网络信息的可靠性。首先，很多网络公司已经开始提倡有关公司社会责任的伦理道德，培养健康的经济环境。其次，网友在互动中的集体智慧可以减少错误信息的传播。最后，网友可以根据自己的网络经验，形成解读网络信息的技巧。

后来我对北京某大型网络公司的营销经理进行了采访，她的回答肯定了以上的观点。她从网民和营销公司两方面向我作了解释。对于营销公司来说，网络营销刚开始是个令人激动的发现。在过去，他们在正常的经济交易费用之外，还要为维持同大众媒体编辑的关系而在人情上加以投入。后来，他们发现可以在网络社区宣传产品，或者插入广告，或者通过雇佣廉价的劳动力去做这些事情。她说，“他们特兴奋”——

用最低成本最鲁莽的方式去做了。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大家也逐渐成熟。你成本 2 万发的和成本 10 万认真发的，结果一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大公关公司又发现了，如果我这样发的话，我跟那小公司有什么区别呀。我也是雇人发，他也是雇人发，我怎么体现我的优质性，怎么去体现我的价值？他可能加更多的策划呀，更多的跟媒体的合作呀，去提升质量。他也会觉得简单的发帖不行。随着网友的提升，广告主水平的提升，主流公关公司的提升，五毛党的发帖越来越不被商业角度所采用。³⁹

谈到网友时，我的采访对象说：

客户开始分不清是什么，在天涯看到帖子说张三不好，张三肯定不会。但是后来越来越多，一堆人说他好一堆人说他不好。真关注这个事儿的人就会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他会找到他认识的人，不管是真正认识的，还是在网上认识的……另外一个，好多的网友也找到一些规律。比如说这个 ID 有多长。比如说这个 ID 刚注册，那可能假的居多……另外一个可能这个 ID 挺时间长了，但他从来不发别的内容，只发这内容，他也认为是假的。所以说他通过网上经验的增加，他就慢慢能分辨出一些事情的真伪。⁴⁰

因此，网络公司的管理人员已经意识到商业型“网络推手”业务中存在的问题，但他们非常乐观，相信这些问题是暂时的、可控的，不会给中国的网络文化造成严重的破坏。因为谈的是他们自己的行业，他们未必能保持绝对的公允，但他们认为网络文化充满活力，对网络未来的乐观和自信溢于言表。有人说开放式的网络（Open Web）已经死亡，⁴¹但实际上网络的未来仍然是开阔的。

□ 复杂的互动和未来抗争的趋势

我在这篇后记中，根据最新的发展，重新审视了我在书中提出的命题。我们可以看到，网络行动作为中国网络力量的表现，依然保持着它的态势。同时，网络治理和控制的方式也越来越精细，商业利益的影响越来越无孔不入。政治和商业利益对公民网络空间的不断渗透，实际表明网络公民力量的壮大。正因为抗争性的网络事件已经成为公众意见的重要表达方式，所以宣传部门和营销公司才予以关注。

为了凸显主要的新行动者和新的行动形式，我在后记中集中讨论了工人、微博，以及新的政府策略和商业型“网络推手”的问题。还有很多其他重要发展，我在这里略作说明。

2010年3月22日，谷歌开始将来自 google.cn 的搜索请求自动转到 google.com.hk 的网站上，从而实际上停止遵守官方有关审查搜索结果方面的规定。谷歌在网络自由与审查方面同官方的对抗，已经广为人知。这一冲突不仅引发了针对这些议题的国际性辩论，同时（或许更重要的是）也标志着跨国公司加入到网络行动与网络控制之间复杂的探戈舞行列。谷歌通过与官方审查规定的决裂，将自己置于支持国际网络自由的道德高地上。谷歌事件可能会对中国网络行动的动态过程产生重要的影响，但具体影响尚不明朗。

与谷歌事件相关的是有关网络安全、赛博安全、网络犯罪和国家安全话语的激增。且不管导致这一现象的多重原因是什么，这种话语的确促使各国政府加强了对网络的控制。⁴²当国家安全压倒其他一切议题时，关于加强网络安全的话语就很容易成为监控与审查无辜公民和公民社会行为的借口。正如我们从中国网络白皮书中所看到的，国家安全是网络管制的理由，而网络安全的话语却是双刃剑，对网络自由有双重效果。

最后，微博写手和新一代移民工人，作为新型的网络积极分子，开始粉墨登场。这些新的参与者与我在书中谈到的其他公民社会行动者一起，参与了为争取正义、自由和集体归属感的日常斗争。他们中间有草根社团、博客写手、游戏玩家、黑客、环保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举报人、宠物主、业主、消费维权积极分子、海外异见人士，以及学生、知识分子和其他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等等。因为存在如此广阔的网络行动领域，所以我们不能假定在全国范围内存在任何形式的集体团结感，或者认为不同社会团体之间存在某种同质性。其实，网络上存在很多区隔与冲突，⁴³而且还有一些群体在本书中没有谈到。⁴⁴然而，我希望本书展示出一个日益多元的领域。在这里有充满渴望的个人和群体，有情感，也有各式各样的组织形式和实践。网络行动将会继续在各种社会力量角逐的历史进程中扮演它特有的角色。这些复杂的互动将继续塑造着中国网络行动和网络自由的未来，同时也被网络行动所塑造。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变迁，交织构成了现代中国的长期革命。如果说网络抗争已经成为这个长期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么它也将塑造中国的未来。

注释

- 1 Michael Wines, "A Dirty Pun Tweaks China's Online Censors," *New York Times*, March 11, 2009.
- 2 李元涛、吴晓琛, "云南邀请网友调查'躲猫猫'", 《南方都市报》, 2009年2月20日, AA10版。
- 3 《南方周末》, "官方公布'躲猫猫'调查结果——李莽明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 2009年2月27日, <http://www.infzm.com/content/24573>, 获取日期: 2010年8月26日。Jane Macartney, "Angry Web Users Force China U-Turn Over 'Hide-and-Seek' Death in Police Custody," *Times*, February 21, 2009, <http://www.timesonline.co.uk/tol/news/world/asia/article5772317.ece>, 获取日期: 2010年8月26日。
- 4 我要感谢戴慧珍 (Deborah Davis) 和裴宜理, 她们提醒我有几个趋势可能会与我关于政府信任危机的判断不符, 例如强大的领导集团、高度的爱国主义和民主自豪感以及在电子政务上的新发展。这些互相冲突的迹象与相互背离的趋势的存在, 说明了中国社会转型的复杂与冲突的特征。这一信任危机是否掩盖了更严重的政权合法性, 则另当别论, 超出了这篇后记所能论述的范围。有关国家合法性问题的研究, 参见: John James Kennedy, "Legitim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wo Increases, One Reductio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8, no. 60 (2009): 391-395; Heike Holbig and Bruce Gilley, "Reclaiming Legitimacy in China," *Politics and Policy* 38, no. 3 (2010): 395-422; Vivienne Shue, "Legitimacy Crisis in China?" in *Chinese Politics: State, Society and the Market*, ed. Peter Hays Gries and Stanely Rosen, 41-68 (London: Routledge, 2010).
- 5 Ching Kwan Lee,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 6 Kenji Minemura, "Japanese Firms Targeted in China Strikes," *Asahi Shimbun*, July 31, 2010, <http://www.asahi.com/english/TKY201007300467.html>.
- 7 David Barboza and Keith Bradsher, "In China, Labor Movement Aided by Modern Technology," *New York Times*, June 16,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6/17/business/global/17strike.html>, 获取日期: 2010年8月31日。
- 8 同上。
- 9 Jack Qiu,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 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9).
- 10 Leslie T. Chang, *Factory Girls: From Village to City in a Changing China* (New York: Spiegel and Grau, 2009).
- 11 具体例子参见: Zheng Wang, "Feminist Networks," in *Reclaiming Chinese Society: The New Social Activism*, ed. You-tien Hsing and Ching Kwan Lee, 101-118 (London: Routledge, 2010); Emily C. Dunn, "Netizens of Heaven: Contesting Orthodoxies on the Chinese Protestant Web," *Asian Studies Review* 31, no. 4 (2007): 447-458; and Simon Shen and Shawn Breslin, eds., *Online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China's Bilateral Relation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0).
- 12 Chris King-Chi Chan and Pun Ngai, "The Making of a New Working Class? A Study of Collective Ac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 China," *China Quarterly* 198 (2009): 287-303.
- 13 饭否 (Fanfou.com) 创建于2007年5月, 两年后被关闭。
- 14 我实时跟踪了这些事件, 并于2010年8月27日用谷歌的实时功能检索到有关这个案例的推帖。
- 15 "微博留言要结束生命、网络爱心救回青岛自杀网友", <http://www.qdjimo.com/html/2010/03/170927454674.htm>, 获取日期: 2010年8月27日。
- 16 "贴吧"是百度网络布告栏的名字。通过这一功能, 百度已经建立起庞大的、多层次的网络社区, 这是百度搜索引擎的一个重要的用户基础, 也是它取得巨大成功的因素之一。
- 17 2009年8月11日 blogspot.com 博文, 获取日期: 2010年7月25日。
- 18 关于加强对微博控制的报道, 参见: Jonathan Ansfield, "China Tests New Controls on Twitter-Style Services," *New York Times*, July 16, 2010.
- 19 我在书中第195页谈到, 方舟子作为一个无情的打假作家和博客写手, 已经从事这样的工作很多年。2010

- 年 8 月 30 日，两名男子在他回家的路上伏击了他，将他打成轻伤。他的妻子在微博上发表声明，表示方舟子绝不惧怕曝光社会丑恶现象。
- 20 材料来自 2010 年 7 月 9 日我在北京对一位大型网络公司的营销经理所进行的访谈。这里引用的所有访谈都是在匿名的情况下进行的，为保护访谈者身份，隐去姓名。
 - 2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北京，2010 年 6 月 8 日），http://www.china.org.cn/government/whitepaper/node_7093508.htm。
 - 22 对这个报告的两个回应，参见：Rebecca MacKinnon, “China’s Internet White Paper: Networked Authoritarianism in Action,” *RConversation*, July 15, 2010, <http://rconversation.blogs.com/rconversation/2010/06/chinas-internet-whitepaper-networked-authoritarianism.html>; and Monroe Price, “The Battle Over Internet Regulatory Paradigms: An Intensifying Area for Public Diplomacy,” Center for Public Diplomacy, August 3, 2010, 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index.php/newswire/cpdblog_detail/the_battle_over_internet_regulatory_paradigms_an_intensifying_area_for/。
 - 2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互联网状况”。
 - 24 Xiaoling Zhang, “From ‘Foreign Propaganda’ to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hina’s Promotion of Soft Power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China’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Revolution: Social Changes and State Responses*, ed. Xiaoling Zhang and Yongnian Zheng, 103-120 (London: Routledge, 2009)。
 - 25 材料来自我在 2007 年 7 月 10 日对一家主要的官方网站前主编的采访。
 - 26 杨律、张梦，“新闻网站的上市冲动为新媒体加温”，2010 年 7 月 4 日，<http://www.cb-h.com/news/wh/2010/63/106337HGI4FC2I6J29804.html>，获取日期：2010 年 8 月 30 日。
 - 27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2009 年上半年地方应对网络舆情能力排行榜”，2009 年 7 月 23 日，<http://yq.people.com.cn/zt/dz3/%E4%BA%BA%E6%B0%91%E7%BD%91%E8%88%86%E6%83%85%E7%9B%91%E6%B5%8B%E5%AE%A4%E2%80%9C2009%E5%B9%B4%E4%B8%8A%E5%8D%8A%E5%B9%B4%E5%9C%B0%E6%96%B9%E5%BA%94%E5%AF%B9%E7%BD%91%E7%BB%9C%E8%88%86%E6%83%85%E8%83%BD%E5%8A%9B%E6%8E%92%E8%A1%8C%E6%A6%9C%E2%80%9D.pdf>。
 - 28 中国互联网络中心，“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进一步落实网站备案信息真实性核验工作方案”，2010 年 5 月 5 日，<http://www.cnnic.net.cn/html/Dir/2010/02/23/5785.htm>，获取日期：2010 年 9 月 25 日。
 - 29 Peter Foster, “China to Force Internet Users to Register Real Names,” *Telegraph*, May 5, 2010,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china/7681709/China-to-force-internet-users-to-register-real-names.html>，获取日期：2010 年 9 月 1 日。
 - 30 这些数据来自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所做的一些调查，有关调查报告，参见：<http://research.cnnic.cn/>。
 - 31 丁乙乙、周元英，“谁在操纵网络舆论？”，《IT 时代周刊》，2010 年 1 月 5 日，33-38；张意轩，“全国至少千家网络推广公司，网络营销应积极使用”，《人民日报》，2010 年 6 月 8 日。
 - 32 丁乙乙、周元英，“谁在操纵网络舆论？”
 - 33 同上。
 - 34 同上。
 - 35 同上；张意轩，“全国至少千家网络推广公司，网络营销应积极使用”。
 - 36 为了保持匿名性，我将不提供网站地址。
 - 37 同上。
 - 38 Shai Oster and Loretta Chao, “China Arrests 2 in Milk Scandal as Number of Sick Infants Rises,” *Wall Street Journal*, September 16, 2008,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22147061860735851.html>，获取日期：2010 年 9 月 15 日。
 - 39 材料来自 2010 年 7 月 9 日我在北京对某网络公司营销经理所做的访谈。
 - 40 同上。

- 41 Chris Anderson and Michael Wolff, "The Web Is Dead. Long Live the Internet," *Wired*, August 17, 2010, http://www.wired.com/magazine/2010/08/ff_webrip/all/1, 获取日期: 2010年9月26日。
- 42 Ronald J. Deibert and Rafal Rohozinski, "Good for Liberty, Bad for Security? Global Civil Society and the Securitization of the Internet," in *Access Denied: The Practice and Policy of Global Internet Filtering*, ed. Ronald J. Deibert, John G. Palfrey, Rafal Rohozinski, and Jonathan Zittrain, 123-150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8).
- 43 有学者已经开始研究不文明行动 (uncivil activism) 的形式, 如网络大汉族主义。参见: James Leibold, "More Than a Category: Han Supremacism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China Quarterly* 203 (2010): 539-559。
- 44 感谢杨美惠和阿兰·亨特 (Alan Hunter), 提醒我关注网络女权行动和网络宗教实践的重要性。

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¹

近年来，大陆的网络事件层出不穷。有很多事件涉及重大社会问题，或引发广泛的网络抗议，或推动自发的公民行动，或波及主流媒体和国际媒体，在海内外产生很大社会影响。有代表性的网络事件包括“孙志刚事件”、“刘涌事件”、“宝马事件”、“山西黑砖窑事件”、“华南虎事件”，等等。本文认为，网络事件的产生和扩散，所依赖的是能够激发网民的嬉笑怒骂、喜怒哀乐等情感的表现形式和内容。网络事件的发生，是一个情感动员的过程，而传统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的理论范式，并不能充分揭示网络事件的动因和意义。本文用文化分析的方法，从情感动员角度研究网络事件，并试图通过对网络事件的情感动员的分析，揭示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

□ 社会运动的文化分析

在日常生活和社会运动中，情感占据核心地位。喜怒哀乐，爱憎恨怨，诸

如此类，构成生活中的情感力量。没有情感的生活，就是没有活力的生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没有情感的表达，就没有社会运动。古往今来，不论什么样的社会运动和集体行动，都是带有感情色彩的行动。往往是行动的方式越激烈，情感色彩越重。所以大革命的时代，是最富有激情的时代。美国有学者提出，近些年美国左翼力量缺乏号召力，原因之一就是左翼运动缺少政治激情。相比之下，右翼运动，如宗教运动，则依靠近乎痴狂的热情，动员了广泛的基层力量 (Hart, 2007)。社会运动的研究，曾对情感因素予以排斥。1960 年代之前很多关于群体行为的研究认为，群体行为是非理性的感情所致，是病态的表现。这方面的代表作是勒庞的《乌合之众》。实际上，他把群体行为诬蔑成暴民行为，具有明显的贬低民众抗议的意识形态特征。1970 年代兴起的资源动员理论，其历史意义正是在于对这种保守的群体行为理论提出了批判，肯定了社会运动的合理性。当时，1960 年代西方学运的参与者已经步入社会。他们中间进入学术领域者，从个人经历出发，对学运和社会运动给予肯定。这一点从近年出版的《不顺从的一代：1960 年代的社会理论家》(Sica and Turner, 2006) 一书中可见一斑。但随着资源动员理论的兴起，社会运动理论却走向另一个极端，研究重心完全转移到社会运动组织，忽视了文化和情感的因素。直到 80 年代末期，随着文化分析的兴起，这一局面才有所改变 (Goodwin, Jasper and Polletta, 2001; Yang, 2007)。

文化分析在社会运动研究领域的兴起，有三方面的思想背景。第一是受到新文化史研究的影响。新文化史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忽视文化的倾向做出批判，强调文化在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和独立性。这方面影响较大的是琳·亨特的《法国革命的政治、文化与阶级》(Hunt, 1984, 2004)。亨特认为，不管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阶级史学还是托克维尔式的以国家权力为核心的理论，他们对于法国革命的研究，重点都是革命的起源与结果。马克思主义的论述，认为法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因为资产阶级既是法国革命的发起者也是其受益者。而托克维尔则认为，法国革命起源于对君主集权的抗争，其结果却是使国家权力更加集中。亨特认为，这些经典研究只看到起源与结果，完全忽略了革命过程和革命经历的重要性。她提出，革命的逻辑实质上是贯穿于革命进程中的政治

文化。因为政治文化由语言、意象、修辞等象征实践 (symbolic practice) 所构成, 所以分析的重点, 在于揭示这类象征实践与革命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简单的机械反映, 而是建构。政治文化直接推动了革命的进程。在中国研究领域, 瓦瑟斯通与裴宜理合编的《现代中国的群众抗议与政治文化》(Wasserstrom and Perry, 1994) 有意识地吸纳了新文化史学对社会运动中政治文化的重视, 是较早开始对中国社会运动进行新文化分析的作品。

文化分析兴起的第二个背景, 是欧洲新社会运动 (new social movements) 理论。新社会运动的核心概念是认同和表达, 故其理论又称为“基于认同的理论” (Cohen, 1985)。新社会运动所研究的内容, 以 1960 年代、1970 年代以后的环境运动、和平运动和女性运动为主。研究者发现, 此类运动的参与者追求的是自我价值的表达, 他们在社会运动的参与过程中, 以不拘一格的方式实践自己的信念。他们未必参加什么正规的运动组织, 但却有自己的社会网络, 通过非正式的、自发的、象征性的行动和不拘一格的风格, 挑战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这样的社会运动, 是社会建构 (social construction) 的结果。因此研究的重点, 应该是建构的过程 (Melucci, 1996)。

文化分析兴起的第三个背景, 是美国社会运动界内部对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模式的批判。这方面的批判, 与琳·亨特对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批评有理论渊源, 均集中于两种理论的结构主义倾向。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分析的重点, 是运动之前的社会结构变化, 忽略了运动过程中行动者的主体经验、互动关系和文化因素。对资源动员的批判, 由来已久 (Kerbo, 1982)。因《穷人的运动》一书而闻名的琵温和克拉德 (Piven and Cloward, 1977) 认为, 穷人造反, 不是靠组织资源, 靠的就是体制外的抗议活动。抗议才是他们唯一的资源。论组织资源, 他们决不能与自己的对手抗衡。后来两人发表长篇论文, 对资源动员理论忽视怨愤, 过分看重运动组织的倾向做了较系统的批判。对于政治过程理论的批判, 同样很多。率先倡导研究社会运动情感的学者古德温 (Goodwin) 和简斯伯 (Jasper) 于 1999 年在纽约大学 (NYU) 组织了开先河的“情感与社会运动”学术讨论会, 并在同一年发表文章, 对政治过程理论做了批判。他们指出了政治过程理论的结构主义倾向和片面性, 说政治过程理论认为, 社会运动在政治

机会比较开放和有力的情况下容易发生，但在很多情况下，实际上是镇压行为导致更强烈的反抗（Goodwin and Jasper, 1999）。

社会运动研究中的文化分析，在内容和方法上触及社会运动文化的很多方面，如传统、习俗、仪式、价值观、音乐、文学、媒体、象征、意象、漫画、叙事、话语、情感等对集体行为的影响。对于情感因素的分析，是文化分析中比较有影响的支流。

□ 社会运动的情感动因

社会运动研究对情感的重新审视，受到情感社会学的影响。1980年代，登曾（Denzin）、克林斯（Collins）、肯坡（Kemper）和霍赫切尔德（Hochschild, 1984）等社会学家，把情感问题纳入他们的研究视野。霍赫切尔德的《受管制的心》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作品。作者通过对航空公司服务员的情感表达的研究，发现资本主义的剥削与管理方式，已经从对劳动力的剥削，深入到人的感情和内心。飞机上的服务员，不管个人内心有什么样的痛苦或不愉快，都要对乘客笑脸迎送。这种劳动，她称之为“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其规则是一种由社会制定的“情感规则”（feeling rules）。社会的权力结构和不平等关系，决定了什么样的人可以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在官僚体制里，上级、老板可以对下级发脾气，反过来却不行。霍赫切尔德认为，当代社会主流的情感文化，是“情感管理”。这种情感文化迫使个人“管理”他们的情感，根据场合的需要，或压制或刻意制造喜怒哀乐的情感。这是工具理性的情感文化，其结果是人内心深处的异化。

霍赫切尔德关于情感管理论述的意义，在于说明情感的社会属性。情感不仅仅是生理的和心理的，更不是非理性的，而是因社会文化而异。受此启发，有学者研究了社会运动的参与者如何控制和克服恐惧和羞耻等负面感情（Goodwin and Pfaff, 2001），培养、激发和表达自豪和喜悦的感情（Whittier, 2001）。也有的研究愤怒在集体行动中的重要性。简斯伯（Jasper, 1998）讨论了多种与社会运动相关的情感，如爱、恨、信任、尊敬、忠诚、愤怒、悲伤、羞

耻，提出社会运动的组织者必须懂得这些情感因素对于运动参与的影响，才能积极调动有利于动员、克服不利于动员的因素。弗兰 (Flam, 2005) 把社会运动内部的情感与针对抗议对象表现的情感区分开来，分析了两类情感对集体行动的不同影响。裴宜理 (2002) 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除了意识形态、严密的组织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革命者善于情感动员，会做“感情工作”。共产党在各时期发起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土改时期的“忆苦思甜”，实际上就是情感动员的运动。

上述研究，在实质上并没有脱离资源动员的框架，只不过把情感当成了一种新的资源。这就把情感工具化、简单化了，无法揭示情感在集体行动中的核心作用。集体行动中的情感，不是简单的资源或工具，而是斗争的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集体行动有其情感逻辑。这个情感逻辑也就是德国学者霍尼斯 (Honneth, 1995) 在其《为承认而斗争》中所说的“社会冲突的道德语法”。霍尼斯认为，社会秩序的维持，靠人们的“相互承认”，而承认则有其不成文的规则。当这些规则受到侵犯时，受侵犯者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便受到损害，导致感情受伤害。在国际关系中，当一国做出侵害另一国尊严的事情时，受害国会说“你们伤害了我国人民的感情。”在日常生活中，正是在人们的感情受到伤害时，他们才起来抗争，故有“奋起抗争”之说。可见感情实在是道德伦理的温度计。当人们因感情受到激发而参加集体行动的时候，不是他们失去了理智，受到感情的盲目支配，而是他们的道德原则驱使他们采取行动。他们的抗争，是争取承认的斗争。用社会运动研究中使用较多的概念，这种承认的斗争，也就是认同的斗争。

新社会运动的重要理论家莫鲁奇 (Melucci, 1996 : 71) 认为，关于认同的研究过分偏重认知的内容 (如观念和思想)，忽略了认同的情感内容。人们感觉到同属一个集体，这是情感投入。因为有情感的投入，所以集体认同就不是简单的患得患失的利益关系。激情、爱、信仰、忠诚等情感，在集体认同中均占有重要地位。往往是这些情感因素，鼓舞人们做出勇敢的抗争行为。Yang (2001) 提出“情感实现” (emotional achievement) 的分析框架，认为“情感的实现同时也是认同的实现。”同时在这个意义上提出，1989年的动员过程，是

情感和认同驱动的抗争。

社会运动中情感动员的主要方式，是情感的表达。情感的表达则依赖各种载体和象征手段，如话语、音乐、漫画、诗歌、顺口溜、口号、标语等等。在互联网和新媒体时代，这些传统的表达方式被赋予了新的能量，传播面广、速度快、发布渠道多。同时出现了视频、短信、闪客、播客、博客等新的表达方式。

目前对于社会运动的情感研究，使用最多的是书面资料，如运动中产生的话语、故事、音乐、漫画、口述历史、媒体报道等（Eyerman and Jamison, 1998；Yang, 2001, 2005; Goodwin and Pfaff, 2001；Polletta, 2006; Reger, 2007）。随着电子媒介的普及，关于社会运动的影像资料将为情感研究提供重要的直观数据，因为影像可以有声有色地记录运动参与者的情感表现。网络的发展和网络事件的出现，也对社会运动的情感研究提供了便利。有学者已经对新媒体利用讽刺漫画等手段制造幽默滑稽的情感效果，从而开展抗议活动进行了研究（Wettergren, 2005, 2009）。中国大陆的网络事件主要发生在网络社区，因此研究社区里有关该事件的帖子，是揭示该事件发生的过程和原因的重要手段。

网络事件属于典型的“抗争性谈话”（contentious conversation）。“抗争性谈话”是梯利（1998）提出的概念。梯利出版于1978年的专著《从动员到革命》，本是资源动员和政治过程理论的奠基之作，但他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注意文化因素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他说社会运动如同日常生活中的谈话，其本质是一种互动，只不过社会运动是“抗争性谈话”（Tilly, 1998）。网络事件发生在网上社区和BBS论坛，主要形式是发帖和回帖，因此“抗争性谈话”在网络事件中的重要性格外突出。甚至可以说没有“抗争性谈话”，就没有网络事件。主帖发出后，能否酿成有社会影响的网络事件，要看“抗争性谈话”如何发展。一般来说，不能调动感情的“抗争性谈话”难以发展成网络事件。反之，能让人感动，给人震撼的“谈话”，容易发展成有影响的网络事件。这个过程就是情感动员的过程。

本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通过对具体网络事件的文本分析，揭示事件发生的情感动因。网络事件的文本，有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在内容方面，本文着重分析文本所表达的诉求、怨愤和情感。在形式上，本文重点分析文本的修辞及

修辞效果。研究网络文本的修辞，符合网络文化特点。人们常说网络文化是注意力经济学。网站点击量的多少，要看网上内容能否吸引人的注意力。修辞是吸引注意力的策略。其实修辞学本身就是一种注意力经济学，因为修辞手法是为了吸引读者（Lanham, 2006）。因此，分析网络事件的修辞学，就格外重要。网络表达对于表现手法的追求，造成对表现形式的重视。没有吸引注意力的表达形式，很难造成大的传播效应。但仅有形式，缺乏内容，也不足以产生大的影响。

□ 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两种情感动员

网络事件在情感表达上，大体可分为两种。一种以悲情为主，常伴有同情和义愤。涉及社会问题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很多网络事件属此类，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7年的“重庆钉子户事件”及“山西黑砖窑事件”。有些涉及道德伦理的网络文化事件，因激起公愤，进而触发广泛的争论和抗议，也属此类。如2006年的“虐猫视频事件”和2007年的“南京烧狗事件”。很多网络事件带有戏谑的特点，其格调是调侃和幽默，总体效果近于网络狂欢。网络文化事件多属此类，如2005年胡戈恶搞电影《无极》和“赵丽华诗歌事件”。从文学理论家弗莱（Frye, 1957）的文学类型学来看，以悲情为主的网络事件，应属“悲剧”或“传奇”类型。以戏谑为主的事件，则属“喜剧”或“讽刺”的类型。不同类型的网络事件虽然情感效果不同，但生成的过程，都依赖情感动员，都基于某些被伤害的情感和“道德语法”，有其情感逻辑。以下分析两个案例。

□ 《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

该案例的情感动员逻辑是戏谑。戏谑的对象是当代精英文化和影视文化，戏谑背后所反映的是草根文化与霸权文化的价值冲突。网民通过表达与小人物胡戈的认同，一方面表达了自身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则表达了对精英文化的批判。事件的缘起是胡戈制作的恶搞电影《无极》的视频短片，而其进一步发

展则跟导演陈凯歌表示要起诉胡戈侵权有关。

2006年胡戈制作的视频短片《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下称《馒头血案》),恶搞陈凯歌执导的新片《无极》,在网上迅速传播。陈表示要对胡戈提出起诉,随后网民展开了广泛争论,使该事件演变成草根网民PK名人大腕的网络文化事件。网民一边倒地支持胡戈,对陈凯歌则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搜狐网的“左右间IT评论”频道让网友投票,“为凯歌辩护VS支持胡戈。”结果在10,728票中,支持胡戈的占93%,支持陈凯歌的仅有2.6%(剩下的4%谁都不支持)。

《馒头血案》的风行,主要原因是它搞笑,但它的搞笑并不是无稽之谈,而是联系了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它把电影《无极》中的人物和情节放到当前中国社会的情境中,一方面嘲弄了《无极》里荒诞无稽的故事情节,同时又把这些情节赋予现实意义。弗莱(Frye, 1957: 223)说讽刺文学类型的特点,是给不理想的现实生存赋予一定的形式。《馒头血案》的社会意义,就在于给当代中国的“不理想的现实生存”赋予了视频的形式。其中所反映的当代中国社会的“不理想的现实存在”的因素,包括工资拖欠、农民工、城管腐败、无证商贩、广告商业文化,等等。如关于城管,剧本有这么一段话:

(相关画面,真田广之率领城管大破无证商贩集散地,一边打一边还骂“我叫你摆摊!我叫你摆摊!”无证商贩们纷纷求饶:“我再也不敢了……”) ²

两年后的2008年1月,《馒头血案》所讽刺的关于城管的社会问题,以悲剧的形式发生在现实社会。湖北天门市的城管,殴打无辜公民魏文华致死案,引起广泛的网络抗议,说明城管问题的严重性。

《馒头血案》的风行,也与其富有创意的表现形式直接相关。在文学样式上,它属“戏拟”(parody)类,其素材直接来源于所模仿和嘲讽的对象——《无极》,同时融入了当代影视文化的因素。如以央视的《法制在线》节目为结构框架,并模仿电视节目,穿插商业广告。在剧本创作和镜头剪辑上,《馒头》的主要手法是拼贴。作者将本不相关的材料放到一起,通过对照、引用、仿拟、移就、

反复、夸张、讽喻等多种修辞手法，制造出滑稽幽默的效果。如下面这段旁白中，引用名篇《纪念白求恩》中的句子，获得幽默效果：

真田局长原是日本人，50多岁了，为了向中国人民谢罪，他义无反顾投靠了中国，加入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来。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难道这位深明大义的国际友人与本案有什么关联吗？

《馒头》之所以成为网络事件，除自身的幽默滑稽吸引观众之外，还在于它引起了广大网友对大人物的愤慨和对网上小人物的同情，由此引发“抗争性谈话”（Tilly, 1998）。2006年1月该视频在网上传开后，《无极》导演陈凯歌于2月初表示将起诉胡戈侵权。网民顿时开始炮轰陈凯歌，论坛里的争论涉及知识产权、婚姻、家庭、隐私、道德规范、娱乐圈内幕等多种话题。仅在新浪网上，关于《无极》和《馒头》的帖子就无以计数。网友们嬉笑怒骂，一边倒地站在胡戈一边，把他当成解构霸权文化的网络英雄。仅以发表于2006年2月16日的若干帖子为例，有网友发帖赞赏《馒头》：“感谢《馒头》带给我的快乐。感谢各位的评论带给我更多的快乐。真是越看越快乐！”支持者中很多人表示愿意捐款帮助胡戈打官司，有人说：“胡老弟，别怕，我们支持你，非常情况下我们可以为你捐款！”³另一个人把胡戈的事件，提高到了“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高度：

现在又不是大清朝时代，也不是大家都必须坐到院子里看电影的贫乏时代，现在是脑子里激荡、言论和信息自由的网络时代……胡戈一个人面对“强权”，人气会越来越高，所谓孟子言：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一万年以后，还会变成一桩网络PK电影的好看的公案哩！

还有很多帖子借题发挥，对当代文化界“为名利所累”的状况，进行了批

判。一位网友写道：

近些年，无病呻吟的作家的作品实在太多，为名利所累，让导演、作家、作品都变了态。可悲呀，应该对这些作家作品，搞一个网上评奖会，评出本年度最臭奖、最假奖、最差奖，网民应该对民族的文化负责!!!!

另一位则说：“中国电影一直是导演玩观众，《馒头》出现以后，各位导演在以后的电影创作中也应该考虑观众的感受，把观众放在第一位。”

由此可见，《馒头血案》成为有影响的网络事件，一方面是因为它的戏谑性质，给网民提供了一个狂欢的机会，所调动的情感因素是滑稽和愉悦。另一方面，它也给网民提供了一个对小人物表达同情，向文化名人表达不满的机会。如果没有这样的情感投入，很难想象网民会有如此广泛的参与程度。

□ 山西黑砖窑事件

2007年的黑砖窑事件，涉及拐卖少年儿童在砖窑做童工的黑幕。该网络事件形成的情感逻辑是悲情与愤怒，其“道德语法”是良知和对极端的社会不公的愤慨。师曾志和杨伯淑（2008）对本案例的分析，关注的是案例中公民性的体现，但他们也注意到案例中的悲情特征，说：“黑砖窑灾难与人权践踏的事实表达，赋予了议题具有良知、关怀等悲情民意的意义，达到了唤醒民众的目的。”

揭露黑砖窑的帖子，于2007年6月6日晚以跟帖的形式首先在大河网贴出。到6月18日，帖子点击率突破30万。⁴该帖在6月7日被转贴到天涯杂谈，至6月13日，短短6天时间，点击率高达58万，有3000多篇回帖。⁵其实，黑砖窑的事情，早在当年4月，就已经在河南电视台的都市频道有所报道，但没有引起广泛注意，解救被拐卖孩子的工作没有进展。据《南方周末》等媒体的后续报道，山西黑砖窑成为全国性媒体事件，直接原因是网络民意：“网络

民意的汹涌，直接引发了传统媒体的跟进报道，南方周末记者也正是根据网帖，第一时间到达了现场。其后，国家高层领导批示，山西、河南两地政府的及时反应，一场空前轰动的黑砖窑打击风暴就此展开。”本文认为，网络民意汹涌的主要原因，是网络互动过程中的情感表达机制。以下通过对“天涯杂谈”里的主帖和回帖的分析，来揭示这一互动过程的特点。

□ 主帖的内容、情感与表达方式

黑砖窑事件的导火索，是首发于大河网又转贴于天涯杂谈的帖子《400位父亲泣血呼救：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从内容上看，帖子揭露山西砖窑主拐骗儿童做苦工，而地方政府和公安面对寻子的父母却非常冷漠。所揭露的问题触及弱势群体及地方官员与公安的腐败，是中国社会的普遍问题，因此问题本身容易引起共鸣，再配以有效的表达方式，便有了震撼作用。帖子的诉求很明确，因为政府不管，失踪儿童的父母在网上发出近乎绝望的呼救：“在被两地政府互相推诿之后，我们又该向谁求助？十万火急，人命关天，谁来帮帮我们？”其诉求的基础，是最基本的人性和良知：“每一位有良知的人，看到此情此景，都会想把他们全救出去。”

帖子所表达的主要情感是父亲们的悲痛：“男儿有泪不轻弹。获救孩子身上的累累伤疤，让我们一次次的落泪。”此外也表达了对孩子所面临的生命危险的极端焦虑与恐惧：“我们不知道这些稚嫩的生命曾经经历了怎样的劫难，我们更不知道我们的孩子正面临着怎样的危险，我们是父亲，我们要救出我们的孩子，可是在大山深处，陌生的环境、窑主消息的灵通，使我们的寻子之路难上加难，我们的力量太薄弱了，我们的孩子随时都面临着生命危险。”

对于当地政府和公安部门的冷漠，父母表示寒心：“我们的足迹踏遍了山西的乡、县、市的公安、劳动等部门，但令我们心寒的是，乡派出所不仅置之不理，还百般阻挠刁难我们带走已经解救出来的孩子，而且在窑主对我们进行威胁恐吓时坐视不管。”

在表达方式上，帖子的震撼力一方面来自如泣如诉的文字描绘，帖子的语

言不仅有声有色，而且带着哭声和喊声。使用的意象是死亡、黑暗和对纯洁的生命的奴役。帖子配有三幅贴图，第一幅是孩子在砖窑睡觉的土炕，第二幅是奔跑中的父母，第三幅是一对父母亲与儿子团聚后悲痛的场面，画面上的母亲在痛哭。这些画面和意象，表达了当事人的内心痛苦，具有很强的情感震撼力。

□ 回帖的内容、情感与表达方式

笔者2008年12月6日查阅天涯杂谈社区的网页快照，发现由“lix06”在2007年6月7日11点20分转发在天涯杂谈的帖子，“谁来救救我们的孩子？——400位父亲泣血呼救”，统计访问量为753,432，回帖22,040条，长达66个页面，平均每个页面334个回帖。⁶最后一个回帖由“ok格瓦拉”发于2007年6月18日9点35分。也就是说在11天之内，平均每天的点击为68,494次，回帖2003条。以下仅以66页跟帖中前两页的内容为例，说明情感表达在该事件中的重要性。⁷

回帖的内容可分三类，一是情感的表达，二是抗议，三是行动。所表达的情感，最突出的有三种，即对事件的震惊、愤怒以及对孩子和家长的同情。在这一点上，《新快报》的报道抓住了要害：“在天涯上的数千个回帖中，网友们几乎都表达了同一个立场——‘愤怒’。”⁸例如有一名网友回帖说：“彻底震惊了！这还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么？”另一网友说：“我也是个有孩子的人，含泪看完，只要开电脑必顶此帖。我的愤怒就是我的ID。”再如：“震惊！愤怒！这都是什么时代了，难道中国又回到奴隶社会？文明何在，良心何在？！法律何在？！和谐何在？！告御状吧！”

情感的表达，能导致行动。常常说愤怒出诗人，社会学家则说“愤怒激励行动”（Eyerman, 2005: 43）。天涯网友在表达个人情感的同时，或采取了某些行动（如抗议），或表示出行动的愿望和决心。网友“shd2005”写道：

我不知道他们的良心被什么吃掉了，我只觉得，当警察和黑心窑主结成同盟的时候，当他们在干这些罪恶的勾当的时候，当孩子的父

母在撕心裂肺的时候，我们作为旁观者——整个社会，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唾骂那些无良的警察和黑心窑主，把他们钉在道德的耻辱柱上，用舆论的棍棒无情地鞭答他们！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力所能及地为孩子的父母呐喊，让全心他们知道有整个社会在支持他们，那些吃人的警察和黑心窑主终将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在行动方式上，网上和网下的都有。网上的除回帖抗议外，还包括顶帖、转帖、募捐、建营救组织等。网下的行动则包括联络主流媒体对事件曝光。极端者甚至鼓动使用暴力手段，发起暴动和革命，等等。如“钢铁之刘”说：“此帖不顶有罪啊!!!!!!!!!!!!!!”网友“安静的脸”写道：

这个一定要顶的，咬牙切齿的顶。

每个人都只有一生，某些人衣着光鲜地活在别人的鲜血上。

造成舆论压力是对的，但是这样的话，想帮的或者想提供具体指导的人们上哪去找你们呢？任何联系方式都没有。

我认为一方面在各大论坛或者博客造成舆论压力，但是同时也要在网络上选择有效的方式，找到能够帮助你们的相关专业人士提供思路和方法。没有一个固定的写建议的地址，写消息给你们？嗯，倒是可以。

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咬紧牙关战斗下去，所有的人，这种猖狂之徒的存在，将会危及更多的孩子，包括你我的。太没有安全感了。

无法出力，愿意为此出钱，虽然不能很多，但是如果有需要，愿尽绵薄之力！

网友“齐林一”呼吁建立QQ群，共同商讨有效的措施：

包括向中央电视台发信，打电话，向国外的大型媒体曝光，向国外，以及香港的慈善机构、宗教机构求救，主动去打一些相关部门的电话，

成立一些组织，我愿意捐款，在西安、郑州的火车站分发一些宣传资料，在网上发表一些宣传资料，扩大它的影响，直到国家重视为止。

又说：“人这一辈子总要做点对得起人类的事情，对得起良心的事情，对得起同胞的事情，否则，丧钟下一个将为你而鸣！”有一网友说：“刚刚给《焦点访谈》发了封E-mail，打了个电话。不知道他们重不重视！！！”并在帖子里公布了《焦点访谈》的电话和电子邮址。网友“赫卓非”说：“请求关天编辑，帮忙上头条吧！跪求。”

回帖在表达方式上比较简单。绝大多数是单个的词语或句子，带有口号的性质，但言词有力。在修辞上使用较多的是感叹、设问、比喻、对照等等。很多网友把砖窑比喻成美国黑奴庄园，或比作是解放前的旧社会。举数例如下：

顶下，令人震惊的说。简直是美国南部庄园再见啊。

这个帖子一定要顶！！！现在的世道，已经堕落到解放前的丧失人性的地步了！！旧社会才有的包身工，现在这么猖獗，这还是什么和谐社会？？

这是在描写孩子吗？我想这些词句只有在记录二战劳工的历史书上才能找到。那些煤矿主简直比日本人还畜生，当地政府简直比清朝政府还无能！！

这比美洲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黑奴贸易还要恐怖！！

心酸啊！这边几百万、几千万的贪污，那边黑煤窑、黑矿井黑心囤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是你？是我？谁能告诉我？

□ 网络事件与当代中国的情感结构

简单的论坛发帖和互动，通过什么样的过程，演变为网络事件？除论坛的名气、影响力和编辑的作用之外，帖子本身的因素是关键。触及普遍关心的现实问题，能给人道德震撼，引起共鸣，唤起同情与良知的帖子，容易演变成网络事件。这个过程，可视为网络事件的动员过程，只不过动员的主体并非社会运动中常见的运动组织，而是网民。动员的过程，从根本上说，则是网上的互动。⁹ 因此对网络事件的研究，必须阐明网络互动过程的特点和机制。这种互动，与其说是资源动员，不如说是情感动员。互动的过程是情感表达和交流的过程。

本文通过对《馒头血案》和山西黑砖窑事件的分析，揭示了网络事件中情感动员的两种风格。《馒头血案》代表的是戏谑的情感动员风格。这类风格常见于网络文化事件。文化事件未必带有明确的利益诉求。网民大量参与，一则基于对主流和霸权文化和价值的蔑视和抵抗。所以他们欣赏胡戈那种对精英文化的嘲弄和调侃。二则基于对“草根英雄”的认同。这种认同，使他们产生交流与表达的渴望，并通过网上的交流与表达，对这种认同获得确认。

山西黑砖窑的案例，代表了悲情的情感动员风格。悲情动员常见于网络社会事件。事件多涉及弱势群体、社会的不公正和官僚的腐败。当人们看到少年儿童被拐卖和奴役，而地方公安部门竟视若无睹的时候，他们的心灵被震撼，良知受到拷问，于是在悲痛和愤怒中发出抗议。这种恶行触及人们的道德底线，使网民感到必须发出他们的声音。

网络事件的发生不依赖资源动员，也不依赖政治机会。在网站和社区基本正常运作的条件下，网络事件发生的关键因素，是事件本身的震撼性以及描述事件的方式。能给人以“道德震撼”(moral shocks)的帖子，就能激发网民的情感，调动他们的力量，从而刺激网络互动，酿成网络事件。这也同时说明，网络事件之所以成为“事件”，吸引大量网民的参与，是因为他们从感情上打动了网民。而只有从道德上给人震撼，才能从情感上让人感动。越是触及公民道德底线的事件，越具有震撼力，也就越能打动人们的情感，从而形成具有影响力的网络事件。反过来看，中国大陆网络事件的频繁发生，说明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社

会矛盾和价值观冲突加剧，因此才民怨鼎沸。

对情感动员的研究，说明有必要重新认识网络互动中的情感因素。带感情的，并不是非理智的，更不是病态的。尽管情绪化的表达，表面上似乎有违背道德伦理的时候（如骂人和侵犯隐私的黑客行为），但实质上却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冲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近年来主流媒体对所谓“网络语言暴力”的声讨，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体现了主流媒体所代表的价值观对异己价值观的声讨。

本研究的另一个意义，在于说明有必要重新审视公共领域中理性与情感的关系。哈贝马斯倡导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不仅把妇女、工人和下层社会的人们排除在外，而且过分地强调理性话语，忽略了交际中的情感和修辞等成分。上文提到，美国左翼学者对近年左翼力量缺少感召力提出批判，明确号召要让左翼政治也像右翼政治那样注入道德激情。这些都说明，公共领域未必仅仅是冷冰冰的话语。激情反而可能给公共领域带来活力。活跃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是有激情的公共领域和公民社会。中国网络文化的活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网络空间充满激情的表达。人们尽可以说这是煽情，但也要看煽的是什么情。网络事件中的情，表达的往往是民众对社会问题的愤怒和对权贵的嘲讽。

网络事件仅仅是当代中国公民运动的一个部分。网上有着许许多多其他方式的网络公民行动。而在网下，在农村和城市的街头，每天也发生着大大小小的群体事件。网上网下、此起彼伏的公民运动，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威廉姆斯说情感结构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冲动、节制、和声调。具体说来也就是意识和关系的情感因素。不是与思想对立的感情，而是有感情的思想和有思想的感情……我们可以把这些成分看作一种‘结构’：一个整体，它们具有特定的内在关系，纠缠在一起，又相互矛盾。”（Williams, 1977 : 132）当代中国社会的情感结构包括什么要素？本文对网络事件的分析，说明在中国的广大网民中，普遍存在着对正义的渴望和追求，对弱者和小人物的同情，对贪官污吏的痛恶，对政府的失望，对权贵的嘲讽，对沟通的渴望，甚至对革命呼唤。这些因素有着共同的内在逻辑，即情感逻辑。在这个意义上，情感汹涌的网络事件，是整个中国社会情感结构的脉络。

注释

- 1 原载《传播与社会学刊》(总)第9期(2009),页39-66。有删节。
- 2 <http://e.yesky.com/117/2273617.shtml>。2007年9月28日下载。
- 3 <http://comment4.news.sina.com.cn/comment/skin/default.html?channel=yl&newsid=28-3-331884&style=1t#>
- 4 “网上发帖揭露山西黑砖窑神秘母亲曝光”,《南方周末》,2007年7月12日。
- 5 “上千孩子被卖黑砖窑做苦工”,《新快报》,2007年6月13日。
- 6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free&idarticle=926643&part=0&flag=1>, 2008年12月6日下载。
- 7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stritem=free&idarticle=926643&part=0&flag=1>, 2008年12月6日下载。以下引文均出自该页面的回帖。
- 8 “上千孩子被卖黑砖窑做苦工”,《新快报》,2007年6月13日。
- 9 由网上互动而引发的网外的行动,实际已经是动员的结果了。

译名对照

主要术语

包装的异见 (packaged dissent)
被决定的技术 (determined technology)
本质化 (essentialization)
参与性新闻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草根式共同生产 (peer production)
长期革命 (long revolution)
倡导网络 (advocacy network)
创业型积极分子 (entrepreneurial activists)
道德公众 (moral public)
道德经济 (moral economy)
地方国家法团主义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地方渴望 (local aspirations)
地方性 / 依赖性 (parochial/patronized)
电子型构 (digital formation)

电子隐藏文本 (digital hidden transcripts)
订阅源 (RSS feed)
对日常的扰乱 (disruption of the quotidian)
多元互动主义模型 (multi-interactionism model)
多元制度政治路径 (multi-institutional politics approach)
多址民族志 (multisited ethnography)
反身现代性 (reflexive modernity)
反向抗议 (counterprotest)
反向运动 (countermovement)
回飞镖效应 (boomerang effect)
非国家行动者 (non-state actors)
非正式民主 (unofficial democracy)
非专有性社会生产 (nonproprietary social production)
分配性资源 (allocative resources)

风格 (style)
 网络服务提供商 (ISP)
 符号暴力 (symbolic violence)
 符号政治 (symbolic politics)
 复合相互依赖 (complex interdependence)
 革命威权主义 (revolutionary authoritarianism)
 公民集体行动 (collective civic action)
 公民记者 (citizen reporters)
 公民新闻 (citizen journalism)
 公众同情 (public sympathy)
 互授合法性 (mutual legitimization)
 互助型团体 (support group)
 话语剧码 (discursive repertoire)
 浸染 (immersion)
 抗争剧码 (repertoire of contention)
 抗争性对话 (contentious conversation)
 可获利的异见 (bankable dissent)
 跨国行动 (transnationalism)
 框释共鸣 (frame resonance)
 历史自我 (historical self)
 联系人 (linkage agents)
 流动的私有化 (mobile privatization)
 民办刊物 (people's publication)
 模式变迁 (modular change)
 末世后的新时代 (the postapocalyptic new age)
 网络内容提供商 (Internet content provider)
 能生成资源的资源 (resource-generating resource)
 企业家积极分子 (entrepreneur-activist)
 潜在网络 (submerged networks)
 情感结构 (structures of feeling)
 全球框释 (global framing)
 全球民族志 (global ethnography)
 全球思维 (global thinking)
 全球意图 (global intentions)
 权力的技术 (technologies of power)
 权威性资源 (authoritative resources)
 认同运动 (identity movement)
 认同政治 (identity politics)
 韧性威权主义 (resilient authoritarianism)
 日常社会化 (everyday socialization)
 社会型构 (social formation)
 社会运动产业 (social movement sector)
 生活政治 (life politics)
 生物权力 (biopower)
 数字化的崇高 (digital sublime)
 数字化乌托邦 (digital utopia)
 思维结构 (mental structures)
 特定议题机会 (issue-specific opportunities)
 体裁 (genre)
 推帖 (tweets)
 网络规制体制 (Internet regulatory regime)
 网络控制体制 (Internet control regime)
 网络民族志 (online ethnography)
 网络能力 (internet capacity)
 网络辱骂行为 (flaming)
 网络行动 (online activism)
 网络直播 (Webcast)
 文本说服 (textual persuasion)
 文化转换 (cultural translation)
 文化规则 (cultural schemas)
 文化剧码 (cultural repertoire)
 文化企业家 (cultural entrepreneurs)
 文化形式 (cultural form)
 文化争论型公众 (culture-debating public)
 乌托邦冲动 (utopia as impulse)
 乌托邦蓝图 (utopia as program)
 乌托邦现实主义 (utopian realism)
 戏仿—嘲讽 (parodic-travestying)
 象征权力 (symbolic power)
 消费文化型公众 (culture-consuming public)

小私营行业 (petty private sector)
新闻跟踪 (news feeds)
新闻组 (newsgroup)
信息政治 (information politics)
行动 (activism)
行动剧码 (action repertoire)
虚拟民族志 (virtual ethnography)
选择亲和性 (elective affinity)
言语体裁 (speech genres)
依法抗争 (rightful resistance)
艺术化抗争 (artful contention)
印刷社区 (communities of print)
印刷资本主义 (print capitalism)
永久的运动 (permanent campaigns)
语言说服 (verbal persuasion)
元话题公共空间 (metatopical public space)
运动周期 (movement cycle)
政治容忍性 (political tolerability)
制度性的凝聚力 (institutional coherence)
中国禁 (banned in China)
主动的含义 (transitive connotation)
自为社区 (communities for themselves)
自我的技术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自在社区 (communities in themselves)

人名

阿博托·梅鲁西 (Alberto Melucci)
阿兰·亨特 (Alan Hunter)
阿帕杜莱 (Arjun Appadurai)
埃莉诺·伯特 (Eleanor Burt)
爱德华·刘 (Edward Liu)
安·斯威德勒 (Ann Swidler)
安东尼·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昂格尔和陈佩华 (Unger and Chan)
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
巴里·威尔曼 (Barry Wellman)
芭芭拉·米特勒 (Barbara Mittler)
白杰明 (Geremie Barmé)
贝弗利·胡波 (Beverley Hooper)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
彼得·洛尔 (Peter Loehr)
波尼·麦克道格 (Bonnie McDougall)
布尔迪厄 (Bourdieu)
布兰妮·斯皮尔斯 (Britney Spears)
布鲁斯·迪克森 (Bruce Dickson)
布鲁斯特 (Bruszt)
蔡谈 (Tan Tse)
查尔斯·泰勒 (Charles Taylor)
查尔斯·梯利 (Charles Tilly)
陈南希 (Nancy Chen)
陈佩华 (Anita Chan)
戴慧珍 (Deborah Davis)
戴维德·梅耶 (David Meyer)
黛博拉·敏科夫 (Debra Minkoff)
道·麦克亚当 (Doug McAdam)
杜磊 (Dru Gladney)
恩斯特·布洛赫 (Ernst Bloch)
菲利普·艾布拉姆斯 (Philip Abrams)
傅士卓 (Joseph Fewsmith)
高扬 (Nick Young)
哈贝马斯 (Jürgen Habermas)
韩丁 (Harry Harding)
贺康玲 (Kathleen Hartford)
贺麦晓 (Michel Hockx)
华志坚 (Jeffrey Wasserstrom)
吉米·卡特 (Jimmy Carter)
嘉嘉女士 (Lady Gaga)
杰基·史密斯 (Jackie Smith)

卡尔·波兰尼 (Karl Polanyi)
 凯瑟琳·默顿 (Katherine Morton)
 凯瑟琳·西金克 (Kathryn Sikkink)
 凯斯·桑斯坦 (Cass Sunstein)
 科菲·安然 (Kofi Annan)
 克雷格·卡洪 (Craig Calhoun)
 克里夫德·鲍伯 (Clifford Bob)
 拉尔夫·纳德 (Ralph Nader)
 兰斯·本纳特 (Lance Bennett)
 劳拉·古拉克 (Laura Gurak)
 雷蒙德·威廉姆斯 (Raymond Williams)
 黎安友 (Andrew Nathan)
 李静君 (Ching Kwan Lee)
 李连江 (Lianjiang Li)
 理查德·鲍姆 (Richard Baum)
 理查德·克劳斯 (Richard Kraus)
 林培瑞 (Perry Link)
 林郁沁 (Eugenia Lean)
 刘欣 (Xin Liu)
 罗伯特·莱瑟姆 (Robert Latham)
 罗伯特·基欧汉 (Robert Keohane)
 罗伦斯·莱斯格 (Lawrence Lessig)
 洛依 (w. w. Looi)
 马克·瑟曼 (Mark Surman)
 马克·斯坦伯格 (Marc Steinberg)
 马克·博斯特 (Mark Poster)
 玛格丽特·科克 (Margaret Keck)
 玛格丽特·皮尔森 (Margaret Pearson)
 玛丽·伯恩斯坦 (Mary Bernstein)
 迈克尔·霍奎斯特 (Michael Holquist)
 迈克尔·基恩 (Michael Kean)
 迈克尔·切斯 (Michael Chase)
 迈克尔·舒德森 (Michael Schudson)
 曼威·卡斯特 (Manuel Castells)
 梅根·费利 (Megan Ferry)
 米蕾娜·古里亚 (Milena Gulia)
 莫尔·古德曼 (Merle Goldman)
 谭自湘 (Zixiang Tan)
 诺什洛普·弗莱 (Northrop Frye)
 欧博文 (Kevin O'Brien)
 欧内斯特·威尔逊三世 (Ernest Wilson III)
 潘忠党 (Zhongdang Pan)
 裴敏欣 (Minxin Pei)
 裴宜理 (Elizabeth Perry)
 乔纳森·昂格尔 (Jonathan Ungar)
 琼·贾吉 (Joan Judge)
 裘德·豪威尔 (Jude Howell)
 芮哲非 (Christopher Reed)
 萨斯基亚·萨森 (Saskia Sassen)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苏黛瑞 (Dorothy Solinger)
 谭乔 (Joe Tan)
 特里莎·莱特 (Teresa Wright)
 涂尔干 (Emile Durkheim)
 王德威 (David Wang)
 威廉·韦 (William Wee)
 西德尼·塔罗 (Sidney Tarrow)
 夏明 (Ming Xia)
 杨美惠 (Mayfair Yang)
 伊莉莎白·阿姆斯特朗 (Elizabeth Armstrong)
 伊利莎白·杰伊·弗里德曼 (Elisabeth Jay Friedman)
 尤查·本科勒 (Yochai Benkler)
 约翰·哈姆 (John Hamm)
 约翰·汤普森 (John Thompson)
 约瑟夫·艾什力克 (Joseph Esherick)
 约瑟夫·奈 (Joseph Nye)
 詹明信 (Fredric Jameson)
 詹姆士·马尔文诺 (James Mulvenon)

詹姆斯·斯科特 (James Scott)
詹姆斯·法勒 (James Farrer)
张力 (Li Zhang)
张树新 (Jasmine Zhang)
张欣 (Xin Zhang)
张旭东 (Xudong Zhang)
赵穗生 (shuisheng Zhao)
赵月枝 (Yuezhi Zhao)
珍妮特·瑞恩沃特 (Janette Rainwater)
郑永年 (Yongnian Zheng)
周启荣 (Kai-Wing Chow)
周曙光 (Zola Zhou)
周晓 (Kate Zhou)
周永明 (Yongming Zhou)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 (Zbigniew Brzezinski)

地名、组织名及网址名

“多背一公斤” (1kg.org)
“中国社会文化”新闻组 (Social Culture China)
《北京之春》 (*Beijing Spring*)
《大参考》 (*VIP Reference*)
《橄榄树》 (wenxue.com)
《华夏文摘》 (CND)
《纽约书评》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卫报》 (*Guardian*)
奥克兰市 (Auckland)
贝尔格雷德 (Belgrade)
布宜诺斯艾利斯 (Buenos Aires)
大赦国际 (Amnesty International)
反 CNN (anticnn.com)
反腐网 (ff.adbt.cn)
饭否 (Fanfou.com)
赫尔辛基市 (Helsinki)
红客联盟 (cnhonker.com)
甲骨文公司 (Oracle)
蒙得维的亚 (Montevideo)
全球绿色资助基金 (Global Green-grants Fund)
全球之声 (Global Voices)
全球自然基金 (World Wide Fund for Nature)
人权观察社 (Human Rights Watch)
闪客帝国 (flashempire.com)
世纪中国 (www.cc.org.cn)
世界华人联盟 (www.huaren.org)
推特 (Twitter)
无国界记者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新闻网 (Newsnet)
英特新闻 (Internews)
中国工人网 (www.zggr.org)
中国人权组织 (Human Rights in China)
中国数字时代 (China Digital Times)
中国舆论监督网 (yuluncn.cn)

参考文献

- Abrams, Philip. *Historical Sociolog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2.
- Akhavan-Majid, Roya. "Mass Media Reform in China: Toward a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 *Gazette* 66, no. 6 (2004): 553–565.
- Alagappa, Muthiah. "Introduction." In *Civil Society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Asia*, ed. Muthiah Alagappa, 1–21.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Almanzar, Nelson A. Pichardo, Heather Sullivan-Catlin, and Glenn Deane. "Is the Political Personal? Everyday Behaviors as Forms of Environmental Movement Participation." *Mobilization* 3, no. 2 (1998): 185–205.
- Almeida, Paul D. "Opportunity Organizations and Threat-induced Contention: Protest Waves in Authoritarian Setting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9, no. 2 (2003): 345–400.
- Amnesty International.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ontrols Tighten as Internet Activism Grows." January 2004.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amnesty.org/en/alfresco_asset/c176cd3d-a48b-11dc-bac9-0158df32ab50/asa170012004en.pdf. Accessed February 4, 2008.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 ed. London: Verso, 1991.
- Appadurai, Arju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 Armstrong, Elizabeth A., and Mary Bernstein. "Culture, Power, and Institutions: A Multi-institutional Politics Approach to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Theory* 26, no.1 (2008): 74–99.
- Arnold, Wayne. "Chinese Diaspora Using Internet to Aid Plight of Brethren Abroad."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3, 1998).
- Bach, Jonathan, and David Stark. "Innovative Ambiguities: NGOs' Use of Interactive Technology in Eastern Europe." *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37, no. 2 (2002): 3–23.
- Bakhtin, Mikhail.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 . *Rabelais and His World*. Trans. Helene Iswolsk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4.
- Baranovitch, Nimrod. *China's New Voices: Popular Music, Ethnicity, Gender, and Politics, 1978–199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Barmé, Geremie R. *In the Red: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 Barmé, Geremie R., and Gloria Davies. "Have We Been Noticed Yet? Intellectual Contestation and the Chinese Web." In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ed. Edward Gu and Merle Goldman, 75–108.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
- Barr, Stephen. "Anti-NATO Hackers Sabotage 3 Web Sites," *Washington Post* (May 12, 1999).
- Béja, Jean-Philippe. "Forbidden Memory, Unwritten History: The Difficulty of Structuring an Opposition Movement in the PRC." *China Perspectives* 4 (2007): 88–98.
- Benford, Robert D. 1997. "An Insider's Critique of the Social Movement Framing Perspective." *Sociological Inquiry* Vol. 67, No. 4: 409-30.
- Benford, Robert, and S. A. Hunt. "Dramaturgy and Social Movement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of Power." In *Social Movements: Critiques, Concepts, Case-studies*, ed. S. M. Lyman, 84–109.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 Benkler, Yochai.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Bennett, W. Lance. "Communicating Global Activism: Strengths and Vulnerabilities of Networked Politic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6, no. 2 (2003): 143–168.
- Benny, Jonathan. "Rights Defence and the Virtual China." *Asian Studies Review* 31 (2007): 435–446.
- Bernstein, Thomas, and Xiaobo Lu.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Bissio, Roberto. "The Network Society, 1990–2000: Electronic Conferences, Global Summits, Getting Together for Good Purposes." In *APC Annual Report*, by the Association for Progressive Communications, 22–26.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apc.org/english/about/index.shtml>.

Accessed May 16, 2003.

- Blecher, Marc J. "The Mass Line and Leader-Mass Relations and Communication in Basic-level Rural Communities." In *China's New Social Fabric*, ed. Godwin C. Chu and Francis L. K. Hsu, 63–86. London: Kegan Paul International, 1983.
- Bob, Clifford. *The Marketing of Rebellion: Insurgents, Media, and International Activ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Boczkowski, Pablo J. "Mutual Shaping of Users and Technologies in a National Virtual Commun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49 (1999): 86–108.
- Bonnin, Michel. "The Threatened Hist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s Lost Generation." *China Perspectives*, no. 4 (2007): 52–64.
- Bourdieu, Pierre. *Practical Reas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Bourdieu, Pierre, and Loic Wacquant. *Invitation to a Reflexive Soci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 Brady, Anne-Marie. *Marketing Dictatorship: Propaganda and Thought Work in Contemporary China*.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8.
- Brainard, Lori A., and Jennifer M. Brinkerhoff. "Lost in Cyberspace: Shedding Light on the Dark Matter of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33, no. 3 (2004): 32S–53S.
- Braman, Sandra. "The Emergent Global Information Policy Regime." In *The Emergent Global Information Policy Regime*, ed. Sandra Braman, 12–37. Houndsmills: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Brook, Timothy. "Auto-organization in Chinese Society." In *Civil Society in China*, ed. Timothy Brook and B. Michael Frolic, 19–43.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7.
- Bruszt, László, Balázs Vedres, and David Stark. "Shaping the Web of Civic Participation: Civil Society Websites in Eastern Europ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25, no. 1 (2005): 149–163.
- Burawoy, Michael, Joseph A. Blum, Sheba George, Zsuzsa Gille, and Millie Thayer, eds. *Global Ethnography: Forces, Connections, 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Burt, Eleanor, and John Taylor.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Reshaping Voluntary Organizations?" *Nonprofit Management and Leadership* 11, no. 2 (2000): 131–143.
- . "When 'Virtual' Meets Values: Insights from the Voluntary Secto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4, no. 1 (2001): 54–73.
- Cai, Yongshun. "China's Moderate Middle Class: The Case of Homeowners' Resistance." *Asian Survey* 45, no. 5 (2005): 777–799.
- . *State and Laid-off Workers in Reform China: The Silence and Collective Action of the Retrenched*. London: Routledge, 2006.

- . “Social Conflicts and Modes of Action i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59 (2008): 89–109.
- Calhoun, Craig. “Tiananmen, Televis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Beijing Spring of 1989.” *Public Culture* 2, no. 1 (1989): 54–71.
- . *Neither Gods nor Emperors: Students and the Struggle for Democracy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ed. Craig Calhoun, 9–36. Oxford: Blackwell, 1994.
- . “‘New Social Movements’ of the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In *Repertoires and Cycles of Collective Action*, ed. Mark Traugott, 173–215.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Carey, James W. *Communication as Culture: Essays on Media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1989.
- Castells, Manuel.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Oxford: Blackwell, 1996.
- .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lden, Mass.: Blackwell, 1996.
- . *The Power of Identity*. London: Blackwell, 1997.
- . *The Internet Galaxy: Reflections on the Internet, Business, and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Chamberlain, Heath B. “On the Search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odern China* 19, no. 2 (1993): 209.
- Chan, Anita. “Revolution or Corporatism? Workers and Trade Unions in Post-Mao China.”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9 (1993): 31–61.
- Chan, Joseph. “Media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China: Processes and Tension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44, no. 3 (1994): 70–88.
- Chase, Michael S., and James C. Mulvenon. *You’ve Got Dissent! Chinese Dissident Use of the Internet and Beijing’s Counterstrategies*. Santa Monica: RAND, 2002.
- Cheek, Timothy. “From Market to Democracy in China: Gaps in the Civil Society Model.” In *Market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Comparing China and Mexico*, ed. Juan David Lindau and Timothy Cheek, 219–254.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 Chen Chiu. “University Students Transmit Messages on Defending the Diaoyu Islands Through the Internet, and the Authorities Are Shocked at This and Order the Strengthening of Control.” *Sing Tao Jih Pao* (September 17, 1996), in FBIS (September 18, 1996).
- Chen, Feng. “Privat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in Chinese Factories.” *The China Quarterly* 185 (2006): 42–60.
- Chen Fong-ching, and 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e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 Press, 1997.
- Chen, Nancy N. "Urban Spaces and Experiences of Qigong." In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 Deborah S. Davis et al., eds., 347–361. 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 *Breathing Spaces: Qigong, Psychiatry, and Healing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 Chow, Kai-Wing. *Publishing, Culture, and Power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Chu, Wai-chi, and Shanhua Yang. "Mobile Phones and New Migrant Workers in a South China Village: An Initial Analysis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Social' and the 'Technological.'" In *New Technologies in Global Societies*, ed. Pui-Lam Law, Leopoldina Fortunati, and Shanhua Yang, 221–244. New Jersey: World Scientific, 2006.
- Cody, Edward. "For China's Censors, Electronic Offenders Are the New Frontier."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10, 2007).
- Cohen, Jean L. 1985. "Strategy or Identity: New Theoretical Paradigms and Contemporary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Research* 52.4: 663–716.
- Constable, Nicole. *Romance on a Global Stage: Pen Pals, Virtual Ethnography, and "Mail Order" Marriag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 Corrales, Javier, and Frank Westhof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Political Regim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50, no. 4 (2006): 911–933.
- CP Central Committee. "Resolution on Certain Questions in the History of Our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eijing Review* 27 (1981): 20–26.
- Damm, Jens. "The Internet and the Fragment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9, no. 2 (2007): 273–294.
- Davis, Deborah. "Urban Chinese Homeowners as Citizen-Consumers." In *The Ambivalent Consumer*, ed. S. Garon and P. Maclachlan, 281–29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6.
- , ed.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Davis, Deborah, Richard Kraus, Barry Naughton, and Elizabeth Perry, eds.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Davis, Deborah, and Helen Siu, eds. *SARS: Recep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ree Chinese Cities*. London: Routledge, 2006.
- Defilippis, James, Robert Fisher, and Eric Shrage. "Neither Romance nor Regulation: Re-evaluating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30, no. 3 (2006): 673–689.
- Deibert, Ronald J. *Printing, Parchment, and Hypermedia: Communication in World Order*

-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 De Kloet, J. "Digitisation and its Asian Discontents: Internet, Politics, and Hacking in China and Indonesia." *First Monday* 7, no. 9 (2002).
- Denning, Dorothy E. "Activism, Hactivism, and Cyberterrorism: The Internet as a Tool for Influencing Foreign Policy." In *Networks and Netwars: The Future of Terror, Crime, and Militancy*, ed. John Arquilla and David Ronfeldt, 239–288.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1.
- Denton, Kirk A. "Visual Memor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volutionary Past: Paintings from the Museum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2, no. 2 (2000): 203–235.
- . "Museums, Memorial Sites, and Exhibitionary Cul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83 (2005): 565–586.
- Dewey, John.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16.
- Denzin, Norman K. 1984. *On Understanding Emo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 Diamond, Larry. "Rethinking Civil Society: Toward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Journal of Democracy* 5 (1994): 4–17.
- Diamond, Neil, Stanley Lubman, and Kevin O'Brien. "Law and Societ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Engaging the Law in China: State, Society, and Possibilities for Justice*, ed. Neil Diamond, Stanley Lubman, and Kevin O'Brien, 3–3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Diani, Mario, and Doug McAdam, eds. *Social Movements and Networks: Relational Approaches to Collective A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Dickson, Bruce J.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Dieter, Ernst, and He Jiachang. "The Future of E-commerce in China." *Asia Pacific Issues* 46 (October 2000).
- Dittmer, Lowell. "Chinese Informal Politics." *The China Journal* 34 (1995): 1–34.
- Dittmer, Lowell, and Guoli Liu. "Introduction." In *China's Deep Reform: Domestic Politics in Transition*, ed. Lowell Dittmer and Guoli Liu, 1–24.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 Dobbin, Frank. "The Busines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 Jeff Goodwin, James Jasper, and Francesca Polletta, 74–8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Donald, Stephanie Hemelryk, and Michael Keane. "Media in China: New Convergences, New Approaches." In *Media in China: Consumption, Content, and Crisis*, ed. S. H. Donald, M. Keane, and Yin Hong, 3–17.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2.
- Downs, Erica Strecker, and Phillip C. Saunders. "Legitimacy a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ism: China

- and the Diaoyu Island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no. 3 (1998/1999): 114–146.
- Durkheim, Emile.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Trans. Joseph Swai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 Earl, Jennifer. “Pursuing Social Change Online: The Use of Four Protest Tactics on the Internet.”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24, no. 3 (2006): 362–377.
- Earl, Jennifer, and Alan Schussman. “The New Site of Activism: Online Organizations, Movement Entrepreneurs, and the Changing Location of Social Movement Decision Making.”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 and Change* 24 (2003): 155–187.
- EastSouthWestNorth. “Chinese Netizens Versus Western Media.”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zonaeuropa.com/20080326_1.htm. Accessed August 12, 2008.
- Edwards, Michael. “NGOs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IDS Bulletin* 25, no. 2 (1994): 117–124.
- Ernkvist, Mirko, and Patrik Ström. “Enmeshed in Games with the Government: Governmental Polici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Online Game Industry.” *Games and Culture* 3, no. 1 (2008): 98–126.
- Esherick, Joseph W.,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Acting out Democracy: Political Theater in Modern China.”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 no. 4 (1990): 835–865.
- Escobar, Arturo. “Actors, Networks, and New Knowledge Producers: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Paradigmatic Transition in the Sciences.” In *Cognitive Justice in a Global World*, ed.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273–294.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7.
- Everard, Jerry. *Virtual States: The Internet and the Boundaries of the Nation-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00.
- Eyerman, Ron and Andrew Jamison. 1998. *Music and Social Movements: Mobilizing Tradition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yerman, Ron. 2005. “How Social Movements Move.” In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ited by Helena Flam and Debra King. London: Routledge, pp.41–56.
- Fang Zhouzi, “In the Name of ‘Science’ and ‘Patriotism’ : Academic Corruption in China.” Speech delivered at UCSD on November 18, 200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xys.org/xys/netters/Fang-Zhouzi/science/yanjiang.txt>. Accessed April 12, 2002.
- Farley, Maggie. “Dissidents Hack Holes in China’s New Wall.”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4, 1999).
- Farquhar, Judith, and Qicheng Zhang. “Biopolitical Beijing: Pleasure, Sovereignty, and Self-cultivation in China’s Capital.” *Cultural Anthropology* 20, no. 3 (2005): 303–327.
- Farrer, James. “China’s Women Sex Bloggers and Dialogic Sexual Politics on the Chinese Internet.” *China aktuell* 3 (2007): 9–46.
- Ferry, Megan M. “Marketing Chinese Women Writers in the 1990s, or the Politics of Self-

- fashioning."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2, no. 37 (2003): 655–675.
- Fewsmith, Joseph. "Historical Echoes and Chinese Politics: Can China Leave the Twentieth Century Behind?" In *China's Deep Reform: Domestic Politics in Transition*, ed. Lowell Dittmer and Guoli Liu, 319–350.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 Finquelievich, Susana. "Electronic Democracy: Buenos Aires and Montevideo." *Cooperation South Journal* 1 (2001): 61–8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tcdc.undp.org/coop_south_journal/2001_oct/061-081.pdf. Accessed June 2003.
- Fischer, Claude S. *America Calling: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elephone to 1940*.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Fligstein, Neil. "Social Skill and the Theory of Fields." *Sociological Theory* 19, no. 2 (2001): 105–125.
- Foster, Kenneth W. "Embedded Within State Agencies: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Yantai." *The China Journal* 47 (2002): 41–65.
- Foster, William, and Seymour E. Goodman. *The Diffusion of the Internet in China*. A report of the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CISAC), Stanford University, Stanford, Calif., 2000.
- Fouser, Robert J. "'Culture,' Computer Literacy, and the Media in Creating Public Attitudes Toward CMC in Japan and Korea." In *Culture, Technology, Communication: Towards an Intercultural Global Village*, ed. Charles Ess. Albany, N.Y.: SUNY Press, 2001.
- Friedman, Edward. "Comment on 'Nationalistic Feelings and Spor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8, no. 22 (1999): 535–538.
- Friedman, Elisabeth Jay. "The Reality of Virtual Reality: The Internet's Impact Within Gender Equality Advocacy Communities in Latin America."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47, no. 3 (2005): 1–34.
- Frye, Northrop. *Th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Gallagher, Mary. "Use the Law as Your Weap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Legal Mobilization in China." In *Engaging the Law in China: State, Society, and Possibilities for Justice*, ed. Neil Diamond, Stanley Lubman, and Kevin O'Brien, 54–83.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Garnham, Nicholas. *Emancipati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rguments About the Media and Soci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Garrett, R. Kelly. "Protest in an Information Society: A Review of Literature on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ICTs."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9, no. 2 (2006): 202–224.
- Giddens, Anthony. *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 Vol. 2, *A Contemporary Critique of Historical*

- Materi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5.
- .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 *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Gitlin, Todd. “Public Spheres or Sphericules?” In *Media, Ritual, and Identity*, ed. Tamar Liebes and James Curran, 168–174.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 Gluckman, Ron. “Ahead of the Curve.” *Asiaweek* (July 14, 2000).
- Goffman, Erving.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59.
- Gold, Thomas B. “Back to the City: The Return of Shanghai’s Educated Youth.” *China Quarterly* 84 (1980): 55–70.
- . “Bases for Civil Society in Reform China.” In *Reconstructing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te Control, Civil Socie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ed. Kjeld Erik Brodsgaard and David Strand, 163–188.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8.
- Goldman, Merle. *From Comrade to Citizen: The Struggle for Political Rights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Goldman, Merle,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Changing Meanings of Citizenship in Moder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Goldsmith, Jack, and Tim Wu. *Who Controls the Internet? Illusions of a Borderless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Golub, Alex, and Kate Lingley. “Just Like the Qing Empire: Internet Addiction, MMOGs, and Moral Crisis in Contemporary China.” *Games and Culture* 3 (2008): 59–75.
- Goodman, David S. G. *Beijing Street Voices: The Poetry and Politics of China’s Democracy Movement*. London: Marion Boyars, 1981.
- Goodwin, Jeff and James Jasper. 1999. “Caught in a Winding, Snarling Vine: the Structural Bias of Political Process Theory.” *Sociological Forum* 14(1). March, 1999. Pages 27-54.
- Goodwin, Jeff. *No Other Way Out: States and Revolutionary Movements, 1945–1991*.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Goodwin, Jeff, James M. Jasper, and Francesca Polletta, eds. *Passionate Politics: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Grier, David Alan, and Mary Campbell. “A Social History of Bitnet and Listserv, 1985–1991.”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22, no. 2 (2000), 32–41.
- Gries, Peter Hays. *China’s New Nationalism: Pride, Politics, and Diplom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Grugel, Jean. “State Power and Transnational Activism.” In *Contextualising Transnational Activism: Problems of Power and Democracy*, ed. Nicola Piper and Anders Uhlin, 26–43. London:

- Routledge, 2003.
- Gurak, Laura J. *Persuasion and Privacy in Cyberspa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Guthrie, Doug.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he Use of Technology: The Adoption of Internet Technology in U.S. Organizations."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42, no. 4 (1999): 586.
- Habermas, Jürgen. *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New York: Beacon Press, 1970.
- .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89.
- . "Further Reflections on the Public Sphere." In *Habermas and the Public Sphere*, ed. Craig Calhoun, 421–461.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92.
- Hamm, John Christopher. *Paper Swordsmen: Jin Yong and the Modern Chinese Martial Arts Novel*.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5.
- Han, Minzhu [pseud.], ed. *Cries for Democracy: Writings and Speeches from the 1989 Chinese Democracy Move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0.
- Hannan, Michael T., and John Freeman. "Structural Inertia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1984): 149–164.
- Harding, Harry.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Toward a Third Generation of Scholarship." *World Politics* 36 (1984): 284–307.
- .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 . "Will China Democratize? The Halting Advance of Plur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9, no. 1 (1998): 11–17.
- Harré, Rom. 1986. "An Outline of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Viewpoint." In Rom Harré ed.,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Emotion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Hart, Stephen. 2001. *Cultural Dilemmas of Progressive Politics: Styles of Engagement among Grassroots Activists*.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Hartford, Kathleen. "Dear Mayor: Online Communications with Local Governments in Hangzhou and Nanjing." *China Information* 19, no. 2 (2005): 217–260.
- Harwit, Eric. *China's Tele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Henderson, Rebecca M., and Kim B. Clark. "Architectural Innovations: The Reconfiguration of Existing Product Technologies and the Failure of Established Firm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5 (1990): 9–30.
- Hill, Kevin A., and John E. Hughes. *Cyberpolitics: Citizen Activism in the Age of the Internet*.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1998.
- Hine, Christine M. *Virtual Ethnography*. Thousand Oak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2000.
- Ho, Peter. "Greening Without Conflict? Environmentalism, NGOs,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 Development and Change* 32, no. 5 (2001): 893–921.
- Ho, Peter,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Perspectives of Time and Change: Rethinking Embedded Environmental Activism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21, no. 2 (2007): 331–344.
- Ho, Peter, and Richard Louis Edmonds, eds.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8.
- Ho, Loretta Wing Wah. “The Gay Space in Chinese Cyberspace: Self-censorship, Commercialisation, and Misrepresentation.” *China aktuell* 3 (2007): 47–76.
- Hockx, Michel. “Links with the Past: Mainland China’s Online Literary Communities and Their Antecedent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3 (2004): 105–127.
- Holliday, Ian, and Ray Yep. “E-government in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Development* 25, no. 3 (2005): 239–249.
- Holquist, Michale. “Glossary.” In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 by Mikhail Bakhtin, 423–434.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 Hooper, Beverley. “Consumer Voices: Asserting Rights in Maoist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14, no. 2 (2000): 92–128.
- . “The Consumer Citizen in Contemporary China.” *Working Paper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12 (2005). Centre fo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Lund University, Sweden.
- Hochschild, Arlie Russell. 1983. *The Managed Hear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ward, Philip N. “Network Ethnography and the Hypermedia Organization: New Media, New Organizations, New Methods.” *New Media & Society* 4: 550–574.
- Howell, Jude. “New Directions in Civil Society: Organizing Around Marginalized Interests.” In *Governance in China*, ed. Jude Howell, 143–171.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 Hsiung, Ping-chun, and Yuk-Lin Renita Wong. “Jie Gui—Connecting the Tracks: Chinese Women’s Activism Surrounding the 1995 World Conference on Women in Beijing.” *Gender & History* 10, no. 3 (1998): 470–497.
- Hu, Kelly. “The Power of Circulation: Digital Technologies and the Online Chinese Fans of Japanese TV Drama.”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6, no. 2 (2005): 171–186. Hua Sheng. “Big Character Posters in China: A Historical Survey.” *Journal of Asian Law* 4, no. 2 (1991).
- Hunt, Lynn.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 Hurst, William, and Kevin O’Brien. “China’s Contentious Pensioners.” *China Quarterly* 170 (2002): 346–360.
- Ikegami, Eiko. “A Sociological Theory of Publics: Identity and Culture as Emergent Properties in Networks.” *Social Research* 67 (2000): 989–1029.

-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Yearbook of Statistics: Telecommunication Services Chronological Time Series, 1989–1998*. Geneva, Switzerland: Place des Nations, CH-1211, 2000.
- Jameson, Fredric. *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 London: Verso, 2005.
- Jasper, James M. *The Art of Moral Protest: Culture, Biography, and Creativity in Social Movement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 Jasper, James. 1998. "The Emotions of Protest: Reactive and Affective Emotions in and Around Social Movements." *Sociological Forum* 13: 397–424.
- Jasper, James M., and Michael P. Young. "The Rhetoric of Sociological Facts." *Sociological Forum* 22, no. 3 (2007): 270–299.
- Jensen, Michael J., James N. Danziger, and Alladi Venkatesh. "Civil Society and Cyber Society: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Community Associations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3, no. 1 (2007): 39–50.
- Jing, Jun. "Villages Dammed, Villages Repossessed: A Memorial Movement in Northwest China." *American Ethnologist* 26, no. 2 (1999): 324–343.
- Judge, Joan. *Print and Politics: "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Karnow, Stanley. *Mao and China: From Revolu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The Viking Press, 1972.
- Kayany, Joseph M. "Contexts of Uninhibited Online Behavior: Flaming in Social Newsgroups on Usene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49, no. 12 (1998): 1135–1141.
- Keane, Michael. "Broadcasting Policy, Creative Compliance, and the Myth of Civil Society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3, no. 6 (2001): 783–798.
- Keck, Margaret E., and Kathryn Sikkink. *Activists Beyond Borders: Advocacy Network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8.
- Keith, Ronald C., Zhiqiu Lin, and Huang Lie. "The Making of a Chinese NGO: The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Project on Domestic Violence."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2003): 38–50.
- Kelly, David. "Citizen Movements and China's Public Intellectuals in the Hu-Wen Era." *Pacific Affairs* 79, no. 2 (2006): 183–204.
- Kennedy, Helen. "Technobiography: Researching Lives, Online and Off." *Biography* 26, no. 1 (2003): 120–139.
- Kennedy, John. "China: Nation's First Citizen Reporter?" March 30, 2007.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globalvoicesonline.org/2007/03/30/china-nations-first-citizenreporter>. Accessed January 24, 2008.
- . "China: Citizen Blogger Treading New Ground?" May 18, 2007.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globalvoicesonline.org/2007/05/18/china-citizen-blogger-treading-newground>. Accessed

January 24, 2008.

- Keohane, Robert O.,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2nd ed. Glenview, Ill.: Little Brown, 1989.
- .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Foreign Affairs* 77, no. 5 (1998): 81–95.
- Kerbo, Harold R. 1982.
- “Movements of ‘Crisis’ and Movements of ‘Affluence’ . A Critique of Depriv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ie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26(4).
- Keyser, Catherine H. *Professionalizing Research in Post-Mao China: The System Reform Institute and Policy Making*.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
- Kluser, Randolph. “The Architecture of Control: A Chinese Strategy for E-governance.”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25, no. 1 (2005): 75–97.
- Koehn, Peter H. “Fitting a Vital Linkage Piece into the Multidimensional Emissionsreduction Puzzle: Nongovernmental Pathways to Consumption Changes in the PRC and the USA.” *Climatic Change* 77, nos. 3–4 (2006): 377–413.
- Kong, Shuyu. *Consuming Literature: Best Sellers and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Literary P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Kraus, Richard Curt. “Public Monuments and Private Pleasures in the Parks of Nanjing: A Tango in the Ruins of the Ming Emperor’s Palace.” In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ed. Deborah Davis, 287–31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 *The Party and the Arty: The New Politics of Cultur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4.
- Kriesi, Hanspeter, Ruud Koopmans, Jan Willem Dyvendak, and Marco G. Giugni. *New Social Movements in Western Europ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 Lanham, Richard A. 2006. *The Economics of Attention: Style and Substance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asica, J. D. “What is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Online Journalism Review* (August 7, 2003).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ojr.org/ojr/workplace/1060217106.php>. Accessed June 18, 2008.
- Latham, Kevin. “SMS,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in China’s Information Society.” *Critical Asian Studies* 39, no. 2 (2007): 295–314.
- Latham, Robert, and Saskia Sassen. “Introduction: Digital Formations: Constructing an Object of Study.” In *Digital Formations: IT and New Architectures in the Global Realm*, ed. Robert Latham and Saskia Sasse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Law, Pui-lam, and Yinni Peng.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 Among Migrant Workers in Southern China.” In *New Technologies in Global Societies*, ed. Pui-Lam Law, Leopoldina Fortunati, and

- Shanhua Yang, 245–258. Hackensack, N.J.: World Scientific, 2006.
- Le Bon, Gustave. [1895]1960. *The Crowd*. New York: Viking.
- Lean, Eugenia. *Public Passions: The Trial of Shi Jianqiao and the Rise of Popular Sympat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 Lee, Chin-Chuan. "Chinese Communication: Prisms, Trajectories, and Modes of Understanding." In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d. Chin-Chuan Lee, 3–44.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Lee, Ching Kwan. *Against the Law: Labor Protests in China's Rustbelt and Sunbel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 Leizerov, Sagi. "Privacy Advocacy Groups Versus Intel: A Case Study of How Social Movements Are Tactically Using the Internet to Fight Corporations." *Social Science Computer Review* 18, no. 4 (2000): 461–483.
- Lenke, Jay L. "Discourse and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Website Communic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Discourse & Society* 10, no. 1 (1999): 21–47.
- Lessig, Lawrence. *Control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Li, Lianjiang, and Kevin O'Brien. "Villagers and Popular Resist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Modern China* 22, no. 1 (1996): 28–61.
- Li, Tiger.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S."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7 (1990): 125–137.
- Li Xiguang, "ICT and the Demise of Propaganda in China." *Global Media Journal* 2, no. 3 (2003).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lass.calumet.purdue.edu/cca/gmj/fa03/gmj-fa03-xiguang.htm>. Accessed March 30, 2008.
- Lichterman, Paul. "Social Capital or Group Style? Rescuing Tocqueville's Insights on Civic Engagement." *Theory and Society* 35 (2006): 529–563.
- Liebman, Benjamin L. "Watchdog or Demagogue: The Media in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Columbia Law Review* 105, no. 1 (2005): 1–157.
- Link, Perry. "Fiction and the Reading Public in Guangzhou and Other Chinese Cities, 1979–1980." In *After Mao: Chinese Literature and Society, 1978–1981*, ed. Jeffrey C. Kinkle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 *The Uses of Literature: Life in the Socialist Chinese Literary System*.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Liu Hong, "Profit or Ideology? The Chinese Press Between Party and Market."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 (1998): 31–41.
- Liu, Lydia.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1937*.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Liu, Shih-Diing. "China's Popular Nationalism on the Internet. Report on the 2005 Anti-Japan Network Struggles." *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7, no. 1 (2006): 144–155.
- Liu Xin. "Urban Anthropology and the 'Urban Question' in China." *Critique of Anthropology* 22, no. 2 (2002): 109–132.
- Lu Suping. "Nationalistic Feelings and Sports: The Incident of Overseas Chinese Protest Against NBC's Coverage of the Centennial Olympic Gam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8, no. 22 (1999): 517–533.
- Lull, James. *China Turned on: Television, Reform, and Resistanc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 Lynch, D. C. "The Nature and Consequences of China's Unique Pattern of Telecommunications Development." In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d. Chin-Chuan Lee, 179–207.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Ma, Qiush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aving the Way to Civi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5.
- Ma, Shu-yun. "The Chinese Discourse on Civil Society." *China Quarterly* 137 (1994): 180–193.
- . "The Role of Power Struggle and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Heshang Phenomenon' i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30, no. 1 (1996): 29–50.
- MacKinnon, Rebecca. "Flatter World and Thicker Walls? Blogs, Censorship, and Civic Discourse in China." *Public Choice* 134 (2008): 47–65.
- Manion, Melanie. "Survey Research in the Study of Contemporary China: Learning from Local Samples." *The China Quarterly* 139 (1994): 741–765.
- Marcus, George. "Ethnography in/of the World System: The Emergence of Multisited Ethnograph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24 (1995): 95–117.
- McAdam, Doug.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2.
- . "The Biographical Consequences of Activ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4 (1989): 744–760.
- McAdam, Doug, Sidney Tarrow, and Charles Tilly. *Dynamics of Conten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McCaughy, M., and M. D. Ayers, eds. *Cyberactivism: Online Activ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Routledge, 2003.
- McCormick, Barrett L. "Recent Trends in Mainland China's Media: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ommercialization." *Issues & Studies* 38, no. 4 and *Issues & Studies* 39, no.1 (December 2002/ March 2003): 175–215.
- McCormick, Barrett L., Xiao Xiaoming, and Su Shaozhi. "The 1989 Democracy Movement: A

- Review of Prospects for Civil Society in China." *Pacific Affairs* 65, no. 2 (1992): 182–202.
- McDougall, Bonnie. "Discourse on Privacy by Women Writers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19, no. 1 (2005): 97–119.
- McGregor, Richard. "China's Official Data Confirm Rise in Social Unrest."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20, 2006).
- McLuhan, Marshall.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1964.
- McNutt, J. G., and K. M. Boland, "Electronic Advocacy by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in Social Welfare Policy."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8, no. 4 (1999): 432–451.
- Madsen, Richard. "The Public Sphere, Civil Society, and Moral Community: A Research Agenda for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Modern China* 19, no. 2 (1993): 183–198.
- . *China's Catholics: Tragedy and Hope in an Emerging Civil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 . "Understanding Falun Gong." *Current History* 99 (2000): 243–247.
- Marshall, T. H. *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 and Other Essay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0.
- Meikle, G. *Future Active: Media Activism and the Internet*.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 Mele, Christopher. "Cyberspace and Disadvantaged Communities: The Internet as a Tool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 ed. Marc A. Smith and Peter Kollock, 290–310.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 Melkote, S. R., and D. J. Liu. "The Role of the Internet in Forging a Pluralistic Integration: A Stud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the United States." *Gazette* 62 (2000): 495–504.
- Melucci, Alberto. *Nomads of the Present: Social Movements and Individual Needs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Philadelphia, Penn.: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 *Challenging Codes: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erry, Sally Engle. "Transnational Human Rights and Local Activism: Mapping the Middle."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8, no. 1 (2006): 38–51.
- Meyer, David S., and Debra C. Minkoff. "Conceptualizing Political Opportunity." *Social Forces* 82, no. 4 (2004): 1457–1492.
- Migdal, Joel S.,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Introduction: Developing a State-in-society Perspective." In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ed.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 Mittler, Barbara. *A Newspaper for China? Power, Identity, and Change in Shanghai's News Media*,

- 1872–191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4.
- Moore, Rebecca. “China’s Fledgling Civil Society: A Force for Democratization?” *World Policy Journal* 18, no. 1 (Spring 2001): 56–66.
- Morton, Katherine. “Transnational Advocacy at the Grassroots: Benefits and Risks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China’s Embedded Activism: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of a Social Movement*, ed. Peter Ho and Richard Edmonds. London: Routledge, 2008.
- Mosco, Vincent.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4.
- Mueller, Milton, and Zixiang Tan. *China in the Information Age: Telecommunication and the Dilemma of Reform*. Westport, Conn.: Praeger, 1997.
- Nathan, Andrew. *Chinese Democra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 “Sources of Chinese Rights Thinking.” In *Human Righ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 R. Randle Edwards, Louis Henkin, and Andrew Nathan, 125–12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 .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Journal of Democracy* 14, no. 1 (2003): 6–17.
- Nevitt, Christopher Earle. “Private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Evidence of Civil Society or Local State Power?” *The China Journal* 36 (1996): 25–43.
- Nonini, D. M., and Aiwa Ong.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as an Alternative Modernity.” In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ed. Aiwa Ong and D. M. Nonini.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97.
- Nyitray, Vivian-Lee. “The Sea Goddess and the Goddess of Democracy.” *Annual Review of Women in World Religions* 4 (1996): 164–177.
- O’Brien, Kevin.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 *The China Journal* 48 (July 2002): 139–154.
- , ed.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O’Brien, Kevin, and Lianjiang Li.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 Ogden, Suzanne. “From Patronage to Profits: The Changing Relationship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with the Party-Stat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s Between State and Market*, ed. Edward Gu and Merle Goldman, 111–137.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4.
- Oi, Jean. “Fiscal Reform and the Economic Foundations of Local State Corporatism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5, no. 1 (1992): 99–126.
- OneWorld International and the Open Society Institute. “The Us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by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Southeast Europe.” 200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southeasteurope.org/documents/NGODoc.pdf>. Accessed June

2003.

- OpenNet Initiative. "Internet Filtering in China in 2004–2005: A Country Study." April 14, 2005.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opennetinitiative.net/studies/china/ONI_China_Country_Study.pdf. Accessed May 24, 2005.
- Orgad, Shani. "The Internet as a Moral Space: The Legacy of Roger Silverstone." *New Media & Society* 9, no. 1 (2007): 33–41.
- Palmer, Augusta. "Taming the Dragon: Part II, Two Approaches to China's Film Market." December 8, 2000.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indiewire.com/biz/biz_001208_ChinesePartII.html. Accessed February 13, 2008.
- Pan, Philip P. "Chinese Crack Down on Student Web Sites." *Washington Post* (March 23, 2005).
- Pan, Zhongdang. "Improving Reform Activities: The Changing Reality of Journalistic Practice in China." In *Power, Money,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Patterns and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ultural China*, ed. Chin-Chuan Lee, 68–111. Evanston, Il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 "Media Change Through Bounded Innovations: Journalism in China's Media Reform." In *Journalism and Democracy in Asia*, ed. Angela Rose Romano and Michael Bromley, 96–107. London: Routledge, 2005.
- Pearson, Margaret. "The Janus Face of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Socialist Corporatism in Foreign Enterprises."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1 (1994): 25–46.
- .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s: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 Pei, Minxin. "Chinese Civic Associations: An Empirical Analysis." *Modern China* 24, no. 3 (1998): 285–318.
- . "Rights and Resistance: The Changing Contexts of the Dissident Movement." I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ed.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23–46. London: Routledge, 2003.
- . *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Perry, Elizabeth J. "Rural Violence in Socialist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03 (1985): 414–440.
- . "Introduction: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Revisited."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2nd ed., ed.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1–14.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4.
- . "Trend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Politics: State-Society Relations." *The China Quarterly* 139 (1994): 704–713.
- . *Challenging the Mandate of Heaven: Social Protest and State Power in China*.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2.

- .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 *The China Journal* 57 (2007): 1–22.
- . “‘To Rebel Is Justified’: Cultural Revolution Influences on Contemporary Chinese Protest.” In *Beyond Purge and Holocaust: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econsidered*, ed. Kam-ye Law, 262–281. London: Palgrave, 2003.
- . “Chinese Conceptions of ‘Rights’: From Mencius to Mao—and Now.”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March 2008).
- . “Continuities and Discontinuities in Chinese Protest.” In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ed. Kevin O’ Brien.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Perry, Elizabeth J. 2002. “Moving the Masses: Emotion Work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Mobilization* 7(2): 111–128.
- Perry, Elizabeth J., and Merle Goldman, eds. *Grassroots Political Reform in Contempora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Perry, Elizabeth J., and Xun Li. *Proletarian Power: Shanghai Workers in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7.
- Perry, Elizabeth J., and Mark Selden, eds.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2003.
- Pfaff, Steven, and Guobin Yang. “Political Commemorations as Symbolic Resources of Collective Action: Protest Mobil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 in 1989.” *Theory and Society* 30 (2001): 539–589.
- Pickowicz, Paul G. “Rural Protest Letters: Local Perspectives on the State’s Revolutionary War on Tillers, 1960–1990.” In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ed. Ching Kwan Lee and Guobin Yang, 21–49. Washington, D.C.: The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Piper, Nicola, and Anders Uhlin, “New Perspectives on Transnational Activism.” In *Transnational Activism in Asia: Problems of Power and Democracy*, ed. Nicola Piper and Anders Uhlin, 1–25. London: Routledge, 2003.
-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A. Cloward. 1977. *Poor People’s Movement ; Why They Succeed, How They Fail*.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 Piven, Frances Fox, and Richard A. Cloward. “Collective Protest: A Critique of Resource-mobilization Theory.” In *Social Movements: Critiques, Concepts, Case-Studies*, ed. Stanford M. Lyman, 137–167.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 Polletta, Francesca. *It Was Like a Fever: Storytelling in Protest and Poli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 Poster, Mark. *The Mode of Information: Poststructuralism and Social Contex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Puchner, Martin. *Poetry of the Revolution: Marx, Manifestos, and the Avant-gard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Qian, Yingyi. "The Process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1978–1998: The Evolutionary,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China's Deep Reform: Domestic Politics in Transition*, ed. Lowell Dittmer and Guoli Liu, 229–250.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 Qian, Yingyi, and Jinglian Wu.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Fourteenth 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ssociation. Marrakech, Morocco, 2005.
- Qiu Hong. "Communication Among Knowledge Diasporas: Online Magazines of Expatriat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Media of Diaspora*, ed. Karim H. Karim, 148–161. Oxford: Routledge, 2003.
- Qiu, Jack Linchuan. "Virtual Censorship in China: Keeping the Gate Between the Cyberspa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Law and Policy* 4 (1999–2000): 1–25.
- . "The Accidental Accomplishment of Little Smart: Understanding the Emergence of a Working-class ICT." *New Media & Society* 9, no. 6 (2007): 903–923.
- Rankin, Mary B. "Some Observations on a Chinese Public Sphere." *Modern China* 19, no. 2 (1993): 158–182.
- ead, Benjamin L. "Democratizing the Neighbourhood? New Private Housing and Homeowner Self-organization in Urban China." *The China Journal* 49 (2003): 31–59.
- Reed, Christopher A. *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2004.
- Reger, Jo. 2007. "Where Are the Leaders? Music, Culture, and Contemporary Feminism."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50 (10): 1350–1369.
- Rheingold, Howard. *The Virtual Community: Homesteading on the Electronic Frontier*.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93.
- Rolfe, Brett. "Building an Electronic Repertoire of Contention,"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4, no. 1 (2005): 65–74.
- Rosen, Stanley. "Public Opinion and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tudies in Comparative Communism* 22, nos. 2/3 (1989): 153–170.
- Rosenthal, Elisabeth. "Finding Fakes in China, and Fame and Fortune Too," *New York Times* (June 7, 1998).
- Rowe, William T.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odern China* 19, no. 2 (1993): 143–148.
- Saich, Tony. "Negotiating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Organizations in China," *The China*

- Quarterly* 161 (2000): 124–141.
- Sampson, Robert J., Doug McAdam, Heather MacIndoe, and Simon Weffer-Elizondo. “Civil Society Reconsidered: The Durable Nature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of Collective Civic Ac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11, no. 3 (2005): 673–714.
- Sassen, Saskia.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From Medieval to Global Assemblag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cammell, Margaret. “The Internet and Civic Engagement: The Age of the Citizen-Consumer.”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7 (2000): 351–355.
- Schmitter, Philippe C. “Still a Century of Corporatism?” In *Social-Political Structures in the Iberian World*, ed. Frederick B. Pike and Thomas Stritch, 85–130.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4.
- Schoenhals, Michael, ed.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1969: Not a Dinner Party*. Armonk, N.Y.: M.E. Sharpe, 1996.
- Schudson, Michael.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Schwarcz, Vera.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tellectuals and the Legacy of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of 1919*.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 Schwartz, Benjamin.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 Scott, James C.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Scripts*.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Sewell, William F.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no. 1 (July 1992): 1–29.
- Shambaugh, David. “China’s Propaganda System: Institutions, Processes and Efficacy.” *The China Journal* 57 (2007): 25–58.
- Shang, Xiaoyuan. “Looking for a Better Way to Care for Children: Cooperation Between State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Social Science Review* 76, no. 2 (June 2002): 203–228.
- Shi, Fayong, and Yongshun Cai. “Disaggregating the State.” *The China Quarterly* 186 (2006): 314–332.
- Shi, Tianji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Beij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Shirk, Susan. “Changing Media, Changing Foreign Policy in China.”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8, no. 1 (2007): 43–70.
- Shue, Vivienne. “State Power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China.” In *State Power and Social Forces: Domin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Third World*, ed. Joel S. Migdal, Atul Kohli, and Vivienne Shue, 63–88.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Sica, Alan and Stephen Turner, eds., 2006. *The Disobedient Generation: Social Theorists in the*

- Six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ilverstone, Roger. *Media and Morality: On the Rise of the Mediapoli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6.
- Siu, Helen, and Zelda Stern, eds. *Mao's Harvest: Voices from China's New Gener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Smith, Jackie. "Bridging Global Divides? Strategic Framing and Solidarity in Trans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Organization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17 (2002): 505–528.
- . "Exploring Connections Between Global Integration and Political Mobilization."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10 (2004): 255–295.
- Smith, Jackie, and Hank Johnston, eds. *Globalization and Resistance: Transnational Dimensions of Social Movement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 Snow, David A., and Robert D. Benford. "Ideology, Frame Resonance, 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 *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1 (1988): 197–218.
- Solinger, Dorothy J. *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s, 1980–1990*.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3.
- . *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 Peasant Migrants, the State, 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 Esbjörn Ståhle, Terho Uimonen, eds. *Electronic Mail on China*. 2 vols. Stockholm: Föreningen för orientalistiska studier, 1989.
- Stark, David, Balazs Vedres, and Laszlo Bruszt. "Rooted Transnational Publics: Integrating Foreign Ties and Civic Activism." *Theory and Society* 35, no. 3 (2006), 323–349.
- Steinberg, Marc W. "The Talk and Back Talk of Collective Action: A Dialogic Analysis of Repertoires of Discourse Among Nineteenth-century English Cotton Spinner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05, no. 3 (1999): 736–780.
- Su Xiaokang, and Wang Luxiang. *Deathsong of the River: A Reader's Guide to the Chinese TV Series Heshang*. Trans. Richard W. Bodman and Pin P. Wa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1991.
- Sunstein, Cass R. *Infotopia: How Many Minds Produce Knowled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urman, Mark. "From Access to Applications: How the Voluntary Sector Is Using the Internet." Prepared for the Government of Ontario, Ministry of Citizenship, November 2001.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ww.volunteersonline.ca/news/From%20Access%20to%20Applications%20-20V@O%20Environment%20Scan%20-%20English%20-%20Nov%202001.PDF>. Accessed June 7, 2005.
- Swidler, Ann. "Culture in Action: Symbols and Strategie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1 (1986): 273–286.

- . “Cultural Power and Social Movements.” In *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ed.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 25–4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5.
- Tai, Zixue. *The Internet in China: Cyberspace and Civi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2006.
- Tang, Wenfang, and William Parish. *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Tarrow, Sidney. *Power in Movement*.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 . *The New Transnational Activ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Tarrow, Sidney, and Donatella della Porta. “Conclusion: ‘Globalization,’ Complex Internationalism, and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 In *Transnational Protest and Global Activism*, ed.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Sidney Tarrow, 227–245.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 Tarrow, Sidney, and Doug McAdam. “Scale Shift in Transnational Contention.” In *Transnational Protest and Global Activism*, ed. Donatella della Porta and Sidney Tarrow, 121–135.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5.
- Taylor, Charles. *Sources of the Self*.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Thomas, Douglas. *Hacker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 Thompson, John B.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 Social Theory of the Medi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Thornton, Patricia M. “Framing Disse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Irony, Ambiguity, and Metonymy.” *The China Quarterly* 171 (2002): 661–681.
- . “Insinuation, Insult, and Invective: The Threshold of Power and Protest in Modern China.”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44, no. 3 (July 2002): 597–619.
- . “Manufacturing Dissent in Transnational China.” In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ed. Kevin O’ Brien, 179–204.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Tilly, Charles.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McGraw-Hill Publishing Co., 1978.
- . “Speaking Your Mind Without Elections, Surveys, or Social Movement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47 (1983): 461–478.
- . “Contentious Conversation.” *Social Research* 65, no. 3 (1998): 491–510.
- . *Stories, Identities, and Political Change*.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2.
- . *Regimes and Repertoir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Tomba, Luigi. “Creating an Urban Middle Class: Social Engineering in Beijing.” *The China Journal* 51 (2004): 1–26.
- Tong, James. “An Organizational Analysis of the *Falun Gong*: Structure, Communications, Financing.” *The China Quarterly* 171 (2002): 636–660.
- Tsai, Kellee. *Capit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 Private Sector in Contemporary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7.
- Tu, Wei-ming. “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 In *The Living Tree: The Changing*

-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 ed. Tu Wei-ming, 1–34.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Turner, Victor. *From Ritual to Theatre: The Human Seriousness of Play*. New York: PAJ Publications, 1982.
- Unger, Jonathan, and Anita Chan. "China, Corporatism, and the East Asian Model."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33 (1995): 29–53.
- Van Dyke, Nella, Sarah A. Soule, and Verta Taylor. "The Targets of Social Movements: Beyond a Focus on the State." *Research in Social Movements, Conflicts, and Change* 25 (2004): 27–51.
- Vegh, Sandor. "Classifying Forms of Online Activism: The Case of Cyberprotests Against the World Bank." In *Cyberactivism: Online Activ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ed. Martha McCaughey and Michael D. Ayers, 71–95.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 Wagner, Rudolf. "The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and the Chinese Public Sphere."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1 (2001): 1–34.
- Wagner-Pacifici, Robin. "Memories in the Making: The Shapes of Things That Went." *Qualitative Sociology* 19, no. 3 (1996): 301–321.
- Walder, Andrew. "Introduction." In *The Waning of the Communist State: Economic Origins of Political Decline in China and Hungary*, ed. Andrew Walder.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Wang, Ban. *The Sublime Figures of History: Aesthetics and Politic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Wang, David Der-Wei. *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 Wang, Jing. *High Culture Fever: Politics, Aesthetics, and Ideology in Deng's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 . *Brand New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Wang, Shaoguang, and Jianyu He. "Associational Revolution in China: Mapping the Landscapes." *Korea Observer: A Quarterly Journal* 35, no. 3 (2004): 485–533.
- Wang, Zheng. "Gender, Employment, and Women's Resistance." In *Chinese Society: Change, Conflict, and Resistance*, 2nd ed., ed. Elizabeth J. Perry and Mark Selden, 158–182. London: Routledge, 2003.
- Warkentin, Craig. *Reshaping World Politics: NGOs, the Internet, and Global Civil Socie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1.
- Warner, Michael. "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 *Public Culture* 14, no. 1 (2002): 49–90.
- Wasserstrom, Jeffrey N. "History, Myth, and the Tales of Tiananmen." In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ed. Jeffrey N. Wasserstrom and Elizabeth J. Perry, 273–308.

-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2.
- . *Student Protes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The View from Shanghai*.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Wasserstrom, Jeffrey N., and Elizabeth J. Perry, eds. *Popular Protest and Political Culture in Modern China*.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2.
- Watts, Jonathan. “China Arrests Dissident Six Months Ahead of Olympics.” *Guardian* (February 2, 2008).
- Weber, Ian. “Communicating Styles: Balancing Specificity and Diffuseness in Developing China’s Internet Regulations.”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23, no. 3 (2002): 307–321.
- Weber, Max.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2 vols.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Inc., 1968.
- Wellman, Barry, and Milena Gulia. “Net-surfers Don’t Ride Alone: Virtual Communities as Communities.” In *Networks in the Global Village*, ed. Barry Wellman, 331–366. Boulder, Colo.: Westview, 1999.
- Wettergren, Åsa. “Mobilization and the Moral Shock: Adbusters Media Foundation.” In *Emotions and Social Movements*, ed. Helena Flam and Debra King, 99–109. London: Routledge, 2005.
- Wettergren, Åsa. 2009. “Fun and Laughter: Culture Jamming and the Emotional Regime of Late Capitalism.”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8(1): 1-15.
- Whaley, Patti. “Human Rights NGOs: Our Love-Hate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ternet.” In *Human Rights and the Internet*, ed. Steven Hick, Edward F. Halpin, and Eric Hoskins, 43–52.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00.
- White, Gordon, Jude Howell, and Shang Xiaoyun. *In Search of Civil Society: Market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 in Contemporary China*.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 Whittier, Nancy. *Feminist Generation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Radical Women’s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Williams, Raymond.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 . *The Long Revolu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1.
- .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London: Routledge, 1974.
- . *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 Wilson, Ernest J.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ss.: The MIT Press, 2004.
- Wright, Teresa. “The China Democracy Party and the Politics of Protest in the 1980s–1990s.” *The China Quarterly* 172 (2002): 910–926.
- Wu, Xu. *Chinese Cyber Nationalism: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mplications*.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7.

- Xia, Ming. "Organizational Formations of Organized Crime in China: Perspectives from the State, Markets, and Network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7, no. 54 (2008): 1–23.
- Xiong Lei. "Biochemist Wages Online War Against Ethical Lapses." *Science* 293, no. 5532 (August 10, 2001): 1039.
- Yan, Yunxiang. "Of Hamburger and Social Space: Consuming McDonald's in Beijing." In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ed. Deborah Davis, 201–22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Yang, Dali. *Remaking the Chinese Leviathan: Market Trans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Yang, Guobin. "Achieving Emotions in Collective Action: Emotional Processes and Movement Mobilization in the 1989 Chinese Student Movement."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41, no. 4 (2000): 593–614.
- . "The Liminal Effects of Social Movements: Red Guar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dentity." *Sociological Forum* 15, no. 2 (2000): 379–406.
- .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Dynamic Field of Study."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9, no. 1 (2002): 1–16.
- . "China's Zhiqing Generation: Nostalgia, Identity, and Cultural Resistance in the 1990s." *Modern China* 29, no. 3 (2003): 267–296.
- . "The Co-evolution of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sian Survey* 43, no. 3 (2003): 405–422.
- . "The Internet and Civil Society in China: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2, no. 36 (2003): 453–475.
- . "The Internet and the Rise of a Transnational Chinese Cultural Sphere."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5, no. 4 (2003): 469–490.
- . "Weaving a Green Web: The Internet and Environmental Activism in China." *China Environment Series* 6 (2003): 89–92.
- . "Environmental NGOs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in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181 (2005): 46–66.
- . "How Do Chinese Civic Associations Respond to the Internet? Findings from a Survey." *The China Quarterly* 189 (2007): 122–143.
- . "A Portrait of Martyr Jiang Qing: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on the Internet." In *Re-envision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Politics and Poetics of Collective Memories in Reform China*, ed. Ching Kwan Lee and Guobin Yang, 287–316. Washington, D.C., and Stanford, Calif.: Woodrow Wilson Press an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 "Contention in Cyberspace." In *Popular Protest in China*, ed. Kevin O'Brien, 126–143.

-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Yang, Guobin, and Craig Calhoun. "Media, Civil Society, and the Rise of a Green Public Sphere in China." *China Information* 21, no. 2 (2007): 211–236.
- Yang, Lien-sheng. "The Concept of 'Pao' as a Basis for Social Relations in China." In *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ed. J. K. Fairbank, 291–309.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7.
- Yang, Mayfair Mei-Hui. "Spatial Struggles: Postcolonial Complex, State Disenchantment, and Popular Reappropriation of Space in Rural Southeast Chin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63, no. 3 (2004): 719–755.
- Yardley, Jim. "Internet Sex Column Thrills, and Inflames, China."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2003).
- York, Geoffrey. "Chinese 'Nader' Uses Detective Flair to Expose Products." *Globe and Mail* (July 23, 2007).
- Yu, Haiqing. "Talking, Linking, Clicking: The Politics of AIDS and SARS in Urban China." *positions* 15, no. 1 (2007): 35–63.
- Zhang, Junhua. "China's 'Government Online' and Attempts to Gain Technical Legitimacy." *ASIEN* 80 (2001): 1–23.
- Zhang Li. "Contesting Spatial Modernity in Late Socialist China." *Current Anthropology* 47, no. 3 (2006): 461–476.
- Zhang Xin, and Richard Baum. "Civil Society and the Anatomy of a Rural NGO." *The China Journal* 52 (2004): 97–112.
- Zhang, Xudong. "The Making of the Post-Tiananmen Intellectual Field: A Critical Overview." In *Whither China? Intellectual Politics in Contemporary China*, ed. Xudong Zhang, 1–75.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Zhao, Dingxin. *The Power of Tiananmen: 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the 1989 Beijing Student Movem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 Zhao, Suisheng. "China's Pragmatic Nationalism: Is It Manageable?" *Washington Quarterly* 29, no. 1 (2005): 131–144.
- , ed. *Political Reform in China: The Rule of Law Versus Democratization*.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6.
-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陈东东,主编,《中国社会团体大观》,第3卷,北京:专利文献出版社,1998。
- 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 董晓常,“打碎旧世界”,《中国网络周刊》,第14期,2007年7月20日:44—47。
- 段宏庆、王和岩,“黑砖窑事件:无论的有力与无力”,《财经》,2007年7月9日。

- 高丙中、袁瑞军，“导论”，《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芮中校，“十七大前严管网络网警 VS 网民斗智”，《亚洲周刊》，第 34 期，2007 年 8 月 24 日。
- 郭良、卜卫，“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的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中心，2001 年 4 月，
链接：<http://www.chinace.org/ce/itre>，获取日期：2008 年 4 月 2 日。
- 韩恒，“互联网与集体行动的达成——以曲阜的民间祭孔为例”，未发表。
- 韩红梅，“志愿者与 NGO 共成长”，《自然之友通讯》，2006（6）：28—29。
- 胡传吉，“网络公民的崛起：谁都别想蒙网民”，《南方都市报》，2008 年 1 月 13 日。
- 胡果，“走近‘红色感动’——民族魂、血铸中华网站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纪实”，《人民日报》，
2004 年 5 月 18 日。
- 《华夏文摘》编辑部，“让我们携手在网络上建一个‘文革’博物馆”，《华夏周刊增刊》，第 77 期，
1996，链接：<http://www.cnd.org/HXWZ/ZK96/zk77.hz8.html>，获取日期：2008 年 3 月 10 日。
- 老田，“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版次说明”，链接：<http://www.wengewang.org/bencandy.php?id=1818>。
- 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2。
- 林木，主编，《网事十年》，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 刘荻，“不锈钢老鼠上网”，<http://www.dok-forum.net/MyBBS/yd/mes/27234.htm>，获取日期：
2008 年 2 月 18 日。
- 刘华芹，《天涯虚拟社区：互联网上基于文本的社会互动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
- 刘县书，“虚拟世界的抗日”（上），《中国青年报》，2005 年 4 月 13 日。
- 刘县书，“虚拟世界的抗日”（下），《中国青年报》，2005 年 4 月 20 日。
- 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刘旭静（音译），《邹涛“不买房运动”正在从深圳向北京推进》，《北京青年报》，2006 年 5 月 12 日。
- 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呼天录》，王绍光主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
- 陆军，“中国乙肝歧视的回顾与展望”，2007 年 10 月 21 日，链接：http://www.brooks.ngo.cn/txjt/jthg/download/mj_071021_1.doc，获取日期：2007 年 12 月 10 日。
- 陆敏（音译），“污染受害者让我们来帮助你”，《经济参考报》，2002 年 4 月 20 日。
- 陆星儿，《生是真实的》，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 闵大洪，“告别中国黑客的激情年代——写在‘中国红客联盟’解散之际”，2005 年 2 月 18 日，
链接：<http://www.xinhuanet.com>，获取日期：2006 年 1 月 2 日。
- 彭兰，《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年。
- 彭苏，“网络造星的幕后推手”，《南方人物周刊》，2007（7）：24—25。
- 钱华林，“中国的互联网络”，《中国科技信息》1997（21）：28—29。
- 任毅，《生死悲歌：〈知青之歌〉冤狱始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 山东省济南市宣传部，《市委宣传部研究部署全市突发事件互联网舆论舆情和新闻宣传工作》，

- 2007年8月8日, 链接: <http://xc.e23.cn/news/534.html>, 获取日期: 2008年8月8日。
- 师曾志、杨伯淑, “近年来我国网络媒介事件中公民性的体现与意义”, 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编, 《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 宋永毅、孙大进编,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 香港: 田园书屋, 1997。
- 孙立平, 《断裂: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 谭人玮, “纸老虎露原型”, 《南方都市报》, 2007年11月7日。
- 谭人玮, “‘卖身救母’引发网络风暴”, 《南方都市报》, 2005年11月2日。
- 童怀周, 主编, 《伟大的四五运动》,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79。
- 万学忠, “热线帮助了万名受害者”, 《法制日报》, 2002年11月27日。
- 王海、刘元、于今, 《王海自己的故事》,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7年。
- 王皓, “北京网络义务监督志愿者——用奉献精神营造网络蓝天”, 《北京日报》, 2007年5月14日。
- 王娟, “未婚妈妈博客引发争议, 坦然面对质疑选择产子”, 《北京晨报》, 2006年10月10日。
- 王颖吉, 《闪客江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 王友琴, “网上‘文革’受难者纪念馆前言”, 2001, 链接: http://humanities.uchicago.edu/faculty/ywang/history/big5/qian_yan.htm, 获取日期: 2004年7月22日。
- 王云斌, 编著, 《红客出击: 互联网上没有硝烟的战争》,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
- 吴过, “网上有间‘黄金书屋’”, 链接: <http://www.oklink.net/99/1126/020%281%29.htm>, 2005年8月29日。
- 吴飒, “胡戈: 我挺严肃的只在作品里搞笑”, 《南方人物周刊》, 2007(1): 21。
- 谢良兵, “厦门PX事件: 新媒体时代的民意表达”, 《中国新闻周刊》, 2007年6月11日。
- 新闻出版署, “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 《中国出版年鉴》, 北京: 中国出版年鉴出版社, 1998。
- 于洋, 《江湖中国》,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 张伟, “糖尿病学生退学引发‘糖友’呐喊: 我们做错了什么”, 《中国青年报》2007年12月5日。
- 赵靳秋、郝晓鸣, “中国西部农村互联网技术的扩散模式”, 《中国传媒报告》, 2006年第3期。
- 赵勤, “市民社会、公共领域及其与中国法治发展的关系”, 《开放时代》, 2002(3): 22—31。
- 赵中鹏, “王海打假后院起火、昔日合作伙伴开打‘口水战’”, 《北京晨报》, 2004年5月24日。
- 中共研究杂志社, 主编, 《大陆地下刊物汇编》, 共20卷, 台北: 中共研究杂志社, 1980—1984。
- 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出版署, “中央关于出版‘文化大革命’图书问题的若干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新闻出版法规汇编(1949—1990)》, 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政策法规司编, 页231—232页,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中国互联网络中心, “中国农村互联网调查”, 2007年8月, 链接: <http://www.cnnic.net>, 获取日期: 2007年11月28日。
- 中国互联网络中心, “中国农村互联网调查”, 2008年3月, 链接: <http://www.cnnic.net.cn>, 获取日期: 2008年4月3日。

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络报告，郭良主持，“2007年中国7城市互联网使用状况及影响调查报告”，2007年7月。

中华环保联合会，“中国公民组织发展调查报告”，未发表，2006。

周不同，“网易借力‘华南虎事件’实现新闻采编突破”，链接：<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2270652>，获取日期：2008年2月14日。

“河水”[用户名]，“上网三月之体会”，2001，链接：<http://www.hxzq.net/home/cunwei/xlu184.htm>，获取日期：2004年6月17日。

《华夏文摘》编辑部，“《华夏文摘》编辑电脑‘键’谈会”，《华夏文摘》，第100期，1993年2月26日，链接：<http://www.cnd.org/HXWZ/CM93/cn9302d.hz8.html>，获取日期：2006年12月12日。

《南方人物周刊》，“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50人”，2004年9月8日。

《新周刊》，“我世代”，2006年6月1日。